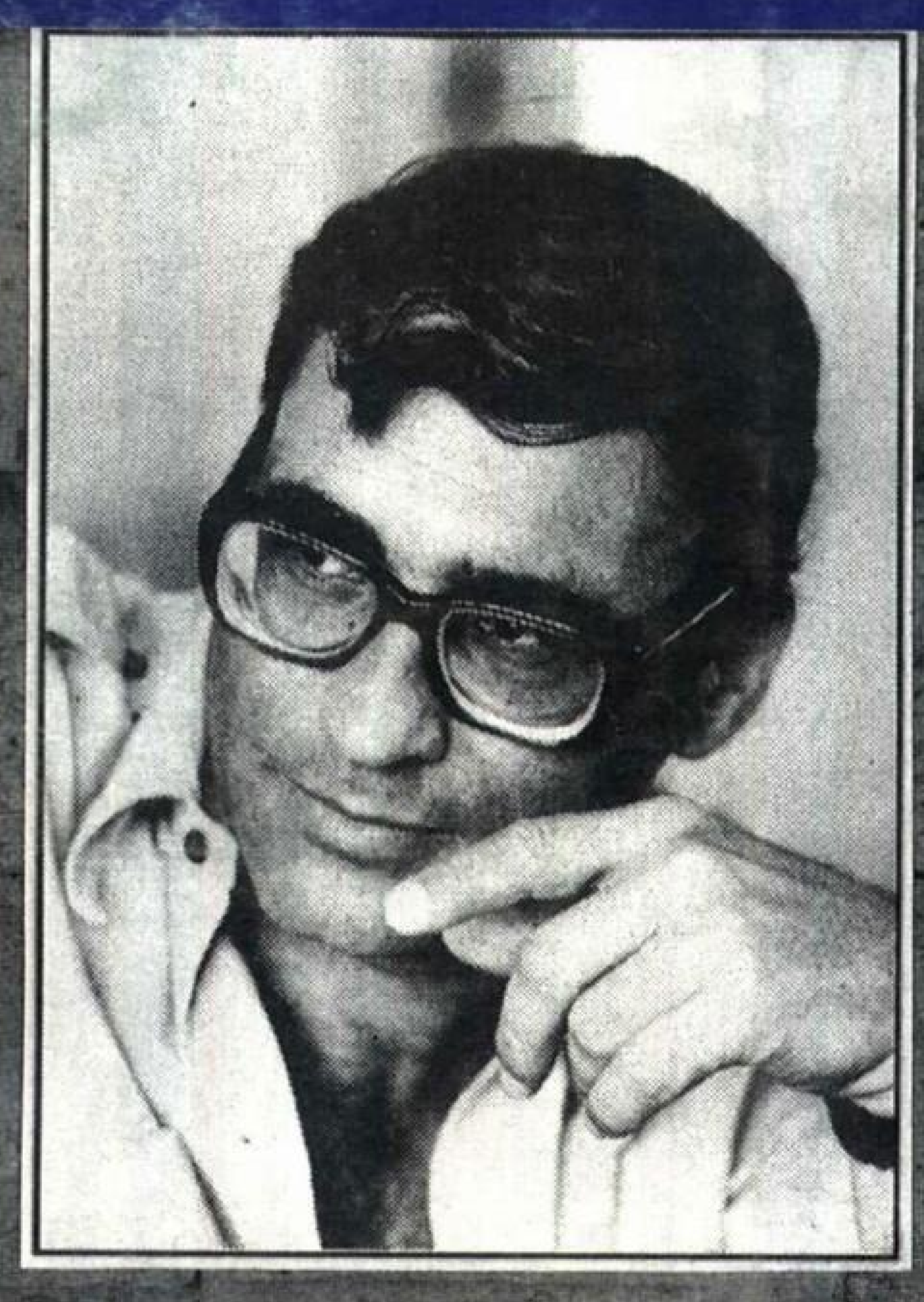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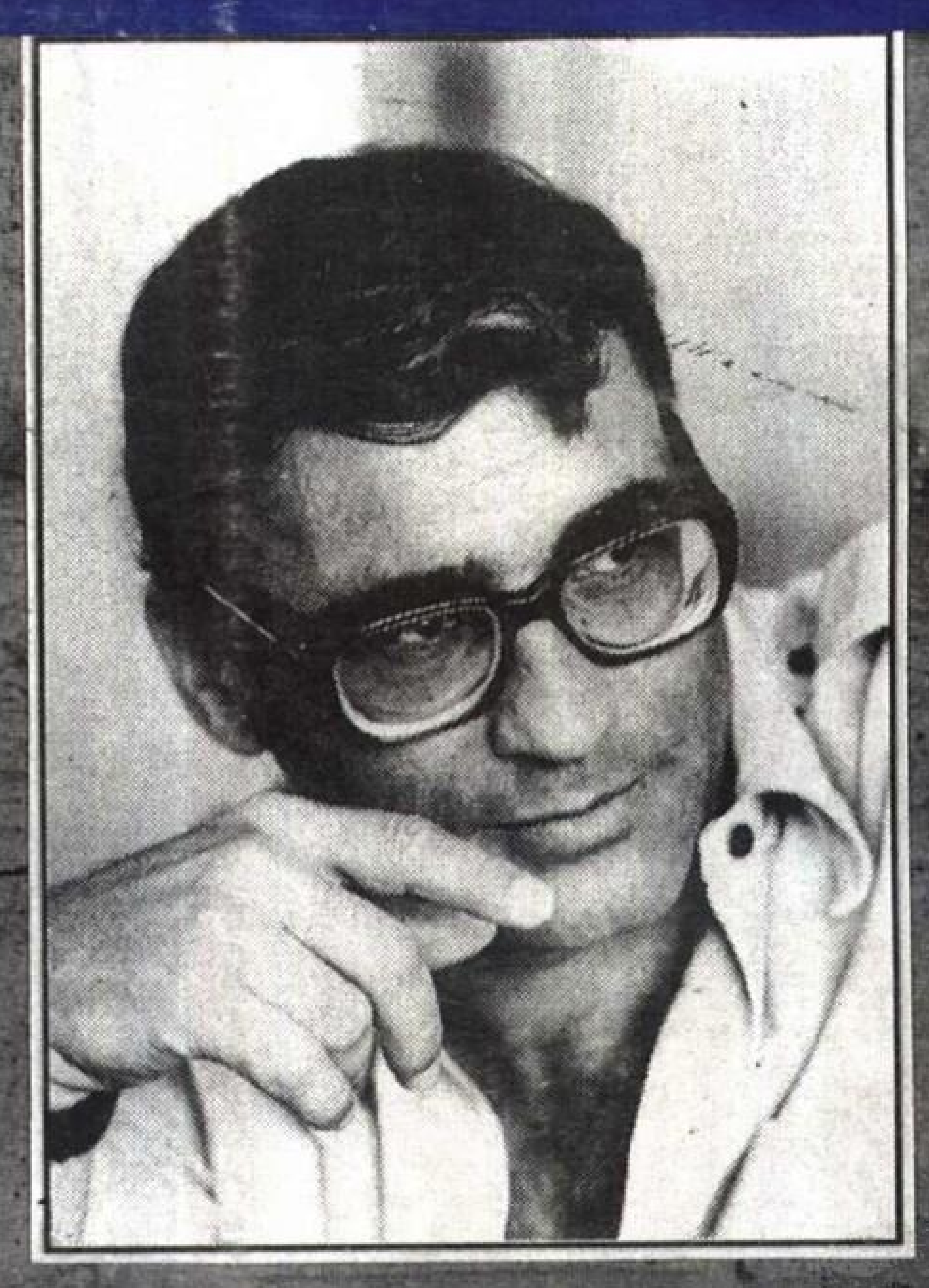
过去的延续



〔以色列〕雅可夫·沙伯塔依 著

过去的延续



〔以色列〕雅可夫·沙伯塔依 著


ISBN 7-5360-2052-X
9 787536 020528 >

定价：7.50元

过去的延续

〔以色列〕雅可夫·沙伯塔依 著
麦梅娟　谢　咏 译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 05 号

策划编辑：关天晞
责任编辑：佘红梅
封面设计：王惠敏
责任技编：岑宇峻

过去的延续

〔以色列〕雅可夫·沙伯塔依著
麦梅娟 谢 咏 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州市飞马彩印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1 插页 150，000 字
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60—2052—X
I·1773 定价：7.50 元

作者简介

雅可夫·沙伯塔依1934年生于特拉维夫，退役后加入梅尔哈维亚集体农庄。在那儿生活的十年里，他开始创作剧本、短篇小说及抒情诗，1967年携妻子和二女回特拉维夫以集中精力写作，1981年8月心脏病猝发夺走了这位天才作家的生命。

《过去的延续》被译成英、德、意和西班牙文。

内容提要

一个普通的家族，衍生了无数的亲朋好友，由他们又各自维系着不同的社会关系。众多的角色在人生的舞台上唱着不同的歌。生者与死者、过去与现在交替出现，极不合谐，甚为怪诞。道尽了世情的淡漠、生存的无奈、人性的复杂和理想的坍塌。

作者通过意识流手法，在纷繁琐碎的生活中寻找意义，并以极具个性色彩的表现手法，使小说蕴含着幽默和无穷的趣味。其价值，透过评论界的声音可见一斑："《过去的延续》的叙述语言非凡，使用了新的意识流手法。在文学中，极少有人如此深入地刺入家庭生活神秘故事的内核，如此深刻地把握代代相传的变化。先前严格而不成熟的生活让位于现在的充满激情却无方向的生活。"（《新共和》杂志）"这部以色列小说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巴尔扎克式的图画，家庭和民族处于困境之中，生活和理想失控，天堂崩坍。""我记不起，这几年能有一部小说像《过去的延续》以天才的手法和对道德生活实质的毫不留情的剖析而打动人。"（《纽约时报图书评论》）

1

戈尔德曼的父亲是4月1日去世的，而戈尔德曼却是1月1日自杀的，当时，由于不断地超脱自我，不断地反思，同时凭借“补尔活”健身器材和有规律的生活，尤其多亏了天文学和翻译了《梦幻》，他似乎即将跨进一个新时代，正要发生变化。只有塞扎尔指出了戈尔德曼之死与他父亲之死在日期上的奇怪的巧合。甚至在戈尔德曼下葬后几天他就指出了这一点。当时他和伊斯拉埃尔在厨房里，伊斯拉埃尔给他们两人各倒了一杯茶。不过，他只是把这事当作没什么意义的奇闻轶事提起来的。因为那时他实际上已抛开了一切，除了迫不得已的事，他一点多余的力气都不想花。在这个无可救药、日益沉沦的过程中，他依然衣着入时，衣服颜色光怪陆离，留起了胡子，吸最考究的香烟，暴饮暴食，见女人便追。可是，他最主要的思想，他剩余的毅力都集中在他的长子身上了。这孩子身患绝症，没有希望了。在塞扎尔看来，生活仅仅是一场莫名其妙的惨败，

要不就是一场只好无奈地付之一笑的恶作剧，或者是当他被失望、懊悔的情绪困扰时痛苦地称之为“兴高采烈的自杀”的东西。如果戈尔德曼没有死，那么毫无疑问只有他本人才能试图破解隐藏在奇怪的巧合后面的含义。其实，并没有任何秘而不宣的含义，除了塞扎尔同父异母的姐姐吕阿玛可能会用嘲讽的口气称之为“带文学色彩”的含义之外。事实上，年初时，就像每年年初那样，实际是每日之初，不能忍受“生存试验”的戈尔德曼都决定翻开他生活中新的一页，就目前的具体情况来说，亦就是完全摆脱这种试验，转向另一种生活方式，或者用他的话来说，另一种“生存方式”。这种方式包括了一种绝对的自由和一种完全坚定不移的信念。尽管他有怀疑主义思想，尽管他始终信仰唯理论，但却是竭尽全力地坚信这种“生存方式”，只在某个时期例外。那时，他曾多次试图信教，但却徒劳无功；他否定了怀疑主义，也否定了自己的社会主义观念。至于戈尔德曼的父亲，埃法拉伊姆之死，大概可以说他之正好在某个 4 月 1 日死去，那只是想开个玩笑，因为除了他过去在难得心情愉快的时候喜欢搞些早已被人们遗忘的逗笑的花招之外，这是他唯一的幽默方式。

埃法拉伊姆的妻子勒吉娜在他去世没几天后就开始使用斯蒂法娜这个名字。她也在这种巧合中看到了带有恶意的、报复的思想；这并不因为他选了 4 月 1 号这个日子去死——无论如何，这对于她来说已不再是某个 4 月 1 号了，而是因为这是一个酷热难当的日子，它宣告极为令人讨厌的夏天开始了。第二天，即举行葬礼的日子，炎热会一直

持续下去，甚至会越来越厉害。整个城市罩在一层热辣辣的干燥空气里，亮闪闪，仿佛要裂成碎片，变成细细的浮尘，慢慢随着灼热的东风飘去，散失在光灿灿、万里无云的天空里。太阳当空照，散发出令人生畏的热量，整夜不停。伊斯拉埃尔淋浴完后，又在阳台上呆了好久，看着黑沉沉、空荡荡的街道，然后很艰难才睡着了。天亮以前他就醒来，几乎整个白天都躺在塞扎尔公寓房间里窄窄的沙发上，盖着一条厚厚的栗色粗毛毯子。

早晨，天刚亮，他便坐到钢琴前面准备继续练习《戈尔德贝尔格[①]的变奏曲》[②]，结果却漫不经心地凭记忆弹起了普罗科菲耶夫[③]的《讽刺曲》，一直到热得受不了，自己也弹不下去了，才停下来。失望之下，他又回去躺在沙发上。脑海里思绪纷乱，精神无法集中，不知为什么老想到饱受失眠折磨的德累斯顿的凯兹宁伯爵以及他的羽管键琴演奏者约翰尼·戈特尼埃布·戈尔德贝尔格，他不由自主地在脑海里胡乱地想着这些名字。它们混在一起，成了各种各样的组合，川流不息、毫无变化地出现。约翰尼·戈尔德贝尔格·戈特尼埃布·德累斯顿·凯兹宁·戈尔德贝尔格·戈尔登·约翰尼·凯兹宁·戈特尼埃布·德累斯顿·戈特尼埃布·约翰尼·凯兹·约翰尼·戈特贝尔格·戈特宁·宁贝尔格·约翰尼·德累斯顿·戈尔登；而他的目光却像蜘蛛网般向前方延伸，映出他脸庞的镜子、天花

① 戈尔德贝尔格（1727—1756）德国作曲家。
② 指德国作曲家巴赫（1685—1750）为戈尔德贝尔格写的变奏曲。
③ 普罗科菲耶夫（1891—1953）俄国作曲家。

板、布满灰尘的霓虹灯和那些照片。照片挂在肮脏的白墙上，钉在把他的房间与隔壁房间分开的宽阔的门上，照片上是雪中的城市、湖泊、绿树、豪华的汽车以及裸体或穿着泳衣的古铜色皮肤的性感女郎。

一部分照片是塞扎尔自己拍的，也是他用图钉和胶粘带把它们挂起来的。这些照片使他精神抖擞，同时把他的欲望自豪地、直率地表露出来，明白地表示他没有继承他父亲埃尔温的自我抑制，他是故意作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来发展这一方面的，他一直这样生活，感到自豪，引以为荣。

只是在钢琴前方上角挂着一张明信片，这是埃拉带到以色列来的，它被安放在钢琴的一个角落里：这是格列柯[1]的《圣——弗朗西斯》的一个部分的复制品。整个画面是绿色的，画里是一个又高又瘦的男人，胡子拉碴的长脸很严肃，甚至可能显得庄重。他穿了一件修道士的袍子，跪在地上，手里拿着个颅骨给一个跪在他面前的年青人看。这个年青人离他很近，但处的位置比他低，也穿着修道士的袍子，头上也像年长的那人一样戴着兜帽，双手交叉在胸前，貌似祈祷，双眼盯着那个头颅，既恐慌又惊奇，年长的修道士则瞧着他，表情宁静，尤其显得很顺从。

一缕苍白的阳光透过南面朝街的百页窗射进来，落在明信片上。伊斯拉埃尔从沉睡中醒来，浑身是汗，目光呆呆地盯在年青人、男人和头颅上面，听着塞扎尔跑上楼的

---

① 埃尔·格列柯（约1541—1614）西班牙画家，原籍希腊。

脚步声。塞扎尔把公寓的门开得大大的，走进了房间。他穿着淡紫色长裤，橙红色衬衫，阔脸庞涨得通红，大汗淋漓，心情愉快，厚厚的眉毛下面一对小眼睛在肮脏的眼镜后面骨碌碌地转动，好像两只快乐的小老鼠。

他从脖子上摘下沉甸甸的照相机后就问伊斯拉埃尔有没有他的电话。伊斯拉埃尔告诉他泰伊拉曾打电话找他，晚上她会再打来。塞扎尔说："埃莉兹拉没打来吗？"同时满怀希望地看了伊斯拉埃尔一眼。伊斯拉埃尔仍然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只说"没有，她没打电话"。塞扎尔说了句"贱货"。然后，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包罗特曼牌香烟，点了一支，几乎是得意洋洋地向伊斯拉埃尔宣布戈尔德曼的父亲死了，送葬队伍两点钟离开市停尸房。伊斯拉埃尔前一天已知道这件事，这可是塞扎尔那天早晨打电话告诉他的。

伊斯拉埃尔一声不吭，一时间静得有些压抑。塞扎尔不停地用湿手绢在脸上和脖子上擦汗。他把伊斯拉埃尔惹火了，因为他让烟灰掉到地上。塞扎尔打破了寂静，问他对戈尔德曼父亲的死有何看法，伊斯拉埃尔正情不自禁地望着堆积在地上的小堆烟灰，还来不及答话，塞扎尔又补充说已经1点半了，最好动作迅速点。伊斯拉埃尔坐在沙发角落里，问是否可以不参加葬礼，到戈尔德曼家里吊唁一番便行了；尤其现在两人都知道了戈尔德曼和他父亲之间的关系的性质，再说，戈尔德曼实际上不重视，甚至讨厌宗教仪式。假如可以的话，他连自己父亲的葬礼都不一定参加，更不用说参加某个朋友父亲的葬礼了。但是，塞扎尔喜欢聚会、其它类型的庆祝活动、不幸的事情或者悲

剧性事件，所以他坚持参加葬礼是他们的责任，戈尔德曼和他父亲关系的性质与他们无关。现在戈尔德曼的父亲去世了，尽管他对宗教仪式持否定的态度，他自己也信奉唯理论，但相信他内心一定不会原谅他们的缺席，不会原谅他们让他孤零零地陪着母亲参加父亲的葬礼。按照同样的思想范畴，他注意到理智与逻辑是有限度的，哪怕是世界上最有逻辑的人也有这条界限。生活不止一次强迫我们去做一些不合逻辑的，甚至令人讨厌 的事，因此，不管怎么说，就他个人而言，他将去参加葬礼，如果需要，一个人也去。他催促伊斯拉埃尔起身陪他前往。伊斯拉埃尔从沙发上起来，毫无表情。他到浴室洗澡，一面咒骂塞扎尔、他自己和戈尔德曼的父亲。他的死既不使他难过，也没引起他的同情，甚至丝毫不使他觉得意外，因为他在突然脑出血之后便毫无知觉地在医院病床上躺了两星期，医生都已对他的死亡下了定论。不过，他有时会清醒一会儿，生气地要这要那或者嘟哝几句。有一天，他甚至在戈尔德曼耳边艰难地说："我想我曾在我的一生中有过一些作为。"他每个字的尾音都已讲不出来，声音变了，沙哑而低沉，就像从阴暗的陶管中发出来的。戈尔德曼略为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他的父亲。此时此刻无能为力地躺在死亡的床上的父亲引起了他的怜悯，特别是引起了一种不自在的感觉，这种感觉从表面上看不出来，主要来自他内心深处，他始终对他父亲耿耿于怀。

医生对戈尔德曼父亲短暂的清醒不以为然，向家人建议"要作更坏的打算"。事实上，勒吉娜——戈尔德曼的父

亲在一次短暂的清醒中要人把她从床前赶开——已早有“更坏的打算”，她轻松地舒了一口气：“他死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他复生。”

伊斯拉埃尔曾两次陪戈尔德曼去医院探望他父亲，有时甚至进入病房。老人裹着白床单，身上连着一大堆管子，像死人一样一动不动地躺着，兔子般的红眼已呈白色，张得大大的，毫无表情，脸色灰蓝，整张脸肿胀、变形。

戈尔德曼坐在床边，把手挪近他父亲的肩膀，冷漠地触摸了一下。伊斯拉埃尔站得后一点，冷冷地、甚至厌恶地望着老人。但是后来，当他和戈尔德曼走出医院来到大街上，甚至在以后的几天里以及老人死了之后，对这一幕的回忆始终使他的情绪极度消沉，那是由于他在一切事情中都看到的无能、古怪，由于时刻等待着戈尔德曼父亲的可怕而又不可避免的毁灭。尽管他可以表现得很洒脱，但一些纯属偶然的情况使这种缠绕着他的感觉不时出现；比如看到或听到什么东西，一种气味、一条报上的新闻、一段乐曲都会引起这种感觉；最近，更由于埃拉的缘故。从早上开始，他就一直地想着埃拉，觉得时间过得很慢，无聊透顶，房间里头又闷又热。

他和埃拉是在电影院里偶然相识的。她当时穿着牛仔裤，暗绿羊毛大衣，里头是黑羊毛套衫，跟别的女孩没两样，可是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她就使他觉得她来自一个陌生的、甚至可能是不存在的地方，他倒不真的觉得她仿佛没有出处，而是觉得她是突然从真空里出现的，某一天又会消失在其中，他没法抓住她。不过，他没有向任何人说

起这种感觉，尤其没有对塞扎尔说起。塞扎尔已回到了另一个房间，那是他的照片冲洗室，里头充塞了一大堆椅子、滤色器、聚光灯、摄影器材、碎布、各种杂志、破旧的东西。他动手给相机换胶卷，嘴里哼着“ob—la—di—，ob—la—da，生活在继续”，然后，他倒了半杯威士忌，来到浴室门口站住，又问伊斯拉埃尔有没有别的人打电话给他。

伊斯拉埃尔说“没有”。塞扎尔小口小口地呷着威士忌，说道：“这个戈尔德曼早就该死了，他打败了死亡，叫它片甲不留。”他又说：“他这种年纪死了，可太好了，再好也没有了。”他看着伊斯拉埃尔。伊斯拉埃尔一声不吭，把毛巾放回原处后就进房去穿衣服。塞扎尔跟着他，把威士忌杯子搁在钢琴上，把身子靠上去，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白信封，对伊斯拉埃尔说：“瞧我这些东西！”他从信封里抽出一沓色情照片，照片上是两男两女——一个金发，一个棕发，长着硕大的乳房——做爱的各种姿势。有一对对的，也有四个一起的。塞扎尔一张张翻看照片，一面独自发表议论，一种欣喜若狂的表情掠过他那通红的脸孔，他不时发出轻轻的笑声、赞叹声，还不忘记有机会就递一张给塞扎尔，嘴里发出惊叹：“你瞧这一张怎么样？”或“你给我瞧他怎么干她，这混蛋！”通通看完后，他的目光久久地盯着最后一张照片，然后才把它们全部放回信封里去。他喝了最后一口威士忌，说道：“我们喜欢结实的大腿，硕大的乳房，我就喜欢这些东西。”他把信封放回衬衣口袋里，进“暗房”呆了一分钟，出来时朝正在上厕所的伊斯拉埃尔叫道：“快走吧，别让戈尔德曼的父亲溜了。”

伊斯拉埃尔从洗手间钻出来，穿上便鞋。塞扎尔喝完了杯里剩下的威士忌。他们两人下楼来到街上。满街白晃晃的阳光刺得他们睁不开眼，稠密的空气像着了火似的，一股熔化了的沥青味，尘土味、废气味和仿佛一夜之间已开了花的丁香、夹竹桃的或浓或淡的香味混在一起。热和光来自灰白的天空、人行道和房屋的墙壁，那么强烈，好像有人在薄薄的地壳下面点燃了无边无际的节日篝火，连纹丝不动的树枝上的最小的鸟儿都受到致命的打击。伊斯拉埃尔有一阵子睁不开眼睛，说了句“可怕的地狱”，然后继续走在塞扎尔旁边。塞扎尔把照相机挂在脖子上，口里哼着“ob—la—di—，ob—la—da”，一直重复着同样的歌词，不去理会是否唱得准确。

他们朝汽车站走去，因为塞扎尔的车子坏了，两周前已送进修理厂。在路上，塞扎尔问是否可以停一会，他要打个电话给维基。于是他们走进了一个咖啡店，塞扎尔拨了 3 次号码，对方都没人接，他生气地把电话挂上，骂了句“臭婊子”，不过，走出咖啡店后，他却微笑着说：“她真棒，这个小维基，只是可惜她已经结了婚。”他只是轻描淡写地咕哝了两句，并不真的很担忧。因为一方面他觉得维基属于他，就好像一切可以给他提供快乐的东西那样，因此他希望她属于他，而不是突然属于另一个人；另一方面，他相信即使结了婚，他们还可以继续偷偷会面，悄悄地、快乐地享受床笫之欢。因为归根结蒂，塞扎尔不想，也不能想象美好的事情终有一天会完结。这些天来，除了与泰伊拉和埃莉兹拉的关系之外，他整天担心的便是他的头发的

脱落，他开始真正感到痛苦了，他用各种香皂、美容品、按摩来与之抗争。尽管他变成秃顶已是事实，他还是不甘心；甚至现在在汽车站前，他都要跑进邻近的一间药店买两瓶约乔姆牌荷尔蒙，这种洗剂他已用了两星期，里面包含了一种有效的抗秃发激素成分。

就在这时，汽车来了，塞扎尔和伊斯拉埃尔上了车，付了两人的车资。他很活跃，正是这种活跃使伊斯拉埃尔越来越生气。不过塞扎尔一点没注意，因为他的脸孔毫无表情，而塞扎尔亦一心只顾想自己的事。坐下来后，他才兴致勃勃地讲他的激素洗剂。如果你相信产品说明书的话，这种洗剂是经过了14年的研究和试验才发现的，据说能根治任何程度、甚至已发展到严重地步的秃发。比如著名的荷兰拳击运动员伯夫·旺·克林弗朗的情况就证明了这一点。他的两幅照片登在说明书中间，展示了他的后脑勺在用约乔姆牌荷尔蒙治疗的前后情况。然后，他谈起了当天早上在一间罐头厂拍的照片，他还说埃莉兹拉没有给他打电话。

他心里老想着这个问题，又想到泰伊拉说过可能傍晚时分还要打电话来，便沉默下来，点燃了一支香烟，又独自沉思起来。不过，过了一会，他又转向伊斯拉埃尔，说道："等泰伊拉打电话来，你就告诉她我去了耶路撒冷，明天才回来。"伊斯拉埃尔说："好吧！"他通过布满灰尘的汽车玻璃窗看着商店、行人和电影院。这个电影院在一块沙质空地上，小时候他在那儿见过戈尔德曼的父亲戴着鸭舌帽，身穿汗水湿透了的工作服推着一辆独轮车，与其他工

人一道正在给建筑物打基础。

2

空气里弥漫着丁香和夹竹桃的香味，蓝湛湛的天空万里无云，空气清新宜人，甚至有点凉爽，好像那个秋日的黄昏：戈尔德曼的父亲牵着卡曼斯卡娅的黑狗，把它绑在他们居住的屋子大院的自来水管上。在当时发生的这一切事情中含有一种阴森森的暴力和无边的恐惧。在温馨的空气中洋溢着甜蜜、宁静的轻松气氛，鸟儿把巢筑在丁香、柏树、蓝花楹、巨大的榕树和红花绿叶开始凋落的一品红的枝条上、九重葛遮蔽下的管道弯曲处，它们像过节那样放开嗓子啁啾鸣啭，整个院子里一片快乐的吱吱喳喳的鸟叫声。卡曼斯卡娅自己——天知道她正在干什么！——这是个高大的金发女人，火爆脾气，醉醺醺，一双惊恐的绿眼睛，性感的厚嘴唇——可能刚刚与外号叫迪亚吉莱夫① 的退休芭蕾舞团团长，或者与大家常常看见跟她在一起的年青画家，或与其他人，可能是个管子工或是个陌生人做完爱。也可能她在埋头读书或呼呼大睡。因为她的时间安排混乱，日夜颠倒。这一点激怒了戈尔德曼的父亲，他盲目地相信世界是存在一种秩序的，有善有恶，但绝没有中间

① 迪亚吉莱夫（1872—1929），俄国艺术评论家，剧团经理，创立了俄国芭蕾舞。

地带。世界建筑在一种有规律的时间安排上面，比如，早上7点前或最迟8点起床。而这个卡曼斯卡娅却毫无秩序，醉醺醺，以致于打仗的时候她竟然好几次穿条裤叉，戴个胸罩就下到防空洞里。她又那么任性、忧郁，有时半夜里会像个精神错乱的人那样放声歌唱，仿佛想把黑暗撕裂，让她身上困扰她的欲望，让在她唱的俄国曲子、歌词里的欲望把她带走，带到苍穹之外的地方。总之，她是那样的堕落、绝望，有时会在罪恶、谎言或诲淫中寻求解脱。但是戈尔德曼的父亲拒绝原谅她，他恨她，恨她和她的举止、她的歌曲、她的衣服以及她起名为"黑夜"的那条黑狗。这条狗被捆在水管上，静静地盯住戈尔德曼的父亲。后者脸色苍白，恐惧和歹毒使他的脸绷得紧紧的。"黑夜"甚至摇晃着尾巴，因为它这时还估计不到戈尔德曼的父亲几秒钟后就要杀死它。可是，戈尔德曼的父亲走近它，猛然从怀里掏出一把大铁锤，又快又狠地向它的头部砸去。"黑夜"发出了一阵奇怪的呻吟，身体摇摇晃晃，戈尔德曼的父亲用尽全力喊道："快死！快死！它该死！"他继续像疯子般打它，一直到狗倒在地上，整个头都被打碎、砸烂为止。它最后还抽搐了几下，发出最后一声喘息，倒下死去了。血和脑浆溅了一地，溅到马鞭草和还开着花的木槿的叶子上以及水管和屋墙上，残留在那儿，直到下了几场雨才把这一切冲洗干净。

戈尔德曼的父亲杀死了"黑夜"之后便赶紧去冲洗铁锤、双手和嗦嗦发抖的身体。他把狗尸塞进一条口袋，扔到老远的地方，扔到其中一块荆棘、矢车菊、野草丛生的

宽阔的荒地里。这些荒地和阿拉伯村庄的巴尔巴里柑桔园和成排的无花果树一起向远方延伸。几年之后，村庄、荒地、西瓜田、葡萄、小小的桉树林以及吞噬“黑夜”的豺狗都会同时消失，消失在一幢幢建起的新楼房和城市的街道面前。有一辆公共汽车正在经过其中一条街道，驶近终点站，塞扎尔和伊斯拉埃尔在这儿下车，与其他人一道走向市停尸间。塞扎尔不停地冒汗，嘴里说着埃莉兹拉，还说希望在葬礼上看见她，不过要看见她单独一人，他一点不想在那儿遇见她的丈夫吉德翁，尤其是在一个这么炎热的日子里。

伊斯拉埃尔一言不发。塞扎尔告诉他炎热刺激性本能，又继续讲起埃莉兹拉。他说她与一个无法在性方面满足她的丈夫在一起实在是浪费了生命。她的丈夫除了鬈曲的金发，有点文化，懂点英语，和蔼但也令人厌烦之外，在他看来一文不值。他一口气地往下说，一直到了墓地大院才停止。院里挤满了人，他们来向死者表示最后的敬意，并且陪伴他们走完最后一段旅程。

等待的时候，有些人来回踱步，另外一些人小堆小堆地围在一起谈论死者和他们的疾病、他们的亲人和家庭，谈论炎热、政治以及生意。从这儿、那儿传来哭声、呜咽声、手绢的窸窣声。在一面墙上镶着一行铜字：“至于世人，他的年月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①] 塞扎尔和伊斯拉埃尔久久地呆在院子门口，看着四周，看看是否在人群中

① 见《旧约》的《诗篇》第103篇。

发现几张熟脸孔。慢慢地、不知不觉地，他们便被卷进人群中，与他们溶合在一起。塞扎尔给相机再装上胶卷，拍起照片来。这时，看不见的扬声器宣布死者的名字，他的送葬队伍要出发了。这时，哭声大起来，人群动了，走拢一起或者给抬黑担架的人让出路来。担架上躺着死者的躯体，后面慢慢走着家人、亲戚、朋友、熟人和邻居。塞托尔不停地拍照，拍抬担架的人、死者、他的哭哭啼啼的妻子和家人，送葬的人；而且他还继续拍其它照片，一直到队伍走出院子，装运尸体的黑色灵车启动，驶向墓地为止。在这期间，扬声器宣布下一个死者的名字，但这一个和下一个都还不是戈尔德曼的父亲。伊斯拉埃尔在嘈杂的人堆里汗流浃背，热得透不过气来，越来越恼火。终于，他转身对还在拍照的塞扎尔叫起来："我要走了！"可是，塞扎尔把他拉住："等一下，我去看看。"他去看看戈尔德曼的父亲出了什么事。一会儿，他便回来了，他说："我们给耍了，他已走了好久了。"伊斯拉埃尔问："去了哪儿？"塞扎尔朝他微笑着说："基里亚——夏乌尔。"伊斯拉埃尔一言不发，但内心这时暗暗希望大地裂开道口子，把包括他和塞扎尔在内的全部人吞下去。塞扎尔又说："喂，来吧！别浪费时间。"他大步朝出口走去，准备乘开往基里亚——夏乌尔的公共汽车。

伊斯拉埃尔实在想回到公寓去淋浴，弹弹钢琴，等着埃拉到来。不过，他还是跟着塞扎尔朝汽车站走去，站在他旁边，气得紧绷着脸，无可奈何地忍受从无云、飘着一层薄雾、光灿灿的天空射来的无情的阳光的烤炙。塞扎尔

这时却匆匆地看了一下抗秃发洗剂的说明书，又仔细看了著名荷兰拳击运动员的脑袋，微笑着说："骗人精。"他把说明书放回口袋，诅咒给他修汽车的工人以及犹太人葬礼的繁文缛节，他本人比较喜欢罗马人火葬遗体、用漂亮的骨灰盒保存骨灰的习惯，这些骨灰盒装饰着他们的门槛。他说他最后的心愿是把他自己的遗体烧掉，骨灰随风飞散。伊斯拉埃尔从来没有真正解释过戈尔德曼的父亲为什么要杀掉"黑夜"。他现在眼睛盯着街道对面的桉树，来往的车辆，始终一言不发。

就在那儿，他和阿维诺阿姆和索妮娅的弟弟阿诺克·勒维阿唐——学校里的同班同学，两年后得肺炎死了——躲在爱神木后边，芳香的大柏树的阴影下看见了这件可怕的事情发生在离他们几步的地方。阿诺克浑身发抖，伊斯拉埃尔却像泥雕石塑般一动不动，一直到戈尔德曼的父亲带着狗尸离去。他当时呕吐了好几次，然后他漱了口，洗了脸就上楼回家去了，浑身一点劲都没有。

有几个邻居说戈尔德曼的父亲之所以杀死"黑夜"，是因为他夜里被吠声吵醒，另外一些人却说，他认为那时候养狗不仅是卑劣，而且是堕落的证明。不只他一个人有这种看法，因为当时独立战争刚结束不久，世道艰难，戈尔德曼的父母与他们大多数邻居、城里的居民一样，无论是三伏天，冰天雪地还是下着倾盆大雨，日日夜夜都排在杂货店、菜贩、肉贩、鱼贩门口那望不到头的队伍里，苦候多时，你挤我拥，筋疲力尽，丢尽脸面，不过是为了带回家里一块可怜巴巴的肉、几块煮汤的骨头、一两个鸡蛋、一

点洋葱和土豆。能弄到这么点东西还得靠别人照顾，或者经过争争吵吵，其中还少不了辱骂，甚至常常是拳脚相加。

这就好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戈尔德曼的父亲就像今天那样拒绝利用他的关系，拒绝在黑市上买哪怕一粒米，迫使他的家庭啃了几乎一星期透着糠味和麻袋味的黑面包，一个鸡蛋还分两半，用仿佛是米粉做的白奶酪、鲱鱼、用掺了水的牛奶以及沙和黑糖的混合物煮成的甜面条汤充饥，这些面条汤通常是晚餐上的主菜。但是卡曼斯卡娅却用最好的色拉米香肠、瑞士奶酪喂她的“黑夜”，让它喝法国白兰地和英国啤酒。狗与她的情人受到同样的待遇，她的情人在退休的芭蕾舞团团长、年青的画家、与她同居几个月的建筑师、一位体操教师，甚至塞扎尔的父亲埃尔温也当了她几个月的情人。

无论如何，可以肯定戈尔德曼的父亲处决了“黑夜”是基于他心中不容置辩的理由，而且他确信这条狗该死才杀它的，哪怕是他自己的狗，他也会这样干。因为他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相信一种俭朴、勤劳、道德、进步的生活，而且是就这些字眼的最基本的意义去理解的。他憎恨右派、修正主义者。他们发了财，就极尽奢华，挥霍金钱；他也憎恨那些诽谤以色列的人。所有这些明明白白、永恒不变的原则组成了一个体制的一部分，这个体制包括了生活和行为的所有领域，一刻也不容损害、不容怀疑。尽管有变化、困难重重，他都不认为有理由偏离这个体制一步。

他知道对于他和对于其他人来说什么是好的，正确的，

他不能容忍错误和过失。因为任何错误，从打碎一只玻璃杯或随便买一双鞋开始直到偷窃或通奸都是一种过失。尽管他生性仁厚，多愁善感，但却一点不准备原谅任何人，哪怕是他的一位亲人或是朋友。因为在他的正直中带有一点狂热，而他的正义感中又有一点混乱，尤其是他有一种不可控制的、想把自己的原则强加于全世界的专制的欲望。这种欲望毫无顾忌地朝不道德的方向发展，使戈尔德曼的父亲在失望和愤怒之间不知所措。总有一些人不知道对于他们来说什么是好的，把事情弄错了，更别说那些故意有心去犯错误的人。总之，所有人都破坏了事物的良好秩序，所有人都一样，只有代表这种秩序的他本人除外。也正因为这个明确的理由，他一刻也不歇息。他的生活中充满了敌对和烦恼，于是他开始指责、揭露和攻击。他用这些原则跟几乎所有的朋友、熟人争论，把所有逃避与他争论的人都拒之门外，只有阿维诺阿姆和索妮娅的父亲约瑟夫·勒维阿唐除外。他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在自己前面筑起了一堵孤独的墙，多亏他那些原则使他战胜了孤独。当他感到失望或是遇到不幸的时候——他的女儿、戈尔德曼的姐姐纳奥米在车祸中死了，或者据另一种说法认为她是自杀的——这些原则帮助了他。

他知道这个消息时勃然大怒，但当他把她下葬时却没半滴眼泪，紧绷着脸。因为在他内心深处，他老早就失去了她；自从她与一个有妇之夫有了瓜葛那天起他便失去了她。那个人外表看来像个英国人，根据他的原则，就凭这一点，她就该受到惩罚，她已经受到了惩罚。但是，当黑

夜降临，他关了灯躺在床上的时候——他已与勒吉娜分床多年，他把脸转向墙壁，用被子蒙着头，痛苦地哭泣。然后，他平静下来，用床单擦干眼泪，天快亮时抿紧嘴唇睡着了。

纳奥米葬在纳哈拉——伊察克墓地。几年前，应戈尔德曼的要求，塞扎尔曾去看过她的坟墓。那是冬季里的一天，戈尔德曼带了他和他的母亲到墓地种柽柳。现在，当他们上了汽车坐下来后，塞扎尔对伊斯拉埃尔提起这事，说道："天下着雨，脚下一片泥泞，真讨厌。"过了一会又说："这个纳奥米可是个了不起的女孩，不过，爱情嘛，老实说，可是狂热的。"他又补充道："人人都离婚。"然后，他又默然不语，一直到了基里亚——夏乌尔墓地。许多人来参加同时举行的好些个葬礼，使得墓地里喧喧嚷嚷，活像个蜂巢。

人们走来走去，等累了就坐到周围的长椅上，或者几个人一小堆、一小堆站着，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走着。送葬队列一队队经过一座丑陋的建筑物前面。这座建筑物的正面写着："生者汇合之地"。送葬行列像黑蛇般在一排排白色坟墓之间的小道上蜿蜒行进。唱经班的人领头，后边是用黑担架抬着死者的人，接着是家属、亲戚、朋友。塞扎尔点燃了一支香烟，说道："全城的人都在这里了。"他们汇入人群，开始找寻戈尔德曼或几张熟悉的脸孔。他们试图从墓地职员口中打听点消息，可是这些人都正忙忙碌碌，急急忙忙干他们的事，大汗淋漓，心情焦躁，不可能告诉他们一点关于戈尔德曼父亲的事。到了后来，才有个

人建议他们去找位于净身楼另一端的墓地办公室。于是他们走过了两层的矮房子，上了两级石阶梯，敲了办公室的门，走了进去。

办公室里坐着个精心打扮的大胖子，一双手又白又厚。他彬彬有礼地接待了他们，听完塞扎尔的解释后，他仔细看了他面前的死者名单，又再查阅一遍后才说他很抱歉，当天没有叫埃法拉伊姆的人在此地下葬，他还特别强调了"抱歉"这个词。塞扎尔问："也许在昨天呢?"那个人回答："也可能。"于是又看了另一张名单，又说很抱歉前一天也没有叫埃法拉伊姆的人在此下葬。塞扎尔说："这不可能。"他首次面带怒容，不耐烦起来了，他在桌上的烟灰缸里压灭了香烟。那个人严肃地盯着他，不过还是克制着自己，依然彬彬有礼，但这一次口气很坚决，说很抱歉，不可能有任何怀疑，因为这个墓地管理有方，不会有人偶尔或由于疏忽被埋在这里，而名单上却没有他的名字。他用同样严肃的声调建议他们去纳哈拉——伊察克墓地，也许会在那边找到他们要找的人。他一下把话打住，口气决绝，不容发问，也不容置辩。他用白手绢擦擦手和前额上部，整理一下无边圆帽，把风扇拉过去对着自己，埋头于桌子上放在他面前的文件堆里了。不过塞扎尔还来得及看了他一眼，说了"谢谢，先生"，然后与伊斯拉埃尔一起离开了房间，无精打采，冲动过后只剩下一脸的不满和倦意，就像一盘残羹。

伊斯拉埃尔看看塞扎尔，有一刹那想建议他回城里去，不过他没这样做，而是静静地跟着他，从送葬行列的人群

和死缠住他们的乞丐中挤出一条路。他们走出墓地，沿着一条一边是田、柏树、柑桔园，另一边是墓石加工工场的窄路往下走，想在大路上找一辆公共汽车或出租汽车把他们载到纳哈拉——伊察克墓地去。这时，伊斯拉埃尔决定即使塞扎尔跪下来求他，他也不会同意再来。可是，塞扎尔并没求他，而是点燃了一支香烟，说道："这些教士全是混蛋!"然后又说："你都看见了，这个该死的办公室，就像'牛肉香肠'那种人，绝对的像。"伊斯拉埃尔答道："可能吧!"塞扎尔说："叫他见鬼去吧!他和他的墓地都见鬼去吧!"然后又补充说："不管怎么说，'牛肉香肠'那家伙以前倒挺有人情味，你去问戈尔德曼，他的妻子还吻过他呢!"办公室里的那个人使人有点想起'牛肉香肠'埃尔贝尔先生。塞扎尔很长一段时间在他那儿吃中饭，因为他妈妈认为非得每天端给他吃的牛奶面条汤使他腻味、倒胃。

3

戈尔德曼一个人在"牛肉香肠"店里吃饭。因为当时纳奥米还在驻亚历山大的英国军队中当司机，他的父亲大多数时候在英国军营里工作，星期六才回家。当他在城里工作时，他就只好吃勒吉娜为她准备的粗茶淡饭，他下班回来三扒两拨就把饭吃完。每天上餐厅的路上他都觉得恶心。当他走过那一大片红粘土地时——这块地以前是他们

的足球场。红色奥地利人和他的妻子经过不懈的努力把它变成欣欣向荣的园子。他们把蔬菜运到市中心，后来则运玫瑰、康乃馨、金鱼草、葛兰、大丽花。一直到独立战争后不久，土地价格猛涨，他们才放弃了园子，把土地卖给别人。那个人在那里建了一幢包括办公室、商店、餐厅、夜总会、电影院的大型建筑——戈尔德曼想到会有意外的喜悦，心里就激动起来。可是，他的希望总是落空，因为"牛肉香肠"的菜单总是千篇一律的：几片黑面包，用浸透水的蔬菜煮成的汤，一种用塞马铃薯馅的丸子做的肉汤，两条旁边配蔬菜的香肠，或者一盘叫"霍佩尔——波佩尔"的菜，实际上是一盘淡红色的液体，面上漂浮着几块可怜巴巴的肉丸，半杯上面点了红点、放了糖的南瓜布丁。有时也和他一起去的塞扎尔特别钟爱这道点心，只是因为这一点他才会陪同戈尔德曼，并且耐心地等待上最后一道菜。

埃尔贝尔先生、太太都是原籍德国。他们体面的举止、高大的身材以及干净利索都令人敬畏。他们的双眸是黑色的，皮肤光滑而无光泽，埃尔贝尔太太长着两条健壮的腿，动人的厚嘴唇，黑黑的头发盘成髻。埃尔贝尔先生的胡子总是刮得很干净，戴一顶黑色的无边圆帽。他们高高兴兴地接待顾客，态度沉静，礼仪周到。因为他们两人之间相处也是采取同样的方式，看起来就像一对非常合拍的兄妹。直到有一天，他们两人之间爆发了一场争吵，这种和谐被彻底打破了。埃尔贝尔先生因为怨恨，脸都发白了，用德语辱骂他的妻子，就在餐厅里用拳头打她，盛怒之下又从

挂勾上扯下一条香肠来打她。这一切发生得那么快，那么出人意外，死一样的寂静顿时笼罩了整个大厅，有些顾客很尴尬，不知如何是好，于是继续吃饭，好像什么都没看见；而另外一些人想去调解，让埃尔贝尔安静下来；但大多数人，好像那些聚在街上的人那样，停下来看着这一幕。只有一个男人与众不同，他站在戈尔德曼后面不停地叫："好了，停下，你要把香肠打坏了，这是一场战争！"

第二天，埃尔贝尔太太和她的阿拉伯情人逃跑了。不久，餐厅关了门，成了一间书籍文具店，又在好些年间成了鞋店，一直到有一天又重新改为餐厅，不过，当然跟埃尔贝尔先生那一间不一样。几年前，戈尔德曼还在一间卖玻璃、水晶器皿、银器和工艺品的小店里偶然遇见埃尔贝尔先生，他把他介绍给伊斯拉埃尔和塞扎尔。现在，塞扎尔看着伊斯拉埃尔说："这些人真是疯了，竟会跟个阿拉伯人跑了。"过了一会，他又一面暗笑一面说："我已经说过爱情是狂热的。"他用脚去踢大路上的一块石头，然后从口袋里取出淫秽照片，贪婪地赶快看了一眼，说道："你知道，我的胃口可大了，我要把全世界都吃掉。"他又用同样的口气谈起看来毫不相干的他的同父异母姐姐吕阿玛的前夫阿维格多尔。这个人把空余时间全花在减肥上面，他在根本瞧不起他的塞扎尔身上唤起了一种奇怪的同情感和满肚子疑惑。他不明白为什么吕阿玛对他这样他还继续爱她，还与她一起生活，就像他不能理解什么东西使这个安安静静的人徒劳地自找苦吃，下班后每周三次去体育俱乐部，把自己关在一间糟透了的又闷又热的房间里，咬着牙，集中

了全身剩余的力量，把杠铃一个劲地往上举。塞扎尔又说了一遍："所有的人都疯了。"伊斯拉埃尔轻轻点了点头，他又接着说："比想象的还要疯，比如，你瞧阿维格多尔，他并不比埃尔贝尔太太好。"他把照片放回口袋里，跑了几步，到了大路上，叫了一辆出租车，把他们两人载到纳哈拉——伊察克。当他们到达时，太阳已开始有点偏西，柏树的阴影拉长了，但是仍然热得很难受，甚至更难受了。好像一层稠厚的蒸气从大路、从褐色的泥土，从墓地四周的墙壁及远远望去仿佛挺凉爽的浓密的柏树丛中升起。

他们走进墓地，打听戈尔德曼的父亲，但也一样没有人听到过这个人。塞扎尔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到处乱跑，气得发疯，几乎不抱任何希望了，他见人就拉住发问，终于只好放弃了。当他一旦要放弃，他就像惯常那样放弃得很突然，很彻底，很悲哀，令人同情。他用湿手绢擦擦前额和脸部，说道："这个下流胚，他不在这里。"他还朝地上唾了一口，伊斯拉埃尔看看他，说道："可是，他死了，总该埋在某个地方。"塞扎尔擦着脸上的汗，喊道："可是埋在哪儿？也许在帕塔奇——蒂克瓦？要不，他可能被扔到海里了？他活着是时候令人讨厌，死了也一样。走吧，没有我们他自己也行。"于是他开始朝墓地门口走去。可是，伊斯拉埃尔原地不动，对他说："他也许在霍隆。"塞扎尔停下脚步，说道："在霍隆？"伊斯拉埃尔说："是的，这里头可能有点什么缘故。"他走近塞扎尔，塞扎尔满脸怒容，说："我什么都不想听，对于我来说，这事已完了，我不想跟在他后面追来追去。不管他上哪儿，都用不着我们，总

之，他已经埋在地下了。”伊斯拉埃尔没有答话，继续走着，穿过大路，朝公共汽车站走去，塞扎尔一动不动地看着他，朝他喊道：“你去哪儿?”伊斯拉埃尔转过身说：“来吧，我们去霍隆!”塞扎尔说：“你这话当真?”伊斯拉埃尔说：“我们白费时间。”他朝快到站的汽车跑去，塞扎尔跟在他后面跑，照相机在他胸前晃来晃去。当他们上了汽车坐下来后，他气喘喘地说：“这个死鬼死了比活着更令人讨厌，他花了我整整一天。我本来要去看看孩子们，或做点什么事。这个婊子埃莉兹拉可没法挂电话说上一句半句了。”他拿下了照相机，放在膝盖上，边点烟边说：“我已四天没见孩子们了。”接下来又说：“你知道，有些日子我会想他们干嘛要活在世界上，什么都不顺利。”他把点着的香烟从汽车窗口扔出去，又在原位坐下，一脸痛苦的表情。

当他们到达霍隆墓地时，已是黄昏时分，微蓝的光变柔和了，那边，田野上弥漫着阵阵幽香的空气也有点变轻柔了。墓地的看守看样子已筋疲力尽，准备关门。他说今天的确埋了个叫埃法拉伊姆·戈尔德曼的人，不过，葬礼在三四个小时前已举行过了。这个消息鼓舞了塞扎尔，使他振作起来。他马上向伊斯拉埃尔建议到坟上默哀一分钟，向死者致意，尤其是表示已参加了戈尔德曼父亲的葬礼。不等伊斯拉埃尔回答，他就转向玩弄着一串钥匙的守门人，问他坟在哪里。守门人手指着一望无际地延伸过去的许许多多白墓碑，指着整个空无一人的墓地，对他们说他不能陪他们去，因为路很远，关门的时候到了，该下班回家了。塞扎尔没有坚持，他向伊斯拉埃尔建议找一天再来，甚至说

要在坟上放个大花圈。不过，今天最好还是回城里去，上戈尔德曼家吊唁和表示歉意。伊斯拉埃尔马上同意了，虽然他觉得毫无疑问，只要给点小费，看门人肯定同意带他们到坟上去，因为这正是他所期待的。当他们明白表示不扫墓要走时，他的声调，他脸上流露的失望之情和送他们走时冷冰冰的态度也可以令人猜到这一点。

他们走了出来，走远一点后，对着墓地和沙丘停下脚步，松了一口气。塞扎尔叫住了一部出租车把他们送到城里去。他说："我累死了，不过还值得。"他重新陷入沉默中，一路上只说了三次话：第一次他又谈起罗马人丧葬习俗的优点，同时说了些关于戈尔德曼父亲的不客气的话，还诅咒他；第二次是他自责四天没有去看自己的孩子；第三次是他要伊斯拉埃尔进城后替他打电话给埃莉兹拉。

伊斯拉埃尔说了句"好吧"，就继续从窗口往外看，脑子里全是《马尔塞利爸爸》的音乐。几个月前，一个冬天的早晨，他与埃拉一起第一次听到这首乐曲。那是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教堂里，法国神父用管风琴演奏这首乐曲，响亮、深沉、缓慢的风琴声仿佛来自其它世界。黑漆漆、空荡荡的教堂充满了庄严、肃穆的共鸣，这些共鸣围绕着他，使他感到一种宁静的幸福，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兴奋感觉，同时在他身上唤醒了全身心的投入以及忘我的欲望。埃拉把满头金发的脑袋靠在他的胸前，心满意足地吮吸着大拇指。一缕黄色的阳光透过彩画玻璃窗的缝隙进入教堂内部，反射在一根柱子上。当他们出来走到街上时，蔚蓝的天空不见一丝云彩，从前一夜下到清晨的雨水味混和了松树味、烟

味、湿土味，在仍然新鲜的空气中弥漫开来。埃拉看着阿拉伯小孩把白铁盒子当足球踢，在泥泞的街道上大呼小叫。伊斯拉埃尔一边走一边注视着她，他对她非常眷恋，柔情满腔，尤其是有一种要保护她的感觉。这些感情会不由自主地突然变成敌意、暴戾，所以他常常决心要一刀两断。过去，他多次想象与她分手，大家不再见面，但是由于为这个夏夜弥漫在空气中的同样感觉所困扰，他感到沮丧、恼怒、无能。这种感觉来自破旧的、爬满裂缝的房子、打开的窗户、坍塌的阳台，来自漠然地坐在那里或者站在商店门口以及丑陋、无人维修的街道入口的男人、女人们，来自在人行道上、院子里、汽车库和仓库里玩耍的孩人们，甚至来自想与塞扎尔交谈的汽车司机的声音里。汽车司机说他可以与任何一个他想要的女人睡觉，然后又说他讨厌女人的体味。正在沉思的塞扎尔反驳他，说有各种各样的女人。但司机坚持“她们全都一个样”，他还说他在忍受性障碍的痛苦，同时他加大了收音机的音量，准备听新闻。他们还经过了一些比较干净，比较令人愉快的街道。终于，塞扎尔叫停车，付了车费，把零钱留给司机。他们下车时已疲惫不堪。他伸了个懒腰，向伊斯拉埃尔提议先到“波尔托菲诺”喝一杯，恢复一下体力，再上戈尔德曼家，并且要在店里给埃莉兹拉打个电话。他们穿过迪藏戈夫路，推开“波尔托菲诺”的大门，他们进去时，铜铃叮叮当当响起来。店里除了店主和一个丑陋的女仆外再无其他人，这个店主是个希腊人，身材瘦小，脸孔干瘪，一脸菜色，愁眉苦脸。

老板认识塞扎尔，他经常与朋友或形形色色的女孩来这里喝一杯。店主向他低声问好，隐蔽在突出的前额下的惊恐、怀疑的眼睛慢慢地、专注地打量他。塞扎尔也向他问好，要了两份奶酪和两杯“图博尔”啤酒，然后坐了下来。这时，伊斯拉埃尔无可奈何地去给埃莉兹拉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埃莉兹拉的丈夫吉德翁，伊斯拉埃尔报了自己的名字，向他问好，吉德翁回答“谢谢，很好”，但从他那迟疑的声音里，伊斯拉埃尔明白吉德翁想不起他是谁。因此，他又自我介绍了一遍，并提醒他，他们几个月前在电影院见过一面，那天正在放映《博尔萨利诺》；然后，过了几个星期，他们又在韦雷德咖啡店附近的大街上见过面。吉德翁一面说“是的，是的”，一面还在犹豫，终于大叫起来：“啊！是的，你是塞扎尔的朋友。”他很抱歉没有立即想起来，伊斯拉埃尔说这没什么大不了，要记得一个匆匆忙忙见了两次面的人是很难的。他问埃莉兹拉是否在家，吉德翁说她刚出去了，不过，9点左右便会回来，因为他们打算去看电影。他问伊斯拉埃尔有什么事找她，他说只是想告诉她，事实上是想告诉他们两人戈尔德曼的父亲死了，如果不是忘了的话，本该早就把这消息告诉他们。吉德翁轻轻笑了一下，说他昨天已知道了，埃莉兹拉还参加了葬礼。他问伊斯拉埃尔有没有参加，伊斯拉埃尔支吾了一下，说道：“没有，我迟到了。”接着又说：“对不起，打扰你们了。”吉德翁说：“没关系，才不会呢。”他请他和塞扎尔跟他们一道去看电影。伊斯拉埃尔说：“看看吧！”吉德翁一再坚持：“来吧，有好些好电影。”伊斯拉埃尔又说：“看看再说

吧!"一面眼睛望着塞扎尔，后者朝他投去探询和充满希望的目光。伊斯拉埃尔说:"总之，要是我们决定了就打电话，再见。"他挂了电话，朝塞扎尔走去，把和吉德翁的谈话告诉他，但是没有提起去看电影的邀请，塞扎尔专心地听，说:"你瞧，我们没去参加这个该死的葬礼多可惜。"他啃了一口干酪，喝了一口啤酒，又说:"这个吉德翁，只要不发火失去理智，倒是个好小伙子。"他微微一笑，叫了一条香肠和另一杯"图博尔"，继续说:"埃莉兹拉，她发明了性欲，真的是这样。她与她那不健全的丈夫过的每一分钟都是浪费。我了解他，以前我们一起上学，还在军队里一起呆过一阵子，要了解一个人足够了。"当他们站起来要走时，他说:"我对她着了迷，尤其是夏天。"他又开始微笑，走去酒吧柜台买了包"罗斯曼"牌香烟，付了钱。他们出了门，来到街上，混入人群，人多得把人行道都挤满了，使人不由会想是否全城居民都离开了他们的房子，跑到闷热的街上来。

塞扎尔走在前头，没怎么说话，照相机在胸前晃动，疲倦的小眼睛东张西望。他那张脸，那个大肚子，他的笑声、激动、贪婪的目光，他的指手划脚，无一不让人想起伊斯拉埃尔·埃尔温，后者虽然比他的儿子高大、魁梧、更多鬼点子，但却跟他一样有魅力。当他们在红绿灯前停下脚步时，塞扎尔擦擦额头和脖子上的汗，说道:"瞧瞧这儿到底出了什么事，简直都要发疯了。"然后又说:"我肯定她是为了我才去参加葬礼的。"他们快要走到戈尔德曼家，"这个夏天使我发狂，也许不是夏天，而是这个死亡的故

事。”走了几步，他补充说：“我曾在什么地方读过，忧伤、疲劳和坐火车旅行与酒精一样都能激起性本能。”他们走进楼梯间，伊斯拉埃尔开了灯。上楼的时候，塞扎尔又突然停下来说：“你不知道当父亲是多么可怜。”他说这话时很自然，动人心弦的率直，仿佛他在想着另一件事，看来他正为此事忧心忡忡。他跟着伊斯拉埃尔后边上楼，伊斯拉埃尔一言不发，但马上便停在戈尔德曼家打开的门前，等着塞扎尔。两个人走进去，穿过通向暗黄饭厅的窄窄的走廊，饭厅里坐满了葬礼后前来陪伴和安慰寡妇的男男女女。

4

戈尔德曼父亲的哥哥和他的妻子齐波拉以及他们的两个儿子梅尔和伊尔米阿胡都在那里。两个儿子把他们身患残疾的母亲抬上楼梯，齐波拉右腿有毛病，几乎不能走动。在场的还有约埃尔、戈尔德曼的父亲和拉扎尔叔叔的妹妹，脸色晦暗，嘴唇干裂，没血色的布拉莎以及她的丈夫，不顾天热还穿着格子西装、戴印红心的蓝丝领带的斯米埃尔；戴黑帽的哈伊姆——莱布和他的妻子哈伊艾太太，他的大儿子斯洛莫曾是地下民族抵抗运动的成员；双眼哭得又红又肿的穆瓦什·特泽莱马耶和他那手里捧着一大束白玫瑰的大块头妻子；马克斯·斯皮尔曼、玛蒂尔达（约瑟夫·勒维阿唐的寡妇）、正在修理烟斗，散发出一股烟味的达

维·科斯托莫尔斯基，他照例没带布通太太来；萨拉（勒吉娜的兄弟勒旺的寡妇）、耶胡迪·梅兹莱、阿弗拉阿姆·谢奇泰、穆瓦什·特齐梅的寡妇、曼弗雷德、耶奇埃尔·勒旺科普夫 和他的妻子肖莎娜。战争的最后三年耶奇埃尔分租戈尔德曼家的房子，虽然事实上只是肖莎娜一个人带着 3 岁的儿子住在那里，因为耶奇埃尔在英国军队中当机械师。

肖莎娜住小房间，即纳奥米的房间。她在那里睡觉、缝缝补补，烫衣服，还在一个小炉子上给自己和儿子做饭。因为厨房太挤了，尤其是因为勒吉娜的父亲，比他妻子多活了几年的莫斯·达维外公怕肖莎娜拿一些违禁的食品进厨房污染了食具和饭菜，又怕她搞混了餐巾、肥皂、盛奶和盛肉的餐具；他对宗教的狂热以及那种闷闷不乐、动辄发怒的性格使整个家惶惶不可终日，经常弄到鸡犬不宁。

耶奇埃尔·勒旺科普夫服兵役的第一年在萨拉凡和朱利的英国军营里操练和站岗，有时获准回家，他便从军队小卖部里带回各种各样的东西，诸如巧克力、糖果或者香烟。后来他被调到埃及当摩托联络员，然后又调到西部沙漠，接着又到了意大利。肖莎娜出外工作维持她自己和儿子的生活。她在一间工人餐厅当了一阵女招待，工作没意思，挣钱也少，她就不干了，去了海边一间很大的酒吧。这些酒吧专门供应盟军士兵；那里总是挤满了脸色白里透红的英国兵和新西兰兵、南非士兵、戴宽边帽的澳大利亚兵和苏格兰兵。当穿着褶迭短裙的苏格兰兵有时在用各式各样的蝴蝶结装饰的风笛吹奏出的单调音乐伴奏下列队通过

街道时，往往引起惊叹。士兵们坐在阴暗、弥漫着啤酒味和烟味的大厅里静静地小口呷着啤酒，讲笑话、回忆，谈及将来，喝得酩酊大醉，打架斗殴，赌咒发誓，又哭又唱，高高的墙壁上方画了沐浴在落日余辉中的瀑布、椰子树、绿色牧场和乳房硕大、脸容迟钝的半裸妇人。肖莎娜给他们端啤酒，有时端点吃的，收钱和收拾桌子。天黑了，她便回家照料儿子，并准备与各式各样乏味的追求者外出，他们带她去看电影或到别的地方去。这一切，从工作到追求者都激怒了戈尔德曼的父亲，而戈尔德曼则紧张地通过锁眼看她淋浴，甚至终于好几次看到她抚摸自己的胸脯、下阴和如瓷器般平滑、白净的肚皮，他兴奋、害怕得透不过气来。

她不漂亮，但她是孤身一人，而且起码看上去不像个正经人。此外，她有一头闪光的黑发，性感的嘴唇，还有某种不知廉耻的、挑逗性的微笑，这一切使她具有吸引力。不过，现在可一点看不出来。她坐在勒吉娜身旁，筋疲力尽，神情冷漠，起皱纹的阔脸庞好像印第安老妇的脸，一双醉眼，大声地打呵欠，以致于挂在脖子上的难看的银色蝴蝶结每一次都随之被掀起，好像想飞走。她冷漠地看着在座各人，他们坐在沙发上、厨房的椅子上，栗色大桌子旁边翻起靠背的旧软垫扶手椅上。桌子上放着杯和碟子，一盘水果、饼干，一个上乘的奶酪蛋糕，这是戈尔德曼父亲喜欢的，是布拉莎带来的。齐波拉不顾腿痛，灵巧地把蛋糕切开，分给每一个人，也请勒吉娜吃一片——她们的关系一直很冷淡。勒吉娜拒绝了，她坐在一张沉重的扶手椅

上。她那干瘪、苍白的长脸看上去很累，幸好还有那一抹几乎看不见的淡红使她双颊有点颜色，好像染上去似的。在座的人喝着茶和咖啡，吃着水果、蛋糕，他们或者在他们之间，或者跟勒吉娜激烈地争论，不过声音很低（勒吉娜几乎什么也不说）。只有特齐梅的寡妇例外，她不停地说话，像平常那样高声大气，这使耶胡迪·梅兹莱怒不可遏，再也受不了，她终于站起来向勒吉娜道别，对她说明天或后天她会来转一转，然后就走了。约埃尔和阿弗拉阿姆·谢奇泰一言不发，曼弗雷德也一样，他穿一条漂亮的黑裤，仔细烫过的白衬衫，一直坐在那里，交叉着两臂，以一种冷漠的局外人的目光打量所有的人，这种目光使他那晦暗的、不漂亮的脸孔有了点表情。他一动不动，只是不时地用灵敏的手指抚摸又高又光滑的额头，或者轻轻抚弄仔细梳好的黑发，或者稍为转过头去，目光对准阳台门口。

曼弗雷德以不易察觉的方式区别于饭厅里在座各人，头一眼就引起了塞扎尔和伊斯拉埃尔的注意。他们走进房子，与脸上露出高兴的笑容迎上前来的戈尔德曼握手，然后又与勒吉娜握手。伊斯拉埃尔向特齐梅的寡妇和玛蒂尔达·勒维阿唐致意，后者对他的问候没有表示，可能她一点没注意，也可能她没认出他来，没意识到别人对她说话。塞扎尔与马克斯·斯皮尔曼握手，一脸庄重地与伊斯拉埃尔坐在戈尔德曼旁边。戈尔德曼向他们问候，塞扎尔用忧伤的口吻向他解释他们为什么不得已在葬礼上缺席，向他讲述了他们怎样经过一番曲折才来到这里。戈尔德曼的脸孔和声音都表示出他很高兴看见他们到来，他安慰他们，并

且说葬礼进行顺利，他们什么也没错过，也一点没迟到，因为他们来也好，不来也好，死者都已经死了。他问他们要喝咖啡还是茶。塞扎尔说："什么都不喝，你坐下吧，我们刚喝过。"但戈尔德曼一再坚持，他们只好让步。于是，他出去给他们准备咖啡。这期间他们坐下来，听男人们谈论政治形势。

他们尽力低声讲话，但讨论越来越激烈，声音提高了，这时，耶奇埃尔·勒旺科普夫含糊不清地大声说这个政府实际上对和平不感兴趣，倒是希望永远维持现状。如果由他说了算，他宁可交出所有领土，包括耶路撒冷老城去换取和平，反正他跟别人一样，也不会得到特别的允许可以占有这座城市。穆瓦什·特泽莱马耶反驳："废话！"哈伊姆——莱布用意第绪语说不可能将自己拥有的财产作为担保交给第三方。斯米埃尔说："对极了。"而马克斯·斯皮尔曼用多毛的粗胖手指敲打着桌子宣布任何政府都不会交出耶路撒冷或任何一个其它城市，这样做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这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应由战争的失败者付出代价，我们不需要比世界上其他人显得更有道义。耶奇埃尔·勒旺科普夫说："世界上其他人不关我事，与我有关的是我们，我想要和平。"马克斯·斯皮尔曼一向头脑较冷静，他说："保住领土就是唯一取得和平的方法。事实上，我们已经拥有和平，并且和平将得到巩固，因为阿拉伯人并不强大，而且落后，他们绝不会同意用犹太人带给他们的经济繁荣去交换其它任何东西。最小的儿子大约三年前在约旦河谷被杀害的阿弗拉阿姆·谢奇泰挥了下手，似乎想说点

什么，但是耶奇埃尔·勒旺科普夫不顾他的妻子想叫他静下来，还是大声说只有盗贼和自大狂才会说出这些令人讨厌的话，因为偷别人的土地永远不会带来和平，经济的繁荣不会使阿拉伯人忘记对犹太人的仇恨，也不会使巴勒斯坦人忘记他们的名誉和民族的愿望。穆瓦什·特泽莱马耶又说了句“废话”，斯米埃尔说：“没必要大喊大叫，总之，这不由我们决定。”但是没有人听见他说，因为一直忍着不说话的哈伊姆——莱布的儿子斯洛莫大叫起来，说我们不需要和平，如果由他说了算，他就要促使所有的阿拉伯人迁出这个国家，当然要有补偿。不可能说什么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愿望，因为不存在巴勒斯坦民族。耶奇埃尔·勒旺科普夫气得脸发白，指责斯洛莫粗野愚昧，因为决定是否要组成一个民族，这是巴勒斯坦人的事。但斯洛莫坚持这样一个民族不存在，是犹太人和共产党人的发明。以色列的完整性是圣经允诺给犹太人的，只给犹太人，没有给任何其他人。耶奇埃尔·勒旺科普夫狠狠的推开了她妻子想拉住他的手，用尽全力在桌子上猛敲一下，嚷道：“圣经见鬼去吧！它不是政治纲领，也不是瓦解国家的计划！”他想继续说下去，但他的妻子拦住了他，求他不要再说了。斯米埃尔·哈伊姆——莱布和齐波拉，甚至马克斯·斯皮尔曼也都劝他：“够了，犯不着大动肝火。”布拉莎问他要杯茶还是要杯果汁。耶奇埃尔·勒旺科普夫说：“不要。”又接下去补充说：“如果这就是赎罪，那我们太不幸了。”他站起身来。阿弗莱阿姆·谢奇泰声音有点胆怯、迟疑，说道：“是的，这就是赎罪，总之，没别的法子了。”耶奇埃

尔·勒旺科普夫似乎没听见他的话，转向他的妻子："来，我们走吧！"他等也不等就出去了，肖莎娜很快地向大家道了别，跟着他走了。

大家都静了一会，穆瓦什·特齐梅的寡妇说："他的脾气真臭。"斯米埃尔说："整个争论完全多余。"哈伊姆——莱布补充说："一个男人应该讲点道理。"又重新沉默了一会，他们又慢慢开始低声谈起炎热、家庭、住房问题、孩子、健康等等。这时，邻居一对夫妇进来了，与勒吉娜握了手后便坐下来。达维·科斯托莫尔斯基起身与勒吉娜和其他人道别。马克斯·斯皮尔曼和斯米埃尔——亲戚和熟人戏称他为"大王"或"山姆大叔"，戈尔德曼的父亲说起他时管他叫"吹牛鬼"——开始讨论生意。

几乎从一开始，对斯米埃尔持保留态度的戈尔德曼的父亲就公开地不给他好脸色看。他总是很惋惜布拉莎嫁了给他，戈尔德曼的父亲对布拉莎有种特别的爱。斯米埃尔原是细木匠，后来突然变成理发师，甚至开了自己的理发店，最后从商，做起各种各样的生意来了。在他的心目中，斯米埃尔就像一个没出息的人，不可抑制地热衷于变更、冒险，更不用说挥霍了，他一生追求用最迅速、最离奇的手段致富，而这些手段在戈尔德曼父亲看来不外乎是诈骗和寄生罢了。这个人想享受人生，他享受的方式与做生意的一样，没有拘束、没有顾虑，也没有雄心壮志。

当他还没有关掉他的理发店，还是个理发师的时候，在他把铺子改成烈性饮料店却没有成功之前，他曾从事经纪业，甚至开过婚姻介绍所。后来，商店关了门，他便做五

金和电器材料生意。在一个电影院买了些股份，建立了好几个投资公司和一个肉类进口公司。这个公司在一段时期内给他带来丰厚的利润，后来遇到困难倒闭了。他这几年从一个有一半股份的大餐厅和从事二手车、出租车的生意中挣了不少钱，但也因为买了巴尼·科恩费尔德的 AOS 股票而亏了不少钱，尽管了解内情的人已经给他许多警告，他还是坚信这些股票不出两天就会使他变成百万富翁。事实上他也曾经离此不远了，因为通过这些股票，他曾成了洛克希德、莫多尔将军、德律风根、菲亚特、菲利浦、三菱、万国商用机器公司和钻石、黄金大托拉斯多·比尔以及其它十几个欣欣向荣的工业、石油提炼厂、造船厂、银行和分布全球的地产公司、锰矿、铜矿、铁矿、铀矿、阿拉斯加冻土带有待发现的世界上蕴藏量最丰富的油田的合伙人。他没有把自己的希望如此丢脸的破灭归罪于巴尼·科恩费尔德，没有陷入怨恨和失望中不能自拔，因为就是在他亏了许多钱，遭遇到许多困难的时候，他依然总是觉得自己在扮演百万富翁的角色。他大手大脚地花钱，毫不计较，因为他生性慷慨、快乐、富于想象，无比乐观。所以，尽管戈尔德曼的父亲对他很冷淡，他也一点不怨恨他，相反对他满怀敬意，并有一种兄弟般的同情，以致于戈尔德曼的父亲的死真的令他很伤心。在举行葬礼的时候，他决心取消他习惯的扑克游戏“拉米”——每星期六晚上他总在家里与三十来个亲朋好友、熟人、同乡一起玩“拉米”，他们在大客厅和阳台的桌子周围团团坐下，男、女各一边，边笑边玩，喝着茶和咖啡，吃着布拉莎每个星期专

为他们制作的美味的蛋糕。

现在，谈话转到财政方面了。斯米埃尔认为鉴于经济状况，勒吉娜应该马上卖掉戈尔德曼父亲留下的邮集，用得到的钱开一间面向旅游者的首饰、纪念品商店或者皮货店，这些生意目前都获利甚丰。虽然，就他个人而言，他宁可把全部这些钱投资 买金币，尤其是纪念币，它们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升值。穆瓦什·特泽莱马耶说："这种事不适合她，只有按指数计资的股票才是好的。"哈伊姆——莱布指出还未打开死者的遗嘱，还不知道他最后遗愿如何处理他的邮集。这时，不停地看手表、瞅准合适的时间好离开的马克斯·斯皮尔曼建议寡妇把钱放在房地产方面，这种投资比商店保险，总之，收入不会少；或者投入重型设备方面，比如买一部拖拉机或一部卡车，她可以把它们租给那些现时在发展计划和防御工程中发了大财的承包人。如果说到投机性的投资，他大概肯定不会投资到金币或纪念币方面，而是投资在股票，尤其是银行股票，房产或投资公司方面，因为这样会有股息。最后他约略地暗示他估计戈尔德曼父亲的邮集至少价值 20 万镑。

戈尔德曼的父亲有一套很漂亮的邮集。他用了许多年功夫致力于收集这些邮票，既是出于爱好，也是要以一种隐蔽的、但孜孜不倦的方式和他的两个兄弟、拉扎尔叔叔，尤其是约埃尔争一日之短长。约埃尔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有点驼背，古铜色的阔脸庞布满密密麻麻的皱纹，看上去几乎总是隐隐露出笑意。最近，他几乎一下子老了，样子很疲倦。葬礼上他站在齐波拉、拉扎尔叔叔和耶胡迪·

唐菲丝旁边，沉默不语，像平常那样持重，他没有流泪。不过，当盖上墓穴，大家都走了后，他把手搁在悲伤、哭泣到不能自制的布拉莎肩上片刻，然后上了公共汽车，他转身对哈伊姆——莱布说："不管怎么说，他是值得大家爱戴的。"在晚上的其它时间里，他再也没说过一句话，一边喝茶，一边看着别人，听他们谈天。因为约埃尔和戈尔德曼的父亲及布拉莎不同的是，他不爱讲话，老成持重。不过，他的沉默中却流露出智慧和怀疑的态度。他有时会出其不意地提出一点讽刺性的看法，让每个人都大吃一惊。他可从不经意地边开玩笑边把话抛出来。比如，他和梅尔在客厅里谈到邮集时，他就微笑着对他说："他们已经在瓜分上帝还未给他们的资本。"

5

约埃尔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有明确、清晰的原则。即使这些原则与他弟弟的原则相比没有那么坚决，那么完整，他却是恭恭敬敬地去体会这些原则的，把它们当成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他从来不强迫别人，也不试图把它们强加给任何一个人，甚至对他的孩子和妻子齐波拉也一样。齐波拉是个矮小的妇人，聪明，精力充沛，粉红的脸庞，栗色的头发已经灰白，一对眼睛充满活力，令人敬畏。在五十年风平浪静的坚贞的爱情生活中她支持着

约埃尔。尽管她的丈夫是个出色的支架工，但收入低微，多亏她刻苦耐劳，勤俭节约，巧手持家才能养活了一家子。她缝衣服和被单、编织、洗涤、清洁房子，屋里总是窗明几净。只要她力所能及，甚至独自粉刷房子。她买来最便宜的食物做出可口的菜肴。她抚养、教育他们的5个孩子：梅尔、伊尔米阿胡、埃丝特、鲁思、阿维泽。阿维泽是戈尔德曼童年的朋友。此外，她一生都致力于帮助家庭、朋友、熟人，不顾自己的身体，也不期望别人感谢，虽然她经常忍受各种疾病的折磨。她的肝不大好，循环系统也有些问题，皮肤对阳光敏感。当她过了50岁，医生就提醒她如果再不注意身体，再不以正确的方式进食、休息，她就会死去。可是齐波拉把他们的话当耳边风，继续照原来那样生活，因为她总有事要干，只有她才能做这些事，帮助有这些需要的人。她不怕死亡，她的一生中经历过那么多痛苦，但也有过那么多欢乐。她从不想也不盼望能长生不老，她只是希望比约埃尔先死，或者与他一块死去。有一次齐波拉自己告诉阿维泽她13岁时曾亲吻死去的父亲，这一吻使她从此不害怕死亡，也许这更多是由于见过死人，而不是因为这一吻。在另外一个场合她也说过她不怕死，因为她从童年开始就要为家庭、为他人的烦恼和生计操心，可没有空闲去想到死，以致于她甚至忘记了死亡的存在。约埃尔爱她，挂念她，但几乎不管家务事，齐波拉对他也没有任何要求。他晚上下班归来，疲乏不堪，一身肮脏。他把鞋子脱掉，洗澡，换过衣服，然后吃齐波拉端上来的过了时间的晚餐。接着就去摆弄自己喜欢的东西：阳台的花草、

调酒、与“墨索里尼”出去溜溜，这是一条栗色的杂种狗。他也读历史书、传记，有时读本好小说，研究与工作有关的方案，或者把收集的邮票分类，这一点使他好几年都与戈尔德曼父亲的关系不好。戈尔德曼的父亲把收集的邮票放在厚厚的邮集里或者专用的白铁罐里，按题材分类。但他竞争的对手拉扎尔叔叔和约埃尔的邮票却是按国家分类的。不幸的根源就在于此，起码对于戈尔德曼的父亲来说是这样。即使竞争最后以戈尔德曼的父亲的胜利告终，他还是继续恶化他们的关系。事情发生在拉扎尔叔叔把集邮的事放在一边去西班牙加入国际纵队参加内战的时候。而约埃尔的邮集却在某一天着了火，跟整个房间一起烧成了灰烬。重油炉打翻了，引起了大火灾，大火扩散，烧着了整个地板，从窗口窜出去，漫延到花园。过了好些年，傍晚时分，约埃尔与“墨索里尼”散步回来，齐波拉在屋子前面的街上等着他，把这件事告诉他。虽然他几乎再也不提起，但这件事折磨了他几个星期，几个月。只是随着光阴流逝，他才慢慢得到解脱，他甚至是不知不觉地突然感到摆脱、卸下了实在是压在他身上的重担。即使在和解之后，他仍然在他与戈尔德曼父亲的关系上蒙上一层阴影。他们的关系在和解之前事实上已坏了7－8年，坏到有一段时期戈尔德曼的父亲已决定不请约埃尔和他的一家来参加戈尔德曼和美丽的杰米玛·切尔诺弗的婚礼。只是由于布拉莎反复请求他才改变了主意。布拉莎是他在世界上唯一毫无保留地去爱的人，只在她拒绝憎恨拉扎尔叔叔，不同意照他说的那样与拉扎尔叔叔断绝来往的那段时间例外。她

的拒绝激怒了戈尔德曼的父亲，也影响了他对她的爱，因为他是对所有的人生气，就像他的恨、不幸和爱都与所有人有关似的。布拉莎毫不放松，一直到他同意请约埃尔为止。他曾和约埃尔因为争论某张意大利邮票的价值闹翻了，这个讨论变成了对两个集邮者的相对价值的评估，最后在不愿收回自己意见的戈尔德曼的推波助澜下演变为对支配邮票分类的原则的没完没了的争吵。在这些争吵过程中，戈尔德曼还得罪了他内心深深尊敬、看重的齐波拉。他拒绝在“问题的原则”上让一丁点儿步，却想把这原则强加给约埃尔。约埃尔曾试图回避这些争论，一点不想改变邮集的次序，这便激怒了戈尔德曼的父亲，竟使他终止了与哥哥来往，许多年间两人都没讲一句话。

约维尔作了种种和解的尝试，哈伊姆——莱布、阿弗拉阿姆·谢奇泰、梅尔、斯米埃尔以及亲朋 好友也作了许多努力，消除他们的分歧，都没有成功。戈尔德曼婚后不久，齐波拉狠狠骂了他一顿也没用。布拉莎无法忍受他继上次和拉扎尔叔叔吵过后现在又吵一次，苦苦哀求他亦无效：戈尔德曼的父亲一直心怀不满，随着岁月流逝，这种不满越来越强烈，在愤怒、怨恨与害怕孤寂、对哥哥的爱之间摇摆不定，需要寻找一个解脱的法子。事实上是他在等待一次新的、单方面的让步，哪怕是微不足道也好。这个让步会挽回他的面子，使他可以弥补他自己造成的损失。但约埃尔对他弟弟已不存指望了，他一直不再作出表示。直到有一天，约埃尔突然心脏病发作，戈尔德曼的父亲被这消息吓坏了，冲到医院，决心请求哥哥原谅，与他重归于

好。但当他走进病房，靠近病床，当时床四周坐着齐波拉、梅尔、阿维泽、鲁思、约纳·科特钦斯基和布拉莎，他就觉得很难了，尤其已经过去了这么多日子。于是他只是激动地握了握约埃尔的手，问他情况怎么样，并且说："我们都已不年轻了，能干些什么呢?"他与约埃尔和其他人谈话，甚至试图开开玩笑。他的脸色苍白、眼睛溢满泪水。不过他慢慢不再对他提起这件事，他认为光是他的探访就是和解的行动。尽管如此，在他们的关系中始终存在一定程度的紧张。一直到几个月，甚至几年后约埃尔的邮集在洪洪烈火中烧掉了，这种紧张才烟消云散。

戈尔德曼的父亲从不承认争吵来源于他引起的关于邮集的荒唐的争论。他实际上并不知道整件事。几年后他才向阿维拉阿姆·谢奇泰承认他永不原谅玩纸牌作弊的男人，他说起这事时就像平常那样天真、诚恳。唯一的差异是约埃尔不玩纸牌，戈尔德曼的父亲却是玩的，他把"拉米"这种纸牌游戏作为自己唯一最大的嗜好。他使自己的日子很不好过，因为他一方面把赌博看作近乎堕落的错误，而另一方面他又狂热地沉迷于赌博，渴望赢，他既专制又暴躁，强行规定赌博的规则，搞乱了每个人的牌局，增加了许多不快、争执的场面。斯米埃尔和其他人的努力都无法使他克制自己。这几年几乎没法跟他一起玩，可是他却一点不改变，大多数时候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做的事或自己违心去做的事。他继续要别人按他的意愿去打牌，甚至他强加于对手的招数会令他失败，他也一点不变。因为他是为了最高原则来打牌的，一点不顾及会影响牌局或者败坏

游戏的乐趣。一个个星期过去了，事情越来越糟。终于，总是阴沉着脸坐在妻子旁边的穆瓦什·特泽莱马耶首先不再来参加晚间的“拉米”聚会，但却从没有作出任何解释，因为他爱戈尔德曼的父亲，对他无限感激和尊敬，但是他发誓再也不跟他坐在同一张牌桌周围，也不在同一个房间里。尽管斯米埃尔和布拉莎不停地邀请他，尽管这个诺言使他难过、尴尬，当然还使他失去了一种乐趣，他却始终对它恪守不变。现在，斯米埃尔和布拉莎正与要离去的马克斯·斯皮尔曼告别，后者也与勒吉娜握手，在她耳边说了几句话，向塞扎尔点头致意。他出去之前还拉住走进屋子的戈尔德曼的手臂。戈尔德曼用两个瓷杯给伊斯拉埃尔和塞扎尔端咖啡，一只杯子的耳朵断了，两个茶碟也是瓷器，颜色、花样都很精细。

戈尔德曼给他们端上咖啡，并且宣布：“先生们，请用吧！这是捷克茶具。”他微微一笑，然后转过身和梅尔和伊尔米阿胡扯了几句，问他们要不要点什么。因为他很爱他们，也爱阿维泽、鲁思和埃丝特，只是与他们失去联系好些年头了，最后只剩下了知道他们之间有这种爱，当然还有家族的关系，另外还有一种觉得自己亏欠了他们的心情沉重的感觉。接下来，他又问约埃尔和齐波拉要点什么。齐波拉是他最尊敬的人，他总觉得自己欠了她一笔特别的债务，因为当勒吉娜的腰部出了问题时，她收留了他并照料他；当时，戈尔德曼问她是否确实没问题时，她安慰他，对他说：“别担心，一切都好。”戈尔德曼轻轻地摇了摇头，过来坐在塞扎尔和伊斯拉埃尔身边。他似乎心情不错，不停

地讲话，充满感情，还开开玩笑，但他的嘴角和绿色的眼睛流露出忧伤和厌倦。他不时地微笑，嘲弄他父亲成功的葬礼，用了最后这整整 4 年起草的遗嘱，嘲弄一家人和朋友们济济一堂好像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大家团聚一起一样。他还说起终于可以放心地使用捷克茶具，因为他父亲死了，什么事都可以做了。他一面说一面把头稍微转向曼弗雷德，偷偷地笑："这是曼弗雷德，我母亲的情人。"塞扎尔也笑了，既尴尬又惊讶，不过也很满意，嘴里说道："这对他们两人好极了。"伊斯拉埃尔却无动于衷，沉默不语，虽然他也尴尬，也惊奇，并不仅仅因为戈尔德曼所说的事，最重要的当然是勒吉娜有情人，因为他本来从没想象过她也有这种感情，也会跟这种事沾上边。塞扎尔又说："这对他们两人来说太好了！"然后，他的目光从曼弗雷德移到勒吉娜身上去了。勒吉娜坐着，满脸愠色，一副漠然的样子，一点也不搭理曼弗雷德。塞扎尔继续微笑，戈尔德曼注意到他的微笑，说道："这是少有几个真正伤心的人之一，但并不是由于我父亲的死。"他拿了一块饼干，一边玩弄着一边补充说："至于我嘛，对死者的回忆使我高兴。"他没有明确说明他话中指的是哪些死者。他咬着饼干，一只眼睛盯着穆瓦什·特齐梅的寡妇，她不停地大声讲话，坐立不安。他说他总是想到死亡和死人，而且尽量愉快地、心平气和地去想。因为不管怎么说，死亡是生命的真正实质，没什么好害怕的。塞扎尔说："说得对。"不过他明显心不在焉，没听戈尔德曼在说什么。不过戈尔德曼毫不在意，若无其事地继续往下说，谈到他最喜爱的文学除了菜单外便

是报上的讣告，他每天都读，尤其是致述一个故事的讣告，往往是以死者的名字组成的藏头诗的形式发表，描写了死者的优点和家庭的悲伤。可是，他突然不说话了。塞扎尔看着他那瘦削，毫无笑意的阴沉沉的脸孔，心想他的内心已经枯萎了。

塞扎尔喝着咖啡，他说："这一切都挺荒谬。"戈尔德曼重新微笑起来，表示赞同，他数番看着他母亲和坐在房子里的人，约埃尔和穆瓦什·特齐梅寡妇，他说："这个女人，我实在受不了。"他再拿起一块饼干，说起他有一次读了一个中国艺术家的故事。这个艺术家画了一个和尚坐在树上朝下看，他在画上大概题了下面这些字："问题是要在这个痛苦、混乱的世界上找到宁静。如果你问我为什么 在这里，我无可奉告。我在这里，在树上，可以像巢里的鸟那样解脱一切烦恼。对那些说我是危险人物的人我的回答是：你们是魔鬼。"塞扎尔说他不明白，因为他不是中国人。戈尔德曼反驳他："就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全是中国人。"如果埃莉兹拉不是在这时刚好走进房子的话，他还想补充几句。塞扎尔一下活跃起来，大家都朝她望去。她和起身站在她面前的戈尔德曼握手，又和勒吉娜握手，然后向伊斯拉埃尔打了招呼。接着，看见塞扎尔朝她打了个手势，她便走过去坐在他身旁。戈尔德曼问她要不要喝点东西，她回答："不，谢谢，我刚喝过。"塞扎尔朝她微笑，一只手搁在她的大腿上，对她说："我给你打过电话，可是没人接。"埃莉兹拉轻轻拿开塞扎尔的手，对他说："我肯定是在路上。"塞扎尔说"是的，可能吧。"他撒起谎来毫不费力，也

毫无顾忌，甚至有时明摆着是谎言，有时没必要撒谎，或者有时还损害了自己的利益，他还是这样做。因为他撒谎成习，以致谎话从他嘴里吐出来就像蚱蜢那么轻快敏捷。因为他撒了那么多谎，以致他自己都很难分辨那些是真哪些是假。不过这一切不会使他不安，因为开始时撒谎是出于方便，出于嗜好，到了后来就把撒谎变成了原则，并且认为道德已不存在了，谎言比真理更有力，只有谎言才能把生活引向更和谐更愉快的地方；至于真理呢，尽管人们那么倾向于歌颂它，但在塞扎尔看来，它带来的忧愁、争端、额外的困难远远超过好处，他本人认为没有任何理由为此牺牲自己的生活。他把手搁在埃莉兹拉的大腿上，她把身子挪开一点，说："现在别这样。"塞扎尔拿开手，对她说："你真笨。"他朝她微笑，点燃了一支香烟。

埃莉兹拉穿了一条轻薄的青绿色连衣裙，袒胸的低领又大又圆，神气地露出她那漂亮的脖子。她用一条鲜红的丝巾扎起金发，乳房像两只大梨子撩人地高高耸起。她很漂亮，她知道这一点。她对自己的美丽深信不疑，以致于她一方面赋予自己的美丽一种取之不尽的精神价值，而另一方面，她又并不真的相信这一点，时刻害怕它的消失。正是这种矛盾的感觉使她变成了一个轻浮、任性的女人，充满了恐惧和愁苦，久而久之便破坏了她正直、慷慨的天性。她不断要求别人更多地注意她、重视她，好像欠了她似的。而事实上，她只寻求一丁点儿的安全感，以及认为自己还有点价值的感觉，这是她在自身无法找到的，使她绝望，无法得到平衡。

塞扎尔玩弄着她的头巾，然后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埃莉兹拉问道："你们为什么不参加葬礼？"塞扎尔说："我们没法子参加。"他动手抚摸她的颈背，埃莉兹拉任由他抚摸，说道："我讨厌婚礼和葬礼，一派矫揉造作。"塞扎尔点点头，并没注意她说什么，就含含糊糊地说他也同意。即使她说太阳是赎罪的公鸡，桌子是蝴蝶，他也会毫不犹豫地表示赞同，因为对于他来说，她的眷恋，以及每逢有空便满怀欲望与爱情委身于他这一点才是至关重要的。

6

塞扎尔不再看着伊斯拉埃尔和埃莉兹拉，转过头去看戈尔德曼母亲的项链，然后又望望曼弗雷德和变得那么老迈的玛蒂尔达·勒维阿唐，以及用栗色木镜框镶着放在图书柜架子上的纳奥米的照片。这个图书柜放满了伯尔·卡茨内松、本·库里翁、比阿利克、布雷纳、沙朗·阿莱切姆的作品和其它书 籍，新、旧都有，这是戈尔德曼的父亲费尽力气弄到的，他小心翼翼的保管它们，连一本也不打开。这时，伊斯拉埃尔越来越不耐烦，因为他想到埃拉可能在他不在时到寓所去。这个想法不停地缠扰着他，使他那么恼火，顿时希望她让他安静，永远不要再来。他准备站起来，离开一切人，回到公寓去，洗个澡，弹弹钢琴。但是，正当他在等待合适时机时，埃莉兹拉朝他转过身，问

他弹管风琴是否有进步，他说有。戈尔德曼在他们面前放了一碟饼干，开始向他们谈论一种新的饮食制度，这是他在一本美国航空杂志上看到的。只要你不折不扣地遵守这种制度，就可以延长寿命 7 到 8 年。这个饮食制度基于把碳水化合物和经严格挑选的蛋白质结合起来，要求根据每个人的能力每年持续禁食 14 到 21 天，把积聚在人体内的废物清除出去。这篇文章还建议 采用葡萄疗法，换句话说即用葡萄来治疗。这个疗法就是在几个星期内每天只吃两公斤半葡萄。这种治疗方法可以降低血液的酸性，对心、肺、肝、循环系统、肾都有好处。戈尔德曼解释完后就说他有意采用这种饮食制度和葡萄疗法，他敦促伊斯拉埃尔，特别是塞扎尔也这样做。塞扎尔说："也许最近我会这样做，我不着急。"戈尔德曼顶了他一句，说他会毫无价值地死去。接着，他转换了话题，开始谈起摩托车，不过他还未来得及大谈特谈，就要站起来送别勒吉娜那位冷冰冰、满腹怨气的嫂嫂萨拉。萨拉站起身，因为她觉得自己已履行了对所有这些人的职责。自她丈夫死后，她几乎没见过他们。尽管戈尔德曼与她形同陌路，严格说来还讨厌她，不过还是尽量客气，送到门口。他返回后，重新坐在梅尔、伊尔米阿胡·约埃尔和齐波拉面前，问他们是否要点什么，接着又问哈伊姆——莱布和哈娅太太。然后，他坐在伊斯拉 埃尔身边，重新谈论起摩托车。他的向往、希望都集中围绕这个引起他的生活变革的新的梦想。他存了钱准备给自己买一辆摩托车，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研究报纸上分类广告中的摩托车专栏，他逛商店、车行，向朋友作调查，阅

读所有的广告。开始时，他想买一部“B·S·A”或者“诺顿”，然后又决定买“本田”，因为他很想买的“哈利·戴维森”对他来说 太贵了。不过他最后找到一辆各个部件还挺好的 5 匹马力的二手“凯旋”。他正决心要买时，他父亲突然病倒，使他没买成。现在他怕被人买去了，他又回复到没找到“凯旋”以前的状况。

戈尔德曼继续讲他那些摩托车的复杂问题，不过他是特别向塞扎尔说的，因为塞扎尔懂得汽车方面的事，还懂点机械，可是塞扎尔心不在焉，加上最近他已不只一次听他讲过这件事的始末，所以只是假装听戈尔德曼讲他如何拿不定主意，听他描写各种不同摩托车的优点，不时还提点看法。终于埃莉兹拉打断了他的话：“戈尔德曼，我绞尽脑汁都不明白你为什么要买一辆摩托车。”戈尔德曼很尴尬，声称摩托车在城里是很方便的交通工具，比小汽车方便，却没那么贵。然后，他仿佛说着玩似的又补充说摩托车的速度吸引他，可能像每个男人那样，他有向死亡挑战的本能需要。但埃莉兹拉已不耐烦听他说，又打断了他的话：“如果你想成为又一个詹姆士·迪安[①]，你可是觉醒得迟了一点。如果你想要的是自杀，那么从屋顶上跳下来也一样。总之，你的美国饮食制度是多余的。”她笑了起来。戈尔德曼也笑起来，以此来掩饰他的尴尬和刚刚蒙受的羞辱，这可是他自找的。因为他想坦率、真诚，却反使自己成了笑柄。他已是 40 多岁的人了，他太清楚自己的无能以

① 詹姆士·迪安（1939—1955）美国电影演员。

及越来越有限的能力，因而觉得摩托车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可笑、荒唐的，埃莉兹拉说得对。埃莉兹拉喝了一点咖啡，毫不同情地看着戈尔德曼说："别指望有人可怜你，求你活下去。"戈尔德曼笑着说他一点不指望。然后他转向塞扎尔肯定地说："我要买那部'凯旋'。"塞扎尔说："那就买吧！"他从埃莉兹拉手中拿过咖啡杯，对她说："来，咱们走吧！"两个人便站起来要走，与勒吉娜和戈尔德曼告别。戈尔德曼把他们送到门口，当他回到房里时，他对伊斯拉埃尔说："他要跟她上床。"马上又补充道："这个姑娘个子高，身段好，不过，我可不想落在她手里，这是个真正的布伦希尔特①，她的血管内没存一滴爱，没有一点正经，什么也没有，她已经坏入骨髓，只想自己，正像塞扎尔一样。"接着，他说了句对不起就到洗手间去了。

伊斯拉埃尔决定等戈尔德曼回来后他也要走了。等待的时候，他就百无聊赖地一门心思去听围着桌子热烈进行的乏味的谈话。他看见穆瓦什·特齐梅寡妇站起身向勒吉娜和其他在座的人道别，他也看见齐波拉不大答理她，悻悻然看着她离去，她对约埃尔说："人们不能一声不吭，也不能整天哇哇叫，地球上还有别的人。"过了一会又说："如此叽里呱啦，可见她的聪明是怎么回事了。"然后，她转向勒吉娜，请她喝一杯果汁和一片蛋糕："吃吧，不会再有人指责你了。"可是勒吉娜说她不饿，她与站起来要走的玛蒂尔达·勒维阿唐道别。后者经过伊斯拉埃尔身边时，他

① 布伦希尔特：德国13世纪时用中古高地德语写的英雄史诗《尼贝龙根之歌》中的冰岛女王。

向她点头致意，说了声“再见”。玛蒂尔达面容惨白，仿佛不幸的遭遇以及岁月的流逝使她心力交瘁。她呆了一下，有点踌躇，然后才向他说“再见”。她的踌躇使人想到她想不起他来。二十几年前，他去过她家看望阿诺克。这孩子才12岁，据邻居和学校老师说，在夏季的一天，他跟在冰车后面跑了整半天，捡起沿路掉下的冰屑，合起来有一大团，他全吃下去了，于是得了急性肺炎，48小时就死了。

这是独立战争后不久的事。阿诺克的哥哥阿维诺阿姆在战争中受了伤，被送到美国治疗，现在还在那边读农艺学，还没有回国，他跟他的美国妻子在一个莫沙夫[1]定居，创办了一个农场。

他们的姐姐索妮娅已经与她的法国工程师分手，她与他在尼斯一起生活了4年，有了个儿子。听说她离开法国去了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她在那儿各式各样的酒吧间、夜总会工作，弹琴或者跳舞，等待有人发现她，让她在电影或话剧里演个角色。这种希望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她有不可否认的才能，且引人注目。尽管到目前为止，她一直很失望，但她也有几次几乎实现了梦想，她曾被地方新闻提过两三次，把她当成艺术家来提起，甚至有一天还写到她将出演一部电影。但这一切却令她的父亲约瑟夫·勒维阿唐感到忧愁和耻辱。他是默默地承受，但戈尔德曼的父亲谈到她时却是公开地表示轻蔑:“这只是个婊子罢了。”

索妮娅的一张相片被放在钢琴上，并排放着的还有一

---

① 莫沙夫:以色列资本主义性质的农村组织，土地所有者各自耕种同样大小的自己的土地。

个古铜色的贝多芬的石膏半身像，是个便宜货。钢琴放在勒维阿唐大房间里的一个角落，房间中央是一张笨重的黑桌子，除了星期六和节日，这张长桌子每天都全部打开，供25个人坐下来吃饭。玛蒂尔达用大大的深瓷碟子盛饭菜，这些碟子边上饰着小花，或者镶着金边或靛蓝边。食物简单但不错，既有营养也很丰富。除了饭菜所费不多外，饭桌上还洋溢着家庭气氛。玛蒂尔达是个活跃且极富母性的女人，她很自然地令到大家都不会拘束，她的客人都是熟客，互相之间都认识：办公室的职员、一个医生，一个画家，几个商人，两个小学教员，一个建筑工程师，一个叫约舒安的是个素食主义者。他那苦行僧般的外表使人想起甘地：个子瘦小，举止灵活，肤色晦暗，近乎黑色，头发全掉光了，无论冬夏都穿双奇怪的布便鞋，短裤，麻或棉的衬衣。他每天上海边游泳，锻炼，空余时间都在海滩上，田野里，柑桔园或城郊的小树林中渡过。他会模仿大海和风的低吟，树叶的沙沙声及鸟兽的叫声。他特别会用皮影戏投射出鹅、天鹅、狐狸和巨大的蝴蝶和各种各样令人惊奇的生物的影子，这都是他想象出来的。心血来潮时他会亲手去制作会飞的鱼、两头鸟、从未见过的走兽。他高高兴兴地把它们投射在墙壁上，把生命赋予它们。孩子们着了迷般一直坐在那里盯着看，既佩服又惊奇，有时还存点害怕，发出阵阵惊叹声，有时连大人也跟他们一样。

约舒安有吸引人的一面，也有令人尴尬甚至吓人的一面，这不仅仅是由于他那修道士般的行为——因为他实在是很快乐，而且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而且在于他的怪

癖中流露出的古怪和神秘的东西。他完全抛弃了任何终极目的、希望、传统的生活方式。他完全相信自己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几乎已经了解它最不为人知的秘密以及它的意愿。他把这种了解反映在投射在墙上的活动的、虚构的影子上，他仿佛成了这些影子的其中之一。这些影子极为离奇古怪，有时看起来吓人，但却显得很自然，好像它们一直都生活在树林、山洞、深海之中，只是暂时缩小，通过游戏的形式现出身来让人观看。不过，他的纯素食主义可绝不是游戏，也不是一种示威；这是一种信念，一种志向。因此，每次在勒维阿唐家吃饭时他都要反复地说大自然是纯洁的、正确的。人类不管如何探索，都并不是想去认识大自然，和它一起生活；而是想去践踏它、歪曲它，从而给自己挖掘坟墓，因为大自然最终是要胜利的。只有与大自然相协调才能创造一种有存活力的文化，因为大自然代表事物的和谐及良好的秩序，宇宙的深奥的意愿。人们长期对抗它的意愿，就只能付出灾难和天下大乱的代价。于是，他又开始讲启示录的故事。接着又不无快意地吓唬人，描述昆虫和巨型的草本植物征服世界之后文明的末日。然后又对其他客人和兴致勃勃地听他讲话的约瑟夫·勒维阿唐重说一遍"凡与大自然冲突的东西注定要灭亡"，但约瑟夫·勒维阿唐对大自然不那么感兴趣，他更关心的是人类，是周围的人，他把大自然看成是抽象的概念。

约瑟夫·勒维阿唐是希斯塔德劳斯① 一个企业的会计

① 以色列的一个工会组织。

主任，富有经验，个子很高，耳朵太大，手臂太长，愁苦的脸上总是一副庄重、无能的表情。他与他那个阶层的习惯相反，总是穿着栗色西服，衣服太大，穿在他身上总有种过时和皱巴巴的感觉。他的世界观、生活经验都来自长期的观察、阅读和思考，使他越来越相信社会秩序不好，甚至不可救药。随着城市越来越大，越陌生、越粗暴，人，尤其是城里的人就常常为越发严重的经济困难和道德困难所困。它们窃取了人们一切自由的机会，不给他们留下任何精神的、欢乐的领域；把一切都变成卑微、低贱的东西，没有意义，没有希望，一言以蔽之，即是没有安乐。最后他得出结论，一定要行动起来改变这种状况。在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文学以及基布兹① 榜样的影响下，他宣扬以下观点：通过建立城市公社，把社会窃取的东西归还给人们，就可以实现这种改变。虽然约瑟夫·勒维阿唐是一个尽责的劳动者，一点不是活动家，但这种思想一旦在他脑海中生了根，他便会逢人就阐述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其中有些人对此有兴趣，慢慢地就形成个小圈子，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城市公社。在这个公社里，工人、商人、手艺人、自由职业者聚在一起，各人依然从事原来的职业，但把收入合起来，统一消费，供给各人所需。他们一起生活，一起吃饭，一起庆祝节日、抚育孩子，这一切都建筑在绝对平等、合作、互助、博爱和政治完全自由的基础上。

这个圈子扩大了，新的人加进来，比如戈尔德曼的父

---

① 以色列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组织。

亲，他在“青年劳动者”组织里认识了约瑟夫·勒维阿唐，但后来没有来往，现在他们重新建立了交情，一起谈论公社的事宜。他们常常聚在一起，讨论组里的问题，起草纲领、章程，这个章程要能团结组里的各种思潮，从空想社会主义者、准马克思主义者到自由党人、梦想家。尽管他们满腔热情，满怀诚意，但这任务并不容易完成。经过长时间的推敲，用了两年才写了一个在各种观点看来都似乎是完美的章程，因为它包括了个人、家庭、社会的各个方面，重视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甚至考虑到实行起来时可能产生的问题和偏差。这个章程包括作为附件的一个宣言，他们起草这个宣言是为了描述公社产生的始末和它的思想——合作、平等、自由、博爱的原则——宣布了公社的总目标，强调指出他们的公社不是一个专门只解决其成员个人问题的特殊的、唯一的组织，而是被看作初级阶段，一个以它为榜样的运动的支柱，它要实现由自由公社组成一个世界的幻想。在制定章程和宣言的同时，也采取了将它们付之实践的最初的具体措施。公社作为一个合作社团注了册，加入合作联盟，在市郊购得一大块地，开始住房和各种建筑的土木工程。草图经过长时间讨论，得到全组所有成员一致同意。经过重重困难、延期、失望，几年后终于准备完毕，他们在他们的城市公社中安顿了下来，并且一致同意在这件事上要小心谨慎：大家不要卖掉城里的住房，甚至不要想把它们出租，大部分人仍然把个人的物品、家具存放在那里。

7

在这之前一年，即纳奥米自杀后不久，戈尔德曼的父亲退出了小组。当最早的一批成员在公社安顿下来时，他还在国外。3 年后他回来时已再也找不到公社，也找不到约瑟夫·勒维阿唐。因为公社解体了，约瑟夫·勒维阿唐在他回来前一年半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了。虽然他回去几天后才知道他死了，但这个消息仍然使他勃然大怒。他用拳头敲着桌子，脸色苍白，大喊大叫："为什么你们什么都不对我说?"然后，他就坐在厨房里，双手捧着脑袋，像个孩子那样哭泣。勒吉娜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戈尔德曼出去了，让她一个人哭到累了不哭为止。可是，停了一会，他又重新哭起来，一直哭到天黑。这时，他站起来，洗了脸，就去拜访玛蒂尔达。她靠她丈夫留下的一点养老金以及又在家里给二十来个人提供饭菜来维持生活。这些人几乎全是新来的，因为大部分过去的常客都各散东西了，有几个甚至去世了.戈尔德曼的父亲和她一起呆了差不多两个小时，他几乎一言不发，听完电台新闻，他便站起来与她握手，然后便走了，第二天，他去了约瑟夫·勒维阿唐坟上默哀，以后便不时地去。有一天他甚至要求戈尔德曼陪他一起去，戈尔德曼溜走了。因为他讨厌与他父亲单独在一起，他父亲从来不与他坦率地讨论问题，隔很久才偶尔盯着他看看。同

时，因为他十分讨厌墓地和礼仪，尤其是葬礼和吊唁。就算现在，只要可能，他也会溜走，但礼貌和责任要求他留下来。不过，当他从洗手间出来时，就对伊斯拉埃尔说：“来吧，到我房间来呆一会，我再也没力气来管他们了，尤其是我母亲。”他们两人进了戈尔德曼的房间，它邻接客厅和纳奥米曾住过一段时间的小房间。不过，戈尔德曼的房间与纳奥米的房间一样，并不朝大街，而是向着屋子的大院。

除了独立战争时期和与美丽的杰米玛·切尔诺弗缔结的 3 个月的婚姻期间以外，他一直没有离开这个房间。在战争时间，他中断了中学学习，参了军。他在这间房子里住了这么多年，里头的陈设一点没变。同一张铁床，上面罩着一条灰褐色粗羊毛格子毯，绿色的图案已褪了色。毯子上依然放着用勒吉娜缝制的花麻枕套装着的硬垫子。窗前摆一张旧碎纹书桌和他的棕色圆背椅。房子的一个角落里搁着一张不大实用的笨重的扶手椅，必要时，它可以变成一张床。扶手椅旁边，戈尔德曼的床对面，放着个玻璃门的书柜，甚至连可以插三枝蜡烛的烛台和窗帘都没有改变，唯一的变化是每样东西都明显损坏了。房间的空气里飘浮着一种隐隐约约的陈旧气味，尽管房里总是那么清洁，还补充了一些新东西。最丑得引人注目的是一盏镀金蛇形床头灯，灯泡安放在蛇尾上，上面有个饰着金色流苏的红灯罩。这盏灯是戈尔德曼保留下来的少数几件结婚礼物之一。他不得不羞愧地把其余的礼物送还给应邀来参加豪华婚宴的众多亲朋好友。戈尔德曼的父亲举办这个豪华婚宴

并不是想引人注目，或者想炫耀一番，而是出于大方、慷慨，尤其出于过分热衷追求完美。他毫不理会戈尔德曼反对这种奢华，订了一个由 7 名乐师组成的乐队，还有那么多啤酒、香肠，当然还有糕点。婚礼后整整一个星期，全家每天都吃煮香肠或炒香肠，虽然已送了部分给邻居和朋友，还是吃不完。勒吉娜怕这样下去大家最终会中毒，就不顾戈尔德曼父亲的不满，把剩下的香肠扔到垃圾堆里了。他与所有人一样都为事情了结松了一口气，但仍禁不住对这种浪费感到可惜。不过，与戈尔德曼出乎意料的离婚这种奇耻大辱相比，这就不算什么了。他的父亲把他的离婚看作是针对他的行动，他永远不会原谅。同时，他把离婚看成像卖淫一样，他尽力去阻止，然后又对朋友、邻居隐瞒，不过，他的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这盏灯是勒吉娜在美国的一位远房表妹送的。她来旅游，一回到家就专门寄来这盏灯。这时候，戈尔德曼已和美丽的杰米玛·切尔诺弗分了手，这盏灯没有人可以归还，就留在戈尔德曼房里了，放在床和墙壁之间。这堵墙以前贴满了公牛和斗牛士的照片，后来又贴满了赛车驾驶员的照片。这几年则只有一张晦暗的风景照片和他妹妹纳奥米的一张照片。

就在这个房间里，戈尔德曼在他的个人问题和世界问题中苦苦挣扎，他在惊讶和失望的同时给自己创造了一种比较自由，比较大胆，比较生动的生活，这样的一种前景使他陶醉。但是在这个房间里他也学会了遗憾地放弃，学会了失败的消沉感觉，不过也学会了过些时候重新不顾一切地去努力，充满了期待、怀旧、以及创造一种更美丽，更

不拘一格的生活的希望，这种生活不受一切法则、一切可能性的束缚。他通过尝试了各种生活方式，练习安于天命去体验缓慢的、必然的死亡，甚至还希望死亡到来，虽然他想活一千年，但是这些反复的、巧妙的练习收效甚微。他无法接受这一明显的事实：有一天，他将永远消失，但死亡呢，尽管它的存在是真实的，距他只有咫尺之遥，尽管他用了各种手段去使它变得更具体，它却仍然是神秘的，难以理解的，因此亦是令人恐惧、沮丧的。因为它不适用于任何人们可以体验的东西，也不能与人们所了解的某种东西作比较。纳奥米的猝死可能是个例外，给了他可怕的一击，此外还几乎摧毁了整个家。

她一死，维持整个家庭的纽带便断裂了。多年来潜伏在习惯、礼貌、习俗之下的仇恨和残暴的火山爆发了。它喷发得那么厉害，仿佛要扫平、摧毁整个家。不过威胁延续的时间不长。曾经把他们的父母连结在一起的仇恨和残暴的强有力的束缚，当然还有恐惧，使他们在过去的日子里看起来是一对正常的夫妇，现在也胜利地维护了家庭这个框框，不同的是仇恨变得尖锐、狠毒，继续公开地喷发，无情地破坏他们的余生。

当然，即使纳奥米没有在车祸中丧生，这一切也可能发生。尽管当时坐在方向盘前面的不是纳奥米，可是这次事故仍然使戈尔德曼的父亲对纳奥米开车一事勃然大怒。从一开始他就反对她开车，他不下十几次预言她不会有好结果。因为他从纳奥米开车的方式中，就像从她所做的大多数事情和举动中一样看到一种反常的行为，唯一的目的

就是向他挑衅，反抗他的思想。但纳奥米很内向，很独立，一意孤行，尽管她从根本上对父亲尊敬、理解，甚至爱他，她却不理会他对她在金钱、衣着方面的态度抱何种想法；当她停止学拉小提琴，当她违背父亲为她设想的计划，决心中学毕业后去当体操教员，或者当她有一天向他宣告要离开中学去加入英国军队时，她根本不理会他的愤怒，更不用说与那个英国人的关系了。他们是后来才知道这件事的。这个关系结束后，经过了诸多讨论、哀求，激烈的争吵，她终于离开家进了军队。

尽管勒吉娜对纳奥米态度谨慎，比较实际，但在纳奥米在家里的最后一天，她却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为她送行，有鱼、丸子和肉煮成的汤、烤小牛肉，她喜欢的土豆煎饼，糖煮干果，就好像为复活节前夜准备的那样，还有一个罂粟蛋糕。全家 4 口人——戈尔德曼的父亲、勒吉娜、当时 12 岁的戈尔德曼和纳奥米——许多年来已没有一起吃过饭，现在团团围着大厅里一张铺了桌布的桌子坐下来，静静地吃着勒吉娜准备的菜肴。吃过饭后，纳奥米站起来，提起走廊里的小箱子和背包，又折回房间来，与戈尔德曼握手，拥抱他和父亲。戈尔德曼的父亲一直如石头般僵坐着，始终盯着报纸假装阅读，中间只停了片刻。然后她拥抱了勒吉娜，勒吉娜把她送到门口，听着她在楼梯上的最后的脚步声远去。纳奥米的死使戈尔德曼大为震动，他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脸孔对着墙。不过，虽然死亡的阴影还留在他心中，他却很快便说服了自己没有东西可以令她再生。于是，他慢慢接受了她的死亡，最后，她的

死成了他生活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但戈尔德曼的父亲一次也没到她坟上去过，他认为她的死是对她与那个英国人交往的惩罚，同时也是某种针对他的东西。他把纳奥米的死归罪于勒吉娜。他去了美洲，在那里呆了两年，又再在加拿大呆了一年。

他们从来不知道他在离家的日子里干了些什么，如何生活——也许他得到了他家里的一些人或其他人的帮助。因为在这么些年里，他连一封信都没有寄给他们，只有3张贺年卡还总算让他们知道他在哪里。戈尔德曼和勒吉娜也像缩在壳里的蜗牛那样对他不闻不问，一点不想费心去打听多些消息。事实上，自从纳奥米死了，勒吉娜就与世隔绝，她几乎不再吃东西，不再上电影院和剧院或参加家族的节日庆祝。她难得出外，不论冬、夏，每星期只出去一次，就是到她女儿的坟上去，在坟地四周松土，拔掉野草，给花和她种下的小灌木浇水。她有时会见见她唯一的、最好的朋友耶胡迪·梅兹莱，她不时去探访她。斯米埃尔、布拉莎、约埃尔和齐波拉、达维·科斯托莫尔斯基、穆瓦什·特齐梅寡妇也有时间或去看看她，后者令她难以忍受；只有穆瓦什·特泽莱马耶是唯一经常去看望她的人。他永远不会忘记当他战后作为难民来到这个国家时勒吉娜和戈尔德曼的父亲对他的帮助，他在他们家住了很久。他每次来都带一盒巧克力，一瓶酒或者一根质量上乘的香肠，一点咖啡或一束花。勒吉娜不喜欢他，接受礼物时神情冷淡。但穆瓦什·特泽莱马耶没有注意，他很高兴能使她开心一点，能表达自己的爱和感激之情。

勒吉娜不时也收到曼弗雷德的信，或者她给他写信，从此，这件事与她每周的扫墓就构成了她生活的主要部分和她的时间安排的唯一依据，使她的日子过得有点意思，有点新奇的感觉。因为她的时间就像她的生活和期待一样全部以这种或另一种方式与纳奥米和曼弗雷德连在一起，再没有其它的了。曼弗雷德与他的家庭住在荷兰。夏天，有时是冬末，他会到以色列来，住在海法他兄弟家里。勒吉娜去墓地时就会告诉他顺便去看他；或者当他有机会来特拉维夫时，他们便在耶胡迪·梅兹莱家见面，他给勒吉娜的信也寄到这个地址。15 或 20 年前情况可不是这样。那时尽管戈尔德曼的父亲不喜欢他，他仍然经常到他们家来，受来客人的礼遇。但是当他决定不来了，他们之间所有的接触就都是间接的或秘密的。甚至戈尔德曼的父亲不在国内时也依然如此，因为这已成了两人都觉得方便的习惯。他们的约会很短促，而且不可避免地变得越来越短，这几年来，每次见面只持续一到两个小时，事实上已成了令人沮丧的离别，充满了怒火、痛苦，还伴随着一种失望、怨恨的感觉。因为虽然他们用顽强的意志面对现实，抑制狂热的希望，这些希望却是没有尽头的。时间、年龄、生活的艰难耗尽了他们的爱情，最后只剩下对爱情、对共同享有的欲望以及对他们放过的美好的机会的逐渐消退的记忆。他们两人都不敢表示意识到自己遭到失败，世上任何力量都无法令时光倒流，重燃熄灭的爱火。每次见面之后他们便分手，决定从此不再相见，要醒悟过来，但结果不过是又马上开始互相想念，用希望来欺骗自己，焦急地等待下

一次见面。他们喜欢回忆他们的爱情，觉得要对此负责。他们不抱希望地期待爱情使他们的希望永生，把他们的生命变成永恒的运动，这个运动不取决于他们或他们的意志，因为他们自己已变成这个运动的实体。

曼弗雷德出生在喀尔巴阡山脚下的一个大城市，来自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这个家是靠经营石油致富的。他的名字叫梅休拉姆，但在学校里大家叫他曼弗雷德，就像后来在以色列戈尔德曼的父亲称他为“知识分子”，再后来又像他的许多朋友给他取了个外号“捣乱分子”一样，最后曼弗雷德离开了这个国家时又被称为“拉丁语”。不过戈尔德曼的父亲从未当着曼弗雷德的面叫过这些外号。曼弗雷德是个思想敏捷，有学问的人。他的外表腼腆、温和，实际上冷酷、果断、有时专制。他话不多，但只要他开口，大家便专心听他讲。可以说他与其他人结交、来往很勉强、极为困难。人们大都尊敬他、甚至对他心存畏惧，尽管另外有相当多人怨恨他，觉得他自负。事实上他是个很狂妄的人，过高估计自己的价值和禀赋，不能容忍人们的愚笨、懦弱、无知和错误，甚至不能容忍他们的差别。他不止一次对人冷淡、蔑视他人，粗暴地对待他们，同时又强迫自己去接近他们，成为他们中之一员。因为他相信集体和友谊，相信两个人之间关系的真诚与纯朴。这些东西组成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世界观的一部分。只是在许多年之后，他在与他那要成为物理博士，他视之为最亲的人的长子拉斐尔的一次谈话中才承认:“我想这是一个新的社会的简单而又正当的行为，它会产生一个较好的世界。不过，归根结蒂，这

不过是一个把我们引向野蛮的粗暴的世界。"拉斐尔问他如果他重新开始生活是否会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他也想到了他的家庭生活——曼弗雷德回答："我不愿想这个问题。"不过，他结束了学生时代以后——他后来把这个时期称为"沙龙时代"，有一天，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所有个人的欲望、感情、才能，甚至表面上连自尊也不要了，他使这些东西都去为一种逻辑服务，这种逻辑是如此深刻、坚定以致有时会使人恐惧。它令人怀疑在这种渴望从根本上否定一切人类的东西——恐惧、爱情、感情、怜悯——甚至他本人的后面浮现的是一个阴暗的深渊。

8

正是由于这同一逻辑的影响，他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他的父母的哀求和威胁都不能阻止他。他们首先把自己看作是哈布斯堡帝国① 的公民，渴望成为德国人，他们是用这种思想教养子女的，更不用说他们对他本人所抱的极大的希望；他不理会向他提供的一切机会，放弃了他有权继承的那份家庭财产，作为一名先驱者迁居到以色列。他在那里凭借坚强的意志，克服了体力上的缺陷，转而从事累人的体力劳动。不过，这使他很快便接受了左派思想，成

① 即哈布斯堡王朝，1278—1918 期间统治奥地利。

了共产主义者。正是由于共产主义思想，他终于否认了犹太民族的存在，在30年代初期离开了巴勒斯坦。他在斯特拉斯堡住了一段时间，开始与共产主义拉开了距离。自从他证实了“莫斯科诉讼”之后两年，便一怒之下脱离了共产主义，去了巴黎。他重新开始学习文学和中世纪历史，尤其是教会的文学和历史，沉迷于基督教的鬼神学的研究：魔鬼概念的演变以及它的各种化身，上帝与魔鬼之间的关系的变化以及它在基督教总体观念上的意义，魔鬼和它们的不同作用，他们在魔鬼等级中的位置以及身份的突然变化和它们的宗教意义。他就这样在自己的研究范围中花了许多时间去画了一张地狱的地图，就像在教会文学或世俗文学中所描绘的那样。他又研究了地狱的不同领域、兽类及其特点，还出了一本论述所有这些问题的小册子，这本书很受重视。不过，这不能使曼弗雷德满意，因为他看到了这本书的缺点和局限。总的说来，他把它看成是他要写的同一主题的更完整、十全十美的一本书的初稿。不过，他始终没写这么一本书。部分原因是由于偶尔遇到了年青时的一个波兰朋友，这人后来成了哲学教师。他使曼弗雷德把兴趣中心转移到斯宾诺莎[①] 上面来。曼弗雷德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甚至考虑出版一本专题著作。就在他收集资料的时候，他发表了有关与基督教相结合的历史哲学问题的文章。几年后，他又发表了一篇关于列宁的性格和革命的文章。后来，他就什么也不发表了。因为随着时光逐年

① 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

流逝，他越来越变成怀疑论者。他在自己写的东西中看不到成功，相反净看见不足的地方，因此他严厉地抨击自己的文章。不过，这些文章也是几乎很难读下去的，因为他的字体弯弯扭扭，文中的句子既复杂又互相矛盾，像个迷宫。他竭力通过矛盾、繁琐的方式去表达问题的复杂性，并且指出隐藏在这种复杂性本身下面的统一的实体。但是，尽管他很了不起，很执著，他终于还是失败了，因为这是一次注定要失败的尝试。于是，曼弗雷德放弃了它，重新去写关于斯宾诺莎的专题著作。他认为这个工作比较简单，他决定专心去写哲学家的生平和他的哲学体系。他坚持他的计划，不管战争在他的周围打得如火如荼，因为他从中看到他个人为战胜疯狂不合理所作出的贡献。不过，不久之后，他就彻底放弃了研究和写作，战争结束后也没有重新进行，因为他对人文科学，尤其对哲学已完全丧失兴趣。经过了战争的恐怖、野蛮和疯狂之后，他把这些工作看作是一种毫无意义、甚至是令人不快的东西，就像文学、诗歌、对宗教和历史的研究以及全部欧洲文化一样。曼弗雷德尽情去发挥他的怀疑主义，这是他在评论方面的才智、他受的教育和他的生活经验的产物。与此同时，他内心信奉虚无主义，并且又重新认为权力才是把秩序强加于这个世界的唯一方式。这样过了一段时期后，他又回复到最初的信念，认为理智和逻辑是建立一个新的、和谐的和良好的世界的唯一基础。曼弗雷德自己不再相信这样一个世界，因为他不再相信理智和逻辑是可以战胜不合理，可以从积极方面去影响历史的力量。出于失望和对这个世界和历史

——它的失败注定要不断重复——满怀敌意，同时亦出于犯罪感，他放弃了一切，去当起泥水匠和花匠来了。后来他又成了关于鸟类迁徙研究计划的助手，以这个衔头在阿尔卑斯山一间茅屋呆了一个冬天。他还有时间去研究光学，空余时间就重新拉起了小提琴，他已好些年没拉了。尽管他拉得很糟，但小提琴能带给他宁静。同时，他的生活经验和怀疑论并没有夺去他丝毫自信心，却教会了他谦虚的新的意义，也教会了他原谅人们的愚笨、错误、弱点以及人们身上所有令人讨厌的东西。这种新的理解使他接受了与妻子的关系及与勒吉娜的私情。勒吉娜差不多跟他一样大，他是在故乡第一次遇见勒吉娜的。

如果勒吉娜不是突然得了一种神秘的呼吸道疾病，他们那时可能结了婚，他们将一起迁往以色列。但是，她被送往各个不同的疗养院，在山区的疗养地呆了很久。曼弗雷德自己迁走了。尽管他们尽力想保持联系，但还是来往少了。当他们几年后在以色列见面时，勒吉娜已跟戈尔德曼的父亲结了婚，曼弗雷德自己也跟一个女人结了婚。两年后这女人离开了他跟另一个男人跑了。尽管这件事令人不快、羞愧，但这却是曼弗雷德最快乐的一天。因为从他结婚的第一天起，他就恨她。曼弗雷德与他妻子一分手，便等待勒吉娜离开戈尔德曼的父亲。但她犹豫不决，没有行动。在这期间，纳奥米出生了。曼弗雷德也跟他某个远房亲戚结了婚。这个女人年纪比他大，但有钱，受过教育。他们在斯特拉斯堡生了两个儿子：拉斐尔和克洛德。克洛德是个很有天赋的男孩，但读书却时断时续，最后投身商界，

也没有多大成就。曼弗雷德说起他来时便说他想幸福反而变成不幸。至于他们的女儿埃莉诺尔是在他们到了伦敦后不久才出生的，他们在伦敦度过了战争的大部分时间。埃莉诺尔个子很高，但身体虚弱，好像易碎的瓷器。她的皮肤白得透明，好像一辈子都关在沉重的窗帘后边过日子。她的嘴唇很厚，苍白没血色。戈尔德曼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她时，便被她那冷冰冰的蓝眼睛迷住了。她当时 17 岁，比他小 10 岁，这次见面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在埃莉诺尔冷冰冰的美丽中既有吸引人的地方，也有令人讨厌的东西。这种美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病态的魅力，总之使她可望不可及，难以接近。她注定一生都要困在一个梦想的世界里，介乎现实、想象和深不可测的内心世界之间，处于产生恐惧和毁灭的愉快感觉的愿望和体验全部消失的那一点上。戈尔德曼不敢公开打听她的消息，每年都希望她与曼弗雷德再来。她几乎真的来了，就在他父亲离家去美洲那一年，但又不知为何原因取消了这次旅行，她不再来了。第二年、第三年，戈尔德曼都在继续等她。直到有一天下午，他听见钥匙在门上转动，他的父亲没有通知便从美国回来了。他提着两个箱子穿过走廊走进来，他把箱子放在客厅里沙发旁边，走进了洗手间，然后进浴室，他洗过脸和手后便走进厨房说：“你好。”勒吉娜回答：“你好。”戈尔德曼当时正坐着吃点东西，他站起来和他握手，也跟他说：“你好。”问他身体怎么样。戈尔德曼的父亲回答说不错。勒吉娜问他是否要吃东西。戈尔德曼的父亲说他要出去。于是他拿了帽子，说：“我只是来拿点东西，我

走了。”他迅速地看了勒吉娜一眼，她说：“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她端给他一杯茶和饼干。戈尔德曼的父亲说：“我喝完茶就走。”勒吉娜又说了一遍：“谁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戈尔德曼的父亲表示同意，眼中流露出敌意。然后他与戈尔德曼说了几句，想知道他的身体怎么样，他在干些什么。他喝完茶便从小柜子里拿出纸张和一些小物品，把它们放到一个小箱子里。不过他没有离开家，虽然每个星期他都威胁要走，还做了一些要见之于行动的准备工作。他写信给房地产经纪，要为自己找一套合适的住宅。同时，他把各种物品、衣服聚拢，甚至把一部分塞到准备搬家的箱子里。他自给自足，自己买食物，自己煮饭，自己吃，不管勒吉娜，完全当她不在。只有中午那一顿除外，他是在餐厅吃的。就在这个时期他开始写遗嘱。不过，这些威胁和计策都没对任何人产生影响，尤其没对勒吉娜产生影响。她跟他算清一切帐目，她毫无损失，却摆脱了一直以来对他的畏惧心理，继续过着她那痛苦的、苦行僧般的生活，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她还找到了对付他的攻击的办法，甚至还令他受到伤害。她越来越内向，她不知道这一点，他也一样不知道，这使他极为愤怒。她很快便不再问他要不要给他煮点什么吃的，或者要不要拿他的衣服去洗烫。她越来越多时间与耶胡迪·梅兹莱一起，穿着打扮令他讨厌，给自己买些没用的东西。当她生病的时候，干脆拒绝接过他递来的一杯茶或者一片药，她宁可死也不向他求助，她既不对他也不对其他人隐瞒这一点。

他们成了死敌，互相开战，这是一场全面的、残酷的、

偏狭的战争。他们采取了小小的、伤人的报复、顶撞、侮辱的方式，利用各人对对方弱点的了解，甚至利用了他们的女儿纳奥米的死。每个人都想用他的方式去占有和重新获得她的生命和爱，互相指责对方是造成她离家和死亡的原因。在这场战争里，戈尔德曼的父亲尤其积极主动：是他首先挑起战争，并毫不容情地继续下去，宣称纳奥米一出生就只眷恋他，因为他时时刻刻关心她、爱她、理解她；不像勒吉娜，一点不想这样做，因为她爱上了曼弗雷德。有时，她溺爱纳奥米，爱到她受不了；有时又对她过分严格要求，下了许多荒唐的禁令，使她变得烦躁、反叛。事实上是她的关怀和严厉使女儿的生活很痛苦，使她从家里逃出去。他不厌其烦地叙述她小时候他怎样带她去散步，怎样给她讲故事，跟她去海边、看电影，怎样在她 12 岁时给她买了一辆自行车，15 岁时给她买了一块表，在她长大了一些，遇到新问题时如何经常与她谈话。这些都不是谎言，不过却是一个男人的想象的不幸的产物。这个男人想重新生活，想不惜任何代价去赢得一个自己不再相信的胜利。事实上是他不大关心纳奥米，总的来说是缺乏耐性，偶尔有机会才好像出于责任那样跟她讲几句无关痛痒的话。只在她身上花了一丁点儿时间，这是他在辛苦的劳动和其他活动之间挤出来的。只有一段短暂的、动荡的时期例外，那时，他试图逼她学拉小提琴，又哄又骗，说服加威胁、许诺、叫喊。但很难在这些事上责备他，因为他的体力劳动、他的雄心以及他的过分追求尽善尽美、他的诚实和自豪已耗尽了他的力量，使他精神崩溃。每天傍晚，他回到家时

已是筋疲力尽，心情烦躁，三扒两拨吃完勒吉娜为他准备的饭菜，他便拿张劳动党的报纸，躺到沙发上，很快便呼呼大睡起来，打开了的报纸搁在脸上。有时就这样穿着工作服一直睡到晚上。

当他谈到与纳奥米的关系时，勒吉娜极少作出反应。有一天他指责她要对纳奥米的死负责，因为纳奥米迷上了那个已在亚历山大结了婚的英国佬，她知道了却不采取任何措施去阻止他们来往，这是她的错。勒吉娜对这种指责依然不吭气。其实，戈尔德曼的父亲甚至在去美国之前就总是认为纳奥米的死是对这种不应有的私情的惩罚，事情发生在她死前几年这一点不重要。他每一次重复这个论据都更痛苦，更愤怒，他越重复就越相信这是真的，它的真实性和勒吉娜的有罪一样是不可更改的，不可反驳的。但戈尔德曼的父亲从来不当着勒吉娜的面提起这一点。因为他从美国回来后，他们之间就不再直接说话了，即使只剩下他们两人面对面，他们之间谈话也好像是在跟戈尔德曼、跟大门、跟墙壁、跟开水壶、跟椅子、跟报纸和所有成了“他”或“她”的物品谈话。勒吉娜总是放弃讨论，躲到另一间房间去，或者走出屋子。只有一次，她突然转身对着戈尔德曼说道：“一切都是从他决定教她拉小提琴的那一天，甚至更早些时候开始的。”戈尔德曼的父亲反驳：“撒谎！她撒谎！”戈尔德曼不想介入这些唇枪舌战之中，甚至不想去劝解他们，他站起来说：“现在该住嘴了！”勒吉娜说他的骄傲把一切都毁了，她把自己关在浴室里。戈尔德曼忍无可忍，躲到自己房里去了。他再也不能忍受他母亲

这几年来由于失望与疲劳的积累变得越来越严重的克己和惶恐，这种疲劳已慢慢变成一种尖酸、刻薄的虚无主义；他也不能忍受他父亲那种愚蠢的、盲目的专制主义。他开始讨厌他们两人，想离开这个家，特别是现在在他周围正在进行一场毫无价值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不过，戈尔德曼没有走，继续与他们生活在一起。尽管他不能容忍看到他们，听到他们的声音，甚至与他们讲句体贴的话；尽管他们两人都在绝望地寻求一点关心、一点爱、一点怜悯，他仍然尽可能在闭紧眼睛，塞住耳朵，让他们互相破坏对方的生活。虽然有时他也有些后悔，可怜他们，但这只是一种一般的、冷淡的同情感，并不妨碍他去干他自己的事。

最初，戈尔德曼想学动物学，可是后来在纳奥米的鼓励下，他想进行东方研究。他的父亲想他成为工程师，但使他失望的是，戈尔德曼最后学了法律，而且成功地学完了。他开始作为公司法和合同的专家任职于一间律师事务所。可是他的兴趣范围远远不止局限在他的职业方面。这种职业使他失望，使他充满了大材小用和失败的感觉。他胡乱地读了许多其它领域的科学书籍和文学书籍、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论文、游记、传记、关于宗教、地质或历史的书，这一大堆书堆放在他的书柜的架子上或散落在整个房间里，当戈尔德曼和伊斯拉埃尔走进房间时，他不得不把堆满扶手椅的书搬开，挪到床上。然后他从橱里拿出一瓶白兰地和两只杯子。问坐在扶手椅里的伊斯拉埃尔想不想跟他喝一杯。伊斯拉埃尔说："好吧，不过别斟满。"戈尔德曼给他们两人倒了酒，他们便举起杯子喝起来。戈尔德

曼又说起他再也不能忍受包括他母亲在内的所有那些人了，他边抚摸着杯子的棱边边补充说："你别误会，这里头有我很喜欢的人。"他说这话时声音厌倦，忧郁，又呷了口白兰地。伊斯拉埃尔悄悄发现在靠近书桌的一个角落里放着哑铃和"补尔活"健身器材，戈尔德曼顺着他的目光望去，说："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这赋予生活另一种意义。"然后，大家沉默下来，可以听见从院子里传来的蟋蟀的叫声，还有远处的嘈杂声，好像是大海的声音。空气里充满了大海的气味，隐隐约约地与波斯丁香、鸡蛋花、海桐花的香气混在一起。察觉不出的空气运动通过房间打开的窗后送进来整个花丛的香味，从未有过那么清新、纯净。

9

伊斯拉埃尔小口小口地呷着杯里的酒，目光不由自主地朝戈尔德曼望去。戈尔德曼也看看他，勉强地挤出一丝干涩的微笑，笑容后面，那张瘦削的脸孔却是惶惶然且了无生气，带眼囊的绿眼睛四周布满皱纹，满眼悲伤的神色。他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说道："你知道我不爱他，但看到他这么虚弱、无能，我便可怜他。无论如何，这是很可怕的。不管怎么说，接受某人的死亡是很难的，事实是他已不再存在了。既然是这样，其它的一切又有什么用呢?"过了片刻，他又说："你瞧，我又说起自己来了。"戈尔德曼

只是简单地讲了几句话，就成功地把他的悲哀、失望和觉得一切都荒唐的感觉，还有他的极度疲劳都传染给了伊斯拉埃尔。蟋蟀那仿佛要永远继续下去的执拗而单调的叫声一直从空旷的院子传上来，带着夏天的气息，伊斯拉埃尔很熟悉这种气息。他的童年就在这个院子里度过，在草坪上，在一品红、波斯丁香、蓝花楹树下，在永远翠绿的大榕树的隐蔽处，或者在浓密的柏树荫下，玩捉迷藏、打球、或者各种各样好玩、粗鄙的游戏。就在这个院子里，在露水打湿的美妙的夏夜，他们讲故事，开粗俗的玩笑，吵吵闹闹，相互手淫，男孩子们有时会偷偷这样干，从而唤醒了他们的激情，以及夹杂着害怕和犯罪感的无限的快感，通过这些东西，他初尝了性的神秘的快乐。当时，从窗后和阳台还传出阵阵平和的说话的声音或音乐。黑色的蝙蝠突然在黑暗中出现，盲目飞行，像石头般落到地面，又再升起。他们互相提防注意不要让它们落在自己的头发上，因为它们一挂上去就不会放松。伊斯拉埃尔坐在这房间里，觉得自己变老了，他又不由自主地看看戈尔德曼，默不作声，他能对他说什么呢？如果他想试图安慰他，戈尔德曼会轻蔑地拒绝，因为他父亲的死不是那种需要安慰的死亡。也许甚至如果可以令他父亲再生，戈尔德曼也不会很高兴，甚至会毫不含糊地反对。在戈尔德曼生活中投下阴影的是另一种悲伤，不能用语言抹去的。伊斯拉埃尔把玩着他那杯白兰地酒，完全缄默下来，这可不是由于他的心情不好造成的。戈尔德曼看着他姐姐在海上的照片，说："她有一双美丽的眼睛。"伊斯拉埃尔也看起照片来，认为他说得对。

然后他转过头去，从打开的窗后望出去。戈尔德曼说爱情和仇恨像习惯的重压，家庭的关系把人与人拴在一起，以致于连意愿和逻辑都无法对他们起作用，死亡也不能打破这些束缚，除非是摧毁一切的时间的顽强的力量，但甚至在这个时候，另外一个人的一部分依然永远渗透你的身上，在很长的时间内，回忆依然会在辽阔的遗忘的海面上掀起波涛。这些回忆本身已不再是事物，而只是唤起一些思想。

外面已全黑，但还不致于黑沉沉到隐没了一品红和榕树那高高的阴暗的树梢。他们在树脚下发现了卡曼斯卡娅的尸体。她从四楼的套间跳下，醉醺醺地死了，这是战后的一个夏日。在她的套间里放满了植物，挂满美丽的壁毯，大客厅和厨房灯火明亮，人们找到了烟灰缸和装满烟头的杯子，空空的白兰地酒瓶，报纸和书，衣服，炉子上搁着一把还烫手的壶，但没有水。她是大清早从阳台上跃下的，对她来说可能是黎明也可能是半夜。极度激动不安的邻居穿着睡衣或工作服聚在院子里，企图通过各种各样的传闻回避她自杀的原因。大部分传闻自然是真的。穆瓦什·特齐梅从这群人走到那群人，大声嚷嚷她这样做很糟糕。从道德观点来看，人们没有权力剥夺、偷盗或窃取自己的生命，因为它不属于你。戈尔德曼的父亲同意她的说法，认为自杀亦是刑法所禁止的，自杀只能表现懦弱和自私。一位邻居打断了他的话，说道："算了吧，到法庭上去攻击她吧！"他嘲讽地指指卡斯曼卡娅的尸体，然后又继续讲话，证明自杀没什么不妥，每个人都有权按自己的意愿支配自己的身体，这个行为本身只是说明某个活着的人决定要死，

然后就死了而已。其他邻居议论纷纷，尽管大部分人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同意戈尔德曼的父亲和穆瓦什·特齐梅。伊斯拉埃尔也看到了这一幕，并且终于看见了卡斯曼卡娅穿着睡衣的尸体躺在潮湿的草地上，后来穆瓦什·特齐梅寡妇用床单把尸体盖上，伊斯拉埃尔把目光众窗口移开，又落在戈尔德曼身上，问他现在如何打算。戈尔德曼惊奇地看着他。伊斯拉埃尔甚至在提出问题之前就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是多么复杂，他就试图好歹应付几句便离开。但戈尔德曼抢先告诉他，说他当然不能像他计划的那样现在就离开家，不过他将改变职业，一年后才会离家，不会再久了。伊斯拉埃尔点点头，没说什么。这些年来，他经常从他嘴里听到这些话。戈尔德曼的前额秃了，刻着一道道深深的皱纹，在他那些几乎每年都重复一遍的话里唯一的不同就是声调越来越呆滞、无力，尽管他还保留着一定分量的信心与意志。

戈尔德曼一口喝干了留在杯子里的白兰地，又倒了一杯，他比伊斯拉埃尔大 5 岁，比塞扎尔大 9 岁，但长期的频繁来往以及他们之间的友谊抹去了这种差别。想了一会儿，他重新转过身，对着伊斯拉埃尔，告诉他他很惋惜服完兵役之后没有如自己所愿上船当一名水手，就像后来没有实现当个农民的志向一样。不过，他知道他放过了机会，因为他太老了，如果他能如自己所愿起码学了动物学的话，他肯定很高兴，但这件事也泡了汤。这就是为什么他学习机械或细木工，就是为了寻到安宁，与阿维诺阿姆在莫沙夫找到的一样的精神安宁。其实戈尔德曼更多的是期待特

别的事件，甚至是以灾祸形式出现的特别事件，而不是安宁。这样的事件可以令他一下脱离现状，根本改变他的生活，使它即时变成他一直梦寐以求的自由、无忧无虑地生活。其实，这与他的原则和能力是完全矛盾的。他又沉默下来，看着伊斯拉埃尔，等待他赞同他的计划，或者以他自己的希望为名反对它。他的目光里流露出某种那么寂寥、失落的神情，以致于伊斯拉埃尔说："是的，不错。"然后又说："明天可能很热。"戈尔德曼喝了一小口白兰地，回过神来，说很遗憾，他母亲不是个身无分文的意大利伯爵夫人，逃到巴黎，在那里遇见他的父亲，他该是个俄国流亡者之类，可能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是个半诗人半无赖的爱尔兰酒鬼，一天天混日子的二流子。因为你要是有他的遗传习性，你便可以高高兴兴地活了一百岁后就消失了，但却怎么也不会成为终生都在律师事务所中翻弄文件的人们中之一员，他们尽量遵循法律，负责任，但无论如何也只是个茨冈人之类的角色，不过，当然是个活生生的茨冈人。

伊斯拉埃尔不是第一次听戈尔德曼这样说了，他开口说道："也许你是有道理的。"他和戈尔德曼都笑起来。戈尔德曼说："我羡慕塞扎尔，他生活着，仿佛生活是一场永不停息的游戏。他没有问题，这是一只真正的小鸟。""小鸟"，这是男孩子们给阿维诺阿姆和哈诺克的姐姐索妮娅·勒维阿唐起的绰号。她是第一个吸引戈尔德曼的女人。还在孩童时代，她就让他隐隐感到人体隐藏着令人心悸的快乐，她自己也从中得到快乐。因为她比他年纪大，对他毫

无感情，所以这种快乐与他的不同。当他来找学校里的同班同学阿维诺阿姆时，她有时会想法让他从打开的门里看到她只穿裤叉和胸罩，她让他摸了几次她的腋窝毛和结实的小乳房。他还曾经斗胆把一双畏畏缩缩的手伸到她的裙子下面，慌慌张张地把手指轻轻伸进去摸摸她的屁股，伸进内裤里面，摸摸肚皮和阴毛。快感是那么强烈，他觉得那么激动，兴奋得发狂，突然，他再也不能自持，一下全部喷射出来。完了以后，他清醒过来，把手拉出来，又尴尬又羞愧，尤其是很不安，他把背转过去一点，偷偷把衬衣从裤子里拉出来，遮住了那一滩痕迹。就这样，他看都不敢看她一眼，就急急忙忙地跑了出来，他两腿发软，穿过院子跑回自己家去。他快快地洗澡、换衣服，使劲地咒骂自己和她。他又伤心，又羞愧，准备做作业。不过，他那么沮丧和惭愧，无法集中精神使自己有个明确的思路。他就坐在那里，对着练习本和书，沉着脸，试图准备功课，忘掉一切。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避免去阿维诺阿姆家，避免遇见索妮娅。她现在在弹钢琴，和各式各样的外国人跳舞，那些人与戈尔德曼不一样，他们肯定放开手脚去享用她的身体。他继续慢慢地呷着他的白兰地，捋着小胡子。他看看伊斯拉埃尔，对他说，总之，所有的人都有一天要死，多 10 年少 10 年改变不了什么东西，也不会改变花天酒地的程度。不过他想了解的是死亡，要把死亡作为朋友，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把死亡作为埃莉诺尔那样的朋友，好像一个久候的、熟识的客人那样来迎接它，不怕它，也不相信没有了自己世界会存在几百年，几千年；也不相信当

他埋在地下一百英尺的黑暗中时，人们会在外面太阳底下散步，去海边，谈话、吃饭、相爱、等待某些东西，看到树木和车辆，看电影和读报。

伊斯拉埃尔一言不发，戈尔德曼把玩着白兰地瓶塞，说道："不，人不能生活两次，甚至多斯托伊弗斯基[1]也只活了一次。"他冷笑起来，过了片刻又说："不过，人们可以自杀。就是说，用自己的武器去战胜死亡。问题在于过后就没有退路了。因此，归根结蒂，胜利也是徒劳。"他又冷笑起来，神秘地朝伊斯拉埃尔摇摇头。伊斯拉埃尔正在盘算着塞扎尔和埃莉兹拉现在在公寓里大概已完事了。于是，他站起来，把杯子放在桌子上，对戈尔德曼说他很累，要上去公寓洗个澡，稍微休息一下，等埃拉来。戈尔德曼没去挽留他，不过他也跟他一起站起来，陪他来到客厅跟他母亲道别，并且说道："我想不久便来看阿维诺阿姆，我好多年没见他了。"他问伊斯拉埃尔想不想跟他一起去。伊斯拉埃尔说："也许吧！"于是，他便走过去与勒吉娜握手。当他正要出门时，拉扎尔叔叔出现地客厅门口，他的衣着像平时那样极为简单：卡其布裤子，蓝灰色短袖衬衣，手里提着个黑皮包。他显得很局促，好像不光害怕客厅里的人，还怕家具、灯光、墙壁，好像唯一能给他一丁点儿安全感的东西就是这个皮包。他站在门口，全力抓住门，尴尬万分，以致于不知道身子该往哪儿转，该干些什么。终于，开始并没注意发生了什么事的戈尔德曼这时突然满面笑容地

① 多斯托伊弗斯基（1821—1881），俄国作家，他的小说注重心理分析。

叫了他一声："拉扎尔叔叔！"并且赶紧奔过去，与他热烈地握手，又叫了一声："拉扎尔叔叔！"这回可是为了让她母亲听见。拉扎尔叔叔脱出身来，步履不稳地在众目睽睽之下穿过客厅，腼腆地与勒吉娜握手，低低地说了几句话。他亲了亲她的面颊，然后退后几步，重新站住不动，仿佛不知该怎么办好。戈尔德曼朝他指指哈伊姆——莱布旁边的一张空椅子，他还未坐下，布拉沙便叫他。他和她讲了几句，还和斯米埃尔、约埃尔、齐波拉、梅尔搭讪几句，与穆瓦什·特泽莱马耶及他的妻子哈亚太太握手。哈亚太太问他耶胡迪在哪里。拉扎尔回答："我把她送回家了，她太累了。"他转身对着哈伊姆——莱布。又黄又瘦，好像死神已长驻身上的哈伊姆——莱布正在低声哼着歌，大手在桌子上悄悄打着节拍。拉扎尔问他身体可好，他摸了摸灰白的胡子，轻轻摇摇头，用意第绪语论："人是什么？今天他在那里，明天就不再在了，这是上帝的意愿。"他的栗色眼睛马上闪出一丝疲倦的笑意，很勉强，但还是愉快的。他抬了抬头上的黑帽子，取了一块点心送到嘴边，一直在轻轻地摇着头。伊斯拉埃尔等戈尔德曼把拉扎尔叔叔推去吃他端上的水果和饼干后，就跟他道别，走了。戈尔德曼陪他走到门口，分手之前，叫他第二天或第三天给他打电话。伊斯拉埃尔说："好吧！"他下了楼梯，感到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他一直向公寓走去，可是当他走到时，他看到他朝街的房间窗帘低垂，他便明白塞扎尔仍然跟埃莉兹拉在一起，因为这是他们约好的信号。他顿时怒气攻心，真想爬上楼

把门撞破，收拾好自己的衣物，一走了之。但是，他却站在屋前不动，很冷静，不时愤怒地望上去。终于，他失望地打消了这个念头，马上走进哈亚尔康街，一直往上走，朝散步大道走去，这个地方高悬于宁静的大海之上。他在那儿靠在金属栏杆上，朝黑暗中望去。一排排白色的浪花有规律地涌向岸边，消失不见了。他心里窝着火，想着他不在时埃拉是否会打电话或到公寓来，耳边听着海浪无力地拍打海岸的单调的声音。这种声音加上弥漫在热辣辣的空气中的海洋的愉快气息，创造了一种宽松的夏日气氛。

伊斯拉埃尔在这个公寓已住了差不多一年了，其实这间公寓只包括了间普普通通的房子。伊斯拉埃尔住在这里既得益于塞扎尔的慷慨，也要受他心血来潮的摆布。塞扎尔把公寓客厅改成摄影室，其中一间房成了“暗房”和照相冲洗室，把他用作办公室和档案室的第三间房让给伊斯拉埃尔，他可以随心所欲住在那里。塞扎尔不收他一分房租，也不要他承担水费、电费和电话费。这个房间很大，有一张大书桌，两张办公用椅，两个灰色金属柜，还有栗色沙发以及伊斯拉埃尔搬来的钢琴。一块大木牌钉在其中一面墙上，上面贴着一张放大了的照片，照片上是一对老夫妇傍晚时分坐在一间缝纫用品店面前两张凳子上，目光平静。这张照片已被撕破，布满小洞，因为塞扎尔常常往上面掷小刀以作消遣。塞扎尔一下就让伊斯拉埃尔用这个房间，内心没有什么别的想法。他这样做是由于天生的慷慨，这是他个人的特点。有时，在某种场合下，他这种慷慨表现得过分夸张，但却仍然很讨人喜欢。他让伊斯拉埃尔住

只有一个条件，就是每当他需要时，伊斯拉埃尔就要把房间让给他。他每天下午2到4点时需要这个房间，他要和埃莉兹拉在伊斯拉埃尔睡觉的沙发上做爱。但是除了这些多多少少固定的时间外，塞扎尔白天、黑夜，任何时候都可能需要，尽管他尽可能提前通知伊斯拉埃尔。但他的需要有时是那么突然，那么迫切，以致来不及通知。当他与一个女孩出现在门口，叫醒沉睡的伊斯拉埃尔，或者打断他正在弹的钢琴曲时，就把伊斯拉埃尔弄个措手不及。这时，他就要当作什么也没看见那样急急忙忙地离开房间。这些突然袭击并不多，因为塞扎尔不知疲倦、不加选择地追逐所有的女人。每征服一个女人，哪怕是最没价值的，都会使他满足和自豪，同时又促使他去进行新的征服。他为此花了不少时间和金钱、力气和想象。他不会那么轻易放弃，不在看来不可克服的困难面前低头，因为他不容许自己失败。他与埃尔温和贝什的观点一样，认为一个男人要与尽可能多的女人睡觉，没有女人会拒绝，因为这是所有女人都愿意的事，尽管她们愿意的方式不同，而塞扎尔不会瞧不起任何一个。

伊斯拉埃尔等待塞扎尔工作太忙无法利用每天那两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也不行的日子，或者他出城，或者他生病的日子，因为塞扎尔不能与埃莉兹拉上床的时候伊斯拉埃尔仍然不能休息，塞扎尔通常把维基带来，甚至在她订了婚后仍然如此；或者带一个偶然遇见的女人上来。这些时间很少空着不用，除非出了意外或者有什么不幸发生，这时不懂休息的塞扎尔就会无精打彩，露出一副一点不打

算掩饰的失败的样子去通知伊斯拉埃尔。现在，伊斯拉埃尔正离开栏杆，顺着散步大道走着，他在这种情况下只感到暂时的顺心，因为他更觉得自己要服从塞扎尔，听凭他摆布。

他慢慢地走着，心里仍然憋着一口气，他看着大海和那些跟他一样在散步大道上闲逛的人们。他们或者坐在凳子上，靠着铁栏杆相互聊天，或者抽着香烟，眼光盯着过路人，或者默默地凝视着大海。这些都是有一定年纪，甚至是上了年纪的人。他们沉浸在夏日的慵懒之中，享受着平静和从海面吹来的凉爽的微风的甜蜜气息。另外就是一对对的青年男女，还有小伙子，他们为好奇心所促使，想寻求某种说不清的快意。伊斯拉埃尔从他们身边走过，穿过马路，走过对面的咖啡店门前。第一间咖啡店不久从前是城里富人、包工头、商人、富有的继承人经常去的地方。他们坐在皮椅上，面对铺着红桌布，放了带花灯罩的台灯的小桌子，喝着茶或咖啡，一边望着大海或者读着画刊，气氛既平和又满足。第二间咖啡店却有个乐队，舞池的另一端有个台子，夏天的时候，台上就会有各式各样戴巴拿马草帽的男歌手和玛尔莱恩·迪特里克及卡门·玛朗德式的女歌手，叫中国名字的魔术师和杂技演员。不过，这两个咖啡馆已关闭多时，现在空无一人，阴阴暗暗。可是，在它们附近却开了三间“地中海式”的大咖啡店，它们蚕食了人行道。里面坐满了涂脂抹粉的女人，她们穿着颜色鲜艳的夏天的裙子，坐在霓虹灯的白光下：一面喝酒一面吱吱喳喳地在扬声器播出的音乐声中又说又笑，一面向四面

八方抛媚眼。她们活像一群栖息在电线杆上的快快乐乐的麻雀。

10

戈尔德曼常与伊斯拉埃尔来到这散步的场所。他认为所有这些女人都是娼妓，她们陪坐的那些男人，围着桌子转来转去或者站在人行道上，双手插在口袋里，眼睛盯着她们的男人都是拉皮条的，要不就是找妓女的。伊斯拉埃尔走过这些男人和女人前面，悄悄看看他们，却没有停下脚步，一直向前走。他穿过一条马路，经过一间灯光又黄又暗的咖啡店。戈尔德曼有一次在这里因为一个妓女的缘故挨了打。接着。他又经过一个卖夹肉煎饼的亭子，一个阴暗的酒吧，抄着手坐在那里的妓女们招呼他进去。他在一间漆成绿色的游戏室门前停了一会，里头烟雾弥漫，肮脏龌龊，一些小伙子正一拳拳地打在拳球上；用玩具汽枪朝快速地出现、消失的小木头人像射击；或者打电动弹子，发出一下下单调、乏味的叮当声；他们还朝地上吐痰，你推我撞，吞云吐雾，赌咒发誓，放声大笑。总之，戈尔德曼在挨揍之前一直都根据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医生的话来为卖淫辩护，当然还谈到在民主制度下任何一个成年人都应具有支配自己身体的最起码的权利。不过，他还走得更远，他不仅声称卖淫是一种积极的现象，一定要给它合

法的地位，还说国家应使卖淫免费或者价钱要便宜，要跟教育、医疗保健、社会福利一样。伊斯拉埃尔当时听着他讲，一点不发表意见。现在，伊斯拉埃尔又停住了脚步，这一回他是停在歌剧院大楼旁边，看着《巴特弗莉夫人》的剧照。然后，他顺着阿伦比街向上走，转进平斯克街，准备回到公寓去。

表面看来，伊斯拉埃尔靠抄乐谱为生，但事实上是靠塞扎尔生活。如果他同意教授钢琴或者学一门职业谋生，他就会另租一套公寓，过独立生活了。可是，尽管他很骄傲，但由于麻烦和不便，他没有走这条路，因为他太自私。当他需要在忍辱、压抑地服从塞扎尔还是自由和选择合适的职业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时，他采取了第一个方案，采纳了一种修道士式的生活方式，没有确定明确的目标，完全不理会现实和时间的约束，这样他便可以使自己的心变得冷酷，坚持拒绝使他为难、感到不方便的事情，同时绝对以自己为中心，以主要的东西为中心。对于他来说，这个主要的东西就是圣—安东尼奥教堂的管风琴，他已弹奏了差不多一年，心想不久总有一天能以此为生，尽管他内心深处已很清楚这个计划不会有任何结果。

他穿过一个铺了沥青，长了几棵枝繁叶茂的榕树的小广场，走近了那所房子。可是，他还未走到街道拐角便看见他房间的帘子仍然低垂。他从屋前走过，一步也没停，只是又朝紧闭的窗后看了一眼，然后便垂下眼睛，悄悄看了看底层的套间。这套房子现已改成了妇女美容院和理发厅。他看见自称为让内特的女老板，她雇的女理发师们已走了，

她一个人坐着，闭着眼睛，头上戴着吹干头发的蓝金属罩。他继续往前走，在本——耶胡达街向右转，走进一间看上去不错的小咖啡馆。戈尔德曼和他经常坐在这里喝杯茶。他从邻桌上拿了一张报纸，漫不经心地在上面扫几眼。他很累，火气又冒上来了，又恨又急，他等塞扎尔空出房间等烦了，尤其是他现在或以后都不知道自己还要在街上转多久。

有时候他运气好，从房子出去半小时或一刻钟便行了。不过也有时候，这样的时候并不少，他不得不冒着冬天的风雨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在街上流浪，一直到有幸终于看到窗帘升起为止。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塞扎尔带回来的女孩作出意外的反抗，不肯脱衣服、上床。这时候的塞扎尔总是忠实于自己的原则和男人的天性，用尽各种方法、计谋，而且很有耐心，坚持不懈，手腕灵活，务求使女孩子就范。他一点不怕掉身份，也不怕浪费时间，如果需要娓娓长谈，他也很投入。他花言巧语、讨好奉承、尽是陈词滥调，大开玩笑，百般爱抚，端上一杯威士忌，大讲特讲最最淫秽的东西，照他的说法是为了“降低道德的门槛”，展示色情照片，他说这些照片能起到酒精的作用，能燃起最冷淡、最有心计、最正经的女人的本能的欲火。在某些情况下，他还胡乱许诺，他其实一点也无意实现这些诺言。或者，他拼命唤醒怜悯的感情，说自己很沮丧，很寂寞孤单，说起自己的失败或者失望感以及认为一切都是荒谬的感觉。他希望通过这样来证明人们称之为道德的东西并不比忠诚、正直、爱情更有意义，没有什么比性更有价值，既

无激情亦无责任。不过，有时他也采取侵犯的行动，甚至采用暴力。因为他认为没有女人不屈服于暴力，甚至有些人希望别人强奸她。总的来说，塞扎尔总能如愿以偿，即使要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斗。不止一次，伊斯拉埃尔在外头呆了好几个小时后回到房间，发现他的床上还散发着身体搂抱的热气。

有时候，塞扎尔过了一会就再回来，或者打电话来向伊斯拉埃尔表示歉意，而且他常常趁此机会向他描述事情的经过，尤其是如果与他上床的女孩是新的，或者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他兴高采烈，得意洋洋地讲述自己的丰功伟绩，不漏掉一个带刺激性的细节，并且努力讲得更下流。但伊斯拉埃尔始终无动于衷。而戈尔德曼就不同了，他虽然认为塞扎尔在吹牛，至少也是夸大——即使不是，也没有什么令人高兴、快乐的东西——但他还是很好奇地听，既开心又兴奋地微笑。但是，情绪平静以后，他很快便感到气恼和失望。他既讨厌自己也嫉妒塞扎尔，尽管他不赞成他的做法，却仍然嫉妒他轻而易举地征服女人，嫉妒他的不负责任，对女人缺乏他心目中的尊重，总的来说，他嫉妒塞扎尔那种毫无拘束的生活方式。在既谨慎又多疑的戈尔德曼的想象中，这一切就像夏日蔚蓝的天空，塞扎尔随心所欲地在其中遨游。事实上这正是塞扎尔所希望的生活方式，他在很大的程度上成功了。咖啡店的老板——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脸容和蔼，古铜色的双臂肌肉发达，整个外表更像个退休的建筑工人——现在给伊斯拉埃尔端上茶，问他们，即他和戈尔德曼近况如何。正在冷漠地想着

塞扎尔的艳遇的伊斯拉埃尔把报纸放在桌上，说道："谢谢，一切都好。"他往茶里加了糖和一片柠檬，慢慢地搅拌。他一面喝茶，一面浏览报纸，最后，目光停在一行大字标题上："圣母玛利亚，你是谁?"题目下面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已经结婚很久，名叫布伦达·伊莱的澳大利亚女人一口咬定自己是圣母玛利亚，身上那些被钉在十字架上留下的伤痕使她很痛苦。她的说法得到了一位与她有着奇怪的友好关系的天主教神父的证明。布伦达·伊莱喜欢把自己称为玛丽安姆，声称十年前有过幻觉，从此以后在双手、两腿和两胁就有些常常消失又出现的伤痕。她是疯子或者只是个骗子呢？她的房东过去因为她与神父的关系相信她是圣女，现在却认为她只是个不付房租，走了几个月的女骗子。不过，她却注意到伊莱不知为何手脚都绑着带血的绷带。

伊斯拉埃尔把报纸折起来，喝茶喝到杯底只剩下一块柠檬。他把柠檬放在嘴里，一面咀嚼一面走去付钱。咖啡店老板对他说："你干嘛读报？报纸会缩短你们所有这些人的寿命。"伊斯拉埃尔边付钱边说："说得对。"老板说："不过，想改变一种习惯是很难的。"伊斯拉埃尔说的确很难。他取了找头后，就来到街上，在咖啡店门前停了片刻，不知该往何处去，然后他决定倒回头朝公寓走去。他走得很慢，神情冷漠，好像他的内心已麻木了。他同样冷漠地抬眼向他的房间依然低垂的窗帘望去。他穿过马路，靠在对面房子的墙上，等着塞扎尔完事离开房间。现在塞扎尔生活中已有3女人——埃莉兹拉、泰伊拉、维基——他与

她们保持着或多或少的稳定和相互需求的关系。

塞扎尔最终与他妻子分手距今已有4年了。他们婚后在吵吵闹闹中过了9年才分了手。这场婚事开始时充满激情，进展神速，最后却以俗不可耐的大吵大闹告终。这场婚姻延续了好些年，在此期间，塞扎尔离家几个星期，几个月，住在父母或情妇家里。他最后一次出走时还不知道这一次是真的永远离开了。他把房子和两个孩子留给蒂尔扎：一个9岁男孩，他们最初燃起的爱火的果实；另一个男孩两岁，是争吵和偶然的后悔和和解的产物。大家本来以为这个孩子的出生会使他们两人重归于好，重新密切分崩离析的家庭关系，结果却只带来痛苦和勉强凑合。有时也还有短暂的后悔，互相尊重和接近的愿望。孩子无法完成不和的父母给他规定的职责，尤其是因为塞扎尔根本不准备作出放弃一点东西或冒点风险的努力。他不能原谅蒂尔扎有一次与另一个男人上床，当时他们之间的关系正处在关键时刻；而塞扎尔自己正恬不知耻地追逐着一个又一个女人。他不能稍微放弃一下自己的随心所欲或者至少稍微收敛一下他自己咄咄逼人的为所欲为以及他表现出的不加区别、逢女人便追的天性。他去可以无忧无虑、无牵挂的地方生活，比如他父母家里。他们总是很高兴接待他，一点不向他提太多问题；尤其他的父亲埃尔温整天忙自己的生意，他爱塞扎尔，不想在他的行为中看到半点不好或虚伪的东西，但是，恰恰相反，他在他身上找到了使他们两人接近的东西。塞扎尔的母亲齐挪也不认为他的行为中有不妥的地方需要训斥。她从不喜欢蒂尔扎，对孩子们也没

什么感情，但只要塞扎尔在她身边，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她的保护之下便行了。同时也因为她很高兴家里住个不管什么样的客人，可以在那所阔阔大大，摆满了豪华家具、地毯、灯饰、名家的油画、雕刻、瓷器和木制品的房子里跟她开玩笑、闲聊或者放声大笑。所有这些物品都是齐娜以无限的热情买来的，就跟她买最贵的裙子、鞋子、大衣、手提袋、首饰时一样，她买了这些东西却几乎不用。埃尔温付钱时并不心甘情愿，不过也不抱怨，因为他有的是钱，同时相信这样做可以使她对他的艳遇，尤其跟切姆达的关系睁只眼闭只眼，他给她的这些快乐可以弥补她生活中的孤寂、愁闷和忧伤。事实上，齐娜嘴上总是带着笑，而且很容易便笑起来，笑得那么大声，有时笑出眼泪，不过，她并不幸福。

她怎么会幸福呢？尽管她已有一定年纪，但仍是个美丽的妇人，女性化，黑黑的大眼睛，高颧颊。她在基辅出生，母亲方面的家族血统是哈萨克的后裔。她曾梦想成为一个艺术家，认为自己有内在的天分，她希望其他人能同意她的想法，让她在剧院演个角色，但是她却没有成功。她把失败的原因归于思想平庸、铁石心肠的剧院经理和导演以及愚昧、嫉妒和阴谋，也归罪于运气不好。不过她从不失望，继续梦想有一天会被发现，在舞台上大出风头。不过，尽管表面上仍在希望，但随着岁月流逝，她的梦想越来越显得难以实现，于是便成了她痛苦和怨恨的根源，她成了自己希望的牺牲品。她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受了埃尔温和贝什的影响开始喝起酒来。她开始时抽着香烟，显出一

副失落的样子只不过是作为一个注定要接近艺术圈子的女人的小点缀，但结果却成了她的真正性格的一部分。此外，她还变得多嘴多舌，令人讨厌，有时又有一阵子冲动，都是令人既可笑又讨厌的。因为这些冲动从一开始就是虚假的，伴随着一种令人不快的狂热的激动以及表面看来符合逻辑的、有说服力的、滔滔不绝的话语。终于，有一天，她自愿到医院工作，致力于贫困住宅区的孩子们的事业。她开始根据亚历山大的方法做体操，从中发现了一根救命稻草。她又在大学学习历史，决定到办公室或商店工作，满足自己需要；不过，她又把决定推迟了。她突然迷上了厨艺，然后又有一阵子热衷于绘画。就在这时，她决定收养一个孩子，甚至与她的姐姐亚法以及埃尔温讨论了几次，埃尔温听得不耐烦直摇头。失望、烦闷、对孤寂和老年的恐惧困扰着她，尤其是她不断地担心埃尔温，这是她最大的爱，也是她最大的失望。这种忧虑在许多年里日夜压迫着她，使她惶惶不可终日，使她备受嫉妒、忧虑和等待的折磨，这些都是不可救药的，把她的生活变成向隐藏在她焦虑不安的灵魂角落的某个没影点稀里糊涂的狂奔。她最后慢慢沉没在空虚、无所作为的大海洋中。她惊惶失措，神经几乎崩溃，除了等待埃尔温在她发疯之前来救她之外不知如何是好。可是埃尔温——她总是费尽心机为了他而修饰打扮——却是只顾自己以及他的生意，只能给她一丁点儿表面上的、勉强的关心。

埃尔温是建筑工程师，有一个大事务所，提供各种建筑、检测的服务，尤其制作那些过于讲究的建筑方案。此

外，他还和马克斯·斯皮尔曼合伙开了个工厂，倒铸特殊形状的水泥构件，这全都是他发明的产物。这样，通过他取之不尽的精力以及他天生的聪颖，使他成了一个极富魅力的男人，当然，其中也隐藏着许多自私和粗暴的成分。这是一个成功的男人，他的抱负就是要取得更大的成功。埃尔温喜欢说："只有一种后悔的原因，就是没有成功"，或者说："上帝创造了猪，一定要把它们养好。""一个好的投资因能带来利益从而变得更好"，还有"给别人爱你的机会"，"生活困难不是不可避免的事，更不是一种乐趣"，有时还说："真理与谎言都不长久，人们只记得成功的东西。"不过，由于他带点讽刺味道的微笑使他目光闪闪，拉长了他那通红的阔脸庞，以及他讲话时的那种随便、无关痛痒的态度，使人永远无法确信他是否在想自己正在说些什么或者他只是开玩笑，玩弄字眼，这其实正是他所寻求的东西。唯一的问题是他想把别人弄得糊里糊涂，最后却是自己陷了进去。尽管他从不承认这一点，因为维持这种状况更为合适。塞扎尔爱他的父亲，毫无保留地欣赏他，从他的格言中汲取一些东西，一有可能就利用，试图像他父亲那样加进一些讽刺。不过，埃尔温年青时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曾作为开路先锋移居到以色列，并在一个吉布兹生活过几年，他始终把自己看作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抱有如此这般的政治、社会、道德原则。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原则发生了不易察觉的变化、走了样。但是，归根结蒂，埃尔温还是承认在道德标准世界与正在运转的世界之间有一道濠沟。既然今天人们可以为所欲为，

那么自然也可以继续通过一种稍为曲折的方式自认为忠于自己的原则。贝什认为这些原则和信仰都一样可笑。埃尔温却拒绝放弃这个信仰，因为他自重，迷恋世界和生活的各种表现方式，他与贝什不同，他能从中得到真正的快乐。埃尔温与他的工作、他的成就、他的熟人以及他对切姆达的永恒的爱之间，也是同一种类型的关系。齐娜憎恨切姆达，就像憎恨埃尔温的第一个妻子、吕阿玛的母亲埃莉谢娃一样。埃尔温与第一个妻子已分手多年，他们结了婚 3 年便分手了。但齐娜对埃莉谢娃的仇恨的不同之处是她在许多年中都没有真正认识埃莉谢娃，也没有见过她，不过，她希望她死掉或者完全被遗忘，同时却又可以说能够容忍她的存在，虽然有时，不太经常，她会从居高临下的姿态指出埃莉谢娃是个可怜的女人，应该同情她；或者以一种公正的语调断言这是个不讲究的女人，不会穿衣服或者没有漂亮的大腿。可是，时间以及埃莉谢娃与埃尔温的生活的真真假假的事使她的仇恨成了对自己有意识的长期折磨、自我压抑和灰心丧气。她对切姆达的恨不是这样的情况。切姆达和埃尔温的公开关系破坏了齐娜的生活，促使她要自我安慰，甚至想象自己躺在贝什的臂弯里来寻求报复。这种报复和安慰的梦想是困难的、丢脸的，因为埃尔温什么都不知道，她怀疑他知道这一切，但却表现出不应有的冷漠。因为她知道她永远没有勇气去实现她的梦想，不管跟谁都不成，尤其肯定不会跟贝什，尽管她看到他时觉得高兴，但却对他有一种不由自主的厌恶。

贝什是这个家的朋友，已成了家庭的一部分，可以随

意出入，与他们一起吃饭、外出。有时住在这里，了解他们的全部秘密。他们的许多朋友、熟人都把他当作埃尔温的兄弟。他们之间的确有一种实实在在的相似，很难明确说出来，是外表、步态、手势中有某种东西相似，可能更多是体格上的雷同，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某种相似的东西，虽然在贝什身上没有半点机敏，不追求高雅，不想显得彬彬有礼、举止文雅，他给人的主要印象就是粗俗和厚颜无耻。

11

他立志终身不娶。这是一个吃起东西来毫无节制的人，喜欢在谈话中穿插一些淫秽的话语，哈哈大笑，像一头驴在叫，同时左右摇晃身体，有时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他挖苦起人来很粗鲁，他对一切都不分轻重地嘲弄、辱骂，包括对他自己。因为他把世界、历史和所有人类的行动都看成是不断重复的愚蠢和罪恶的体现：家庭、宗教、国家、科学、运动、政治、工艺、法律、哲学、医学、艺术、爱情、新闻、教育、全都成了他讽刺和生气的目标，因为他在这些事情中只看到掩盖愚蠢与罪恶的面目的面具。他宣称自己是他这一代人和所有各代人中唯一明智的人，同时又把白痴的角色派给自己，因此他与世隔绝，不把它的惯例和习俗放在眼内，甚至故意犯严重拼写错误来表示他的蔑视。

他曾经有一段时期加入了共产党，那是在两次世界大

战之间。那时他在德国学医，就在那里认识了埃尔温。不过，第二年快结束时，他就放弃了学习，不久之后又退了党。然后，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四处流浪，在陌生人的桌子上吃饭，睡在别人的床上，享用人家的妻子，不管这些人是他的保护人还是他最好的朋友。他过着这样的生活却毫无悔意。他还不断更换地方和职业。一直到有一天，多亏了埃尔温和他在澳大利亚的兄弟的帮助，寄钱给他买了一部拖拉机，他成了工程承包人。这工作本来可以给他带来好日子，甚至金钱，如果他不是在两次征地之间呆在那套几乎空无一物，懒于收拾的套间里过一天算一天的话。他从来没有赚到过他本来可以拥有的一半，花费却总是超过他赚的一倍，更不用说因为他不能按时完工或干得不好被罚款以及错过了的赚钱机会。这一切都丝毫不能使他感到忧虑和后悔，贝什继续照他选择的方式生活，照样全力以赴把肚子撑得饱饱的。这是个贪食的人，吃起东西来狼吞虎咽，一点不担心自己体重已超过 100 公斤。他的体重使他呼吸困难，很疲劳，因为肥胖影响了他的心脏和肺，他的双腿勉强支撑着他，他步态缓慢，东摇西晃。他喝了那么多酒，连医生都觉得他能活着是个奇迹，警告他如果继续像个无底洞似地喝酒便没有多少日子好活了。但他把这些警告抛在脑后，继续喝酒。此外，好像想表现满不在乎，他还非常喜欢画刊、体育报、侦探电影、愚蠢的美国音乐喜剧。夏天时，他下午便把自己关在空调电影院里美美地小睡一会儿。他也喜欢玩仆克，尤其在早上。他当然也喜欢女人。他不像埃尔温那样通过魅力、各种手段、计谋去

引诱她们，他使用最直率、最露骨的方式，就像吃一只小母鸡那样，用两只贪婪的手，使用暴力，什么也不顾，绝对不会温文尔雅。他最多使用卑鄙的手段去诱捕他的猎物，即使在这种时候，他也不会注意掩饰自己的企图。当蒂尔扎还未与塞扎尔离婚时，他竟想说服她与他上床，但她拒绝了，也一点没告诉塞扎尔。塞扎尔从贝什自己嘴里听见这件事，后来蒂尔扎才告诉他。他高兴得笑起来，因为他喜欢贝什，也欣赏他，就像对自己的父亲那样。他想像他们一样，赢得他们的尊重，出于这个目的，他试图找到与他们的共同语言。总的来说是指在生活方面，尤其与女人有关的共同语言。他们一起坐下来交换意见、观点、感受、有时甚至讨论政治和每日新闻，讲讲笑话、粗俗的故事寻开心，有时塞扎尔带些黄色书籍、色情照片来，贝什喜欢看，同时大声进行猥亵的评论。有时这些聚会会变成过节那样，开玩笑，放声大笑，齐娜也参加，脸上喜洋洋，内心却很沉重。

贝什很适应这间豪华的房子。它门户大大开放，不停地发生变动，没有持久的规则，也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表。这并不是由于这间屋子的成员思想自由而愿意采取这种生活方式，而是因为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首先为自己着想，老考虑个人的方便，有时就会暂时或偶然地影响别人的方便，与别人的方便发生碰撞。曾经有段时间，齐娜尽力想维持一种脆弱的秩序，保住一个框框可以帮她留住埃尔温；她亲自下厨，常常买电影票、戏剧票和音乐会票，尽量一起吃晚饭，安息日晚餐及星期六午餐，但是她的一切努力

都付之东流。不过，当塞扎尔最后离开了蒂尔扎回到父母家中居住时，她便不再想使这个家的生活有点所谓秩序。这个家不成样子，乱七八糟，好像好日子过完了，一副曲终人散的样子。

塞扎尔在他父母家住了几个月，住在他们住宅的套间，那里空气清新，从来闻不到厨房和烫衣服的气味，这房子好像既没有洗手间也没有卧床。他 16 岁的时候，一个夏日的早晨，他只盖了一床被单，半裸躺在床上时，女仆肖莎娜曾跟他一起玩——这个插曲使他们后来有了同谋的感觉——现在她又重新照料他，好像他还是个孩子，这正是他所喜欢的。一直到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和犹豫，有一天他终于决定搬到自己租的两间一套的房子里，因为他不能忍受与母亲共同生活，她使他感到压抑，使他发火，不过，不久以后，他就住到泰伊拉家去了。他爱她，因为他知道她关心他的全部需求，不会成为他的包袱。于是，他与泰伊拉住在一起，还跟埃莉兹拉上床。至于不久前他遇见过的维基已经和她那金头发的军官订婚了，她是他空余时间的乐趣，好像他也是她空余时间的乐趣一样。维基是一种真正的乐趣：古铜色皮肤，快快乐乐，落落大方，就像塞扎尔对伊斯拉埃尔谈到她时那样："一个节奏紧凑、充满活力的小节目，可以使我血液流通。"维基很懂得从偷来的做爱时间中获取最大的快乐。当他们在一起时，她从不向他提出任何要求，只要他使她快乐，同时也从中获得他自己的快乐。对于塞扎尔来说，这一点很重要。尤其在这段时间里，他仍然由于与吕阿玛的分手而备受痛苦、嫉妒的折磨，

很需要鼓励、消遣和不会引起什么麻烦的寻常的安慰。泰伊拉和埃莉兹拉相互并不认识，她们不停地向他提要求，使他不胜其烦。她们要求与他结婚，使他的生活苦不堪言。尤其是埃莉兹拉，一点小事就大呷其醋，大吵大闹；泰伊拉却是静静地进行，几乎不提及这事，说真的，她尤其出于自己的希望和一片忠心才这样要求的。埃莉兹拉就完全不同了。此刻她正走出房子。马上便朝大海的方向顺着街道往上走。她很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要求，绝对不会引起误解也不可能逃避。从未喜欢过她的伊斯拉埃尔的目光追随着她，过了片刻，抬起眼睛朝他房间已升起的窗帘望去。几分钟之后，塞扎尔出现了，他朝与埃莉兹拉相反的方向走去。伊斯拉埃尔依然原地不动，靠在墙上看着塞扎尔。然后又用同样冷漠的目光看着女理发师，她现在正坐在一面大镜子前面，梳理自己的头发。接着，他又盯着塞扎尔，他顺着街道往下走，再向左转去找泰伊拉。

泰伊拉高大、苗条，面容娟秀，有一种慵懒的美；又黑又光滑的头发总是拢到脖子上，用一个栗色玳瑁别针卡住；眼睛有点斜视，这倒给她增加了一种特别的风韵以及某种隐隐带挑逗性的东西，尽管看上去眼神总是惶惶不可终日。事实上她是腼腆、内向的，但却不乏幽默；她讲话不多，除非她突然感到快乐或者觉得轻松、没有抑制的时候。当她心情不好时，她便喜欢去洗碗碟，洗衣服，拖地板，因为所有这些工作能使她平静下来。不过，归根结蒂，她并不很注意料理屋子，也不注意外表，常常心不在焉，考虑其它的事情：她喜欢看电影、阅读、音乐以及与塞扎尔

谈话。当她筋疲力尽，从机场下班回来时便很高兴听他说话。开始时，泰伊拉想教法语，不过干了两年后，她便放弃教学，试图搞文学和科学翻译，不过她遇到了许多困难和麻烦——有工作时报酬又很低——所以她最终违心地成了地勤人员，但并没有放弃当翻译的梦。这份工作使她经常整晚、整夜不在家，塞扎尔便可随心所欲地去干他的事。

泰伊拉的父母不满意她转而从事教育。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来到了以色列，拥有一间大家具商店。尽管他们在这个国家生活多年，学会了既陌生又困难的希伯来语，但他们之间，以及与朋友之间仍然说波兰语，尤其她的母亲，一位注重仪表，总是打扮新潮的美丽的妇人，无法适应——尽管她很愿意——炎热、光线和噪音。她既自豪又轻蔑地注视着这个平庸的巴勒斯坦。他们商店挣的钱可以使他们给自己的孩子任何父母都希望给的东西，衣、食、教育、文化等方面，包括音乐和外语的特别课程。但是他们做什么都要算一算，因为他们达到的富裕程度没有使他们变得更大方，即使由于家里有了银器、水晶和钢琴，还在家里举行宴会，使他们也曾尝试使自己显出富有和贵族气派。尽管他们不信教，甚至每星期五晚上还打牌——输赢数目总不大——他们仍然认为严格遵守一定数量的传统礼仪是荣誉攸关的事。星期六和节日，泰伊拉的父亲去犹太大教堂，重大节日时，她母亲也陪同前往，在这一点上双方都不觉得这事有什么矛盾，因为他们认为这一切是他们应该尊重的习惯与准则的体系的一部分，它组成了包括孩子们的教育和前途的一个整体。他们的谨小慎微，斤

斤计较，尤其在金钱方面，事实上已在泰伊拉父亲的性格中深深地扎了根，虽然他们偶然也故作姿态地大方几次以作掩饰，或者用各种原则来辩解。泰伊拉的父亲是个矮个男人，花了许多年的功夫去买卖旧家具，终于有了自己的大家具商店，过上了今天的富裕生活。

当泰伊尔开始在机场当服务员时，他们感到深深的失望和丢脸，但是还不至于像对她与塞扎尔的关系那样，就像大难临头。他们想尽方法不让家族和最亲密的朋友知道，这件事使他们感到那么不幸，那么愤怒，以致于什么也想不下去了，因为他们从未拒绝过泰伊拉的任何要求。他们期望她学完法国文化后，在外交部找点工作或在大学教书，嫁个医生、工程师或经济学家，建立一个家庭。只要她能沿着他们规划好的路走，他们将会全力帮助她。她的两个哥哥分别是牙医和职业军队的电子工程师，他们都同意父母的意见，尤其工程师，他是个脾气不好的单身汉。他们认为有责任去说服她离开塞扎尔，既然母亲无法对她施加任何影响，而父亲已逢人便宣告再也不与她讲话，不与她来往，剥夺她的继承权。每一次谈到这个话题，他便勃然大怒。有一天，他和她坐在客厅里，他的神经失去了控制，当着她两个哥哥的面，抬手打了她一巴掌。不过一切想把她与塞扎尔分开的努力都失败了，因为泰伊拉真正爱塞扎尔，连所有她承认是他的缺点的东西她也爱，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使她享受了床笫之欢的男人。

泰伊拉沉着冷静、坚定不移地反对她的父母以及要与一个离了婚有两个孩子的男人、摄影师同居的决心使她的

父母、哥哥们惊讶不已。不到一年，她怀了孕，不顾塞扎尔的请求，拒绝流产这一点也同样使塞扎尔极为惊奇。他开头指责她不当心，后来态度变温柔了，向她解释，恳求她，遭到她拒绝后就不理她了，接着又重新试着说服她，答应她一堕胎就结婚。他大叫大喊威胁她，躲出城外好几天；后来又回来，心平气和，向她解释从经济和感情的观点来看，他们都未成熟，不能有孩子；一个意外的、不想要的孩子会损害他们的关系和她的前途，因为他与蒂尔扎的离婚还未办完，在办离婚手续的这个阶段生个孩子会彻底破坏他们有一天会合法结婚的可能性，根据犹太的法律，没有这些手续，她就永远不会获准嫁给她。泰伊拉和塞扎尔一样对犹太法律都只有一点概念。泰伊拉不惜一切代价要与塞扎尔结婚，同时想要和他生个孩子，她怕堕胎，她与他谈起这事时心情很沉重，就像她以前跟他讲过许多遍那样，她准备与他同居，生个婚外的孩子，只要她有他的孩子，就算被看作私生子也无所谓。从来不想在她家住两夜以上的塞扎尔说："这样的话，我就走了。"泰伊拉说即使他不愿与她一起生活，她也将会有她的孩子，如果需要，她会独自养育他。塞扎尔火冒三丈，指责她要胁、自私。泰伊拉坐在床上，第一次问他是否想跟他妻子重归于好，或者除她以外还有另一个女人。塞扎尔说她疯了，赌咒发誓说他爱她，只爱她一个，他的生活中没有另一个女人。泰伊拉用怀疑的目光看着他："好，就讲到这里吧！"塞扎尔反驳："你不相信我。"泰伊拉喝了一口床头柜上已冷却的咖啡，对他说她相信他。于是，他把手搁在心口，重新发

誓，一直到快天亮，她已脸色苍白，累得浑身打哆嗦，答应了他的全部要求，他才离开了她。3天以后，塞扎尔带她去诊所，再把她送回家。第二天，她请求他让她安静一下，他一点不理会她的话，在她身边呆了好几天，尽了一切努力，一直到她康复，从床上起来为止。她又求他走，让她一个人呆着，这一回，塞扎尔没有一点异议地走了，而且带着松了一口气的感觉。他把自己的大部分衣物、个人用品都丢在那里，还有他忘了拿走的剃须刀；不过，他没有忘记拿走泰伊拉套间的钥匙。他回到他的父母家去住，一个月不到，不管齐娜反对，他又走了，住到一个朋友家。他好几个星期都不再见泰伊拉，只是不时打个电话，随口问问她的身体情况。她回答他时似乎很冷淡，且有些疏远，仿佛她要保护自己，仿佛她对他的爱情已冷却。然后，出于塞扎尔的主动，他们又开始见面了，进展缓慢，还有点犹豫，但泰伊拉却没有任何先决条件。泰伊拉对与他的约会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起码表面看来是这样，尤其一点不提起他们之间曾经发生的事情。他来了，跟她看电影或吃饭，有时上剧院，很高兴跟她上床，不过开头有一种强烈的负罪感和感恩的思想，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感觉也就消失了——他对埃莉兹拉从未有过这些感觉，他对她只感到一种不可抑制的肉体兴奋，以及对他认为她身上具有的思想、精神的优点的赞赏。事实上，除了一种难以满足的肉欲之外，什么也没有。对塞扎尔有吸引力的是她庸俗的美，不加掩饰的放纵的性欲，她的狂妄，既要假装羞耻，又一点不怕难为情的任性、暧昧的行为，既咄咄逼人又需要

保护。

埃莉兹拉有一点吕阿玛那种很随便，不满足的思想，不过她没有她那种自然和极端。因为埃莉兹拉害怕孤寂，需要讨人喜欢，同时又要保持某种优势，她意识到这种现象，这种优势既是她的力量也是她的弱点所在。她时刻感到威胁高悬头上，因而一切东西在她身上都变成游戏，从而失去了它的力量。但是塞扎尔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尤其不去重视它。他们是在军队里相识的，复员后不久就分开了：塞扎尔去美洲学建筑，埃莉拉兹去耶路撒冷“伯扎莱尔”学校学书画刻印艺术。几年后的一个夏天他们才重新见面。埃莉兹拉已跟从中学时代起就追求她的吉德翁·里特结了婚，塞扎尔也娶了蒂尔扎，他跟她好歹过了两三年。后来他与吕阿玛的关系人所共知，把这个家的生活搞得一塌糊涂，直到有一天吕阿玛一下子无情地结束了这种关系，甚至不把她可能改变主意的希望或幻想留给他。当塞扎尔问她除他之外是否还有另一个男人，她对他说：“是的，现在穿好衣服，走吧！我想不要再继续下去了。”塞扎尔还问她是不是来真的，吕阿玛说完全是认真的。剩下的就是他应该确确实实离开了。塞扎尔总担心这么一件事会发生在他身上，但当他预感到结局到来时，他还是向她问了本不该问的问题，他仍然感到吃惊和窘迫。他站起来，一言不发，穿上衣服离开了，结束了这种多年以来的疯狂、肆无忌惮的关系。这种关系给了他们不可估量的快乐，但也有伤心和痛苦。他嫉妒她的丈夫阿维格多尔以及她在他以前有过的所有的男人——他大部分不认识，还有在她的生活中进

进出出的其他男人，但他从不敢向她问及这方面的事。终于有一天他确实向她提出了这个问题，也正是这个问题结束了他们的关系。

12

她对他的态度经常受无法预料的喜怒无常的脾性的影响，使他很痛苦，经常处于幸福与失望之间，内心深深感到他要受她支配，预感到她有一天会结束他们的关系，就像她结束与阿维格多尔的婚姻一样，她和阿维格多尔已有了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但塞扎尔尽管进行了好几次徒劳无功的尝试，还是没法离开她，始终跟她连在一起，屈从于她与她的脾气。过去，阿维格多尔也是这样。阿维格多尔是个漂亮的男人，心地善良，思想灵敏，有时甚至反应敏捷，不过他很少暴露出来，总是私下里表现，因为他生性寡言，吕阿玛的在场更使他动也不敢动。因为她不仅聪明，还是个长舌妇，性格冲动，无法预见她的脾气和反应。不过，某些时候，甚至一连好几天，她都会显得轻松愉快，风趣，有魅力，她的豁达像埃尔温和她的母亲。只是她会因一句话，一个手势，而且经常没有明显的理由便会勃然大怒，或者陷入极度的失望。于是她会把全部恼恨一古脑儿发泄在她碰到的第一个人身上，或者在男人的臂弯中寻求安慰，或者大吃大喝一番。她的时间都花在睡

觉上面，可以睡整整半天。她对家庭、孩子都很淡漠。不过，尽管如此，阿维格多尔仍然忠于她，当她是个病人那样去照料她，因为他始终爱她（也可能他怜悯她）。尽管她给他带来痛苦、屈辱，他对她干的荒唐事，她的不忠了如指掌，但还是宽容地原谅了这一切。他为了她去看电影，听音乐会，试着学英语，穿不合适自己的衣服，还要照看他养在屋里的两条巨大无比的狼狗，她去任何地方都带着这两条狗在身边。可是，他却令她失望，起码她没有在他身上找到她寻求的宁静。吕阿玛自己要求他做到的忠贞不二终于激怒了他。某一天，吕阿玛向他发表了一番短小而坚定的声明后即以一种令人吃惊的方式，心平气和地离开了他。接着她用埃尔温的钱去了希腊 3 个星期。当她还未离婚时，她就趁当公共汽车司机的阿维格多尔上班的时候，在大白天与塞扎尔做爱。分手之后，他们也在孩子们卧室隔壁的房间一起睡觉，就在阿维格多尔的床上；夏天时就在地板上，或者在浴室莲蓬头喷出的水柱下做爱。塞扎尔亲吻她的厚嘴唇、暖和、沉甸甸的乳房，她的肚皮、大腿，呼吸着她的汗味，快乐、兴奋得抖动不已。但别离的影子笼罩在他头上。当这个时候终于到来了，他便觉得他的整个世界坍塌了，他突然处于无边的黑暗中。

外头下着细雨。当他来到潮湿、无人，依然笼罩在冬天寒冷的早晨的黑暗中的街道上时，他双手放在口袋里，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直视正前方，脸孔冻得发青。然后，他翻起了大衣领，低着脑袋，躲避越来越密的雨点，很快地钻进他的汽车里了。他一动不动地，僵硬地坐了一会，望

着天空慢慢变成灰色，然后是白色，黑暗随之慢慢消失，他感到一种极大的轻松，也许是一种幸福。他一面诅咒吕阿玛一面发动车子回家去。孩子们还在睡觉，蒂尔扎已经醒了，怒火和痛苦使她的脸变得丑陋、冷酷。她看着他问道："你为什么来了？"塞扎尔回答："因为我想来。"蒂尔扎告诉他这不是真的，塞扎尔回答是真的。然后，蒂尔扎又问："你为什么不呆在她家里？呆在她那里吧！让一切都了结吧！"塞扎尔说："我不想。"蒂尔扎说："这还不够吗？"塞扎尔说："是的。"他把手搁在她的肩膀上，但他的动作缺少爱，不过表示了抱歉和和解的愿望，不能使蒂尔扎平静下来。于是他继续抚摸她的颈项，对她说："好了，全都结束了。"然后，他朝孩子们的房间看了一眼，走进厨房，给自己煮了杯咖啡，再朝蒂尔扎走去，问她有什么需要。蒂尔扎说："有，我想这该停止了。"塞扎尔对她说一切已经结束。他洗了澡，换了衣服，从食品杂货店买了黄油、面包回来，然后出去上班，他已感到心平气和，从未有过的幸福。晚上他们去看电影，在餐厅吃饭。他一整天心里都充满了早上那种感情，一直到他去睡觉都是这样。可是，两天之后，这种感情消失了，他又开始毫无理由地到处乱跑，得不到和嫉妒的感觉困扰着他，他几乎完全不工作了，大吃大喝，胡言乱语，从家里出走，厚颜无耻地追逐每一个女人，包括蒂尔扎的妹妹佐哈拉。蒂尔扎尽管很谨慎，但还是像塞扎尔自己一样，相信这个时期已经结束，她为此感到高兴。因为与吕阿玛的这整件事情以及它的后果、仇恨和受辱、受冷落的事实使她万分颓丧，尽管她依然尽力

使家里的习惯没有一丝改变，满足孩子们的一切需要，同时还要保持昂首挺胸，挽回面子。虽然她爱塞扎尔，她还是要求他一刀两断，要不就离开这个家。她甚至叫来了戈尔德曼，请他跟塞扎尔谈谈，运用他的影响。一直到了后来，因为受到轻视和侮辱，她试图挽回残留在她身上的自尊心，突然与一个过去仅仅在朋友家见过一面的男人上了床。但是，当塞扎尔目瞪口呆地听她讲述这件事时，愤怒和名誉受损都不能平息他对吕阿玛的渴望。这种渴望变得如此强烈，使他浑身不舒服。他一面心存报复，一面准备牺牲名誉和理性，跪在吕阿玛面前，吻她的脚，哀求她重新接纳他。他甚至想到去请求埃尔温——吕阿玛爱他甚于任何人——为他说好话，尽力让她改变主意。他在街角窥伺她，从那个地方可以看见她家的门口；或者等在她家对面的院子里和所有她会经过的地方，等她出现好看见她，也让她看见自己。可能他那时做了某件事伤害了他，或者可能发生了什么事，但一切都会妥善解决的。不过，当他看见她带着那两条狼狗走过，身边总有一个那些通常比她年青——有时甚至比她年青得多——的陌生青年时，痛苦和嫉妒使他心都碎了。他在心里发誓，就算这婊子跪下来求他，他也不再要她了。他诅咒她，祈求上帝让她死掉，或者至少让她气色不好或者脸露愁容——可是不，她没有一丁点儿变化，她继续戴她那些大戒指、品味不高的项链，穿着又长又宽的连衣裙，这些裙子通常用印着大花或格子的普通料子做的，她那张不漂亮的脸在塞扎尔看来显得从未有过的幸福和宁静，以致于塞扎尔几乎要失望得大叫起来。

爱情的失意毁了他。虽然他曾发狂般试图去找乐，尽管戈尔德曼和其他人对他好言相劝，没有东西能安慰他，他自己也认为无法自拔了。只是后来他才明白并不是爱情从精神上摧毁他，而是失败的屈辱以及某种属于你，曾给你快乐的东西被拿走给了别人的感觉。这事发生在重新遇见了埃莉拉兹后，事实上是离开了她以后。她没有太当回事的这种认识已经对他没有任何用处了，甚至对与埃莉拉兹有关的事情也一样。

一天傍晚，他们在街上偶然遇见了，塞扎尔请她一起喝杯咖啡。他们走进一个咖啡店，开始时有点局促，然后打开了话匣子，塞扎尔开起玩笑，主动接近她。埃莉兹拉笑着推开他。然后，他们到了公寓里，没有讲一句亲热话就脱衣躺在沙发上满足了两人积了好多年的欲望和饥饿。1小时就使他们摆脱了生活中的痛苦和失望的重压。埃莉兹拉急着回家，很快就起来，匆匆忙忙穿衣服离开。塞扎尔对她匆匆离去一点没感到不快，他走进黑洞洞的房间冲洗照片。3个星期以后，塞扎尔在工作时觉得无聊，给她挂了个电话，他们于是又见面了。这一次他们做爱动作较缓慢，较有耐心，双方都放肆地享受。从此以后，他们就几乎每天都做爱，只有一段不太长但很痛苦很消沉的时期除外。那时，埃莉兹拉怀了第二个孩子，她等了半个月，确实无疑了才告诉塞扎尔。塞扎尔半躺着，盯着她，冷漠地听着，然后问道："你肯定吗？"埃莉兹拉说："是的，我去看过大夫了。"塞扎尔说："好，然后呢？"他翻过身仰卧着。埃莉兹拉说："这是个意外事件。"塞扎尔抬起眼睛望着天花板，轻

轻咬着两颊。埃莉兹拉说："我会把他弄掉的。"塞扎尔很快地瞥了她一眼，问她是否确定这是吉德翁的孩子。埃莉兹拉这一段时期都觉得不舒服，萎靡不振，她犹豫了一下。然后，当塞扎尔开始玩弄放在床边的眼镜时，她便回答："是的，是吉德翁的孩子。"塞扎尔坐地床上，戴上眼镜，点燃了香烟，说了下面这番话："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埃莉兹拉说："我想的就是与你在一起，你是知道的。"塞扎尔现在面对着她，说道："他可该高兴了。"埃莉兹拉说："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他站起来在房里兜圈子，当埃莉兹拉再跟他讲一遍这实在无关重要时，他拿起一把裁纸刀朝大木桌子上掷了几次，然后转身向着她："你是个臭婊子，你想让谁干就让谁干吧，我无所谓。"埃莉兹拉再跟他说她想的就是跟他在一起。塞扎尔怒气冲冲地对她喊道："够了，闭上你的狗嘴，婊子。"然后，他冷静下来，用平静的声音对她说："穿衣服吧，我该走了，我有个约会。"埃莉兹拉说："好吧，随你的便。"她起来穿衣服，他们分了手，他连一眼也没看她。但是第二天早上，塞扎尔工作中间打电话给她，他还未讲完第一句话，她就说想见他，1 小时以后，他们就在公寓里见面了。她心力交瘁，情绪消沉，告诉塞扎尔她决定堕胎，问他是否可以借点钱给她。当塞扎尔说没问题时，她对他说这不会把他扯进去。塞扎尔把她搂在怀里，抚摸着她的脑袋，说："你真笨，我们去结婚，那就一切都好了。"这一天，他给了她两倍所需的钱，尽管他觉得不管她怎么说，这个举动把他给牵连进去了。不过自从他们分手后，他很害怕看到她从他手中逃脱，这一点使他

备受折磨，以致于他很满意现在能够把她掌握在手中，被牵连的想法只会使他精神振奋。埃莉兹拉问他是否真想娶她。塞扎尔说："我已对你说过'是'了，你没什么好担心的。"埃莉兹拉说这正是她所希望的，她把钱放在提袋里。不过，一个星期后，埃莉兹拉就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改变自己的决定，并把钱还给他。当时，塞扎尔正一心渴望得到吕阿玛，她好像持久不散的回声那样纠缠着他。他顿时松了一口气，看了看她，证实她的美丽已经消失，脸孔变得又黄又丑，皮肤干燥，于是便说："我想我们最好不再见面了。"埃莉兹拉神经质地咬着嘴唇，说她没意见，如果他高兴这样的话。在两个星期之内，他们都信守诺言，然后又开始见面了——他们的会面充满了忧伤和抱怨——不过他们都毫无喜悦地坚持到底，一直到埃莉兹拉分娩前不久，他们又重新见面，决定不再相见了。但是，小孩出生两个月后，她和塞扎尔又见面了。塞扎尔慢慢地接受了新的现实，忘记了他的愤怒和怨恨，忘记了他当着她的面或在戈尔德曼和伊斯拉埃尔面前对她的指责和侮辱。他们重拾旧欢，比她怀孕前更热情，更迫不及待，好像想得到补偿，想摆脱忧伤和对不愉快的日子的回忆。

随着埃莉兹拉逐渐接近塞扎尔，她与吉德翁——一个让她过上好日子的水文工程师——的关系就日渐恶化，蜕变成冷漠和不堪入耳的无情的争吵，事实上这不过是他们婚姻本身已开始的一个过程的延续。这个婚姻，除了举行仪式时的风光、排场外，没有一刻的和谐和幸福。如果这个充满挑剔、敌意的家庭框框之能维持下去，那是由于舒

适、失望和恐惧。吉德翁对她表示的爱和关心，注意使她什么都不缺——但他自己却是生性特别节俭——却不能阻止埃莉兹拉从一开始就毫不掩饰地对他冷冰冰，看不起他，她既对自己也对他感到失望。婚后不久她便开始欺骗他，既是为了补偿由于见机行事及自身的弱点导致缔结的失败的婚姻，也为了证明自己的优势，在自己眼中确立无所畏惧的、不受约束的妇女形象。吉德翁继续埋头计算他的金钱，斤斤计较地注意保护自己的利益。他首先要求她停止那些对他不忠的行为，接着，自己也欺骗她，目的是为了挽回名誉以及重新得到她。就是这样，他伤害了她，也吓坏了她，但却没有达到目的：埃莉兹拉自从与塞扎尔有了私情后，更瞧不起他，更走极端，从此便讨厌他了。她厌恶他的声音，他的脸，她觉得他漂亮得没有生气，苍白得平庸无奇。她不能忍受他过分干净的双手，与之稍一接触就使她不舒服。他说的一切话语都会令她恼火，她的孩子也使她生气，甚至使她产生敌意。她很快便又和塞扎尔打得火热，又开始向他谈及结婚问题，但与过去的方式不同。以前她说的话虽然清楚、明白、咄咄逼人，但却是抽象的，最终只得到含含糊糊的许诺。她的要求现在更明确，更清楚，因为她逼他谈论结婚的方式、日期、他们要住的地方。尽管塞扎尔不爱她，但却始终含糊其词，并且想出各种各样的借口。因为自从马上分手的危险不存在，他就不再想受任何东西约束了。有两个理由——当他和伊斯拉埃尔及戈尔德曼谈起时他是这样认为的——令他不能娶她：首先，他不能这样对待泰伊拉，他答应过与她结婚，而且不能忘记

对她满心感激，对她有责任。另外，他怕如果吉德翁知道埃莉兹拉离开他是为了和塞扎尔结婚的话会杀了他。假如说在这些理由中有那么一点是真的话——至少从塞扎尔目前的感情方面来看——那么，赤裸裸的事实是他无法作出决定，他宁可无视这一事实。无论他作出什么决定，都要作出部分牺牲，而塞扎尔是不准备牺牲任何东西的，如果他真正觉得不能使某人痛苦的话，他首先想到的人就是他自己。此外，自从与吕阿玛断了来往，又与他的妻子分了手后，他已疲惫不堪，幻想破灭，再也没有道理放弃单身汉的生活，放弃泰伊拉和埃莉兹拉对他的好处以及他对她们的好处，再去忍受家庭生活那令人畏惧的沉重的枷锁；尤其是他依然觉得自己是一家之主，这种感觉是自相矛盾的，与他的所作所为背道而驰。

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几个月，终于有一天，埃莉兹拉起了疑心，于是便告诉他自己另外有个男人，不时与他上床，她说这话时既不尴尬也不内疚。奇怪的是，这个消息倒引起了塞扎尔的好感。他虽然既痛苦又嫉妒，但却禁不住更欣赏她，而且忙不迭地把此事告诉了戈尔德曼。同一天，他向她询问有关这个男人的事，还问他们是什么时候，具体怎样上床的。塞扎尔答应等他与妻子办妥离婚手续便在春天娶她。（这离婚拖了很久，因为双方都不想加快它的进度）但埃莉兹拉等不及了，她听了这个消息后没两天就把离婚的想法告诉吉德翁。吉德翁一点不吃惊。不过，尽管他们不停地吵架，满肚子怨气，尽管她经常令他受辱，但他还是请求她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因为他重视家庭，认为

家庭是神圣的。尤其因为他那么害怕他的父母，特别是他父亲，一个著名的皮肤病学家的反应，害怕朋友、熟人、同事的反应。他宁可在一场不幸的、令人失望的婚姻中做一个失败者也不愿接受离婚的耻辱。此外，他也习惯了埃莉兹拉，他还是想着她，准备原谅她所有的荒唐举动和对他的不忠。他也为孩子们感到难过，几乎都是他一个人照料他们的，就像料理大部分家务那样。是他每星期一次在上班途中到超级市场采购，负责各种修修补补，付一切账单，查阅家里的发票。如果需要的话，还是由他叫来裱墙纸的工人，或者安放窗帘的人，也是他参加他的长子学校的学生家长会。雇了女佣照料这套宽敞的住房，使它总是干净、整整有序，无懈可击，好像没人住那样，因为埃莉兹拉在孩子一出生就重新到书画刻印工艺室工作，没有耐心干所有这些事。她从不下厨，从结婚开始，他们就总是吃罐头、现成的饭菜或几乎不要准备的东西——香肠、烤鸡、牛排、色拉，或者在餐厅吃。只有星期六中午例外，他们通常到吉德翁父母家吃饭。吉德翁父母不喜欢她，她也一样不喜欢他们。他的父亲聪明，但骄傲，爱指挥人；他的母亲尤其是一个惹人生气的人，她老是唯恐失去她的丈夫，把大好光阴用来作贱自己，以便显示别人是如何虐待她的。

13

吉德翁试图用感情去说服埃莉兹拉，让她明白家庭生活，即使是不稳固的家庭生活都是很重要的。归根到底，离婚不过说明了幻想战胜了理智。他求她想想孩子们，她应该感到自己对他们有责任，因为自从孩子们生下来的那一刻起，她的自由便不再属于她自己，她应把他们的幸福放在自己的幸福之前。他建议换套住房，去外国旅行。埃莉兹拉说她也这么想。但当吉德翁努力说服她留在家里时，她却去向律师咨询，打听采取什么方法才能使她的丈夫同意离婚而不失去自己的权利。她还就真的通过这个行动提出了离婚诉讼，事前一句话也没向吉德翁和塞扎尔提起过。这样，塞扎尔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她的爱的表示了。她甚至前所未有地小心翼翼与塞扎尔来往、约会，怕一旦被吉德翁发现，他就不仅会剥夺她的全部权利，而且务必会令她离婚后也不能再与塞扎尔结婚。塞扎尔不停地赞扬她，甚至对伊斯拉埃尔和戈尔德曼说是她发明了性欲，并且详细地描述了他在床上的战绩。不过戈尔德曼对伊斯拉埃尔说在女人这个问题上，他很可怜塞扎尔，他肯定塞扎尔在他所有的性关系中都没有得到丝毫的快乐，因为它们大概都陷进了标准化的程序中，已成了某种机械化的、令人厌倦的东西。事实上，他整天受到他父亲形象的困扰，患上了

“去势综合症”，因此而忍受“交配情结”的痛苦，使他能够孜孜不倦地证明他自己也不大有把握的男子生殖力。而埃莉兹拉则是个患性冷淡症的女人，她与其他人沟通时扮演了女性求偶狂的角色。埃莉兹拉和塞扎尔两人都不能做到的事便是无论谁都无法使做爱技巧和他们从中得到的乐趣更上一层楼。他们使用了各种各样的产品、器具、照片、色情文学，他们边做爱边读里面的章节，他们照着塞扎尔新近在天花板和床的三面安装的镜子，使埃莉兹拉和他能够看见自己做爱的过程。由于这些不同的镜子，他还能从所有可能的角度拍照。这些镜子使伊斯拉埃尔要发疯了，因为他每次张开眼睛都看见自己的形象同时在几边出现，缠着他不放。不过，现在伊斯拉埃尔离开了那堵墙，穿过街道，没有向塞扎尔说一句话。他最后看了一眼女理发师那微鬈的头发和化了妆的脸，这张脸现在就像一张容光焕发的年青女人的面具。他走进楼梯间，里面弥漫着肥皂和化妆品的好闻的香味。他上楼一直进入屋里，在钢琴盖上看到了塞扎尔匆匆写下的一张字条。他很抱歉这一回花了这么多时间，他同时还提起了夏天和葬礼，又一次向伊斯拉埃尔指出无聊、炎热和忧愁会增加性欲。他对伊斯拉埃尔担保尽管存在各种问题，但一切都顺利进行。最后他画了一头骆驼当签名，用一朵花来点缀骆驼那硕大无比的生殖器。

伊斯拉埃尔把纸条撕碎扔到垃圾箱里，然后呆了一会，突然感到很困倦，他在洗澡还是坐下来弹钢琴两者之间拿不定主意，不过结果他两样都没做，而是脱了便鞋和衬衣，

躺在沙发上，闭上眼睛，全身放松，任凭微风从身上轻轻吹过。当他张开眼睛，便看见自己没有刮胡子的疲倦和紧绷着的脸孔从天花板上看着他。他转过头，盯着自己受阳光刺激的浅蓝眼睛好像一个陌生人的眼睛在镜子里审视着他。于是，他感到在他的疲倦和无动于衷的深处奔腾着对埃拉的欲望，快要把他淹没了。他现在再也不想知道她是谁，她从哪里来，不想了解她过去的所作所为，她现在的思想，他所要的一切就是看见她在这里，在这个房间里；甚至，如果他想的话，去触摸他。在沙发旁边的椅子上，在那盏陈旧的床头灯下面，伊斯拉埃尔看到几本包着皱巴巴有色纸封面的色情书，那是塞扎尔给他留下，让他转给戈尔德曼的。他伸出手随意拿了一本，翻了一下，读起来："最后，我解开了裤子的纽扣，扒掉了衬衣。一会儿后，热尔梅娜突然把她漂亮的小脸伸进门里，溜进了房间，我推上门上的插栓，开始拥抱她。当我朝床走去时，她扒掉了乳罩和内裤。我把她平放在床上，狂热地亲吻她的乳房，然后撩起她的裙子，轻轻抚摸她滚圆的屁股和她那神秘的孔穴，一直到粘液从那里流出来。于是我拉出了我的阴茎，涂上油……"他放下书，坐在沙发边上，然后起身拿过放在书桌上的匕首形的大裁纸刀，朝木板，朝坐在商店前的那一对老人的照片上掷去，就像塞扎尔那么干。这时，塞扎尔正朝泰伊拉家走去，但犹豫了一会后又改变了方向，去蒂尔扎家看望孩子们。蒂尔扎正忙着做饭，她开了门，塞扎尔微笑着走进来，在她屁股上捏了一把，还想拥抱她，但蒂尔扎轻巧地避开他。塞扎尔对她说："你为什么逃避？"他

俯下身要拥抱从厨房里跑出来搂着他脖子的最小的儿子，他把他举起来，亲他的额头和沾满食物的两颊，然后把他放在地上，走进客厅看大儿子沙奥尔。沙奥尔坐在一张扶手椅上看书，塞扎尔亲热地在他肩上拍了一下，问他在读什么。沙奥尔朝他仰起苍白晦暗的脸孔，把书的名字告诉他。塞扎尔没有听清，但这并不妨碍他自豪地惊呼起来，并亲热地抚摸他儿子长着鬈发的脑袋，又在他的肩上拍了一下。他闻到从厨房飘来的那么熟悉的鸡汤和别的一些东西的味道，这时，沙奥尔问他为什么前一天不来带他去看电影。他已忘了这件事，孩子的问题令他呆了一呆，他说有许多工作，不得不匆匆暂时离开城里，甚至没有时间通知他。不过电影还在上映，如果他愿意，他们可以第二天下午去看。沙奥尔同意了。塞扎尔不能肯定他的儿子是否相信他。他自己忘了这件事，又向他撒谎，觉得很内疚，他想开个玩笑来忘掉这一切。他突然合上放在沙奥尔膝盖上的书，说道："说好了，明天 4 点。"然后又问他那些鱼养得怎么样。沙奥尔回答他："母鱼有小鱼了。"他站起来与塞扎尔一起去看大鱼缸，这个鱼缸是塞扎尔被吕阿玛赶出门的第二天早上给儿子买的。沙奥尔把母鱼和在一团团绿色水藻中蹿动的小鱼指给他看。塞扎尔说真好看，一定要好好照料它们。他走进厨房朝正在给汤调味的蒂尔扎要杯咖啡，同时问她身体可好。蒂尔扎一边静静地走来走去，一边回答她很好。然后她把开水锅放在火上面，对他说她很不安，因为 3 天前她发现沙奥尔身体上有些蓝色的印痕。塞扎尔虽然也注意到儿子脸色苍白、一副倦容，但还是对她

说这不过是感冒罢了，打消她的不安。他把鼻子伸进炖肉锅里，叫起来："喔！好香！"然后他盖上了锅盖。蒂尔扎给他倒咖啡的时候，他又想拥抱她，还闹着玩似的摸摸她的乳房。当他弯腰对着洗碗槽喝咖啡时，他便问她跟他6个月前接连看见好几次的那个鬈发的家伙接吻是什么味道，是否他接吻的技术比他高，还是他的阳具比他大。他还问她是否打算与她这几个月中来往的律师结婚。

蒂尔扎一言不发。塞扎尔说："他身体不那么好，不过有钱。"接着又说："你最好嫁给鬈发那个。"蒂尔扎说："谢谢你。"他点燃了一支香烟，问她是否想与他重归于好。蒂尔扎给了他一个否定的答复——他每次来都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提出同样的问题。他把烟灰弹在洗碗槽里，笑了起来。蒂尔扎没有笑，塞扎尔的脸也突然严肃起来，说自己心境不好。蒂尔扎请他不要再像个被宠坏的孩子那样行事，不要等待别人帮助。她说这话时，她那依然美丽的女性的脸孔表示出除父母之外无人可分担的不安。她的父亲是个热情、正直，甚至有点天真的人，对实际缺乏了解妨碍了他在生活中取得世人心目中的成功，但他不把这当作一回事，他带着某种幽默感去看待这一点，就如同他看待自己一样。她母亲不理解这种幽默感，她持反对的态度，因为她从中看到的是平庸，无所作为。然后，蒂尔扎却正因为这个优点而爱她的父亲甚于她的母亲。她的母亲是以一种浪漫，往往是感人肺腑的柔情去爱他的。经过好多年时间，她才学会了欣赏他，甚至为此感到欣喜。因为与她这个一辈子都在建筑工地当木工的丈夫相反——尽管他曾几

次为了她试图改变职业——她是个积极的、雄心勃勃的女人。抱负和行动是她的生活原则，这些原则在她用来治理这个永远清洁、干净的家的一系列道德标准中占主导地位。她也是按这些原则去教育她的两个女儿蒂尔扎和佐哈拉的。她希望她的教育能使她们在生活中实现每个人应该实现的东西，生活在她的想象中就是一场竞争：她不准她们吃饭时头俯向碟子，不准在陌生人面前穿袜子。甚至不准在她们之间提到父亲的假牙。此外，她还认为她们应该生活在大城市里，一生起码要去美国游览一次；应该主宰自己的感情，慎重选择朋友，持有自己的驾驶证，尤其要积极主动，要不遗余力地去争得一席之地，但要光明正大地去取得，最好是通过读书，得到一张大学文凭，大学文凭的持有者们组成我们时代的精英：她认为这些文凭是智慧和个人价值的绝对证明，它们是攀登顶峰的主要手段。因此，蒂尔扎和比她小 3 岁的妹妹一样都学会了跳舞，弹一直搁在客厅里不用的钢琴，打字。蒂尔扎还上个别教授的法文课。她服兵役后开始学建筑，不过她始终没学完，因为她与塞扎尔结了婚，生下了沙奥尔，后来就对事实上体现她母亲意志的某些东西完全失去了兴趣。她只是觉得不该让她失望——尤其面对她妹妹的成就。她妹妹在美国以优异成绩学完了经济后，与丈夫菲利浦和两个孩子回到以色列，很快在政府其中一个部找到了经济学家的高级职位。

蒂尔扎把一切希望集中在她儿子身上和努力建立一个家上面，但塞扎尔不让她那样干，他摧毁了她耐心地、忠心耿耿地、全心全意地、当然也作了许多让步才建筑起来

的一切。没完没了的争吵；旷日持久的疑虑耗尽了她的精力。她觉得受到压迫，陷入嫉妒和塞扎尔使她蒙受的屈辱的痛苦之中。开始时，她感到意外、震惊，因为她爱他，毫无私心，毫无保留地委身于他。逐渐她才明白——她很难对自己的爱情感到失望——这一切都不重要，爱不一定能带来爱，更痛苦的是他连自己的生计都不能维持。在塞扎尔和吕阿玛决裂以后，她也不得不意识到忠心耿耿、忠贞不二以及世界上最好的，哪怕是最有耐心、最顽强的意愿都不能唤回一个我们所期待的人。在这个极为寒冷的冬天的早晨，塞扎尔靠在她旁边，坐在床上，亲热地把手搁在她的肩上，她有那么一阵子充满希望亦充满疑虑地以为她长久的等待终于成功了，塞扎尔回到了她的身旁。

塞扎尔公开欺骗她，在大众面前让她丢脸。婚后年复一年，塞扎尔终于使她产生了自卑感，使她感觉不到自身的价值。不过她还保留着足够的自尊在朋友、近亲，特别在父母，尤其是在母亲面前挽回名誉，尽可能掩饰自己的痛苦和屈辱。她的母亲对塞扎尔感到痛心，但没有露出来，对他依然礼数周到，但很冷淡。蒂尔扎时时留意让屋里保持清洁、整齐，孩子们什么也不缺，她自己尽量衣着得体，通过化妆保持美貌，讨男人的欢心。塞扎尔却正是不原谅她这种做法，即使在彻底分手后也一样。这次分手是蒂尔扎主动提出的，她再也不能忍受他的侮辱和不忠。他怨恨她，他的侮辱和嘲笑时常使她神情沮丧，独自垂泪。慢慢地她不再理会这一切了。在这场婚姻的最后几年，当她开始怀疑塞扎尔终有一天会抛弃她，使她一无所有时，她就

开始存钱。现在，多亏了这笔钱以及她父母的补贴，她做起了家居精品生意来了。她白天与合伙人一起在店里上班，晚上尽量与人交往，跟朋友上街，上剧院或者听音乐会。这些东西并不特别引起她的兴趣，不过这是她生存斗争的一部分。在这期间，她希望爱上一个人，再度结婚，尽管她已经被所经历的事弄得心力交瘁，幻想破灭，很难重新去爱。在她身上迸发出的自发的情感还未被重重的失望、痛苦，也没被过去残留的禁忌所湮没，但却被太多的见机行事及谨小慎微取代了。这都是她与塞扎尔生活的经验和她母亲对她教育的结果。她的要求太过分了，以致老早就拒绝了一切结婚的机会，甚至包括没有爱情的婚姻。对一切都失去希望之后，她需要许多时间来抹去屈辱和恐惧，明白了没有任何东西是永远有保障的，必须放弃许多才有希望得到一些。尤其要彻底放弃希望塞扎尔——他此刻正把空杯放在洗碗槽上——有一天会回来和她一起生活，她的内心实在一直都这样希望。虽然她已不再确信还爱他，但却仍然依恋他，唯恐失去他，相信他们还能重新一起生活，相信塞扎尔的归来会使她在自己、在朋友、父母、妹妹眼中恢复自尊，抹去所有的屈辱和失败。因此，在他们分手后两年间，她都没有与其他男人上床，甚至两年以后，在很长时间内，她都尽量不朝这方面想。如果她有一天终于这样做了，也几乎不是心甘情愿的。这并不是她的原则和感情阻止她去做渴望做的事，就像她的妹妹和她认识的其他女人一样自由自在地去做，事实上是她觉得对塞扎尔有责任，好像他们还没有离婚。而且她在生活中总还希望塞

扎尔一旦停止毫无益处的、无休止的寻花问柳，摆脱幻想和坏的影响，他就会回到她的身边；时间和生活的沧桑已经打消了她这个希望，但却同时使她恢复对自己及自身价值的信心，使她重新对自己个人及所作所为感到高兴和满意。她不再老想他，总是等他，这并不因为她习惯了一个人独立生活（尽管她已从中找到乐趣），而是她明白了从此之后他们便各奔前程，她已拉开了距离，不能再与塞扎尔一起生活。如果说她对他还有所等待的话，那就是待他请求她重修旧好时，她好拒绝他。当她意识到他已毫无用处，她也不再怕失去他，也没什么可以反对他时，则连这个希望也打消了，她自自然然地便开始把他当朋友看待了。

现在她脸带微笑，以一种宁静的优越感望着塞扎尔。他继续在厨房里乱转，他有时也想回来与她一起生活。此刻，他就这样想。他看着她在他旁边做饭，他朝长柄锅上吹口气，把香烟扔在咖啡杯里，然后往锅里舀了满满一勺调了味的肉汤，一股胡椒和藏红花的香味，他叫了起来："味道好极了！"他把勺放在洗碗槽的大理石上，朝蒂尔扎微微一笑，对她说她真了不起。接着轻轻搂着她的腰身，说道："你的臀部真美。"蒂尔扎正好臀部不美，不过脸容姣好，很女性化，神态安详。塞扎尔又伸手去拥抱她，尽管刹那间与他上床的欲望在她心中蠢蠢欲动（即使她表面上既冷淡又忙碌），她还是推开了塞扎尔的手，朝他示意小儿子进厨房来了。他请求塞扎尔给他讲他手里那本书里的故事。塞扎尔很快地看了看表，说他赶着去赴一个重要的工作约会，答应很快便给他读故事，跟他一块玩。他亲了亲他的脸颊，

然后走进客厅，亲热地摸摸大儿子的头，还提醒他第二天4点要来带他去看电影——但塞扎尔大概也没践约，因为他在一位美国女游客身上花了整个下午和晚上，直到她同意与他上床为止——接着，他回到厨房，拥抱了小儿子，跟蒂尔扎道别，带着一种已经完成任务的愉快的感觉走出了屋子。

他在街上遇见了佐哈拉从刚停泊的车子里走出来。他们像惯常那样热情地问好。塞扎尔问她和菲利浦是否安好，佐哈拉说他们很好，问他最近怎么不来看他们。塞扎尔说他很忙，不过答应不久会来，条件当然是她要答应请他喝核桃潘趣酒。佐哈拉说："你想要什么都行，我们还有好的雪茄，你该来看看菲利浦的新照相机。"她作了个告别的手势，就急匆匆地跑进了院子。塞扎尔也向她挥挥手告别，悄悄地从背后看着她，目光一直停留在她的身影和大腿上。然后，他转过身朝离此不远的父母家里走去，同时像每次见到她时那样想着如果他真的愿意，她肯定会跟他上床，她应该挺不错。他还想到她很少有机会与菲利浦上床，除了不时由于责任、由于内疚或者干脆只是为了发发善心之外，而且就算她做了这么一点点，对于菲利浦来说也太多了。因为他比她大15岁，尽管还是壮年，模样英俊，自从他背弃了生活，恶作剧般故意自暴自弃之后，他这个人就完了。

菲利浦是温哥华一个富有的犹太人家庭的儿子，他的父亲是一位颇负盛名的精神病医生，母亲是钢琴教师，他本人在麦吉尔大学读建筑学。除了他在本职工作方面应具有的能力，他还具有精深博大的文化修养，这应归功于传

统和他的家庭财富。家里有钱可以使他生活无忧无虑，可以利用文化领域中可以提供的一切最好的东西，诸如在音乐、书籍、戏剧、绘画、芭蕾舞、出国旅行等等方面。

14

他和佐哈拉是在纽约两人都认识的朋友家中相识的，来往两个月后就决定结婚，婚后1年就生了第一个孩子，再过两年生了第二个孩子。第二个孩子1岁时，佐哈拉才完成了学业，他们决定返回以色列，在那里生了第三个孩子，距第二个孩子出生过了6年。当时他们的婚姻正经历危机，这危机永远不会结束。那时佐哈拉爱上了在菲利浦作为合伙人的公司里工作的其中一个年青的建筑师。开始时，这件事进行了许久，而菲利浦一无所知。等他知道了后，他的反应也只是以极大的冷静，甚至是懒洋洋地说了几句话，然后就沉默不语了。当佐哈拉离开他们与孩子们一道居住的豪华住宅去跟年青的建筑师住在一套租来的房子里时，他的反应也是一样的。佐哈拉的这种做法使默默与她分担痛苦与不幸的父亲很伤心，也激起了她母亲的愤怒，跟她吵得很厉害，但是毫无用处，因为佐哈拉一意孤行。几个月后，尽管他们曾称有伟大的爱情，两个还是分了手。建筑师回到自己妻子身边，佐哈拉也回了家。就是在这个时候，菲利浦也是以她离家时他表现出的同样的冷静来接纳

了她，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因为他生性懦弱、持重，他所受的高品味的教育再加上贵族式的自尊使他软弱、疑虑重重，使他无力作出如他所想的反应。实际上，在佐哈拉回来不久，他就不顾她的反对，卖掉了他在建筑师事务所的股份，不再工作了。他开始靠家庭的财富生活，终日无所事事。早晨，他把孩子送到学校（这是他承认唯一有用的事），给自己准备一片烤面包和一杯咖啡。然后整天听音乐，或者翻阅艺术和鸟类学的书籍，他在书架上收藏了许多这方面的书；或者读读文学书籍，法国和英国的诗歌，解解国际象棋的问题或者做填字游戏。他毫不犹豫地强迫自己去过一种明显极端乏味的生活，他心甘情愿地自卑自贱，生活在一种无动于衷的、痛苦的、嘲讽的令人沮丧的气氛中，这种气氛是首先针对他自己的，但有时也间接地从中迸发出几句对自身的不满和怜悯的讽刺话。他与佐哈拉之间的关系一直令塞扎尔惊奇不已：他同情这个高大强壮的男人，他自甘无能、绝望；他甚至同情佐哈拉，她那种暴躁的、缺乏耐性的行为是一个外国女人才有的，她对菲利浦怀有负罪感，觉得内疚，想对他和蔼可亲，但既不能也不真正愿意与年青建筑师一刀两断，即使在分了手，各自回家去之后，她还继续每星期去旅馆见他一两次。菲利浦知道这些约会，虽然没有人提起过。他却依然不采取任何行动。他在自己和佐哈拉以及其他人之间筑起一道屏障，他继续对她保持最起码的礼貌，不多说一句话也不多笑一下。在塞扎尔看来，他们这一对是把某种活生生的、颤动着的东西与某种已经死了、或者至少已不可救药的东西捆在一

起的一种关系。他无法理解佐哈拉会嫁给菲利浦，如果不是为了钱和他的社会地位的话。同时，菲利浦也令他摸不着头脑，当佐哈拉邂逅年青建筑师后，他竟然作出这样的反应亦是塞扎尔远远不能理解的。当他到了他父母的房子前面，他仍然在想他们的关系是否在认识初期就有根本性的分歧。齐娜听到门铃响便离开了宽敞的客厅出来给塞扎尔开门。她当时正独自坐在大客厅里，手里拿着个沉重的木头面具。她顺着铺了红、黑两色石板的小路往上走，这条小路蜿蜒穿过院子，两旁栽了灌木丛，还有一棵美丽的柑桔树，花开得正旺，散发出强烈的醉人芳香。当她看到塞扎尔时便高兴得叫起来，流露出既幸福又感到慰藉的表情。

齐娜用同样的方式接待客人，因为她认为要使所有的来客都高高兴兴，尤其是因为她不能忍受孤单单一个人呆着。孤独使她沮丧、充满焦虑，所以他总盼望有人来，使她得到解脱。实际上，孤独是她唯一的处境，她很少能越过它的界限。因为她真正关心的只是她自已，甚至她对埃尔温的关心也是取决于后者对她的关心。不过埃尔温有他自己的活动范围，他是独立的，与齐娜的活动范围完全不搭界；齐娜失去了任何支点，便完全不知所措了。塞扎尔再也不能忍受她的荒唐的行动，神魂颠倒的举止以及她对关心和赞同的病态的需要。他亲了亲她的面颊，跟着她来到客厅，尽可能显得亲热一点，问她身体可好，齐娜说："太好了，我的儿子，你呢?"塞扎尔不由自主地感到紧张，对她说他的身体很好。齐娜微笑着说："你父亲快回来了。"

又问他孩子们可好，当他告诉她沙奥尔觉得不舒服时，她便说孩子们是常常会这样的。她把手里的木头面具拿给他看，热心地解释这是象牙海岸的非洲偶象，她在古董商店买的，正在考虑该把它摆在哪儿好。但她对面具和对塞扎尔的热情一样都是无谓地装出来的，因为这几个星期以来，可以看见她对绘画、雕塑、文物和所有其它各种艺术品和衣服的热情大大减退。甚至她为了赢得埃尔温的爱情和关注而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斗争也让位给她对双腿状况的忧虑。她两条腿突然出了问题，她的两条腿本来还挺漂亮，现在却变青并肿起来了，这使她很痛苦，不得不经常坐下来或躺着使两腿得到休息。尽管她发现这个情况时感到苦恼、不安，但还是宁可置之不理，希望问题会像出现那样自己消失。但过了几个星期，她两腿的情况更糟了。在肖莎娜的建议下，她决定用被醋浸过的绷带裹着双腿，又按照贝什的建议，用酒精浸过的绷带来裹；然后又用一种气味难闻的植物油来摩擦两腿，这是埃尔温的兄弟兹维的妻子贝阿特丽丝给她的，还叫她改变饮食方式。当所有这些药物和其它药物都失效后，她在她姐姐亚法的坚持下转而求医。她起码看了5个医生，这些医生并没有在一起讨论过，但都异口同声地对她肯定她的病很普通，也不严重，但是没法治好，大概她下半生两条腿都是这样泛青，肿胀，疼痛。齐娜咒骂这些医生，她拒绝接受这个定论。她生气、失望得咬牙切齿，为挽回外表而苦苦抗争，因为她想死时漂漂亮亮、容光焕发，两条腿要像弗朗索瓦兹·阿尔努的双腿那样漂亮。在她的思想里，这场斗争与为了留住埃尔温的

斗争有关。她在自己的疾病里看到切姆达的胜利和她自己的失败，她用同样的方式去解释一切可能发生在她身上的坏事，疾病或者事故，因此便没有困难也没有理由可以阻止她不惜任何代价去把她那无望的斗争进行到底。失望感和失败感影响了她的生活，但也给它赋予了一种意义和一个目标，也给了她力量去与她心目中的大自然和切姆达的阴谋作斗争。

她现在在亚法身上找到从未有过那么多的安慰，由于这几年遇到的问题和疾病，齐娜把亚法当成日常生活问题的专家，尤其在健康方面。事实上，亚法在年青时正享有这种声誉，因为还在她很年轻的时候就被看作是个讲求实际的女人，机智、脚踏实地，也就是说她完全与齐娜及她们两人的妹妹，漂亮的沙尔娃不一样。自从沙尔娃被丈夫抛弃后，她们已经25年没见过她了。她的丈夫是个漂亮、快乐的小伙子，身强力壮，声音悦耳动听，他在建筑业工作。一个星期六，沙尔娃在海滩认识了他，他用手倒立，打空翻，讲故事，开怀大笑，他的身体散发出好闻的汗味和咸水味：几天后，他们结了婚。她的父母反对这门亲事，因为他们对生活，对人们的行为方式，对男人有默守成规的、保守的看法，这种看法与这种一见钟情，这种闪电般的婚姻以及这个漂亮、讨人喜欢的男人格格不入。可是，他们就像惯常那样用沉默表示反对，平静地、吱吱唔唔地表示不赞同或不满意。只是在一个星期五晚上，她父亲一个人和沙尔娃单独呆在阳台上时再也按捺不住，说道：“你肯定这是你心目中的男人？”沙尔娃给了他一个肯定的回答。她

父亲很爱她，极其温柔地对她说："只要你不后悔就好。"可是，这一切都白费心机。沙尔娃嫁了她的意中人，当时只邀请了几个亲密的朋友。在他们婚后6个月中，他们的生活天天像过节那样充满阳光。终于有一天，他招呼也不打就去了美洲，抛下了还沉醉在幸福中的沙尔娃。她把自己关在家里，不见来帮助她的朋友、亲人，尤其她的父亲。她的父亲努力想作些化解工作，但都失败了。她故意自甘堕落，接受各种乱七八糟的微不足道的工作，不修边幅，委身于她厌恶的男人，事后这些人往往给她留下恶心和卑劣的感觉。她想这样去为她受的侮辱和受了无限伤害的自尊心去惩罚人们，尤其是她的家庭。

相反，齐娜和亚法却因为忧虑和失望而互相接近了，她们常常互相走动，尽管在好些年间她们的关系时好时坏，甚至曾经紧张过。因为她们两人很不一样，生活中走的路子也不同，又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涉足比较高尚的社会阶层的齐娜不只一次嫉妒她姐姐的幸福。亚法在很久以前，即在她的女儿结婚前和她的丈夫纳费尔德去世前着实幸福过。因为她在俄国的中学毕业，又在师范学校读了两年。她只希望过正常的家庭生活，此外别无所求。她是一个模范的家庭主妇。塞扎尔小时候喜欢到她家去，屋子里总是弥漫着厨房的香味，浆过的被子、烫过的衣物、糕点和打蜡的味道；他喜欢看她缝纽扣、织补袜子、烫衣物、揉面团，再用擀面杖把它压平，切成面条；她拔鸡毛，巧手制作黄油辫式面包，她往上面涂鸡蛋黄，然后放到炉子去烤；此外她还照看她的两个孩子：蒂克娃和阿里。阿里与塞扎尔

同年，是他多年的童年朋友。亚法还有时间帮助纳费尔德，他依靠她，什么事都征求她的意见。这是个纯朴、勤劳的男人，开始时只开了个小鞋店，凭着勤俭节约、辛劳地工作，再加上晓得利用机会，慢慢地把小店变成个工厂，规模不大，收益却不错。

15

不过，他们依然俭朴地生活，精打细算，因为纳费尔德谨慎地，甚至是秘密地把利润投资买了两部卡车，整个战争期间他都用这两部车为英国军队工作，又把利润和其它钱一起拿去投资，在耶尔孔附近，靠近阿拉伯的村子，还在城东的田野附近买了地。买了位于这么远的地引起了他大部分朋友的惊奇，甚至嘲笑，好像他买的是撒哈拉大沙漠中央的沙田。其实，他买每一块地都有自己的打算：他在纳哈拉——伊察克公墓买的墓地是为了他和亚法死后不分离。

他们可观的财富以及他继续规定的节俭的生活都没有破坏他们和谐的家庭生活和亚法的幸福。为了纳费尔德，她拒绝了许多比他更有吸引力，更有才华的追求者。但是当纳费尔德决定等蒂克娃中学一毕业就把她嫁给一个年青人时，她可站出来反对了。这是个从匈牙利来的青年，金发碧眼，红喷喷的双颊，容光焕发。他自称为电子工程师，他

温文有礼的举动给人好印象。蒂克娃与他来往了一段时间，甚至还把他带回家三四回。她后来拒绝这门婚事是因为她已与年青人分了手，一点不想和他结婚。但纳费尔德不死心，甚至强迫反对这个计划的亚法去见年青人的父母，这是一对勉强讲几句希伯来语的普普通通的人。经过好几个星期徒劳的哀求、哭泣，蒂克娃终于屈从于自己的命运，她在喜帷下面，身穿白丝袍，脖子戴着珍珠项链，脚穿银色鞋子，被他们领走了。她与工程师在几百位来宾面前举行了婚礼。接着，在乐队伴奏下，客人们团团围住放满食物的桌子。可是没几个月就发现了工程师实际上是个骗子、说大话的人，他游手好闲，每星期都到纳费尔德家里提出叫人瞠目结舌的要求。一遭拒绝，甚至稍有迟疑或者有那么一丁点儿不合他的意便大吵大闹或者虐待妻子。他对亚法和蒂克娃的苦苦恳求百般嘲弄，蒂克娃已给他生下个儿子，而且马上又怀孕了；他对纳费尔德的慷慨大度也嗤之以鼻，后者建议他合伙，并帮助他创建自己的事业。他甚至威胁他们，有一天还想打他的岳父，他把他们所有人的生活都变成了地狱。终于，他们看到除了离婚便无路可走了。可是，不管蒂克娃和她父母怎么请求，他都拒绝离婚。经过多次恳求之后，他同意了，但却是为了得到几千磅和一辆大卡车作补偿。纳费尔德不能再忍受下去了，马上一口答应。可是，这件事拖了好几年，弄得他身心交瘁，寿命都缩短了：蒂克娃离婚后一年左右他就死于心脏病，他死后就葬在他买的那块墓地里。他全部财产和许多生意都过到亚法名下，或者不如说落到了他们的儿子阿里手中。阿里

当时 24 岁左右，却已到了生命的暮年。

阿里是个高大英俊的小伙子，不管他在活动还是在讲话都给人半睡半醒的感觉。他对周围的事漠不关心，作息时间也好，传统的行为习俗也好，全都无所谓，甚至懒得去取得父母的欢心。他做了他们期待他做的事，他出色地通过了中学会考，使纳费尔德十分高兴，他在他身上看到了未来的合伙人和继承者。不过在纳费尔德死前不久，他从部队回来，就让人难以认出来了。虽然他读完了管理专业第一年，可在第二年开始时，他突然不读了。他开始睡到中午才醒来，悄悄走出家门，在街上闲逛，穿着离奇古怪，身后留下一股女人的香水味。亚法靠会计帮助管理着生意，她要求阿里把生意接过来，或者上大学，或者另找一份工作。阿里叫她不用担心，可以信赖他。但他可什么也不干，因为他对一切都感到厌倦，他那颗苛刻的心充满了恶毒的仇恨和无缘无故的歹毒，使他在冷漠的外表下时时处于紧张状态，近乎极度疯狂。他沉湎于打扑克、台球、掷骰子；他开始有步骤地随意挥霍他父亲多年辛勤劳动、勤俭节约、精打细算才积聚起来的大笔财产，更不用说他为了那些恬不知耻地利用他的一面之交的朋友所花的钱，他们晚上请客时把吃、喝、抽烟都算在他帐上。如果他有时会收敛一下的话，他便把自己关在房里。他把房间扩大了，他现在还住在里头，他在房里躺在床上用墨汁或粉笔画画，就像他在中学里学的那样。他对母亲的敦促报之以沉默或粗暴，他母亲这时还继续为他做饭、洗烫衣服。有一天，亚法对他说起生活要有一个目标，他回答："是的，我有目标。"

但她不敢问他是什么目标，因为她不想惹他发火。只是当她把汤盘放在他面前时才好像对旁人讲话那样亲切地对他说也许他该工作、结婚、生孩子，去找到自己的幸福。从不正面看她的阿里回答："我很幸福，我干我想干的事，现在没有人，将来也没有人能阻止我。我父亲挣了许多钱。"然后，他站起来，再也不多说一句话便离开家里了。

尽管亚法更担心儿子而不是在她眼皮底下烟消云散的金钱，因而多次请求蒂克娃出面干预，但却遭到拒绝。蒂克娃也对发生的事很生气，很担心，但只限于在财产方面。她那么需要钱，极想保住自己继承的那份财产。她多次直截了当地向亚法提出来，经常粗声大气地说，但她没有什么行动，因为她那一切不幸遭遇令她很痛苦，她要照顾两个孩子。此外，她从未喜欢过阿里，从不担心他会出什么事，他们之间的关系形同陌路人，以致于她再也不想看见他，也不想见到她母亲。阿里也躲避她。只有那一夜例外，他吸了毒，神态狂乱，一大早叫醒了她，与她面对面坐在厨房里，她给他倒了杯热奶。当时，他对她说，一切都腐烂了，他讨厌全世界以及他的母亲。每个人都有权成为上帝，有责任成为上帝，但他认识的、尊敬的神祇却是罪犯，因为他们违背一切准则，创造了他们自己的世界和法律，并且愿意按这些法律来生活。蒂克娃静静地听他说，然后给了他一条毛巾洗脸、洗手，再给他倒了一杯热奶。等他清醒过来后，她便送他回家。一到家，他就和衣睡着了。过了一个星期，他又到了她家，这回也是吸了毒。他给她带去一张蓝墨水画的草图，上面画了一条弯曲的手臂，一个

蛇头代替了手。一个男人靠在手臂上部，戴着帽子（帽子叼在蛇的嘴里），穿着裙子、便鞋，手里拿着类似牧童的长棍那样的东西。一条狗坐在他前面，在手臂的水平面上。这条手臂与人、狗一样，位于两条分开的腿之间，一条腿是水平的，另一条腿在右角，朝天固定在空中。在水平的那条腿的尽头——据阿里说这条腿是根据一根肋骨创造出来的——出现了他母亲的脸孔，从脸孔处同时伸出手臂和两腿，脸上的皱纹在前额构成一棵树。在脚和膝盖之间是女人的生殖器，正在研碎男人的一条腿——据阿里解释，罪孽来自女人，她使男人堕下深渊，朝天的腿象征这个堕落，大脚庇护蛇头和男人的头，阿里把这个人叫做“好牧人”——这个人就是代表阿里自己，他被许多恶狼围困，这些狼没有在画面上出现。

16

阿里解释完画面以后，对蒂克娃说只有他一个人能够真正理解这幅画，而且即使除他以外的其他人也能悟出画中的某些奥秘，他们最好还是不要去碰它，因为这很可能会给自己制造灾祸。他请求对这画心生不安和恐惧之感的蒂克娃把它藏起来。蒂克娃接过画，在阿里的眼皮子底下把它藏入衣橱最下面的抽屉里，一边打算一有机会就把它还给阿里或交给亚法。亚法尚未从丈夫去世的打击中恢复

过来，每晚入睡前和清晨醒来时总要怀着无尽的哀伤想起亡夫，痛失亲人的感觉时常萦绕心际。同样令她愁肠百结和意志消沉的阿里的状况的恶化也不能冲淡她对亡夫的思念，而将纳费尔德的离去变为真正的困境。面对这种处境，她不顾一切地寻找一只援手，一个建议，或者至少一句同情的话。这处境不仅让她惊慌失措，而且令她方寸大乱，大大地伤害了她。她无法理解阿里的行为，因为他曾受过良好的教育，每时每刻都被抚爱有加，在吃、穿、玩具和零用钱诸方面的要求都被慷慨地一一满足。亚法那时还没有感到目前这种巨大的空虚，也还没有为蒂克娃的恶毒行为而苦恼，因为阿里的问题掩盖了一切。后来她深受各种家庭纠纷和疾病所苦，而这对于她丈夫的死和孩子们的境遇使她产生的忧虑不安和犯罪感，无疑是雪上加霜。她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地衰老，昔日曾使她名声远扬的美貌已如枯花般凋谢，仅留一点儿痕迹，尽管她仍然保存着相当的活力和力量以不脱离现实生活，照料一大家子和负责采购、做饭和制作糕点、处理日常事务，仍然很有兴致地穿衣打扮甚至化淡妆。她还得爱护阿里，除了那次她实在控制不住自己而大发雷霆，严厉地呵叱他。不过她随即又痛苦地感到内疚，因为她看到自己在这整件事中是唯一应指责的人，也因为她很心疼阿里。无论如何她还是强使自己相信阿里成亲后会变得循规蹈矩，一切都会恢复正常。然而阿里对女人们同样感到厌倦，他不结婚，继续表现得十分粗野，如果他不是已经自杀了的话，他一定会不顾亚法的恳求和蒂克娃的愤怒继续把家里的财产无情地挥霍贻尽，直

到一个子儿也不剩。

阿里朝嘴里开了一枪。两天后人们在他的车里找到了他的尸体。车子停在一些柑桔园中间的一条小路上，离海不太远。阿里穿着一套皮西装，里面一件花衬衫，打着一条黄领带。是埃尔温和塞扎尔——塞扎尔还从他母亲家里取来非洲神的木制面具放在书架的一层搁板上——去尸体认领处认的尸，因为无论是亚法、蒂克娃还是齐娜——后者带着恍恍惚惚的神情看了看假面具并说“很漂亮”——都没有力量到那里去。是由贝什陪着埃尔温和塞扎尔去把噩耗告诉亚法的，而亚法甚至在他们开口之前就已经晕倒在客厅里，就像她在得悉蒂克娃的匈牙利工程师其实并非工程师时晕倒那样。她打翻了咖啡杯子，咖啡在她周围洒了一地。塞扎尔赶紧朝她身上泼冷水，同时也使水溅到贝什和齐娜身上。齐娜脸色苍白，无精打采，试图安慰她姐姐亚法，同时拼命压下她因看到咖啡渍在墙上和地毯上扩散开来而对姐姐和对这一切产生的愤怒，并在亚法稍微恢复了一点神智后就迅速地用一块湿抹布去擦，可惜徒劳无功。咖啡渍使齐娜一直息不了怒，最后他们终于在阿里安葬后把整个房间重新粉刷了一遍。阿里的自杀以及所有与此相关的一切彻底摧垮了亚法，使她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而且这绝望与日俱增。她是带着一种痛苦得发呆的表情反复说这些话的：“至少他要是死在军队里也更值得呀！”尽量安慰她的齐娜继续看着非洲神假面具，一面再三称赞说它很美。实际上她一直在看着埃尔温走到花园里的小径上，聆听他与别人说话的声音，直到他走进房间，后面跟着他

兄弟兹维。兹维带着一头狼狗，名唤“亨利”，本是一头令人生畏的动物，但年老力衰和无所事事使它变得无精打采，它跟着兹维到处去，就像埃尔温那从不离嘴的烟斗那样。齐娜看到他们时发出一声欢叫，但是从照亮了她的脸的那种凝固了的幸福表情中也泄露了她的愤怒和神经质，因为她知道埃尔温直接从切姆达家里来，且她心里既没有兹维又没有他的狗。这条狗散发出一股难闻的衰老的味道，它在昂贵的地毯上随意遛达，蹭着扶手椅和长沙发，用晃动的尾巴使散放在整个房间里的玻璃器皿、瓷器和花瓶处于危险之中。兹维跟她握手并对她说“我们给你一个小小的惊喜”；而埃尔温一看到齐娜便要她煮咖啡。齐娜一边在埃尔温的脸上寻找他去过切姆达家的迹象，一边用下面的话回答兹维的微笑：“这太好了。见阿特丽丝好吗？”兹维答道：“她很好，她工作很辛苦。”然后他又去握塞扎尔的手，塞扎尔正在问候父亲埃尔温。齐娜说她很羡慕贝阿特丽丝，接着去煮咖啡。兹维、埃尔温和塞扎尔走出客厅来到临海的阳台上，三个人一起坐下。享受着浸透了柑桔树、柏树和刚浇过水的青草的芳香的傍晚的微风。兹维一边缓慢而细心地往烟斗里塞烟叶，一边呼唤“亨利”和问塞扎尔在干什么。接着他又与埃尔温重续刚才中断了的关于政府的土地政策的谈话，两人特别谈到了出让土地搞建筑和农业用地城市化的问题。

很难想象兹维和埃尔温会是亲兄弟，因为虽然他们在身材、音色及脸部捉摸不定的表情上较相象，但在其它方面太不一样了。兹维是一个又胖又结实的男人，脸上刻着

皱纹，额头很高，话讲得很少、很慢，讲话时全神贯注——这也是他的行动方式——他身上有某种很冷酷、顽固，甚至很威严的东西；即使在他偶尔表现出温柔和热情的时候，也似乎不是他的本性。他曾在荷兰的乌德勒支呆了四年，准备一篇关于某些激素生长过程，以及它们对玉米某些品种的单位面积产量和提高其收成的影响的论文。可是在他即将进行论文答辩的时候，一位英国研究人员排挤了他，发表了一篇正好是同一题目且结论与他得出的结论多少有些相同的文章。于是兹维放弃了博士论文，携带在荷兰迎娶的贝阿特丽丝回到祖国，在城郊一所小房子里安下家，投身农艺学以及有机肥和无机肥方面的应用研究，贝阿特丽丝则在大学教授古代东方历史。贝阿特丽丝是一位快乐的和生气勃勃的女人，不过没有生孩子，因为兹维不想要，他认为他没有权力违反孩子们的意愿让他们降生在一个糟糕而冷酷的、将会腐蚀和伤害他们的世界上。他还强使贝阿特丽丝也接受了这个意见，而她本来是希望有一个孩子的。贝什常说一旦没有了这些冠冕堂皇的话作幌子，兹维的观点只能暴露出一种纯粹的自私。

兹维在战争期间曾参加英国军队，他在巴尔干半岛、西沙漠和欧洲服完役又参加了勒依① 的组织。这在他和埃尔温之间引起了频繁的紧张冲突，不过就像涉及他们的遗产的潜在冲突那样，从来没有导致过公开争吵。复杂的手足

① 勒依（Lehi），以色列恐怖组织名称的起首字母。该组织成立于1940年与贝京产生严重分歧之后。它主张以武装斗争和暗杀对付英国占领军，以解放巴勒斯坦并建立大以色列国。

之情将兹维和埃尔温连在一起，兹维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很坚决果断，而埃尔温一贯忙于个人的商务，而且他太聪明、太好嘲笑人，不会使事态恶化，这样，甚至在以色列建国之后，两兄弟之间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这国家的性质越来越不符合兹维的理想，于是他采取了日益极端的立场，尤其是在六日战争以后。他大部分时间都缄默不语，但当他发表意见时，尽管他不是左派而是中间派，他任由自己态度生硬、勃然大怒，他批评政府听任形形色色的寄生虫轻而易举地大发横财，巧取豪夺公共财产，以一种非常不负责的、足以引向灾难的态度扩大社会的鸿沟，在宗教或其它荒谬理论的幌子下让国家沦入一种狭隘民族主义和一种法西斯化和暴力日益膨涨的过程之中。这时候埃尔温却竟然赞同兹维的观点，尽管他作为个人从这种经济和政治形势中获得了金钱方面的利益。他面带一种半嘲弄半严肃的微笑回答他兄弟说，人归根结底只不过是人，所有发生的一切都属于一个飞速发展和曾经经历过长期战争的移民国家的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但是兹维不准备接受该论点，因为国家对于他是弥足珍贵的，在他看来妥协好比在虚假事物面前闭上眼睛那样不符合他的性格，除了处理他们父母留下的遗产一事可以妥协以外——遗产是一套房子和三块大地皮，两块在特拉维夫，一块在纳当亚。埃尔温起初作为遗嘱执行人和纳税人，然后作为正式业主控制了遗产。兹维对这整件事大为震惊，但他什么也没有说，而埃尔温也没有吱声，以为他兄弟不关心遗产或忘记了此事。然而兹维——他现在点燃了烟斗，吹出一些小圆

烟圈，一边抚摸着"享利"——什么也没有忘记，但他在内心深处决定装着什么都不知道，并永远不在任何人甚至贝阿特丽丝面前提起这件事。兹维问埃尔温土地的价格将会上涨多久，埃尔温答道："能持续多长时间就多长时间。"然后他打开了摆在阳台的白色铁制桌子上的那盒烟，递了一根给塞扎尔，也替自己取出一根。兹维说政府应该出让非农业用地搞建筑以降低公寓套房的成本，埃尔温一边抽烟一边说这并不重要，人们有许多钱要花掉。兹维又说政府本身在投机，它实际上是最大的投机者之一，埃尔温反驳道："政府也得赚钱呀！"

埃尔温看起来疲惫不堪，但他的疲劳并非年龄和过度努力引起的，而是一种大家特别是埃尔温本人宁可不知道的病的症兆之一。除了极度疲惫以外，他还饱受失去短暂记忆之苦，双手和背部有阵发性颤抖和疼痛。他可以在谈话当中睡着，两眼半闭，嘴巴张开，或者虽然还醒着，却心不在焉地看着对话者，根本不知道谈到哪儿了。他那宽阔的脸已开始皱缩，皮肤变得松弛和起了皱纹，活像太阳底下晒干了的苹果的皮。然而他从他母亲克拉拉大娘处，在某种程度上也从他父亲达维老爹那儿继承的活力，如同激励着他的野心和求生存的本能愿望一样，驱使他奔忙、领导他的公司，监督他负责的各种建筑工程计划的实施，进行新的构思，同时尽力搞垮他的对手，通过搞票证或一些卑鄙手段抢走对手的定货。他也同样继续好吃好喝、追求女人和满足他对切姆达的不倦的性欲，而切姆达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顽强斗争和这么多的希望——这些希望只在唯

一的一个夜晚重新燃起，尔后又熄灭了——以后，已经任她的种种美好希望消失殆尽。

切姆达把愤怒、高傲、失望这一切统统压下去了。即使她还是害怕孤独——她无论是在埃尔温的陪伴下还是在他走后把她一个人孤零零抛下时都感到孤独。即使她还是后悔没有要孩子，她仍然在她对埃尔温的完整的爱中，在她坚信他也爱她、除了死亡什么都不能再把他们分开的信念中，得到了满足。她对两人一起分享欢乐的时光感到无比幸福。而当埃尔温有时微笑着对她说真正的爱情是无法实现的爱情时，她甚至不再像不久前那样劳神去反驳："埃尔温，这是些漂亮话，可暖不了我的床。"她微笑着换了话题，因为她不再需要格言警句，也不再需要杂志、妇女报刊合订本上的闲言絮语或故事，她已经停止收集这类文字，停止在脑子里加以反复考虑，仿佛这是些她必须解开的魔语、咒语和隐语似的，因为它们掌管着预言未来的大权，教导她如何生活和博得埃尔温的好感，或者至少它们能够帮助她克服不幸的爱情生活中遇到的种种困难，顺利通过它的全部考验。这是由于她的生活已经不再是那么凄凉，她的爱情也已经不再是那么不幸了，相反这正是她过去所能想象出的最纯洁最完美的爱情，她祈祷这爱情就像现在这样永远继续下去。而且她只希望有一个孩子，那么她将别无所求了，甚至埃尔温的去世也不会令她惊恐不安。

切姆达谁也不嫉妒，甚至不嫉妒齐娜。这时齐娜刚从厨房出来，推来了活动餐桌连同咖啡，开始往这金属餐桌上摆一些带有朱红色花纹的精致的白瓷杯、一个盛满了核

桃和罂粟籽糕点的银制独角盘和一个放黑面包片的碟子。然后她坐在塞扎尔和兹维之间，把瓷咖啡壶里的咖啡倒入每一只杯子里。埃尔温拿起一片齐娜专门替他带来的黑面包，一边看着她，仿佛在此时此刻才发现她似的，并说道："我走的时候你的头发还是棕色的，可你现在已经是满头金发了。"他微微一笑，立即向兹维转过头去说道："你看人们的变化多么大。"他再次露出笑容，可是兹维的脸上依然毫无表情，于是埃尔温那有点勉强的微笑在他那疲倦的木头般刻板的脸上消失了。埃尔温掰下一块他喜爱的、有股糠和黄麻布的味道的黑面包，开始有滋有味地嚼起来，一面喝下一口咖啡。他的动作和他母亲克拉拉大娘的一模一样。克拉拉大娘也是兹维和他们两人最小的弟弟米沙（他已经和妻子移民到阿根廷）以及其他四个孩子的母亲，其中一男一女已在年幼时夭折，一个女儿死在拉索阿，而第四个男孩于利尤斯曾参加过游击战争，并成为战后共产主义波兰的某位重要人物，党内和情报局的高级官员，从此他和家庭脱离了一切关系。只是在最近他们才通过在阿根廷的弟弟重新和这位兄弟恢复了联系，尽管他现在继续自视为波兰人。贝什的兄弟也如此，他曾经为躲避纳粹逃亡到澳大利亚并在当地生活，可是他竟然不顾发生过的这一切而愿意继续做德国人，声称无论是希特勒、海森堡或是其他人都不能替他决定他是哪国人而不是哪国人，或者取消他的德国国籍。

塞扎尔边品咖啡边端详他父亲埃尔温的脸及脸上消逝的笑容，他的脸和克拉拉祖母的脸有着惊人的相似。塞扎

尔很喜欢克拉拉穿着标新立异的大花衣裳泼妇般闯进他们家时那扯开的生硬的粗大嗓门，这嗓门总是使他莫名其妙地充满快乐。甚至在祖母生命中最后的日子里，当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时，当她力图通过洒香水和在床边置放鲜花来驱散的那种衰老、死亡、药物以及消毒剂的味道支配着她的仍然肥大的痛苦的身躯时，她的声音也还是那样令塞扎尔开心。那时祖母已不再下床，讲话很困难，但她永远以微笑迎接他，就像接待其他探病者一样。这微笑不同于埃尔温现在的微笑，尽管痛苦，它依然是充满生命力和快乐达观的，甚至是嘲弃人的。她的目光清澈而纯净，毫无恶意，即使在她很自然地抱怨医生、护士、膳食、嘈杂声、尤其是致使她无法稍微出出门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的疾病时也是如此。在她内心一角，她不相信自己将要死去；她是对的，因为死亡与她一生毫无瓜葛。只是当塞扎尔在她临终前不久最后一次探望她的时候，她才转过头去——一个被一层黄皮肤紧裹着的头，上面只剩下一双混浊的老眼和一张大嘴——用意第绪语这样对他说“你瞧上帝把一个人变成什么样子了”，她用尽全身力气微笑了一下，但在这依稀保留着热情和讥讽的笑容里已经包含了对末日的了解和接受。在此一两天前她还向来看她的兹维、贝阿特丽丝、埃尔温和齐娜打听米沙的消息，说如果他从阿根廷回来，她将会感觉好些，将能回到家里去，至少有力气下床和到户外去呼吸新鲜空气，最后一次看看天空、树木以及在医院围墙外自由地走动的人们。突然间克拉拉大娘轻声干咳起来，随之而来的是一阵长时间和令人心慌的沉默，此时塞

扎尔很希望有人进来坐在他身边。克拉拉祖母说道："我想起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又补充道："有一首很美的波兰歌曲。"复又缄默不语，像是在努力回忆。然后她又说："我父亲习惯在罗什哈沙纳节犹太教逾越节吹羊角号，他是最出色的羊角号手。可惜你们从来没有听过他吹。"她把瘦骨嶙峋的手放在塞扎尔的手上，脸上闪现出一阵短暂的温情，然后她稍稍沉默了一下，又说了一次："我想起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可是虽然她显出要说的样子，她并没有说出是哪些事情；她闭上眼睛，又陷入了沉默。塞扎尔看到和接触到的这只骨瘦如柴的手，以及这生病的躯体散发出的异味，激起了他一阵厌恶的颤抖和走开的愿望，但他还是留在那儿，什么都不问她，也不在她病榻前吭一声。对奶奶的回忆总是令他满怀悲哀，因为虽然他已经忘了她的忌日，也从不去给她扫墓，但是在他认识的所有人中间，只有奶奶是他真正发自内心地热爱的，并非出于某些私下的盘算或迫于某种义务。因此，他有时会非常深切地哀悼她的逝世，他想起奶奶会非常动情，他今晚在阳台乘凉时是多么希望看见她依然健在，哪怕只看见她几分钟，进而他甚至还想象出他们重逢的欢乐，她本人的快乐。他这样痴痴地想，以至于竟然忘记了兹维、埃尔温和齐娜之间的平静的谈话，直到贝什的粗嗓门的一声大吼从街上传来，才把他们的谈话打断。过了一会儿，贝什走进屋子，嘴咧得很大，愚蠢地笑着，一副烂醉如泥的样子；当他挨近桌子时，一股强烈的酒精味儿从他身上散发出来。他用手指戳着兹维和埃尔温，声嘶力竭地大叫要把世界和上帝置于法律保护之外，即

便上帝已如作家们和记者们所讲那样不复存在；他还嚷嚷说必须禁止作家们和记者们说话，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讲的是什么。他宣称生活是如此的荒谬、虚假、邪恶，所以深深地诱惑了他，使他心醉神迷，无论什么都不能使他离开它，此外这也是由于他只想用自己的存在来烦扰生活，总之，如果人没有被禁止抬起头来正视生活的话，他本来是能够把它撕成碎片或者放火烧毁它的。但贝什又说如果人真的这样做了，他就得把自己的耳朵扯下来，把它们挂在一根绳子上，爬上最高的屋顶大声喊叫直至把嗓子喊哑。他在说“扯耳朵”的时候，居然揪住自己的耳朵，使劲地拉它们，好像真的要把它们从头上扯下来，并大声狂笑。他说为了换母亲做的一盆鱼汤他本可放弃现在、将来、另一个世界和永恒的，说他母亲无可置疑地是世界的奇迹之一，因为她像贝什的兄弟一样自视为德国人，尽管她与他兄弟相反，她是如此地笃信和忠于她的信仰，一直把它保留到纳粹清除它的时候；而且可能甚至在现在，她仍以烟雾或其它形式——如果根据物质的常规任何东西都不会在大自然中消失的话——对她的德国保持信仰，同时坚信这一切都源于一个可怕的错误。

17

贝什又大声狂笑起来，他向客厅的酒吧走去，在那儿

拿了一瓶伏特加和几只酒杯，又回到餐桌。但是这时候齐娜站了起来，抢走他手中的瓶子放回原处，因为她感到贝什的身体与自己息息相关，而贝什却把她推开，一边说自己的身体棒极了，说无论如何任何人都有权决定他何时和怎样毁坏身体及死亡。他还发誓赌咒，然后给自己也给别人——兹维、埃尔温、齐娜和塞扎尔倒酒喝，并说实际上齐娜关心的并非他的身体，而是他那些该死的家具和贵重物品。兹维坐着抽烟斗，一直看着他，一副不赞成的神情，若有所思。贝什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之后说道："我谨告知你们，形而上学家们向后倒退的步伐已经激起了城市中鸟类如猫头鹰的反抗，给司法人员带来了损害，他们丝毫不考虑雨水或其它任何问题或在台上的总理。这是因为地面上的建筑工程太多了。就这样，由于不断地做徒劳无益的事，我们承袭的生命已经结束。而与此同时，发出倡议者和响应者都统一了行动方向，要对花园、气候及森林中鲜花盛开的树冠进行更大规模的改造，直到幸福开花结果。我的话完了，谢谢大家。"因醉酒而语无伦次的贝什在继续笑，然后突然不作声了，和他一起笑的塞扎尔和埃尔温也静了下来，大家一起默默地喝酒，一直到齐娜由于被这突然的安静弄得很不自在，就大声对塞扎尔说（为了让贝什和埃尔温也听见），非洲神的假面具美极了。贝什看着面具回答她说，她可以和他及所有其它非洲神一起擦屁股。他又来自斟自饮，再次纵声大笑，对塞扎尔说："如果不想要孩子就不该生，这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塞扎尔回答说他言之有理，但齐娜补充说他喝多了。贝什朝她点点头，微笑着向

她打招呼说“祖母夫人您好”，埃尔温训斥他说“够了，贝什”，塞扎尔则装着什么都没有听见，继续呷他的伏特加酒。他像厌恶威士忌一样厌恶伏特加，尽管他口头上说他两种酒都同样喜欢，因为他在伏特加中看到了他想过上的那一部分不可分割出去的生活和他为自己确立的一种男性的理想。贝什停止笑以后，喝了一大口威士忌又接着说：“再也看不见沙子了。不过别担心，沙子总有一天要掩埋这座城市。人们不能摆脱它。”贝什的脸变得黯淡无光，他的话也稍微变得严肃了些。他再次喝下一大口酒后补充道：“这座城市不配存在，它仅仅是一个误会。人们还以为可以尽情玩乐，荒谬！这是一座公墓。”贝什挨个儿看了看兹维和毫无理由地微笑的齐娜，他那疲倦的脸突然变得极其难看，他玩弄着杯子对齐娜说道：“你呀，你什么也不必害怕，你是哈萨克人的后裔。”他沉默片刻以后又重复道：“一切都是荒谬的。”然后很响地打嗝。兹维声称他什么也没听见，等待着他可以告辞的时刻的来临，而塞扎尔却强装笑容，甚至真的看着贝什笑了笑。贝什突然出其不意地提议：“结束吧。”接着他又斟满一杯酒，看着兹维道：“他从不开口说话。”兹维什么也没有回答，他抚摸着亨利，盯着贝什，贝什大感尴尬，搓着下巴说：“那么好，你爱怎样就怎样吧。”

最近一段时间贝什和一位比他大几岁的有钱寡妇关系密切：他在她家吃饭，虽然无欲望也有时跟她睡睡觉，经常骗取她的钱，并常把这些钱和自己的钱一起挥霍在一种扑克赌博中。可是他对自己经济上的损失并不在意，一点儿也不降低对这种赌博的狂热程度。这狂热与钱、甚至与

对赌博的热爱都无关，而是因为一方面贝什表现出很希望通过无忧无虑和毫无价值地浪费他的时间来炫示他对游手好闲和白吃白拿的生活的信仰；另一方面，这种狂热也出于一种纯粹的好奇：当贝什拿起扑克牌并把它们翻过来时，他的好奇心便得到满足，因为拿扑克牌和翻转它们的动作使他产生战栗和快感，而且贝什总是把这感觉比作第一次把手伸进一个女人的裙子里面，在她的两腿之间进行抚摸时所感受到的那种紧张和快感。就这样，贝什不去上班和监督他的工人们，而把大部分时间泡在他的朋友们的一个理发师那儿，那家伙在发廊门上挂一块“片刻即回”的牌子就和贝什打起扑克来，有时也玩“希克特”，直到吃午饭时才停手。当贝什手气好和赢牌的时候——这种情形很久才会发生一次——他们甚至可以一直打到晚上，直到贝什（他目前又喝下一大口伏特加）一文不名。贝什爆发出一阵笑声，但它更像是嘶哑的吼叫而且再也透不出一丝讥讽或快乐。现在，贝什又重复说他愿意用全世界来只换回她母亲做的一盘鱼汤。埃尔温说：“忘记这些，这是过去的事。”但贝什还在坚持并说“这只是面团”，完全像克拉拉祖母过去习惯说的话，又仿佛是那天晚上兹维、埃尔温和齐娜向她告辞前，和她以八十七岁高龄、神志清醒、保留着一口好牙地去世前说过的话。她死之前还有机会看到第一个宇航员在月球登陆，这事件她一开始不相信，尔后又使她动怒了，犹如有人企图讽刺她和侵入她的生活。不过很快地，这一切引起了她的兴趣，甚至一点点好奇。她在漫长的一生中曾经目睹过许多难以置信的琐碎小事、不公平的事和

可怕的灾难，但其中绝大部分却是由良好的意愿和崇高的愿望引起的；此外，如此多的惊人的和卓越的事情使她眼花缭乱，可是其中只有一部分显然不是虚无飘渺的幻想。

克拉拉大娘去世时没有留下债务和借据，她为此感到自豪，因为她出于原则和自由的愿望总是按时还债；她一生都是这样做的，从不低头，决不惧怕任何人，甚至不惧怕上帝。随着时间的流逝，她感觉到离上帝越来越近了，虽然上帝比她年长、明智和重要。她亲切地向他说话，仿佛他是一个老相识。她不只一次地敢于为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违反上帝的禁令，因为她把这视为一种简单的，可能也是不太重要的家庭习俗，但这种习俗必须小心谨慎、抱着良好愿望和诚心诚意地、身着盛装和拿一本祈祷书地加以遵循。祈祷书的内容不能激起她的同情心和恐惧感，这尤其是因为她是一个纯朴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女人，即使是模模糊糊地弄懂祈祷书上写的话也有困难。什么都不能使她感到痛苦，除非是米沙，她是这样地爱他，她相信他能够赋予她力量。但是她没有再见到他，因为他正好这段时间在阿根廷商务缠身，虽然兹维一再紧急召他回去，他也无法脱身，与母亲在这个国家与世长辞前作最后的诀别。克拉拉大娘在来到该国四十年后被葬于此地，不仅是出于外在的必要性，而尤其是因为她喜爱耶路撒冷这个地方，而它在她身后又带走了她的丈夫，达维老爹。达维生前是迪亚斯波拉一个富有的皮革商，同时兼任犹太教堂的管理人，但是克拉拉到此后很快就为自己没有见到过去梦想中的国家而感到幻灭。她对家中四方房子的白色调，对钻进她的

鞋子甚至食物里的大量耀眼沙子的无声行动，对太阳的炽热光线，对里面飞舞着灰尘和苍蝇的酷热的光晕，都感到失望，觉得自己是个异乡人。她用一连串意弟绪语、波兰语和俄语发出诅咒，用大嗓门吼出的滔滔不绝的侮辱和怒骂来表达她的失望。她的叫骂往往夸大其词，似乎她为一个神秘的原因而从中获得了乐趣，这乐趣与她无意中给予那些听她骂街的人的乐趣一模一样。

她抱怨炎热的气候、人和水的味道、犹太教堂的教士、价格、房屋和街道的形状、苍蝇、灰尘及豺狼的嗥叫。豺狼的嗥叫使她无法入睡，当她按照一个不变的规律，除礼拜五和节日以外每晚都早睡的时候，不得不用棉花塞住耳朵。自从米沙携妻子去了他认为可以发大财的阿根廷以后，克拉拉大娘开始时常出入咖啡馆，在那儿翻阅她根本看不懂一个大字的英德文杂志，她上电影院，还虐待丈夫，而她过去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她丈夫则到街头、教堂或儿子们尤其是埃尔温家、甚至到卫生间避难，以躲避妻子的迫害。卫生间已成为他个人的伊甸园，他以此为掩体，把时间花在冥思苦想和惬意地胡乱猜想上，或者花在打盹儿读旧报纸上，花在虚构他和自己、儿子们，妻子及各种各样的相识和政客们的讨论上。他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敲门紧急命令他出来的克拉拉大娘的话充耳不闻，他知道无论如何在外面等着他的只会是骚扰，如同他娶克拉拉以来一生中遭受过的那些骚扰一样。达维老爹直到和克拉拉大娘结婚时一直是一位果断的受到尊敬的男人，一位自豪的丈夫。可是在失去第一位妻子以后，他决定挑选一位年轻貌

美的姑娘，就这样他和克拉拉结了婚。然后，他还没有再婚地位就开始衰退了，几年间克拉拉成功地打垮了他，完全统治了他，以致后来克拉拉在场时他根本不敢做一个动作、讲一句话。达维老爹终于变成了他自己的影子，对于荣耀的过去他只保留了几件质地稍好的旧衣服、一件镶绸里和皮领的沉甸甸的冬大衣，一直挂在衣橱里派不上用场。此外他还保留了一根银球饰手杖以及两个毛病——他一直没有能够克服它们，虽然有危险和要受辱，他仍然千方百计地企图满足这两个嗜好：追逐女人和吸鼻烟。

鼻烟是他从犹太教堂的朋友那儿拿来的，或者是用他那点不时地东刮一点西刮一点得来的钱买的，埃尔温也给他买了一盒，就这样他继续秘密地往他那几乎变黑了的鼻孔里塞满了烟，全然不顾克拉拉大娘的责备和她放肆地在他的衣物里进行的细致和侮辱性的搜查。他像一个受罚的小男孩那样看着她把在他的祈祷书的书页中、在裤子的口袋里和褶子里或在衣领后面所能够找到的每一撮鼻烟搜去，倒在厕所里拉水箱冲掉。至于他对女人的强烈情欲，这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情欲了，它经常烧灼着他，无论他是躺在床上，坐在卫生间里，正在大街上走路，或者甚至正在祈祷。当他还在外国的时候，他窥伺那些在河边洗衣裳、露出手臂和脖子、裙子撩起到膝盖上的妇女；在以色列他则是散步时去海边观察那些穿泳衣在海滩闲逛或平躺在沙滩上的女人特别是年轻姑娘，在内心深处祈祷着至少在他死去之前有机会和这些明艳照人和晒得黝黑的年轻姑娘中的一个睡觉，当他回到家里时，他欲火中烧，企图强迫克拉

拉大娘和他睡觉。克拉拉不得不与他撕打起来，然后逃到埃尔温或兹维家，或者逃到一个朋友家，一边发誓说她再也不回这个老异教徒家。这老异教徒七十高龄时尚能在一个被丈夫遗弃的五十岁女人开的服饰用品店里满足她的性欲。在那儿，商店一关门，他们就飞快地尽情享乐一番。平时他通过手淫使自己这种对肉体的需要得到缓解，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他八十一岁死于肺炎和肾并发症那一天。可是手淫这种瞬间的快感只能增加他的性欲和他暗藏于心底的挫折感，有时实在顶不住了，他就在埃尔温面前发牢骚。

现在埃尔温正用泄气和疲倦的目光盯着贝什，同时拿起一块黑面包，在对齐娜大为不利的情况下，面包屑洒了一地；埃尔温把面包放进嘴里慢慢地嚼起来。贝什说："我将来死后会把这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他微笑了，喝着他的伏特加又补充道："如果我忘记了我母亲做的鱼汤，还能记得什么呢？"正好在此时门铃响了，齐娜去开了门，马克斯·斯皮尔曼进来了，他前来与埃尔温谈生意，他穿着一套与在勒吉娜家已经穿过的同一种款式的裁剪得很好的夏装，只是他现在穿的这套是米色的，他的头发亦精心梳理过了，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除臭香水和花露水的味道。

他向屋里的人问好，跟他们握手，包括跟布什握手，而他憎恨布什就像布什憎恨他一样。齐娜问他是否来一杯咖啡，他很乐意地接受了，同时坐下来和兹维、埃尔温、塞扎尔交谈两三句话。塞扎尔玩弄着他的雪茄烟，一个劲儿地盯着斯皮尔曼看，他那张既毫无魅力却又保养得很好的脸上有一种令人极不舒服的傲慢和自负的表情。突然他想

起自己的皮包丢在公寓了，那里面装有全部证件和汽车驾驶证，这些证件是他从明天一大早把车从车库开出来的时候起就需要用的，于是他把瓶底的伏特加喝干，起身走了。齐娜跟在后面，在门口与他分手时问他是否要给孩子们拿一块巧克力。塞扎尔说不用了，没有必要，吻了她以后匆匆忙忙地走了。当他快走到公寓的时候，他老远瞥见了埃拉正穿过马路，她肩上搭着一条黑披巾。他看了看她，停住脚步，尔后走进大楼门口消失在楼梯里。但经过片刻的犹豫之后，他决定第二天早上才来取皮包。当他折回原路准备上泰依拉家时，埃拉爬上楼梯，很快去按公寓的门铃。伊斯拉埃尔从脚步声听出是埃拉来了，但他没有离开他正躺在上面的长沙发，没有动弹，两眼盯着仍然凝固在油画上的调色刀。埃拉再次按门铃，铃声短促而谨慎。但是伊斯拉埃尔在两分钟后埃拉第三次撤门铃时才来开门。伊斯拉埃尔看见埃拉站在门口，幼稚而明朗的脸上挂着腼腆和尴尬的微笑。她说："我迟到了一会儿。"伊斯拉埃尔一言不发，埃拉用她那双饱含害怕和期待的天真的蓝眼睛看着他，一直在微笑，试图平息他的怒火和使他恢复平静，然而他的脸依然是冷酷的和不友好的。埃拉走进画室，眼睛已被泪水湿润，她把装着画夹、纸、中国墨的瓶子、钢笔、铅笔和毛笔的大画袋放在桌子上。

伊斯拉埃尔关上门，随她走进画室，重新躺在长沙发上，开始翻阅手头的黄色书籍，并固执地保持缄默。这是一种越来越沉重的缄默，且充满了暴力，仿佛埃拉根本不存在。她终于忍无可忍，走过来对他讲："我没有办法早些

到。”她在伊斯 拉埃尔身边坐下，又说：“真的，我没有办法。”可是伊斯拉埃尔一动不动，敌对而冷漠，眼睛盯着书。渐渐地，他尽了很大努力，而且几乎违反了自己的意愿，才任自己释放对埃拉的柔情蜜意。他令人难以觉察地稍稍转过身，允许埃拉靠着他，然后，仿佛他又不满意自己这一仍嫌犹豫的动作似的，他抚摸了埃拉那头在颈背上用一根蓝皮筋扎起的金发。他吻了埃拉，但不是很热情，眼睛没有离开书来正视她，不过他那不开朗的脸变得柔和了一些。当埃拉说天气很热，问他要不要她带来的小蜂窝饼，吃后要不要洗澡的时候，伊斯拉埃尔假装没有听见她的话，却反过来问她是否要喝咖啡。埃拉感激地答道：“好的，我去煮。”可是伊斯拉埃尔跳了起来，告诉她可以坐在这儿画画。他进了厨房，把咖啡壶放在电炉上烧，与此同时埃拉从她的大袋里取出画纸、中国墨瓶以及所有画画的用具，开始把它们整整齐齐地摆在桌上准备工作。

埃拉学习艺术，同时给大学的自然科学系用中国墨画植物和昆虫的大张插图。有时画整棵植物或整只昆虫，有时只画各个部分或器官的剖面图：肺、呼吸系统、触角、雄蕊、茎、果实、种子。埃拉从和伊斯拉埃尔相遇的第一个晚上，在两人一起去“牛奶吧”喝咖啡时就把她的一切都告诉了他。第二年，伊斯拉埃尔又有机会获悉她有母亲，这是一个重要的细节，是她从不愿意告诉他的最后一件事。关于这个埃拉不愿意提及的母亲，伊斯拉埃尔想象她是一个头发又黑又长、眼睛炯炯发光的女人，她那张美得俗气，几乎男性化的、带着苦涩和极度疲倦的脸，已经被痛苦和失

望折磨得憔悴不堪和非常丑陋，这种种痛苦和失望使她不注意自己的健康，过着一种放荡的、对自己的身体和在自己身上可能发生的一切都麻木不仁的生活。这种数年间彻底毁了她的面容的生活方式同时也使她在心理上受到极大的震撼，她变得困窘和不知所措，并因此而几乎失去理智。

伊斯拉埃尔不知他对埃拉母亲的印象从何而来，因为根据埃拉讲过的所有的话，她涉及该话题不过是为了简单地指出她有母亲，但甚至没有暗示她也可能有父亲。虽然伊斯拉埃尔没有马上发现这个疏忽，他后来还是决定要问她，起先是谨慎地问，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好奇，然后是更加直接和坚决地要问，然而埃拉避而不答，一直不作声，拒绝任何回答。但是有一次，他拼命地缠着她问，于是她承认不曾有过父亲。伊斯拉埃尔忍无可忍，指责她撒谎和向自己隐瞒真相，但是她并不试图为自己辩护，始终以缄默来掩护自己，负隅顽抗。这不是一个有某种事情要隐瞒的人的缄默，而是一个一切都说了，再也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人的缄默。但是伊斯拉埃尔却不让她得到安宁，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拾话题，而每当他想到这话题时新的打探方式就在脑子里形成了。现在伊斯拉埃尔端着两杯咖啡从厨房回来了，埃拉快活地看了他一眼，扔下画笔，在桌上给他腾出一个位置放咖啡。他在她身边坐下。两人喝咖啡的时候，埃拉让他看“银蜘蛛”的速写，几天以来她一直在画这些速写。伊斯拉埃尔对她说画得很好，并问她是否愿意明天和她一起去圣安托尼教堂听管风琴音乐，埃拉答道她当然很乐意。他们一喝完咖啡，埃拉就重新开始画蜘蛛的肢体，

伊斯拉埃尔则去洗了一个澡，然后马上在钢琴前面坐下。这时埃拉的脸上平静而喜悦，她又工作了一会儿，才起身去躺在长沙发上。她像通常那样靠边躺着，屈起的双腿几乎触到胸前，一只手塞在头下，玩弄着一根金发，把它绕在一只手指上，同时欣喜若狂和专心致志地吮吸着另一只空着的手的拇指，闭上眼睛，沉醉于伊斯拉埃尔的演奏之中。当伊斯拉埃尔演奏完毕，屋里重新安静下来——一种伊斯拉埃尔喜欢但不愿意延长的安静——的时候，他前来挨着埃拉在长沙发边坐下，继续安静地吮着拇指的埃拉尔轻轻地将头靠近伊斯拉埃尔的大腿。伊斯拉埃尔轻轻地抚摸她，出神地注视着她的纤纤十指，上面的指甲总是很短，因为她老去咬它们；接着他又看这张绝对清白无辜的脸，一个柔弱的微笑使脸上显出光彩，也照亮了她那纯白的肌肤。

伊斯拉埃尔眼睛不离埃拉的脸，把手伸进她的衬衣里面，抚弄着她那小小的坚实的乳房、光滑的腹部，埃拉却毫无反应，似乎浑然不觉，其实她已经心醉神迷。伊斯拉埃尔继续抚摸她的脖子、肩膀、腋窝，继而又重新摸她的腹部，同时问她谁是第一个跟她睡觉的男人。但埃拉不回答，仍然躺着静静地吮吸拇指。伊斯拉埃尔向她重复了好几次同样的问题，他起初还是和颜悦色的，之后就带了某种粗暴，然后随着他不断地盘问她，终于变成了盛怒。可是尽管伊斯拉埃尔一再坚持，埃拉还是一言不发，最后才在不拿开拇指的情况下说了句："谁都不是。"这个过去她已经给过他好几次的，因而可以预料得到的回答，只起了进一步激怒他的作用。他指责她撒谎，因为如果她以前从

来没有跟男人睡过觉，那么为什么她第一次见到他时已经不是处女。埃拉把拇指从嘴里拿出来，两眼泪汪汪地回答："我生来就是这样的。"伊斯拉埃尔并非不知道她可能讲了真话，但由于他嫉妒得发疯，还是被她的话激怒了，他要她马上带着行李走，永远不要再回来。于是在伊斯拉埃尔的注视下，埃拉从长沙发上站起来，开始收拾散放在房间里的行李，一边无声地哭泣。伊斯拉埃尔坐在长沙发上，在他的书和房间里到处都照出两人身影的那些镜子之间看着她，直到他突然对她产生了怜悯，因为她显得这样的不知所措，也不替自己辩护，显得这样的清白无辜，似乎受到了不公正的惩罚；而他本人也可能害怕孤独。于是伊斯拉埃尔走近埃拉，把手放在她肩膀上，这就足以使她躲到伊斯拉埃尔身边，他一言不发地把她拥进怀里，吻了她的头、前额、眼睛，接着他脱下她的衣服，她在他面前顿时一丝不挂，除了一颗位于右腹部、在阴阜上面一点点的棕色胎记以外，她那光滑的肌肤雪白诱人。

埃拉熄了灯，回吻了伊斯拉埃尔，他勉强忍住笑，两人都站在房间的中央，沐浴在从街上照过来的微弱的灯光里。接着，伊斯拉埃尔把一条被单铺在长沙发上，也脱掉衣服来到埃拉身旁，夜晚的凉风轻拂着他们的肌肤，令他们身心舒畅。他们把另一条被单盖在身上，在狭窄的长沙发上进入梦乡，直到拂晓不期而至。此时塞扎尔前来取他的装有各种证件和驾驶执照的皮包。当塞扎尔经过伊斯拉埃尔的房间时，他在敞开的门前驻足片刻，看到了沉睡中的、因天热而把盖的被子蹬掉的全身赤裸的伊斯拉埃尔和

埃拉。塞扎尔在隔壁房间弄出的响声和他出去时把门带上的砰的一声把这两人吵醒了。向来清醒得很快的伊斯拉埃尔又开始抚摸埃拉的身体，吻她的摸上去鲜嫩而柔软的乳房和腹部。两人还接着躺了一会儿才起身，穿衣，漱洗，喝咖啡。接着伊斯拉埃尔拿上乐谱，和埃拉一起下楼，沿着这天早上波涛汹涌的大海往前走，一直走到圣安托尼教堂。傍晚时分，他们精疲力尽，浑身是汗地回到公寓。回来之前，当他们缓缓走出渔港的时候（渔港离那个目前聚集了一大批飞走后又回到地面上栖息的白海鸥的地方很近），他们整个下午都在悠闲地观看钓鱼者钓鱼的恢弘场面，钓鱼的人们沿着港口附近的整条海岸，在所有的沿河马路耐心地举起钓鱼竿；他们还看了出海的渔民冷静地准备渔网、渔绳、马达及夜晚捕鱼用的火炬的壮阔景观。

翌日，他们重返圣安托尼．又是直到夜幕降临时才回住处。在家里洗过澡，吃过东西恢复元气以后，伊斯拉埃尔如约给戈尔德曼打电话。他问戈尔德曼近况如何，戈尔德曼很高兴朋友打来了电话，对伊斯拉埃尔说一切都很好，他很高兴听到朋友的声音。伊斯拉埃尔又问戈尔德曼有什么新闻，戈尔德曼用讽刺的语气答道："还能再有什么事？家里面尽是人。"伊斯拉埃尔想知道自己能帮戈尔德曼什么忙，戈尔德曼回答说他本来是很高兴能把自己的职责推卸到伊斯拉埃尔身上的，然后当他问伊斯拉埃尔能否明天或后天、自己一个人或跟塞扎尔一起来看他时，伊斯拉埃尔说"可以"，接着后者还跟戈尔德曼说了几句话。最后戈尔德曼说："现在我不能再讲下去了，没有办法，我是这儿关

注的中心。再见。”他搁下听筒，握住刚和长子纳当一起来到的穆瓦什·特泽莱马耶的手。纳当是一个安静的和不太出众的小伙子，就其和蔼的态度和外貌而言，他酷似父亲特泽莱马耶。纳当是钻石琢磨工人，穆瓦什·特泽莱马耶——他带来了一块大蛋糕——对此引以为豪。特泽莱马耶对他儿子抱有极大的希望，一有机会就替他买新衣服，给他钱花，如果不是害怕车祸的话，他本来还想给儿子买辆摩托车。当儿子纳当在他学习电气技术的职业学校拿到文凭时，或者更确切地说从他结束服兵役以来，特泽莱马耶就不顾妻子的反对，想尽一切办法影响儿子离开以色列移民去美国，因为在美国儿子可能会发财致富，过上好日子；在那儿——这并非最不重要——他将不会重被召去服兵役。当戈尔德曼的父亲从特泽莱马耶本人嘴里听到这些话时，他怒不可遏。特泽莱马耶已经两次三番非常坦率地对这个问题发表过他的意见。有一天当戈尔德曼的父亲试图反对他时，他驳斥道："他已经当过一次兵，这对他足够了。"戈尔德曼的父亲控制住自己，对这事再也不置一词，因为他虽然很愤怒，但对这个纯朴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还是怀有一种老板的喜爱的。特泽莱马耶曾在迪亚斯波拉参加过贝塔尔[1]，也曾在以色列不只一次地用结结巴巴的希伯来语鼓吹过暴动。眼下，和死去的父亲一样喜爱特泽莱马耶及其儿子的戈尔德曼跟他们交谈了几句就陪他们到已经连续三天亲朋满座的客厅里。他用眼角的余光瞥见曼弗雷德

---

① 贝塔尔（Beitar）系在波兰成立的一个青年运动组织，隶属于埃鲁特（Hérout）民族主义政治运动。

正起身向斯蒂法娜告辞，于是他转身返回房间把自己关在里面，因为他不想看到这些简短、紧张甚至冷淡和不友好的告别场面，尽管这些人把自己的真面目精心隐藏在社会习俗和礼貌的平静的面具下面。曼弗雷德说他明天动身去海法，在那儿看望过他兄弟和移交完几笔生意以后，下周再回来。斯蒂法娜答道："很好，曼弗雷德。去吧，去吧，这很好。"接着她陪他到客厅门口，然后又回来坐在她的安乐椅上，与客人们稍微拉开了点距离。自从当年戈尔德曼的父亲和他们中间好几个人发生了争吵，又赶走了一些人，而其余的人则四散离去之后，大部分人已经不在这所房子里露面好几年了。现在对死者的哀悼使他们重又聚集在一起，他们一边安慰着寡妇一边又吃又喝地聊大天，就像第一天下葬完以后那样。只有拉扎尔叔叔例外，他昨天晚上在耶胡迪·唐菲丝的陪同下也来了。此时他像以前来访时那样几乎不说话，克制而尴尬，似乎感到自己很不得体。但是在所有的客人都走了以后，他照例问斯蒂法娜是否需要什么和他能否帮她点忙。这回斯蒂法娜答道"好的"，并请他把两个搁在浴室吊顶里面的箱子搬下来。拉扎尔登上一把小梯子，给她搬下两个有圆盖和上了大铜锁的黑木箱，那铜锁上面已经开始长铜绿了。拉扎尔把箱子拖到斯蒂法娜的房间，一个紧挨一个地摆好，斯蒂法娜向他道了谢。

18

两只箱子里都装满了旧绒裙、旧刺锈印花丝裙，还有一件带皮领和有皮毛装饰的大衣，以及各种平纹细布内衣裙和一些雅致的帽子。当斯蒂法娜把这些衣物拿出来的时候，它们散发出一股樟脑丸和长期压箱底的变旧了的衣服的呛人味道。斯蒂法娜看了一会儿面前的衣服，开始在里面乱翻起来，有时拿起几件仔细瞧瞧，脸上毫无表情，似乎不感兴趣。可是第二天一早，戈尔德曼发现她坐在电视机前她的那张大安乐椅上，穿一条深紫色的丝绒裙，肩上披一条黑色的羊毛巾，这时他看到她脸上的表情冷淡而傲慢，心中大感不快。正如他无法忍受她的客人的长时间逗留那样（他们的嘈杂声甚至透过他房间的门窗传进来），他也不能忍受她那冷傲的外表。他把一篮水果、饼干及前一天特泽莱马耶带来的大蛋糕吃剩的部分摆到桌子上以后，和一两位客人交谈了几句，就把他那主人的角色拱手让给特齐梅的寡妇——她没有一天晚上不来这里呆上至少一小时，或者让给耶胡迪·梅兹莱，或者让给其他任何人，然后就谁也不告诉地从屋里溜走了。

这天夜里天很阴，空气炎热而沉闷，似乎凝固不动。一种压抑的气氛蔓延到每一样东西；从树木到其它植物，再到聚集得越来越厚的云层。戈尔德曼的神经极度脆弱，他

对络绎不绝前来吊唁的人感到气恼，也由于感觉到自己在服丧期间急匆匆地出了门，让母亲独自留下跟那些人在一起是一种不得体的表现和对某种禁忌或某种基本的礼貌原则的违犯，而十分气恼。但他犹豫了片刻之后，还是不顾一切地决定去迪塔家，自从父亲去世后他就没有再见过她。并非因为他特别想念迪塔，而是因为他渴望到别处，到一个干净和安静的地方去，况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到迪塔家的经常造访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和一种需要，这需要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也同样成了迪塔生活的一部分，即使程度要低些。迪塔是生化学家，正从事遗传码方面的研究，她曾先后在耶路撒冷、英国和美国出色地完成了学业，并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她比戈尔德曼年长四岁，是一个很有条理、但并不特别漂亮的姑娘。说真的，假如她不是有一双美丽的褐色眼睛，有才智、敏感、奋斗和独立的精神，可能会是很不起眼的。她的奋斗和独立的精神是在生活中磨练出来的，但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变成了某种明显的、有时令人反感的不近人情。这种不近人情表现在：她把大部分和精力用于学习和工作，对自己过于苛求，把严格的纪强加于己；还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不近人情也表现在她一直过着独身的生活，没有要孩子。起初她出于需要，直到攻读完博士学位时都没有想过要孩子。后来，她对工作是这样的投入，她是如此地适应独身生活，以致害怕孩子们会打扰自己，又怕从她那方面不能给予他们必需的关心。最后，当她也许愿意要孩子的时候，却又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可能要孩子而不遇到问题和不冒极大的危险了。

她五年前遇到了戈尔德曼，从此两人就没有停止过幽会，幽会每周三四次，有时甚至每晚一次，总是在迪塔家。但他们很少提及婚姻或确立任何一种形式的固定关系。时间本身使这种讨论的频繁程度和对此的兴趣发生了变化，至少一开始这类讨论是相当经常地涉及婚姻和确定关系等话题的，以作出一个决定。如果迪塔稍微果断一些，向戈尔德曼提出明确的要求，他们恐怕在那时就已经结婚了。可是迪塔在她独立的愿望和打破孤独小圈子的愿望之间犹豫不决，并等待戈尔德曼采取主动。然而戈尔德曼出于同样的理由从来下不了决心，他在所有这些年间一次也没有邀请迪塔上他家，亦无将她介绍给自己的父母，甚至没有提到过她的存在。他特别担心重蹈他与美丽的杰米玛·切尔诺弗的失败婚姻的覆辙，总是在寻求伟大的爱情，这就使他们最初的意图和行动的愿望变得微弱无力和毫无生机。他们曾经燃起的一点点热情已经被大量的私下盘算、长期等待、两人会面的例行公事驱散了，而两人会面的例行公事在很大程度上使结婚的想法本身成为多余的，即使不算不现实的话，但是他们在知道两人不会永远在一起生活和不可能建立一个家庭的情况下，仍然继续不时地见面并同床共寝，哪怕他们从这种本身也已经成为习惯和义务的行为中得不到任何快乐。或许，他们尽管幻想破灭和试验失败，也还是希望就此回到激动人心和充满希望的最初阶段上。其实如果说在他们的关系中当真存在过这一阶段的话，那也没有维持多长时间，不过他们继续违心地勉强自己。可惜他们虽然有良好的愿望和决心，却无法从中得到一丝一

毫的快乐，每一次一切都在失望和一种失败、耻辱、甚至不道德相交织的痛苦感情中结束。经常可以看见戈尔德曼从迪塔的住处下楼梯回家时心情沮丧，在盛怒之下决心要断绝这种毫无结果和压抑人的关系。不过他从不真正采取行动，只是继续羡慕和妻子及三个孩子一起在莫沙夫[①]生活的阿维诺阿姆·勒维阿唐，和与任何女人在一起都能毫无障碍地得到快乐的塞扎尔，而他却不得不在妓女们的怀抱里得到慰藉。这是一种可鄙和耻辱的慰藉，他视之为罪孽，但也是唯一他可以允许自己有的罪孽，是他虽感羞愧却又不打算放弃的罪孽。当戈尔德曼来到迪塔的住房附近，看见灯光从朝着院子的大窗泄出时，他停止脚步往后退，然后开始慢慢撤退，似乎他还没有作出决定似的。他穿过好几条街，漫不经心地走进了阿雅尔贡街，它在他眼中是全城最卑鄙和最可怕的街道。他总是感到局促不安，并对自己自我放纵追逐艳遇深感羞愧。艳遇导致的一切与价值体系和道德是水火不相容的，他反叛这种道德并力图摆脱它。他在经过不断的自我说服之后终于相信了在以宗教为基础的传统道德之外，还有一种建立在理性之上的人道主义的道德。后者是他作为无信仰者可以接受的唯一道德，也是唯一一种既不反对卖淫又不反对通奸，因而无法反对幸福的道德。退一步说，即使这种道德也反对幸福，那么他将像塞扎尔那样宁可要幸福而不要道德。然而，一种耻辱和罪恶的感觉折磨着他，不过他在沿这条可怕的街散步时仍

① 莫沙夫（Moshav），希伯来语，系以色列资本主义性质的农村组织，土地所有者各自耕种同样大小的自己的土地。

然情不自禁地匆匆看了看呆在街角和被废弃的坍塌的旧楼的墙角里的那些拎着小手提包的姑娘，以及那些旧楼的窗户、拱门和装着生锈铁栅栏门及镶嵌着彩色瓷砖的阳台。这一切是如此的昏暗，很难想象房子里除了破烂的旧家具、灰尘、蜘蛛网和歹徒以外还会有别的物体和生命。

戈尔德曼走进一条通向大海的小街，在“39号俱乐部”的小橱窗前驻足片刻，观看杂技演员、魔术师和脱衣舞舞女的照片，然后走进俱乐部。他先向老板点头致意，接着进入阴暗小厅的里面，走近酒吧间，向柜台后面的侍者打招呼。那侍者穿着笔挺的制服，名唤卡罗尔。戈尔德曼坐下来要了一瓶啤酒，向四周看看，证实波拉不在这里。而那位被大家称作多普茜的淡褐发年轻女招待则在一旁陪着一位穿深色华丽西装的中年男子，那人静静地细嚼慢咽，时不时地，他一边仍在全神贯注地吃菜，一边向他那位神秘莫测的女伴俯下身子，吻她的前额，或者往她嘴里送一块他碟里的肉；那一位违心地一直面带微笑，随他摆布着。酒吧里还有其他中年男子，他们前来在女招待身边找消遣、寻开心。女招待陪他们喝酒，任他们抚摸和亲吻，装着倾听他们的心声，对他们那些关于失望和感情问题的烦人故事感兴趣，而在这些故事里，指责、抱怨、拙劣和有时令人嫌恶的感情吐露与金钱、房子等问题及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事情交织在一起。酒吧里也有少数孤单的年轻男子，和比他们年长的中年人一样是常客。此外，还有几对来度过一个良宵的夫妇，他们等待节目单上预告的歌手、魔术师、杂技演员和“疯马”脱衣舞团的著名舞女出场，一面喝饮料、

闲谈、在黑暗中接吻、或随着一架钢琴、一套打击乐器和一支萨克管组成的乐队奏出的音乐翩翩起舞。戈尔德曼喝着啤酒，不时地环视一下整个小厅，并出于礼貌准备与卡罗尔交谈。卡罗尔可能已经是第一百次向他讲起自己的故乡，一个位于保加利亚玫瑰谷的小城市。在那儿人们种下玫瑰，使整个山谷溢满花香，然后把花放在大容器里煮，从中提炼出玫瑰油和世界上最有名的玫瑰香水。但是卡罗尔的话被从酒吧间门口传来的一个大嗓门的声音打断了，紧接着一个年轻的壮汉闯入酒吧间，他全身上下都是盛装打扮：头发仔细地梳理过，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穿一件华丽的黑西装，钮扣孔上别着一朵红石竹。他拖着一位披一袭白婚纱的非常瘦削的姑娘。这位全酒吧的人似乎都认识的小伙子因快活和喝多了而如醉如痴。他面带微笑，向四面八方挥手，命令年轻女人在一张桌子旁边坐下来。这时他一边用拳头敲打酒巴间柜台，因快活和喝多了酒大笑着，一边喊道："行了！我结婚了！"同时用手指指他那位坐着的温顺的妻子。她正神经质地玩着手指和看着丈夫，惊恐、可怜而无奈，身上的结婚裙服已揉皱和变形，盖着她那一头褐色秀发的白纱巾已弄乱。可是她丈夫根本不重视她，他把红石竹花从钮扣孔上拔出来，同时声嘶力竭地喊道："我戴上红石竹了！"他握住卡罗尔的手，卡罗尔和两位男侍者、厨师、全体乐师及拥吻了他的一些女招待们一起向他表示祝贺。他笑得更厉害了．大声重复道："我戴上红石竹了！"他掏钱为所有此时在酒吧间的客人各要了一杯啤酒，老板、男侍者和女招待们赶紧在热烈的掌声、笑声和"祝您好

运”的欢呼声中上酒。波拉正好在欢乐气氛达到最高潮时进来了，她立即吃了一惊，思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接着，当她意识到这快乐的喧闹的原因时，就跑去吻了新郎，同时向四周散发出一阵香粉雾和香水雾。她拥抱了新郎，吻他两边的面颊，新郎也回报她以同样的吻，把头发都弄得有点乱。然后波拉来到戈尔德曼身边坐下，他替她要了一杯马德拉葡萄酒。接着，戈尔德曼犹豫了一会儿后，把手放在波拉的胖脖子上，抚摸着她的被坚挺的胸罩绷得紧紧的背部和胸部，一边同她和卡罗尔聊天。戈尔德曼越过波拉的头顶看见聚光灯亮了，它用白光束把小舞池照得雪亮，这是艺术表演即将开始的信号。戈尔德曼紧张地等待着，继续慢慢地喝着他的啤酒，一边和面带微笑的波拉谈话，她摇头晃脑，吻着他的脸。她的皮肤白里透着粉红，头发稀疏而卷曲，活像一部旧电影中的胖美人。她很好，或者至少很耐心，戈尔德曼已经适应了她。节目开始后，他向她示意站起来，接着两个人一起走到俱乐部大楼后面的院子里。大楼用一扇生锈的铁栅栏门、一道与毗邻大楼的院子隔开的寒酸的栅栏围了起来，毗邻大楼除了打牌俱乐部所在的三层以外完全隐没在黑暗之中。他们可以看见自己常去打牌的俱乐部部址，和那常在他们头顶上缓慢转动的吊在天花板上的巨大风扇。

19

大气中某样东西破碎了，一阵被释放的风开始刮起来，大海平静的低语迅速变成了单调的咆哮，而人们却再也听不到从街上偶尔传来的车声、人语以及穿越酒吧间密封的墙壁和窗户的压抑的乐声了。戈尔德曼和波拉紧紧搂在一起，做完了他们该做的事情，一切都进行得迅速而有效率，包括那传统和平庸的拥吻。戈尔德曼完事后，波拉像往常那样吻他的前额，问他刚才有无快感。仍然趴在她身上的戈尔德曼说有，但波拉很可能没有听见，因为她根本不等待对方的回答，重新穿戴整齐后便撇下戈尔德曼向酒吧走去，而戈尔德曼甚至没有转过头去看她穿衣服。他第一次感觉到清新的空气极不舒服。他走出院子，回到客人散去了的萎靡不振的家，刚才的性行为只给他留下了一种耻辱和罪恶的感觉，一种挫折感，因为一切都不像他在想象中、尤其在看了塞扎尔给弄来的黄色相片和书籍以后所孕育的那些疯狂的性交奇想，也不像塞扎尔讲述的他和女人睡觉的经验，其中最精彩的——戈尔德曼对此羡慕得无以复加——是他同时和两个女人作爱。

风停了，开始下起一种缓慢而炎热的雨。戈尔德曼又一次下了楼，双手插在口袋里，向海边的散步场所走去。他经过有拳球和电动弹子的寒伧游戏室，经过临街的酒吧间

和他曾因一个妓女在里面挨过揍的咖啡馆，接着又经过另一间咖啡馆，在那儿，他曾经在长时间的踌躇之后，平生第一次激动，害怕和充满期待地接近一个妓女。不过整个过程没有超过十分钟，可能还要更短一些，就在耻辱和沮丧中结束了。妓女先要了他的钱，塞进包里，然后带他到三楼一个光线很暗的过厅里（戈尔德曼还以为它通向自己将和妓女睡觉的房间），让他摸黑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妓女不经戈尔德曼允许就要了酒和一包美国烟，记在他的帐上，而所有她允许他做的只是把她抱在怀里，吻她一两次和隔着裙子摸她的乳房，与此同时她却在抽烟、喝酒，注意不让她糟蹋她化的妆和发型。感到受骗和受辱的戈尔德曼确在试图抗议，但由于他知道自己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加上又害怕暴力，因而他的抗议非常软弱无力，他站起来时只会这样说："要知道你失去了一个顾客。"然后他赶紧告退，也不去考虑仍在不停地慢慢下着的雨。雨水使空气转暖，打湿了人行道和马路，道路上潮湿的尘土散发出一股特别的和令人惬意的味道。他回到家里，这时他已因走了路而平静下来，然而当他一看到从客厅透出的灯光时，马上又火冒三丈，他就怀着这种恶劣的心境进门，开灯，上楼。他重新看到仍然坐在客厅里的拉扎尔叔叔、阿弗拉阿姆·谢奇泰、耶胡迪·梅兹莱、斯米埃尔、布拉莎和斯米埃尔的弟弟阿哈隆。过去阿哈隆狡猾地、特别是残酷地夺走了他亲生父亲的肉店，据为己有，甚至发展到不让父亲进店门，完全支配了他。斯米埃尔和布拉莎——阿哈隆的妻子经常嫉妒的对象——则在美国定居，从此两兄弟尤其

两妯娌之间除了互相讲几句冷淡的客套话以外再也不说别的话。这种疏远是由于阿哈隆莫名其妙地认为自己受到斯米埃尔不公正行为的损害，而斯米埃尔早就把一切——肉店和挨兄弟的揍——忘得一干二净。然而坐在客厅的阿哈隆至今仍对兄弟怀恨在心，愤怒有加，等戈尔德曼进来时他才息怒，朝戈尔德曼勉强微笑了一下，因为他想到戈尔德曼是他阵营里的人：他儿子阿弗拉阿姆多年以来在法国生活，他曾经在戈尔德曼的班上读书，两人一度是好朋友。

所有的客人都还在，唯有阿弗拉阿姆·谢奇泰起身准备告辞。大家互相聊天、喝茶、吃水果——穆瓦什·特泽莱马耶带来的蛋糕只剩下一小块了。这时戈尔德曼进来了，走到客人面前停下来对他们说："晚上好。"阿哈隆问戈尔德曼近况如何，戈心德曼回答说很好，并感谢了他的问候。戈尔德曼也向阿哈隆问起阿弗拉阿姆的情况，阿哈隆回答道他儿子很忙，但他还会来的。阿哈隆的妻子进一步夸张地说："他肯定还会再来的。不过这儿夏天太热，他又是个大忙人。"她放大嗓门以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因为她像丈夫那样为儿子感到自豪。可是阿弗拉阿姆正相反，他为父母感到羞愧：为大嗓门和无知的母亲，为无文化、庸俗和粗暴、在他童年时代动不动就狠揍他一顿的父亲而羞愧。这时戈尔德曼说："阿弗拉阿姆要是再来就太好了。"接着就去握阿弗拉阿姆的手。阿弗拉阿姆·谢奇泰用黯淡无光的眼睛盯着他，也无力地握了一下他的手。自从阿弗拉阿姆的儿子耶胡达（这是他四十岁上才生的儿子）乘吉普车触雷丧生后，他就失去了生活的兴趣，深居简出，甚至皈依

了宗教。不过他皈依的那种非常独特、有点模糊和很不可靠的宗教不怎么像穆瓦什·特泽莱马耶所天真地奉行着的宗教，在后一种宗教里既没有对上帝的信仰又没有对上帝的本质的思考，甚至没有平日对教规的遵守；这种宗教不过是简单和被动地重复与各种宗教节日和家庭节日有关的礼仪，例如巴尔米兹瓦或犹太教堂里的安息日祈祷。阿弗拉阿姆的宗教信仰也不像马克斯·斯皮尔曼的粗浅的信仰，后者与先驱者和社会主义者穆瓦什·特齐梅的皈依宗教区别不大，马克斯的宗教信仰归根结底不过是一种奴性和虚伪的风尚，是富有和衰落的副产品。这种宗教用空洞的话颂扬以色列的传统和民族的统一，表现为偶尔向犹太教堂捐赠财物，和经常在罗什哈沙纳节和犹太教逾越节，或有时在安息日去犹太教堂祈祷。此时，马克斯便到任何适合自己露面的地方坐下，身上裹着带流苏的披巾，全神贯注地读着祈祷书。同样，阿弗拉阿姆的宗教也不是戈尔德曼从前曾试图寻找的宗教。阿弗拉阿姆的犹犹豫豫的宗教信仰是他绝望、无力摆脱忧伤和解释他的遭遇的结果，是他发出的要别人帮助一个被打垮的男人的呼吁。戈尔德曼的父亲对阿弗拉阿姆的友谊始于两人青年时代一起在波兰的日子，虽然他对老朋友深感同情和怜悯，但无法认为老友的宗教信仰站得住脚。戈尔德曼的父亲本人对宗教的摒弃属于其世界观的一部分，他的摒弃是如此的彻底和狂热，以致他对各种皈依宗教的企图和所有对传统的怀念毫不在意，既不关心阿弗拉阿姆·谢奇泰——其儿子的死亡深深地震撼了戈尔德曼的父亲，下葬时他避开别人以掩盖自己

的哭泣——采用的模式，也肯定不关心马克斯·斯皮尔曼和穆瓦什·特齐梅的方式。这两人的宗教信仰激起了他的反感和愤怒，因为他在他们的宗教活动中只看到一种不可原谅的愚蠢和虚伪。他不隐瞒自己的态度，一有机会就公开表明它。戈尔德曼的父亲与约埃尔和拉扎尔不同，这两位兄弟原则上脱离宗教，但他们的非宗教倾向——特别是无任何思想动机的约埃尔的非宗教倾向——仅仅表现在生活方式中，但对于布拉莎和斯米埃尔来说，这是一种无法接受的生存方式，因为哈娃大娘在他们家住了很久，所以他们虽然不信教，但在母亲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也不愿意惹她伤心，那时她已陷入昏迷状态，不知道周围发生的事情了。现在斯米埃尔转向戈尔德曼，问他身体如何，外面是否在下雨。戈尔德曼答道："是的，下雨了，不过挺舒服的。"斯米埃尔邀请戈尔德曼和他们一起稍坐一会儿。戈尔德曼深爱他和布拉莎，同时极恨阿哈隆和他妻子，他没有接受斯米埃尔和阿哈隆的一再邀请，他表示歉意，说自己很累，并向他母亲和所有在场的朋友道晚安。他进浴室擦过头和脸以后，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进行了十来分钟的举重和健身运动，接着他把训练器材放好，脱下外衣，睡觉前还看了看桌上、书架上的书，想找些入睡前看的书。

在散放在不堪重负的书架上的书中，有关于犹太教的书、卡巴尔① 的书、论著、犹太法律及犹太法学博士的有关注释、祈祷书，这是一个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在那段

① 犹太人对《旧约全书》作的传统解释。

时间里，戈尔德曼胸怀伟大理想，热情努力地试图皈依犹太教和一种他在整整一年间以为已经重新找到了的宗教，可是他的宗教没有机会继续存在下去,而最终消声匿迹了。因为虽然戈尔德曼有良好的愿望和尽了很大努力，他还是没有最终获得宗教信仰，甚至没能最终从理智上确信信仰的必要性和上帝存在的作用。戈尔德曼的观点与曼弗雷德的相去不远。曼弗雷德在几个月后初冬时期与戈尔德曼的一次短暂谈话（大概是最后一次）当中对朋友说，他不相信可能是由自身创造出来的人和宇宙的绝对自主，他认为只能在承认本能的无限支配和在缺乏道德标准的前提下才能否定上帝的存在。稍作停顿之后，曼弗雷德又补充说："我们已经看见了这会导致什么。"戈尔德曼承认曼弗雷德肯定是对的。不过戈尔德曼的宗教实践与他另一种采纳道教、从道教中看到不同的世界观、思想和理想体系及生活方式的尝试一样，也以失败告终。正是在精疲力尽地研究了道教、反复研读道教的著作及旨在阐明其道理的解释文章——然而这些道理最终在他脑子里还是一片模糊，也远不能打动他的心——之后，戈尔德曼又转回不久前还鄙视地加以摒弃的心理学，目前他对此又重新产生了兴趣。特别是，他因阅读了埃里什和纽曼的书而得以了解了荣格学派，这学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力图根据从书中发现的观点进行自我分析,期待重新赋予他的生活以意义。就这样戈尔德曼开始研究梦境。当他刚做完梦，眼睛还困得睁不开的时候，他就努力用不连贯的呓语来回忆梦的所有细节，以免第二天早上遗忘。过了一段时间，当他发现这

个方法无大用处和第二天整个梦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时，他就开始在半睡半醒中起床，用沉重的手在纸上录下梦，以便翌日在这些纸上努力辨认出那些他忘记了的细节，并发掘出埋葬在无意识中的潜能。然而所有这些努力的结果、如同其它一切旨在使他避免生活中的困难的困惑，以便有可能在一个和谐而合理的世界上过上平静和自由的生活所做的努力的结果，是如此的不尽人意和毫无实际意义，他终于慢慢失去了对心理学和梦境分析的信心。疲劳和泄气的阶段过去以后，他重又投入对历史、社会学，和在某种范围里对哲学的研究，同时他再次梦想到农村生活。这个他从未放弃过的和在他眼里由阿维诺阿姆·勒维阿唐体现了的梦想，在他多年以前拜访过一次阿维诺阿姆以后就深深地刻在脑海里了，就像其它仍铭刻在心的悠久往事那样：例如他曾在约埃尔、齐波拉及他们的孩子们居住的莫沙夫，在他们经营了几年的大农场里度过假。

在他的经过筛选保留下来的和带有宁静而和谐的美妙光晕的记忆里，总是有蓝天、草地、黑土地、一条种着葱翠柏树的林荫大道，柏树散发出夏天干燥的味道，这是一种刺激而醉人的香味。齐波拉在树荫下割喂鹅的青草，果树的树干都刷成白色（有一年她甚至和伊尔米亚胡一起往树上刷石灰浆），雄鸡在东方泛起的鱼肚白中引颈高歌，脚穿打湿了的鞋子的阿维诺阿姆在一个仍然严寒的安息日的清晨收割三叶草，暖烘烘的鸡棚散发出羽毛、鸡食和鸡粪的混合臭味，埃丝特小心翼翼地把冒着热气的鸡蛋捡起放进一个圆筐里，晌午炽热的太阳照射着辣椒地、西红柿地

和黄瓜地，还有那位英俊和晒成古铜色的阿维诺阿姆和他的来自美国犹他州的妻子在西瓜田里，正在为他们自己和三个孩子们做饭。稍远一些是覆盖着野草败花的未开垦的处女地，它们与隐没在微蓝天际的大片柑桔园毗连。当戈尔德曼和梅尔、依尔米亚胡一道从厄卡利普蒂斯小树林那边的田地推着小车回家时，他非常喜欢沉浸在这寂静的大自然中，沐浴在已经减弱但依然温暖的夕阳的余晖中。他非常疲劳，同时也因松筋动骨而感到舒服，就靠在阿维诺阿姆身旁的墙上。阿维诺阿姆坐在一张板凳上，在牛栏的灯光下注视着他，同时用单调的机械动作挤着五头正在安静地反刍草料的奶牛的奶，使牛奶很响地射入夹在他两腿中间的桶里。桶一旦接满牛奶，戈尔德曼——他现在终于下决心拿着报纸上床——就盖上桶，小心翼翼地把牛奶桶从牛栏里提出去，接着又缩回他的墙角里，然后累得昏昏沉沉的他继续从那儿观察阿维诺阿姆。戈尔德曼面前是永恒，他知道乡间生活可以拯救他，他对这种生活永远不会失望，总是梦寐以求，这是一个他认为比其它任何梦都要具体和容易实现的梦。目前他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报纸，就任它从手中滑落，眼睛盯着天花板，然后转过身子向着墙，眼睛一直大睁着，注意地倾听从客厅传来的清晰的说话声，不过那声音很快变小了。他慢慢闭上眼睛，钻进夏季的薄被窝里。他还能听见的最后一个声音是叶胡迪·梅兹莱的平静的噪音，接着它也消失在深沉的寂静中。但寂静被斯蒂法娜的唯一的脚步声打破了：她进厨房洗餐具并摆放整齐，接着进浴室，最后进房间并上床。这时终于完全安静

下来了。戈尔德曼很困，他闭着眼睛伸手去关了灯，但他无法入睡——好几个月来，甚至可能一年多来一直如此。他辗转反侧，努力专心地入睡，但是没有成功，便又神经兮兮和紧紧张张地开了灯，重新拿起报纸读起来，直到平静下来，疲惫不堪，觉得自己终于快要睡着了。他缓缓拧动开关以便保持迷糊状态，他平静地倒在床上，闭上眼睛，一心一意地入睡，渐渐有了睡意，但还是没有真正睡着。他仍然醒着，满脑子模糊的想法，极其烦躁不安，只好又起来服了两片安眠药，然后回去躺在床上，这时他精疲力尽，过度兴奋，几分钟以后就睡得很熟了。他翌日一早醒来时，天气变化不定，寒冷、多云，是四月份五月初会有的那种天气。尽管他从一醒来就重新开始操心种种问题——各种需要澄清或解决的问题，但如果不是斯蒂法娜的脚步声终于把他从床上拖起来，他还会闭着眼睛躺更长时间。他好不容易才起了床，漱洗完毕和喝过咖啡之后，就去隐蔽在藏书当中的父亲的小藏物处取父亲私人壁橱的钥匙，好把死亡证书放进去，同时把父亲的支票簿拿出来（他的身分证则总是放在厨房的某一层搁物架上），以支付与父亲的生病、安葬及立墓碑有关的一些费用。他还想利用这个机会找到原来属于他父亲的保险单、银行存折和国库券。他把自己的意图告诉斯蒂法娜以后，就打开了在他父亲生前没有人敢靠近的壁橱。

壁橱很干净，很细心地收拾好了：在集邮簿和保存着昔日漂亮的年轻人和一个幸福家庭的旧相片的相簿旁边，有一些“泽鲁巴别尔”银行：“英国——巴勒斯坦”银行和

“巴尔克莱斯”银行的旧支票簿，及三四十年前使一些机构受益的各种捐款和付款的证书和收据，而这些机构中的大部分已经撤销很长时间了。戈尔德曼站在打开的壁橱前面，突然感到一阵不自在，他觉得后怕，同时对所有权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转眼之间一切都属于他了，然后他稍微弯下身子，在证件和文件堆中乱翻，直至找到银行存折，保险单和国库券，甚至还找到一张他姐姐的旧相片和他父亲的遗嘱。他把遗嘱拿在手中，犹豫了片刻，没有拆开信封就把它准确地放回原位，重新关上壁橱。他经过深思熟虑以后，第二天早上就把一切都告诉了斯蒂法娜，问她是否同意让拉扎尔叔叔在所有人面前开启遗嘱。斯蒂法娜同意了，她点点头，但同时又心不在焉。晚上当拉扎尔叔叔来到以后，戈尔德曼一边把遗嘱递给他，一边请他在众人包括斯蒂法娜面前拆开它并加以宣读。拉扎尔叔叔似乎被这请求弄得很尴尬，他窘了一会儿，然后戴上眼镜，拆开遗嘱，开始慢慢念起来。他用极其单调的声音念着，戈尔德曼确信自己在叔叔那毫无感情的朗读中发现了他对遗嘱有所保留和批评的态度，这决不是为了取悦侄子，但戈尔德曼对此不置一词。戈尔德曼的父亲在生命中的最后四年里致力于写遗嘱，遗嘱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的诚实、专制和痛苦。遗嘱本身是反复权衡、无数次易稿的结果，它既精细又复杂，戈尔德曼的父亲是在一个狡猾的律师的帮助下才把这许许多多的思考和手稿最后变成这份阴险的文件的。遗嘱主要是向死者保证他的财产将留给他的合法继承人斯蒂法娜和戈尔德曼，同时把死者所希望的继承人享用

其财产的方式规定下来并强制他们执行。这实际上等于使他们特别是斯蒂法娜对财产的享有成为一纸空文。当拉扎尔念完兄长的遗嘱时，他问斯蒂法娜是否要他或戈尔德曼——他从一开始就一直盯着叔叔看——向她解释遗嘱中的某一条款。可是斯蒂法娜已经听清楚了，她脸上的冰冷和完全漫不经心的表情也没有变化，她用波兰语对他说这没有必要，对于她事情就这样结束了。然而遗嘱却重新激起了戈尔德曼过去对父亲一直怀有的那种怨恨，他把遗嘱放回壁橱里原来的地方，同时利用这个机会再次看看他姐姐的照片，照片缺了一角，像是被剪刀剪过或被剃刀割过。他怀着刚才有过的那种不舒服和害怕的感情，重新锁上壁橱的门，然后问拉扎尔叔叔——他愿为任何理由使叔叔快乐——是否愿意下一盘棋。拉扎尔微笑着很乐意地接受了，戈尔德曼便拿来棋盘，两人进了厨房，在桌前坐下，布好局后就开始下棋。没有人来打扰他们，来访者的人数日渐减少，因为大部分人认为来过一次或者最多两次就已经尽了他们的义务。还来（不是每天）在斯蒂法娜默默的陪同下坐一会儿的只有斯米埃尔和布拉莎夫妇、耶胡迪·梅兹莱(唯一恰当地对待斯蒂法娜的人)、穆瓦什·特泽莱马耶、特齐梅的寡妇以及曼弗雷德。曼弗雷德曾在服丧周的周末、他从海法回来的当天晚上前来看斯蒂法娜，次日又来看她，不过这回是来向她辞行的，因为两天后他将赴荷兰并在那儿逗留两三个月后才回以色列。

20

斯蒂法娜身穿一条蓝色的丝睡袍，头戴一顶雅致的毡帽接待了曼弗雷德。她的毡帽和她的衣服不太相配，然而不乏魅力；这是一种贵族式的高雅，有点夸张，但不是太古怪，至少令人印象深刻。当曼弗雷德走进客厅的时候，他们像往常那样重逢时心里有点儿痛苦，但他们的激动转瞬即逝，很快让位于怨恨和一种礼貌的不耐烦。他们的对话不太长，但不坦率也不自然，中间穿插着沉重的缄默、空洞的套话和过分斟酌的词句。曼弗雷德掩饰着自己的不自在，和他的搭挡一起演戏，或者不时地用手绢擦眼镜，最后他终于起身出去了，同时向斯蒂法娜告别。这次斯蒂法娜没有如他预料那样站起来并送他到门口，她目送着他，在他迈出门口那一刻对他说："必须懂得分离。"她脱下毡帽放在桌子上，又补充说："一切都会过去的。"接着她打开电视，心神不定地看了几分钟，然后又关上了，坐在那儿无所事事，心不在焉地盯着对面的空墙和透明的白窗帘。两天以后，她这样向耶胡迪·梅兹莱述说整个过程："他走了。就这样。不过这样更好。"脸长得很像俄国女人和仍在一个医疗保险金保管处的诊所当护士的耶胡迪·梅兹莱对她说："你会想念他的。"由于斯蒂法娜说不会，一切都结束了，耶胡迪·梅兹莱又说斯蒂法娜本该送他到门口，那一

位答道："他本该多呆几分钟的，可是他太着急走了。"耶胡迪补充说斯蒂法娜不该把这看成是一个面子问题，对方说："不，这不是因为自尊心。"可是耶胡迪·梅兹莱肯定地说她其实是出于自尊心，不过自尊心并不像她想象的那样重要。耶胡迪最后说的话表达了她自从认识了曼弗雷德以来对他一直怀有的尊重和敬意，她认为人们发现了的他那古怪和难处的性格并无大碍，她完全尊重和赞成曼弗雷德对斯蒂法娜的态度及对待她的方式，尽管她从未将自己的观点告诉过斯蒂法娜，当然也从未告诉过曼弗雷德。她遇到曼弗雷德时从来只是和他简单地互相问个好，因为他一在场她就不知所措，即使她很喜欢听他讲话，而这更多的是因为他的音调而非他讲话的内容。

除耶胡迪·梅兹莱以外唯一常来的是拉扎尔叔叔，仿佛他试图通过对死去的兄长表示亲近和好意来弥补这位兄弟强加给他的三十四年的分离和排斥。他很少和斯蒂法娜讲话，她拿他当外人；他甚至很少和戈尔德曼讲话。但戈尔德曼甚至在终于认识拉扎尔叔叔之前就对他颇有同情和感情，即使只因为他父亲一有机会就要对自己的亲兄弟进行模糊然而夸张和仇恨的指责，而拉扎尔叔叔却不能到场为自己辩护。后来戈尔德曼和叔叔的关系得到了改善，他们终于在一起用越来越多的时间打牌，或者两人什么都不说，尽管拉扎尔叔叔并非天生沉默寡言。他之所以说话这么少，是因为他了解知识、理智和人的能力的限度。一切都是这样的自相矛盾和含糊不清，似乎唯有怀疑才是某种具体的存在，只有极少数人才有可能相信某样东西；因为

期望太多是毫无用处的。拉扎尔也知道必须欺骗自己才能挨过哪怕是仅仅一天；知道命运会愚弄人，正如人会愚弄自己那样；世界上人们讲的所有的话都不能使地球只偏离它的轨道一厘米；决不可能让时光倒流，或填补空缺，或安慰一个睁开眼睛的人。拉扎尔叔叔的眼睛就是睁开的，而且一直大睁着，尽管他并非一个绝望或尖刻的人，而只不过很现实、很明智，具有一个阅历丰富和头脑清醒的人的那种冷静和超脱；尽管他继续以积极方式和最严肃的态度看待的生活不会再令他惊讶，因为他曾经死而复生，他曾去过天涯海角，看过一些无法想象的、可能现在已经被遗忘和消失了的地方；他曾经历过一些先前从来都想象不出的考验；他曾欣赏过一个他信仰的和期待建成的新世界的种种奇妙景象，而他是在自己所有的改良计划皆因人们的脆弱、恶意、害怕和无限自私而彻底破产后才发现这个新世界的。与此同时他从磨难和造反当中懂得了除了这个新世界决无别的出路，懂得了甚至他与之斗争的可怕事物也与善良、诚实和勇敢的表现一样合乎人情，而善良、诚实和勇敢永远都能打动他的心，给他注入世界和人类仍然大有希望的信念。这是和过去一样的信念，因为无论如何拉扎尔叔叔依旧怀有美好的憧憬，因为他从未停止过获取知识和阅读书籍，这是热爱和纯粹好奇心的驱使，特别是他日益渴望了解永远在变化的世界，这个他生活在其中的、其混乱和专横从他童年时代起就塑造了他的一生的世界。在他的童年时代，作为他出生地的小村庄数度易主，从波兰人到俄国人，从俄国人到德国人，从德国人又重新到波兰

人，永远处于无休止的战火中，仇恨、隐隐约约的狂热和无缘无故的暴行随之出现，与此同时还滋生了傲慢、欺骗、愚蠢，连一些有教养、明事理和正直的人也沾染了这些不良品质。这种专制在拉扎尔离开波兰来到以色列的时候还在继续迫害他，那一天他不得不把戈尔德曼的姓改为施瓦尔茨——一个他沿用至今的姓，因为根据当时在以色列通行的英国委任统治地法律，他是作为耶鲁阿姆·施瓦尔茨和里娜·施瓦尔茨的儿子移民到以色列的，此前他从未遇见过这对夫妇，而且在到达海法港后只是再见过他们两三次。

拉扎尔到以色列时将近十七岁，起初他住在耶路撒冷约埃尔和齐波拉的家里，当时这对夫妇来以色列定居已经六年，比齐波拉本人的父母来特拉维夫的儿子耶沙亚胡身边生活早了两年。耶沙亚胡几年后死于疟疾，是在他和齐波拉的妹妹萨拉一无所获地在奥地利和德国逗留后也来到以色列的那年夏末。拉扎尔叔叔在耶路撒冷呆了一年以后就到利比里亚德去，然后从那儿再去哈德拉、海法，班雅米纳兹和雷柯沃特等地，最后像约埃尔和戈尔德曼的父亲那样在特拉维夫定居。戈尔德曼的父亲比拉扎尔早四年到以色列，他当时孑然一身，在北方一个基布兹[1]的田间和露天矿上几乎干了两年。拉扎尔在长期辗转中先后当过矿工、挖土工人，他甚至是钻填塞炸药的洞眼的专家；他还当过看管员、铁匠、脚夫、农业工人；可是当他到特拉维

---

① 基布兹（Kibboutz），希伯莱语，是以色列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组织。

夫时，却开始干泥瓦工了。他在戈尔德曼的父亲的帮助下，利用工余时间盖起一间棚屋，和他的妹妹布拉莎栖身于此。布拉莎当时也和他们的父母——巴吕什·哈伊姆老爹和哈娃大娘——一起到了特拉维夫，很快斯蒂法娜和她留在波兰的兄弟雅内克的共同的小弟弟勒旺也来和他们团聚了。戈尔德曼的父亲对勒旺这个身材高大和有一张活跃而宽厚的脸的小伙子特别友好，但他们的友谊在哈伊姆·阿尔洛佐罗夫[1]遇刺后不久，当勒旺突然异想天开地选择了修正主义阵营的时候就中断了，就这样两人之间出现了一条仇恨的鸿沟，这是一种深仇大恨，后来在拉扎尔原先的妻子拉舍尔与阿基瓦·维内的婚礼上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拉扎尔和戈尔德曼的父亲盖的棚屋与约埃尔、齐波拉及他们三个孩子居住的棚屋相连，或者更确切地讲是他们住房的一部分。约埃尔他们稍微挤了挤以腾出地方给孩子们的祖父巴吕什和祖母哈娃住。两位老人和长孙梅尔同住一间房，梅尔当时约七岁。他们这间带院子的大棚屋淹没在其它一大片同类建筑中，它们一律盖柏油纸顶，并刷成白色以防晒。齐波拉在院子里为家人种菜，还种了几株花，养了一些鸡。四周的金色沙海一望无际，在沙漠那一边的少量白房子之间，有一些红土地，上面覆盖着野草、荆棘、矢车菊，其间不时冒出一些埃及无花果、桑树、无花果树、冷杉和仙人掌围成的篱笆。在更远一些的天际，呈现出葡

① 哈伊姆·阿尔洛佐罗夫（1898—1933），以色列犹太工人运动领袖之一。他于1933年被神秘地暗杀，由此引起了工党分子和被怀疑出钱策划谋杀的“修正主义分子之间的尖锐对立”。

萄园、甜瓜地以及阿拉伯人的柑桔园，柑桔园边上种着刺槐，开花时散发出醉人的芳香。布拉莎和斯米埃尔结婚时（他们当时匆匆结婚，因为布拉莎已怀孕），大家集中起来，用几个星期的时间又建了一间木板房，就在老棚屋附近，而老棚屋两间房中的一间已在约埃尔和齐波拉生下第四个孩子以后给巴吕什祖父和哈娃祖母住了。他们在斯米埃尔和布拉莎在澳大利亚的整个滞留期间都继续在这些棚屋里居住。当时斯米埃尔已经廉价处理了理发馆、酒馆以及其余的店铺，希望在澳大利亚这个阳光普照、安详宁静和欣欣向荣的国家里，在肉类、羊毛、建筑，甚至理发等行业均能轻而易举地发财致富。然而令他大为失望的是，他在澳洲做成功的事仅限于学了点英语和艰难地节省下一些英镑。不过他马上又把英镑花掉了，因为他回到以色列后就投入到各种各样的投机和不正当的商业活动中。至于斯米埃尔的父亲，他只要一涉及到钱就马上成为铁腕人物，他从未给过斯米埃尔一个子儿，不过他还是经常提醒儿子要小心这类生意，甚至建议儿子到自己的肉店来工作。肉店几年以后落入他最年幼的儿子阿哈隆手中。阿哈隆在战争一爆发就乘船回到以色列并立即与父亲合伙做生意。还有，巴吕什老爹也同样念念不忘不时地告诫斯米埃尔，哪怕是间接地告诫，因为他憎恨带有撒谎和剥削味道的一切事物，即使只沾一点撒谎和剥削的边。在他看来，所有涉及金钱和经商的活动均在此列。他常提醒斯米埃尔还因为这整个话题都引起了他的怀疑和不信任，而他是没有任何从商经验和商业头脑的。他当初就反对斯米埃尔去澳大利亚，并

且自此再也不得安宁，继续希望斯米埃尔和布拉莎最后一分钟改变主意。不过当他们终于成行时，他还是为他们祝福并祈求神灵保佑他们旅途平安。在他们离开以色列的整个期间，他保留了他们的房子：每年在逾越节和罗什哈沙纳节用石灰把房子刷两次，在屋顶上重新铺上柏油纸，换掉碎瓦片。他甚至在院子里种了一棵桑树、一棵无花果树、一棵柠檬树和一些葡萄树，并搭了一间鸽笼——他喜欢所有的动物：狗、羊、马、鸟——和一张工作台，继续在工作台上修理手表以维持他和哈娃大娘的生活。

巴吕什·哈伊姆是一个强壮的男人，有一头乌黑的厚发，为人正直，信仰犹太教但不狂热，忠于它的戒律。城里每幢新建的房屋，房屋的每一根柱子和每一扇栅栏门，每一段路都使这位热情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心充满了快乐，他非常热爱以色列。哈娃大娘则是一个瘦小的女人，她一直穿着她那些黑丝裙。她似乎总是晕晕乎乎地走动着，一天到晚无时无刻都在毫无理由地淌眼泪，泪水顺着脸上的沟壑往下流，干后变成一堆松弛的皱纹，散发出一股衰老的味道。她那干瘪的身体只剩下皮包骨，她的头脑也渐渐迷糊，尤其是在丈夫去世以后；但她仍然能靠某种第六感官做饭，打毛线、搞卫生、以及一丝不苟地遵守上帝的戒律。她甚至强使儿子们也接受了其中几条戒律。他们每天轮流来看望她和她丈夫巴吕什·哈伊姆老爹。她继续用一种秘密的语言祈祷，祈祷词用很粗的字体印在祈祷书上，但她常常读错和删改祈祷词，她的心情倒是轻松而丈夫却大为痛心。她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去请教犹太教教士，在她

眼里，他是人间至高无上的权威，他代表知识和信念——坚信世界远非没有目标的一团混沌，而是服从一种规律的；它虽然有混乱、干扰和不公正，但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源于一个预先的设计，在里面每一种事物都有其位置和存在的理由。哈娃大娘始终保持着她向来就有的节俭的习惯（正是为此她钦佩马克斯·斯皮尔曼却对斯蒂法娜持保留态度；至于对斯米埃尔和阿哈隆的父亲，她则出于其它原因憎恨他），她缝补旧袜子，把用剩的肥皂碎片融成一整块，小心翼翼地剥土豆皮以致剥出的皮是透明的，煮满满一大锅汤，这至少足够一星期享用的汤变得极稠极硬，一只猫都可以在上面走过而不留痕迹。她从来没有扔过一小块食物，也没有扔过旧衣服或旧鞋子甚至空罐头盒。战争期间，意大利人轰炸了她当时还与斯米埃尔、布拉莎夫妇同住的棚屋，他们把她藏在衣橱最里面。就这样她得以生存在人世，但身体已经不能动了，直至不久后以高龄辞世。在这段时间里她已神志不清并丧失了记忆力，甚至想不起她的丈夫，再也不知道周围发生的一切，就这样她经历了毫无知觉地躺在床上直到死亡的不可逆转的过程。

21

父母来到以色列时还是光棍一条的拉扎尔起初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照顾他父母。可是当他在特拉维夫定居三年，与

童年女友拉舍尔——其时她刚和母亲、兄弟马克斯·斯皮尔曼来到以色列，三人暂时栖身在棚屋群旁边的一个大木头框式棚子里——恢复关系时，就开始谈婚论嫁，令拉舍尔的母亲深感快慰，因她母亲不赞同不承担义务的放纵的爱情。然而她尽量在冷漠的面罩下掩饰自己的快乐，因为她害怕指责的眼光，也认为表露自己的感情是不适当和有失身分的。这和马克斯·斯皮尔曼截然不同，他的极左观点使他公开反对此事。特别是他和拉扎尔的政治观点完全相左，他反对建立家庭这一原则，而且没有明确阐述自己的观点就把家庭确定为一个衰落的和具有破坏性的资本主义细胞，认为它植根于经济利益、一种僵化传统及虚伪之中。他是某种激进社会主义和更为自由的恋爱关系的热诚信徒。

这时期，建筑业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萧条后又恢复了繁荣，这是向棚户区日益靠近的城区飞速发展的结果。此时棚户区内修建了一座犹太教堂、几条林荫道，一些种有无花果树，柠檬树、柑桔树、冷杉、攀沿植物、香豌豆的绿荫覆盖的公园，另外还有人仍仿效齐波拉在这儿那儿开垦出萝卜地、生菜地、西红柿地和黄瓜地。鸡和狗在菜地上自由地跑来跑去；夜里，每当豺狼跑过，狗群便狂吠作为呼应。豺狼的叫声显得很近，几乎就在墙的另一边，哈娃大娘被吓坏了，马上就准备收拾行李回波兰——总之这是她自己说的话。城市以极其疯狂的速度向沙丘、葡萄园和瓜地扩展，哈伊姆·巴吕什老爹很难跟得上房屋、街道和新工厂迅速崛起的速度，对此他怀着一种自豪和苦恼相交

织的感情，因为他不理解城市了，它变得很陌生了。正是在这时候，在繁荣达到顶峰时，拉扎尔决定放弃他在建筑部门的工作，因为它从体力角度看已经变得很艰苦，且无利可图；然后他到印刷厂工作。

拉扎尔既懂希伯莱语又懂波兰语和意第绪语，甚至通过自学很好地掌握了德语和英语，以及相当多的知识，尽管他在某些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领域还是缺乏方法。这是因为在他内心唤起了愤怒和恐惧的感情的世界同时也吸引着他，他渴望了解事物变化的规律，而对这些规律的了解本身也许有助于改变事物。同样以报纸和书的形式出现的印刷纸页对他似乎施加了魔力，使他对它们的兴趣和崇敬不断增长。从拉扎尔当印刷工人开始，事实上几乎从戈尔德曼的父亲和拉扎尔叔叔开始共同盖棚屋那一天起，在“青年工人”的成员戈尔德曼的父亲和属于“劳工联盟”的拉扎尔叔叔之间就爆发了经常性的争论，拉扎尔叔叔的左派观点甚至变得比马克斯·斯皮尔曼的政治立场还要极端和强硬。他们的充满火药味的争论往往会激化，演变为充满仇恨和伤人的吵架。随之而来的先是两人互不说话的决裂时期，尔后是经约埃尔·齐波拉夫妇和父母或勒旺做大量劝解工作以后的互相接近阶段。他们常谈论斗争和工人阶级的目标、苏联和共产主义运动、犹太复国主义和阿拉伯问题、法西斯主义、暴力和民主问题以及建设国家和改造世界的最佳途径。当拉舍尔怀孕和人们在犹太教堂前面替她立起一顶喜帏的时候，马克斯·斯皮尔曼和拉扎尔本来都满心反对这种宗教礼仪，不过后来拉扎尔认命了，甚

至试图逆来顺受和在婚礼上露出微笑，而马克斯却忠于他的原则，不顾他母亲、姐妹、齐波拉、勒旺和巴吕什·哈依姆老爹的反对，没有出席婚礼。

这时已经是十月初了，空气很新鲜，充满了埃及无花果树、其它无花果树、桉树的味道和初秋凉爽的味道，一早一晚特别明显。但这种凉爽决不影响他们在围绕着大木板房的花园中摆放桌子。桌子上盖着上过浆的桌布，一盆盆天竺葵、香豌豆、香桃木树枝、叶子花枝、冷杉枝和柑桔树枝装饰着桌面。包括途经此地的雅内克在内的来宾们身穿白衬衣，紧围着桌子旁边坐下，忙着畅饮齐波拉亲手酿制的葡萄酒和无花果酒，品尝拉舍尔的母亲和哈娃大娘烹制的咸甜水果塔、奶油土豆烘饼、香料鹰嘴豆、洋葱、罂粟和果酱饼干、冻巧克力蛋糕。哈娃大娘两天两夜不停地流泪，许多泪水流到面团上，于是哈娃大娘没有使面团充分发起来，并且像拉舍尔的母亲接着断言的那样，面团有一种苦味。哈娃大娘在举行婚礼时和在婚宴上还继续哭泣，甚至当全部人，包括深爱拉舍尔和痛苦得心要碎的阿弗拉阿姆·谢奇泰都跟着勒旺——他和萨拉跳了一晚上舞——开始唱歌跳舞的时候仍在哭。耶胡迪·梅兹莱的这位姐妹萨拉幸福得如醉如痴，勒旺让她极其优美地原地旋转和向后旋转。几个月后，虽然遭到斯蒂法娜的反对，萨拉还是成了勒旺的妻子，此时穿尖头皮鞋、丝质毛衣和抹美发油，跳探戈和华尔兹无人赶得上，同时又成为扑克和台球的高手的雅内克已经回波兰很长时间了。勒旺和萨拉婚后相爱如初，但后来他们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阴影，因为他们虽

然费了很大劲，也总是怀不上孩子。

这天晚上人们跳舞跳到很晚。当晨曦微露，当所有来宾都尽兴而去，留下一桌桌残剩食物和继续发出香味的鲜花和树枝时，巴吕什·哈伊姆与世长辞了。他坐在他和哈娃大娘的大床的床沿上，松开皮带，发出一声低沉的叫唤，就一头栽倒在地上。于是第二天，人们穿着和把拉扎尔、拉舍尔领到喜帏下时穿的同样的白衬衣又来了，只是这一次是为了把巴吕什安葬入土。哈娃大娘由约埃尔和戈尔德曼的父亲搀扶着，泪如泉涌，不停地用意第绪语念叨着："这是一个伟大的人，这是一个伟大的人。"她那因哭泣而变得含混不清的嗓音和她翻来覆去讲这句话的方式透露了当年曾使她这位年轻姑娘怦然心动、可惜后来淹没在单调平谈的日常生活中的对巴吕什的钦佩和追求。五个月后冬天即将过去时，拉舍尔产下一个男婴，拉扎尔替他取名为巴吕什；两年以后拉舍尔又生下一个女孩，夫妻俩叫她作特齐拉，这是拉舍尔的外祖母的名字，但无论是拉舍尔还是拉扎尔过去都从未见过这位外祖母。

他们住在一所棚屋里，在特齐拉出生后不久搬来约埃尔的棚屋里居住的拉舍尔的母亲和马克斯·斯皮尔曼的帮助下又加盖了一间房，并扩建了厨房。约埃尔则租了一个套间，和全家人一起在里面住了几年，然后到莫沙夫去定居，二次大战前只是短期离开过那儿。特齐拉出生时，拉扎尔退出"劳工联盟"，但依旧保留着共产主义的思想观点。他的观点与日前在约埃尔的棚屋里开了一家制锁店的马克斯·斯皮尔曼的不同，是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这色彩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浓厚，并招致了正统共产主义者马克斯对他的批评。拉扎尔的共产主义不仅引起了过去的同志们的愤怒和敌对（其中大部分人已经和他断绝了一切关系），也引起了亲友们的愤怒和敌对，最终在他周围造成了一种持久的、充满了争吵和敌意的剑拔弩张的气氛。他和戈尔德曼的父亲的关系是在一个冬天的晚上，当两人在患了流行性感冒的哈娃大娘的病榻前进行了一场关于犹太复国主义及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的地位等问题的激烈争吵之后，达到了要决裂的地步的。几个月后，当人们获悉拉扎尔决定参加国际纵队[①]去援助西班牙共和政府时，这种分歧演变成了戈尔德曼的父亲那一方对拉扎尔的彻底排斥。他一直狂热地坚持对弟弟的排斥，到死也没有改变；他断然拒绝任何与拉扎尔和解的意图，借口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与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的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平共处，他决不能原谅一个忽视家庭的人，哪怕这人是为了拯救世界。

齐波拉和约埃尔也试图从他们的角度劝阻拉扎尔叔叔不要实现他去西班牙的计划，刚和哈娅太太一起到以色列几个月的哈依姆·莱布和斯米埃尔、布拉莎夫妇，此外还有不少人，包括马克斯·斯皮尔曼，当然还有拉舍尔在内，都劝阻过他；拉舍尔恳求他不要抛下她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但拉扎尔还是决定要走，他于夏初时分乘船开赴法国。拉扎尔和拉舍尔分手时，两人几乎什么都没有说。随后拉

---

① 即西班牙内战时的国际纵队。

舍尔接到两封他从巴黎来的信，稍晚一点又接到一封来自巴塞罗那的信，后面还有几封，所有这些信件都是寄给她本人的。再往后有好几个月音信杳无，接着却寄来了他的私人证件及他已在德卢埃尔[①]附近的一次飞机轰炸中阵亡的通知书。然而过了不久拉扎尔的另一封信又到了，但写信时间和地点均不详。关于拉扎尔尚在人世，有人在塔拉戈内附近、巴伦西亚、马德里和翁达涅塔[②]的一间小医院里见过他的传闻重又燃起了埋藏在拉舍尔心底的一点希望的火花。可是同时也流传着与上述传闻相矛盾的其它消息，特别是关于拉扎尔已被波兰志愿军杀害的消息似乎证实了最初传来的拉扎尔的死讯。本来除了拉扎尔最后一封含混不清的来信外大家在这整整一段时间里就再没有收到其它任何来信，现在又加上他被波兰志愿军杀害这一明显事实，这就使一切希望都消失了。然而拉舍尔又等了三年，直到那一天她在经过许多思想斗争后，决心嫁给彬彬有礼地追求了她多年的阿基瓦·维内，却无视阿弗拉阿姆·谢奇泰对她的爱情。两人对这爱情心里都很清楚，尽管男方从来没有勇气说出来。拉舍尔作出这个决定是因为她首先要替自己和孩子们寻求靠山和保护，而这恰恰是阿基瓦·维内所能给予她的。

婚礼在亲朋好友的圈子内举行。他们围坐在摆满佳肴的桌旁，可是一种悲凉和不舒服的气氛使任何想挑起一点欢乐情绪的努力都归于失败。婚宴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约

---

① 西班牙地名。
② 均为西班牙地名。

纳·科特钦斯基用男高音唱了几首意第绪语歌曲和一首《茶花女》的咏叹调，令齐波拉的妹妹萨拉十分开心，此时她已经是他的妻子。接着大家入席用餐，努力地逗乐，这时候在戈尔德曼的父亲和勒旺之间爆发了一场可怕的争吵，这是一件极其不幸的事情，宾客们纷纷告退回家。口角非常短促，特别是很出人意外，以致无人能阻止它。这是对修正主义头子雅波坦斯基[1]的一种侮辱性抨击，戈尔德曼的父亲深知此人的底细，这回他放大嗓门把对此人的抨击公之于众，这就把火药点着了，很快演变成两个男人之间就阿尔洛佐罗夫[2]被刺一事爆发的大吵大闹和恶语伤人的互相责骂。戈尔德曼的父亲从椅子上站起来，脸色因愤怒和仇恨变得灰白，他敲着桌子大喊："肮脏的法西斯分子！凶手！滚到希特勒那里去吧！"然后他冲出房间，这时他被椅子绊了一下，接着疯子般推开他一路上见到的人。而勒旺激动得嘴唇和双手直打哆嗦，因为他过去从未攻击或谩骂过任何人，他对戈尔德曼的父亲吼道："共产主义的坏蛋！恶魔！是你们杀了他！你们把他们全都杀了！"然后精疲力竭地重新坐下来。从此两人再也没有互相说过话，甚至没有再见过面，除非出于偶然，且大多数是在街上；他们绕开可能见面的场所，尽管如此如果偶尔还是遇见了，便互相全然不理睬地擦肩而过。两个人当中最记仇的是戈尔

---

① 泽埃弗·雅波坦斯基（1880－1940），犹太民族主义运动和修正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与达维·邦·古里昂领导的社会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相对立。

② 见183页的注①。

德曼的父亲，他在婚宴风波之前老早对勒旺就怀有的仇根甚至在勒旺死后还未消失。这是一种非常根深蒂固的仇恨，为此他甚至拒绝参加几年后触电身亡的勒旺的葬礼，尽管亲友们作出种种努力想劝他到场。他对斯蒂法娜的感情一点儿也不尊重，总是不失时机地攻击她弟弟勒旺，甚至当着她的面也是如此。他对以各种形式甚至以最令人尊敬的形式出现的修正主义恨之入骨，与它誓不两立，他的仇恨和对抗是没有止境的。他从修正主义那儿看到的是法西斯主义的一种化身和全民族面临的一种危险。他去世前不久在与阿弗拉阿姆·谢奇泰谈论国家的政治形势时还说："贝京[1] 徒劳地表现出一副可敬的样子，但什么也不能使人忘记是他们杀害了阿尔洛佐罗夫！"此时走进厨房的戈尔德曼无意中听到了父亲的话并为他感到自豪。这时候阿弗拉阿姆说："阿尔齐的兄弟说这不是真的。"父亲又回答说贝京他们确实杀了阿尔洛佐罗夫，这是事实，世界上任何所谓证据都不能动摇这个事实。戈尔德曼的父亲一直被这件事所困扰，在拉舍尔的婚礼上终于又以非常激烈的方式爆发了对此事的争执。

婚后一个星期，拉舍尔把孩子们接来安顿在阿基瓦·维内的套间里，同时把从此空了的棚屋卖给哈伊姆·莱布。哈伊姆几周内把棚屋改造了一番，加盖了一间房，并在里面放了一个很大的木头圆转柜。而这时拉扎尔已经在北极地带大荒原上的雅库提生活了好几个月。他在经历了一系

① 默纳埃姆·贝京，右翼民族党党魁，于1977年上台执政，结束了工党政府为期三十年的统治。

列艰难困苦以后作为政治流放犯来到此地；他和其他国际纵队的志愿兵一起被递解到苏联，在那儿被指控为托洛茨基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而根本无法为自己辩护，不过最后苏联人却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宽容仅判处他流放。就这样他和其他囚犯和政治流放犯生活在北冰洋的岸边，起初住在遇险船只剩下的破船板里，后来住进流放犯用捡来的咸鱼桶的木板亲手拼成并抹上一层泥的简陋棚屋里。大家分配拉扎尔当渔夫和泥瓦匠，还分配他当矿工，徒劳无功和精疲力尽地试着开采刚刚在雅库提永冻冰层下面发现的煤和石油。

很快地拉扎尔双手结满了老茧，两腿沉重得像灌了铅，长期的严寒和疲劳使他的感觉麻木了，充满了绝望。而冰的严峻的白色和以他所不习惯的速度交替着的日日夜夜，还有北极光，它用各种颜色的幻景在天空勾勒出逐渐淡薄的轮廓，被雅库提矮小的人们当作死魂灵的舞蹈，这些都使拉扎尔几近发疯。他在内心深处超越了可怕的日常生活中的困难，仍牵挂着从他离开以色列的时候起直到他被指控为颠覆分子和反革命并被放逐到雅库提那天止，改变了他的一生的那不明确的革命。一切似乎都被一种无法解释的偶然的力量弄复杂了，这种偶然性支配着事件的发生，并且演变成规律。一想到他的生活和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与理智和事物必要的次序相对立的、含混而令人绝望的谜，他便再也不得安宁，这想法就像鱼和冰的味道那样日夜困扰着他。于是他更加自我封闭了，并重新作出努力来解开这个谜和解决矛盾，以便能够在不过分绝望的情况下继续生

活下去，并恢复心灵的平静，因为完全无法想象生活竟是一片混乱，无法想象事物会不受逻辑和正义的支配。虽然拉扎尔还是从根本上坚持原先的观点，但上述努力慢慢地将他引向学习，学习他过去不知道的，或从来没有愿望要学习的东西：他学会了少说话、对时间完全不在意；学会了安于怀疑和犹豫甚至将这些作为一个新的生存的理由；学会了对未来不抱希望，过一天算一天地混日子。他也学会了摆脱想重见家人的愿望——在遗忘了一段时间以后，这愿望突然再现于脑际，占据了他的整颗心——就像他学会忍受可怕的暴风雪、学会了在零下六十度到户外大小便那样。十八年过去了，他从未表达过愿望或改变过思维方式就被释放了。就这样，在隆冬寒冷和下雨的一天，他回到了以色列。到机场迎接他的只有约埃尔和齐波拉、斯米埃尔和布拉莎。拉扎尔的母亲哈娃大娘病倒在床已经好几年了，坚持与他决裂、又不愿出门半步的戈尔德曼的父亲则拒绝和兄弟姐妹一起去接弟弟拉扎尔。

直到一周前大家仍然以为拉扎尔叔叔确实不在人世了，因为很长时间以来他们已经放弃了任何希望，于是重逢的场面就更加激动人心；同时它也很沉重，因为这已经不完全是拉扎尔走时的那些人了。或者说，他们虽然还是那些人，但已经有了变化。他们的心里沉甸甸地装满了旧怨和痛苦，而一小时之前这一切还秘而不宣，至少对拉扎尔叔叔不公开：这都是些拉扎尔长期在外的时候积累起来的怨恨和痛苦。光是拉舍尔和孩子们不在机场这件事就给他们的重逢投下了阴影，大家料到拉扎尔会向他们提问题，

可是他当时什么也没有问，只是打听了一下哈娃大娘的身体情况，甚至当晚上大家在约埃尔、齐波拉的大房子里互相聊天时，拉扎尔也还是什么都没有问。在机场候机室时拉扎尔和亲人们欣喜若狂、激动万分，互相拥吻了好几次，互相说着一些含糊不清的话，开着玩笑。在到约埃尔和齐波拉的家去的一路上（他们正好在战争结束的前夕卖掉农场和搬到城里住），布拉莎一面哭一面不停地碰碰拉扎尔，摸摸他的肩膀和手臂。他们和孩子们及其家人、还有齐波拉的妹妹萨拉一起准备了丰盛的午宴，约纳·科特钦斯基还从他们自己的糕点铺带来了一块美味可口的核桃蛋糕和好几种饼干。大家吃过饭后仍然围坐在为迎接拉扎尔而像逾越节晚上那样、在房间中央支起的和尽其长度打开的桌子旁边谈天说地。天渐渐黑了，宾客们都告辞了，拉扎尔到小房间躺下，但因旅途过分疲劳而无法入睡。尔后他们在天很晚时才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餐，喝了咖啡，并终于能摆脱孩子们及来宾们，和更加从容地谈话。齐波拉、斯米埃尔、约埃尔和布拉莎把勒旺和耶沙亚胡的死讯和哈娃大娘的病情告诉拉扎尔，同时拉扎尔也得知拉舍尔在他死于西班牙的最后证据确凿，不容再抱希望以后与阿基瓦·维内结了婚。仍然处在生活中发生的变故和与家人团聚的冲击下的拉扎尔叔叔晕头转向，似乎已经失去了对现实和对严重性的感觉，一切——时间、人、外表、词语——都好像飘浮在空中，属于两个既存在又不存在的世界，因而他以高度的平静接受了人们告诉他的一切，而没有任何激动和惊愕的迹象，使人以为他对此早有预料。他沉默了一会

儿以后只说他第二天就去看望母亲，然后再去看拉舍尔及孩子们。约埃尔、齐波拉和布拉莎劝他推迟拜访的努力均告失败。翌日，当齐波拉通知了拉舍尔并征得她的同意以后，拉扎尔叔叔——他皮肤一旦接触空气，和他一看到外界，就会头晕目眩——就去看哈娃大娘。自从斯米埃尔和布拉莎从美国回来，在一两周内把棚屋换成一套单元房，不久又卖掉它并在原地买了他们目前住着的这套更为宽敞的房子后，哈娃大娘就一直住在他们家。

22

斯米埃尔不在家，他为餐馆、汽车收音机和其它项目的进出口业务忙得不亦乐乎，布拉莎把拉扎尔叔叔直接领去看他们的母亲。布拉莎和丈夫把母亲安顿在离客厅最远的房间里，不让别人打扰她。

房间用石灰刷得洁白，干净得无可挑剔。但也许因寒冷不能开窗和适当地通气的缘故，房间里有一股闷味儿和药味儿。拉扎尔的母亲，一个身体干瘦、一动不动、几乎无性别特征的女人只露出脑袋，手藏在大鸭绒被里，整个人几乎全埋在极白的床和被里面了。她的神智已不太清醒，听觉变模糊了，视力衰退得很厉害，只能分辨出白天和黑夜。可是当拉扎尔叔叔走进她的房间时，她稍稍转过白发苍苍的头，问道："是拉扎尔吗？"拉扎尔叔叔答道："是的，

妈妈。”他轻轻地走近她，吻了她那布满皱纹的脸和她的双手，那手上只剩下皮包骨，散发出一阵强烈的衰老的味道，和她嘴里呼出的难闻的热气一样。拉扎尔挨着母亲坐下，跟她说话，再次吻她，他是这样的激动，试图接近她，让她理解自己。可是母亲像石头般麻木不仁，毫无反应。过了片刻，当拉扎尔叔叔恢复平静以后，他站起身，踮着脚尖走出房间。他和布拉莎一道喝过咖啡，然后向她告辞，去看拉舍尔。然而在路上，他决定拐个小弯，经过棚户区。现在该区四周尽是房子，显得格外小、寒伧和荒凉，这是一种临时庇护所，很快就要废弃不用了。斯米埃尔和布拉莎的旧棚屋已经被一个挂毯商占用，他还在里面开了工场。在这房子里，墙壁倒塌了，有些地方的柏油纸撕破了，巴吕什·哈伊姆老爹曾经如此精心照管过的院子现在却无人料理：生锈的鸟笼掉在地上，无花果树和葡萄树已经枯死，到处是野草、一块块纸片、碎布、碎瓦、木头以及许多苔藓。约埃尔和戈尔德曼的父亲的大棚屋也同样乱七八糟的，自从马克斯·斯皮尔曼把它卖掉，和他母亲及当时正怀着他们的长子的妻子一起搬进一栋豪华新楼房里的一套五居屋以后，就有些外国人住进来了。他们的新楼是那些在被城市蚕食的阿拉伯村庄的废墟上盖起的新楼房中的一幢。并非因为马克斯贪图奢华——正相反，他很节俭，知道钱的价值，而是因为他觉得他目前的地位需要某种高标准的生活方式，他意识到住在一个这样的套间里会促进他的商务的发展，此外从中他还正确地看到一笔很好的投资。

他甚至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就把锁厂搬走了，其时

大量的订货使他制锁业的规模扩大了，以色列国的建立令他的生意更加兴旺发达。他主要为军队服务，这使他又一次搬去新的厂址，比原址更为宽敞，他在厂里雇佣了二十多个工人。他那时尚未结婚，与母亲生活在一起。他和母亲因血缘关系而联系在一起，这与他和拉舍尔的关系不同。他对结婚几乎没有需求，他本来可以一辈子独身的，因为他习惯于独立生活，总想把他的全部力量和时间用于实业，用于企业的发展和致富。这种种努力使他在很短时间内就拥有了一些加油站，并引发了他的犯罪行为——把非正当交易中弄来的汽油卖给他的顾客，使加油泵的计量器出差错——为此他不得不到法庭上替自己辩解。可是法庭根本不相信他的把责任推给手下人的任何一个借口，对他和他的两个职员重重地罚了款。然而整件事除了经济损失之外只使他尴尬了很短的时间，因为虽然发生了他本来直到最后一分钟还以为不会发生的诉讼，虽然他被罚了重款，他依旧继续真心实意地自视为一个诚实的人；特别是他的地位和他与商界及一些政府部长的关系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并无受到任何损害，没有人认为他做的事情中有什么是不可原谅的，他们想这至多是一个倒霉的失利，必须立即忘记和不应影响别人可能与他建立的关系。不过虽然有人为马克斯辩护，这可不是拉舍尔和他的岳父即布吕丽娅的父亲采取的态度。他岳父是一家不锈钢罐厂的厂主，马克斯为他包了许多工程，而这些工程在马克斯本人搞加油站生意以前向他提供了和布吕丽娅相遇的机会，当时她年过三十，在别人眼里已经是一个老姑娘了。

马克思和布吕丽娅没有经过太多接触便结了婚，这既不是出于爱情也不是出于理智的婚姻。不久马克斯就作为合伙人参与了他岳父的不锈钢生意，就此抛弃了棚户区。这时那儿已经几乎全部被外国人住满，只有拉舍尔和拉扎尔叔叔曾经住过的老棚屋除外，他们还给这木头房子加多了一间，并加盖了一个平台，新开了一块蔬菜地和种了一些小灌木。目前哈伊姆·莱布和拉扎尔叔叔仍住在这里面。拉扎尔的双脚行走在被冷风搅拌过的湿沙子上，沉浸在无尽的悲哀和遗憾之中。正向窗外探出身子抖落桌布上的灰尘的哈娅太太突然发现了他，在看着他。她没有认出拉扎尔叔叔，猛地转过头去，仿佛他是一个偶然来到此地的外国人。就这样拉扎尔在棚户区转了一圈，然后迈着镇定的步伐离开它去看拉舍尔。拉舍尔本来打算对他表现得得体一些，表现出某种形式的热情，既然他们的分手不是始于昨天。但事实上正相反，她极其冷漠地接待了他：她不跟他握手，不请他坐下，不问他身体如何，从他进门的第一分钟起便只是好奇地想知道他为什么要来并希望看到他离开。不过拉扎尔似乎把他的一部分激动传染给她了，于是她没有作声；拉扎尔的好奇、尊严感再加上激动使他说不出话来，但是拉舍尔并未因此而对他有好感。

拉扎尔叔叔没有感到任何怨恨。虽然他在承担责任和接受命运时只觉得伤心和遗憾，但还是盼望和渴求能跟拉舍尔讲上几句他长年在外时脑子里重复了千百次的话，同样他也热切地准备和孩子们——巴吕什和特齐拉说几句话。然而两个孩子都像他们的母亲那样坐在桌子的另一端，

像看陌生人似地冷冷地打量着他。于是拉扎尔叔叔在这短短的几分钟内明白了甚至连最低微和最弱小的愿望——说真的这其实不过是模糊的惋惜和无奈，可能连这还不如——都已经不复存在。他在这里已经再也没有位置，哪怕只是讲一句表示道歉或惋惜的话。最后他说了几句毫无意义的话，拉舍尔含混地回答了他，然后，当他准备出去时，他向特齐拉伸出手，可是她不动弹，巴吕什则干脆转过身把背对着他，走进了另一个房间。拉扎尔一出门就冒着雨边走边哭，直到胸前和脸全被泪水打湿；他一点儿也不注意水洼、狂风和扑打着脸的雨点，穿街走巷，漫无目的地游荡，直至夜幕降临。拉扎尔回到约埃尔和齐波拉的家时，他发现两人都忧心忡忡，但他们什么也没有问他。齐波拉给他递过一些干衣服，端来一杯茶，然后铺床，拉扎尔一躺下就睡着了。他半夜里醒来，发着高烧，整整烧了一个星期。齐波拉照顾自己的八旬老母，帮助她那些老是不会处理问题和照顾孩子的女儿们和媳妇们，还得满足大部分时间都在其永远凌乱的套间里绝望地打转的妹妹萨拉的要求，同时也照料拉扎尔叔叔直到他痊愈为止。拉扎尔康复后还和他们一起多住了几个星期，并利用这段时间频繁地拜访家里人，甚至去看望戈尔德曼的父亲（可是那一位装作不认识他，不回答他的问好）。拉扎尔叔叔重新去拜访他的旧相识和老朋友，重新认识约埃尔和齐波拉的孩子们——梅尔、伊尔米亚胡、埃丝特、鲁思和阿维泽，除了阿维泽，他们都成家了，拉扎尔还见过他们各人的妻子或丈夫及他们给约埃尔和齐波拉生的孙子孙女。此外拉扎尔还

认识了斯米埃尔和布拉莎的孩子伊拉娜和于里。至于他们的长子阿莫斯，他已经赴美好几年，在那儿学习管理专业。

拉扎尔叔叔没有重操印刷工的旧业，而是在面包店里找了份工，收入相当可观，而且重新工作对他也很有利。他在海边租了一个小套间，一个人住了进去，他的单身生活直到一年以后他决心和耶胡迪·唐菲丝一起生活的时候才结束。耶胡迪·唐菲丝是一个矮小的褐发妇女，很朴实也很规矩，她过着一种平静的单身生活，在中学教了多年英语。两人没有结婚，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结婚理由；但他们像夫妻那样生活在一起，这两位温和而有教养的头脑清醒的成年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和谐。他们避开激情的风暴，不再期待生活发生变化，只倾心于这种宁静的生活。他们确实一直这样平静地 生活直到几年后的一天两人双双在睡眠中猝死。他们习惯在工作之余傍晚时分坐在阳台上聊天或阅读，同时观察街道和民居的院子，那些院子里密密麻麻地栽满了柏树和柽柳，夏天时鸟儿满枝头欢叫。在严寒的冬季，他们自然坐在供暖最好的房间里，或者上电影院或剧院去，或手拉手去散步，似乎这是他们走路的习惯；他们尽量多走路，甚至走得很远，因为这对拉扎尔叔叔的身体很有好处。他们常去看望约埃尔和齐波拉，因为拉扎尔叔叔和他们及孩子们在一起时倍感身心愉悦，而孩子们也没有一天不去看他们。每周一两次，他们利用散步去向拉扎尔的母亲哈娃大娘问安。尽管医生们很怀疑她仍旧活着，经常预言她将死去，她却依然像植物人那样活着，以致于大家都以为她已经战胜了死亡，或者死亡已经将她遗忘，她

将就这样傲视满身的病痛和命运的沉浮永远地活下去。她的命运在大战结束约三年后起伏特别大，此时她已经日益陷入无知觉状态。斯米埃尔在投资失败、投机失利和借高利贷——其中有一笔是欠他兄弟的——以后负债累累，于是他在秘密地卖掉所有值钱的衣物和珠宝之后即与布拉莎及两个孩子（于里当时尚未出世）逃往美国。他于清晨三点钟、离飞机起飞只有四小时的时候才将他们的离去告诉戈尔德曼的父亲。戈尔德曼的父亲把哈娃大娘及她的两个铜烛盘抬出来，但没有搬她的床，因为床太大了，然后锁上斯米埃尔和布拉莎的房子的门。房子在斯米埃尔的弟弟阿哈隆强行搬空大部分家具和杂物后租给了阿弗拉阿姆·谢奇泰。可是一年还未过去斯蒂法娜就又病倒了——更不必提他们的套间里的拥挤，于是他们不得不把哈娃大娘暂时安置到约埃尔和齐波拉的家,她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最后为孩子们、媳妇们、孙儿女们——还没算上她本人的母亲和妹妹萨拉——忙得团团转的齐波拉再也无法独自承担所有的重负，他们又把哈娃大娘和她的两个烛盘送回戈尔德曼的父亲和斯蒂法娜家。大娘没有在那儿呆很久，因为总是以冷淡的礼貌对待她的斯蒂法娜的病永远不能痊愈，她既无力气又无耐心去照管厨房的俄式荞麦粥，而这是哈娃大娘在家就必须做的。因此，当斯米埃尔和布拉莎突然从美国回来、暂时又住进他们那依旧空着的木板屋里的两周以后，他们再次把哈娃大娘和两个蜡烛盘接了回来，安置在她曾经住过的房间里，还睡那旧床。如果后来斯米埃尔没卖掉这旧房买套间,后来又买了另外一个更大的套间，

带着哈娃大娘一起搬进去的话，她本来可以就此结束这种动荡的生活了。哈娃大娘在戈尔德曼的父亲死后还活了几年，直到她也停止呼吸的那一天，就像一只勉强能听到其机械转动声的手表不知不觉间突然停了那样。不过在她渐渐死亡的整个漫长过程中，她自始至终都受到家人的爱抚，他们常来看望她，而且每年两次，在犹太教逾越节和巴吕什·哈伊姆老爹忌日那一天，全家都在她的床周围相聚好一会儿。除了偶然的相遇，只有在这些场合才能看到戈尔德曼的父亲和拉扎尔叔叔。他们无视别人为使他们和解而作出的种种努力，相互之间甚至不讲一句话，不看一眼。

拉扎尔叔叔很幸福地重新感受到家庭成员互相联系的温暖。虽然母亲已经不再可能接受任何人给予的快乐，他还是想使母亲快活，于是他在去看约埃尔和齐波拉的同时也频频探望母亲，还去看斯蒂法娜。只是这位嫂嫂甚至在丈夫去世后还是冷淡地接待他，而戈尔德曼却正相反，他向拉扎尔叔叔表现出由衷的热爱。每次叔叔来访时，他在坐下来照例地与他下一盘棋之前总不忘记给他端上一杯浇了一滴白兰地酒的黑咖啡，他用他们家在战争期间弄来的一套无比精致的捷克斯洛伐克茶具中仅存的两只杯子中的一只来盛咖啡，霎时茶具的精美使家庭生活焕发出光彩，而这个家已经很长时间以来陷入了一片混乱、悲伤、愤怒和绝望。这是由紧张的氛围和深深的苦恼引起的，是戈尔德曼的父亲的全部能力，和他投入到工作中的，已经耗尽了其力量和精神的种种努力所不能克服的；此外这也是通货膨胀、他的诚实和自尊心所导致的。

过去戈尔德曼和姐姐纳奥米和父母住在同一间房里，在许多堆在一个沉重的黑餐具橱前面的绿色家具的中间，这些家具每天晚上都有待搬开才能挪出一点位置给戈尔德曼和纳奥米放床，戈尔德曼的父亲和他母亲睡在一张沙发床上。而斯蒂法娜的父母在世时一直住另一间房，那里面乱七八糟地摆着大部分从波兰带回来的旧桃花心木家具以及一些枕头、垫子和其它家居物品。至于他们的三房客（次承租人），那是周期性更换的，这类人住在小房间里，而小房间在战后只有一段时间当过纳奥米的卧室。战争还在激烈进行的时候，戈尔德曼的父亲的远房亲戚达维·科斯托莫尔斯基从“安代的部队”里开小差来到他们家，在这之前他已把军装和证件扔在沙滩上。他睡在一张他们每年都要在走廊里重新支起的折叠床上。稍后一些这张床就归穆瓦什·特泽莱马耶使用。穆瓦什·特泽莱马耶是拉索阿幸存的难民，他来到以色列时没有家庭，也没有认识的人。戈尔德曼的父亲收留了他，给他衣服和钱，帮助他找到工作，甚至最后找到妻子。穆瓦什大为感激，他永远不忘戈尔德曼的父亲和斯蒂法娜的盛情。达维·科斯托莫尔斯基的情况也一样。他在独立战争期间曾当过司机，战争结束后临时寄住在一家小旅馆，继续和德布通太太一起生活。德布通太太是位来自地中海畔犹太区的美丽而高雅的女人。她有一个女儿，女儿既善缝衣又善烹调，但是她太腼腆，太持重，不敢去戈尔德曼父亲和斯蒂法娜的家，甚至在戈尔德曼的父亲死去之后仍然如此，尽管她也秘而不宣地对戈尔德曼的父亲和斯蒂法娜充满感激，而且非常尊敬。是戈

尔德曼的父亲给家里背来工地上的木柴来烧热洗澡水，是他剪下旧轮胎来替家人的鞋上橡胶底，就这样他修补了家里的全部鞋子；是他修理炉子、电灯、堵塞的管道、墙上的裂缝及家里一切可能出故障的东西。但家里几乎总是笼罩着一种忧伤和压抑着的愤怒的气氛，甚至连戈尔德曼的父亲的突如其来的好脾气——当他身上裹着床单，头上顶着垫子在房间里走，一边敲着锅盖的时候，或者当他做着鬼脸和声嘶力竭地唱歌的时候——也不能驱散这种气氛。而且短暂的好脾气远不能使他快乐，而只能使他局促不安甚至心生恐惧——且不说对他这种暴露癖感到厌恶的斯蒂法娜——因为在戈尔德曼的父亲的或好或坏的行为里，有一种试图发泄出来的潜伏的暴力和某种专制。可能只有他在纳奥米和戈尔德曼还是孩子时变的三套戏法不在此列，这些戏法使他心中充满了快乐和愉悦。戈尔德曼的父亲会变的三套戏法是：吞刀叉、从嘴里吐出鸡蛋、一拳打掉桌面上的一只杯子。

捷克斯洛伐克茶具是一位在他家里包饭的三房客赠送的礼物。这是一位非常彬彬有礼、英俊而强壮的小伙子，是当特齐格人。他总是使房间保持干净整洁并按时交房租。他每天只呆在房间里几个小时，而且甚至当他在的时候，人们也会以为他房间里没有人，因为他的闲暇时间都用来睡觉和看报纸，唯一有点影响房子里其他人的是他的烟斗和烟斗散发出的呛人的烟味儿。他在港口工作。他在离开这住处的前一天晚上把包在硬纸板盒里的茶具作为分别的礼物送给戈尔德曼的父亲一家。他把茶具递给戈尔德曼的父

亲，并说道："这是送给你们的。"刚吃过饭剔着牙读报纸的戈尔德曼的父亲说："不用了，不必这样！"然后还是把盒接过来了。他有点拘束，也不同意这种作法，因为他不喜欢礼物；不过同时他对所有关心的表示还是感到很高兴和很感激的。此时仍站在门口的三房客说："一套茶具而已。"戈尔德曼的父亲终于把盒放在桌面上，再次表示说："不必这样。您花了钱，这实在是太破费了。"三房客说："我在你们家过得很好。"斯蒂法娜插嘴说："您请坐，您请坐。"并递给他一张板凳。这时戈尔德曼的父亲还有点迟疑，他慢慢地打开盒子，充满敬意和畏惧地取出第一只埋在茶托堆里的杯子，茶壶和糖罐则裹在一层白棉花里。他把杯子端到大家眼前，在灯光下仔细地看，用一只内行的手指慢慢地敲着上面的瓷，让它发出音色如小铃般的丁当声，接着他把杯子翻转过来看杯底的字，将"捷克斯洛伐克制造"的字样读出来，然后把杯子放在斯蒂法娜手里。斯蒂法娜有点犹豫不决，但她还是不由自主地说："很美，确实很美。"同时赶紧小心翼翼地将它放回桌上，仿佛害怕它在自己手里破碎似的。这时她母亲却还在用粗胖的手指抚摸桌上那只杯子的边，同时用意第绪语反复地说："捷克的瓷比德国的瓷好。"她一边说一边轻轻地摇晃着脑袋，向三房客微笑。房客呆在厨房门口，不敢动弹一步，不停地玩弄着手指上戴着的沉重的蛇形银戒指。戈尔德曼的父亲仍在教训他，对他说他本不应该花这么多钱。三房客面带有点漫不经心的笑容回答他说，茶具并非昂贵到这种程度，而且对于他们，它是会派上用场的。已把茶壶放在炉子上的

斯蒂法娜还是满口感谢话，一面承认说他们确实没有这样漂亮的茶具招待客人。这套捷克茶具实在是美：它用几乎透明的细白瓷制成，上面用中国式的浅色笔触画出色彩纷呈的优美画面，画面上是挺拔的高山和中国式村庄的景色：小溪潺潺流过，竹子迎风摇曳，两位身穿中式裙服的妇女伤感地眺望着远山或天际。当戈尔德曼的父亲从纸板盒里取出所有的茶具让斯蒂法娜去洗净、擦干之后，他们就把茶具庄严地拿到大房间里，然后戈尔德曼的父亲细心地，几乎是虔诚地把它们摆到黑餐具橱里的一层搁板上，接着关上了绿色的玻璃门。

23

就这样从这天晚上起，茶具就成了家里的骄傲和欢乐以及秘密希望的象征。与此同时它把全家人的许多恐惧都凝聚在玻璃门的后面。它在等待着从寒冷阴暗的餐具橱里面逃出来服务的特别的机会。可是过了二十五年，戈尔德曼的父亲还没有找到这样的机会，除了那次他们在家里接待美丽的杰米玛·切尔诺弗的父母以外。茶具在没有被使用的情况下竟也渐渐破碎了。斯蒂法娜从第一刻起就害怕这套茶具，因为她非常清楚等待着它的命运，她用自己唯一的肩膀担起了随茶具的日渐破损而来的痛苦、耻辱和丑闻的重负。这个过程始于耶奇埃尔·勒旺科普夫和肖莎

娜·勒旺科普夫在当特齐格的小伙子走后成为他们家的寄膳宿者之时，几乎延续到戈尔德曼的父亲去世的时候。那时在整套精美豪华的茶具中，仅存三个茶托和两个杯子，其中的一个杯子，即唯一还有一只杯耳的那一个，就是戈尔德曼在和拉扎尔叔叔对弈前专门拿来替他盛咖啡的。

拉扎尔叔叔的棋下得很好，几乎总是赢，他是在雅库提学会下棋的。在那儿，流放犯们用木头雕琢的“棋子”来娱乐度日。不过他也学会了其它许多有用的、假如他没被流放就永远无法学会的东西：例如讲俄语、打猎、甚至在水面覆盖着一层厚冰时钓鱼、生吃鱼、在狂风中不划火柴就能点着火、忍受严寒、驾驶狗拉的雪橇、在辽阔无边的冻原上靠星星确定方向，此外他还掌握了关于动植物的生命和关于人的其它许多重要的秘密，这对于他在西班牙作战时已经学到的所有知识是一个补充。他的棋艺得到改进是因为他具有顽强的意志、高度的注意力和有条不紊的思维方式。拉扎尔叔叔自嘲地说他有条理的思维方式之所以能够形成，是因为他对现实的感觉已有点迟钝，和他在雅库提开始患上了耳聋。事实是他有一只耳朵除了一种没完没了的长久的耳鸣之外再也听不到其它任何声音，这使他在和戈尔德曼讨论问题时不得不稍稍提高点音量。

他们的讨论往往是很短的，断断续续的，多半分割成两部分，或者当他们下完棋的时候才谈。然后拉扎尔叔叔起身进客厅坐下，斯蒂法娜不声不响地陪着他坐，她在嘴唇上抹了一层淡淡的紫红色唇膏。拉扎尔一直坐到用一声“晚安”和“再见”向她告别，而她却装作什么也没有听见

并用俄语回答“晚安”，“再见”正是在这些零零碎碎的谈话中拉扎尔叔叔表达了他对生命和对人们的行动的看法，或提及在西班牙和雅库提度过的日子。他的思想观点和生活经验是在那儿形成的，这些导致他对人们可以从有关道德和哲学的书中获益这一点持一种怀疑主义的态度。但是他仍然无限崇敬上述书籍，非常乐意和热情高涨地去阅读它们，永远在寻求那些困扰着他的问题的答案。他对与社会有关的理论表现出同样的怀疑，不过他从未否认过其相对重要性，因为它们探讨一些范围狭窄的和具体的问题。他对浅薄和有害的乐观主义有如此清醒的认识，以致于他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相信人的本性是可以改变的，可以变得更好和更合理，除非付出极其大量的持续的努力，经受艰辛的和各种各样的考验，接受人格中的“阴暗面”——它虽然丑陋但是合法。然而他在没有无视困难和否认怀疑的情况下，还是努力去相信世界是可以改造的，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可以提高，或者至少他相信有必要去尝试一下，但并非通过共产主义的道路，因他长期以来已对此失去幻想；也不是通过无政府主义的道路，尽管他继续认为无政府主义是关于社会的唯一确切的理论。目前他已知道无政府主义无任何实现的可能性，因为它建立在对人类本质的极端乐观的看法上，而无考虑到有血有肉的实实在在的人。但是对这一点的证实并未使他对自己曾经为这无法实现的理想而经历过的那一段生活，对他曾为该信仰而遭受过的多年的痛苦和失望，而感到后悔。恰恰相反，虽然他的经历充满艰辛、教训颇多，他依旧满怀热情和自豪地讲起导致他

牺牲了几乎半辈子生命的天真幼稚和不谨慎的傲慢。当拉扎尔有机会半嘲讽半严肃地指出归根结底每个人都有一种他无法逃避的生活和命运的时候，对这句话吃了一惊的戈尔德曼微笑着说：“那可以自杀嘛。”拉扎尔反驳道：“这也一种命运。”戈尔德曼补充道：“在这种情况下，也完全可以说，一切都是命运。”拉扎尔叔叔表示同意。但戈尔德曼却指出这很不严肃，这并非一种观点而是一种信仰，某种只能事后证明的东西。拉扎尔的脸上浮现出一个谜一般的微笑，但转瞬即逝，他开始把棋子摆在棋盘上。戈尔德曼先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拉扎尔叔叔他是否从未想过自杀，拉扎尔承认他曾想过一次，但又马上改口，微笑着说：“可是我并没有自杀。”他又补充道：“几乎所有的人都有过一次自杀的念头。”同样开始摆棋子的戈尔德曼问叔叔是否反对自杀，拉扎尔回答说：“是的，但这问题提得不好。”当戈尔德曼问为什么的时候，拉扎尔叔叔没有回答，他把“王”这只棋子向前移了两格。戈尔德曼正等着他的回答，他也把他的“王”向前挪了两格，一边说他同意这种看法，即自杀是生命提供的自由选择的最充分和最彻底的表现，是放弃生命和选择与生命相反的形式即死亡的自由。死亡也是留给人们的唯一选择，因为人完全受制于死亡，只能通过死亡的力量来摆脱死亡本身。拉扎尔叔叔注意地听完戈尔德曼的话以后说：“这使我想起了多斯托瓦弗斯基那里的那位工程师，你知道的，我忘了他的名字。”戈尔德曼答道：“我知道，不过我也忘了。”他不再看正在移动“马”的拉扎尔，同时也把自己那只“后”往前挪了一格，又再下

了几手之后，他又说，人如果不能信上帝或信永生，那么自杀就至少在理论上成为一种无法避免的需要了。拉扎尔叔叔用灰蓝色的眼睛看着戈尔德曼，对他说，他表达了一个已入教门的人的观点，或者是一个因看到生活中的痛苦、非正义和混乱而激起了一种深刻的宗教需求的人的观点，但这不是他拉扎尔的情况，他不觉得自己有这样一种需要。拉扎尔叔叔接着说，虽然从根本上讲，纵观他的一生和他所经历的坎坷本该把他引向一种绝对的虚无主义，或者导致下列结论：也许确有某种叫做“上帝”、“神意”，或通过迂回曲折途径统治世界的“至高无上的力量”的东西，但他仍然是并永远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同时，直截了当地讲，他没有自杀的意图，他并不感觉到这种需要或理论上的必要性，也不觉得必须通过死亡的力量来摆脱死亡的桎梏，以突破生命的临界线和达到最终的自由：他将他的生和死都作为生命的一部分来接受。在拉扎尔叔叔讲完这番话以后的短时间的沉默中，戈尔德曼拿了他的“马”去威胁拉扎尔叔叔的“象”，一边仿佛自言自语地说，我们暗暗地害怕的事总会发生的。然后他看了拉扎尔叔叔一眼，又低声补充道，当这一切终于发生的时候，总是比人们原来想象的要严酷得多，艰难得多。拉扎尔叔叔避开戈尔德曼的目光，似乎突然表现出不耐烦，并说道：“我不知道，不过我觉得要经历过许多事情才能说这些话。”

24

几天以后，拉扎尔叔叔在放下晚报时说人们有时会觉得报纸是魔鬼编的。过了一会儿，他微笑着喝了一口戈尔德曼为他冲好的咖啡，接着说如果某些人在面对生存的荒谬、痛苦和非正义，特别是在面对死亡的时候，需要称为“上帝”的这个神秘的存在，这是一点儿也不令人惊讶的，换句话讲，可以说上帝主管痛苦和死亡，而且因为痛苦和死亡是永恒的，上帝就更加是永恒的了。而拉扎尔叔叔本来是可以提出相反的命题的，指出由于存在着痛苦和人注定要死去，所以上帝的存在这个问题就不重要了。戈尔德曼等拉扎尔叔叔讲完后问他是否怕死，拉扎尔一下子困惑起来，他说：“和所有的人一样。”但他又赶紧补充道：“我有时候想这个问题。不过我毕竟不那么年轻了，可能过去想得更多一些。”坐在平日总坐的位子上的戈尔德曼说是有可能战胜对死亡的恐惧的。拉扎尔叔叔问他如何战胜，戈尔德曼说可以通过准备迎接死亡，要它、让它在脑海里扎根来成功地战胜对它的恐惧。讲到这里，戈尔德曼又提起蒙泰涅[1] 和他的“死亡实践”，这种实践使他把睡眠、卧床或昏迷的种种状态都视为“小死亡”的训练，进而成功和

---

[1] 米歇尔·德·蒙泰涅(1533—1592)，16 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思想家和散文作家，著有三卷《随笔集》，研究过死亡和自杀等问题。

毫不畏惧地准备正视“大死亡”。戈尔德曼还同意蒙泰涅的以下观点，即哲学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准备死亡，如果哲学实现了该目标，那它就能教我们接受死亡的现实，不害怕走向它，而可能会像苏格拉底（戈尔德曼在此提到他）教导的那样对它感到欣喜。戈尔德曼认为真正的哲学家只向往和训练一种东西，这就是正在死亡和已经死去，所以他们远不像其他人那样怕死。

拉扎尔叔叔先是笑了起来，然后同意地说蒙泰涅的话很有意思，不过他认为——他讲这话时变得严肃起来——实际上是不可能准备死亡的；而尤其困扰他自己的则是不可避免的分解过程，死亡是该过程的绝对和最终的表现。戈尔德曼说为了活到一千多岁他什么代价都肯付出，可是他很担心他的愿望不能实现。他在拉扎尔叔叔友好的微笑面前半严肃半开玩笑地说，他相信可以通过合适的饮食制度和体育锻炼来延年益寿，合适的饮食可以保持身体的血液和组织的干净及修长的体型。戈尔德曼向拉扎尔谈到他在一本美国航空杂志上发现的和他即将开始的一种新食谱，他还告诉拉扎尔，无论夏天还是冬天，每天早上他都去洗海水浴和用“补尔活”健身器材进行锻炼。拉扎尔喝完咖啡，问戈尔德曼这究竟是什么东西，戈尔德曼走进他的房间，把“补尔活”拿出来，还拿来一页旧报纸，上面刊有一则关于该器材的性能、优点和用途的广告。这器材的外表引得拉扎尔叔叔的圆脸上再次浮现出微笑，而他一般是几乎不笑的。戈尔德曼将报纸递给他，还是用半嘲弄的语气请他读那则广告。这时本来正摸着健身器的拉扎尔叔叔

一只手拿过报纸，另一只手戴上眼镜，开始低声读那则覆盖了将近三分之一版面的广告。

在这页报纸的左上角，有一个拿着“补尔活”健身器材的肌肉极其发达的男人的照片，底下写着：让·泰克西埃（法朗士先生）现介绍一种很容易做的只须七秒钟的健身训练，这七秒钟便使这种训练赢得了它的美名。在报纸的右下角，有另一个肌肉同样发达的男人的相片，他满脸微笑，旁边是说明：“让·佩尔隆谨向你们示范他如何借助‘补尔活’健身器材在几周内使二头肌增加了五厘米，腹肌增加了十厘米，大腿围增加了三厘米。”这则广告的标题是“最近您什么时候体形健美？”后面紧跟着置于两张照片之间的广告全文：

> 即使您不想长出很多肌肉，您也得保持良好的体形。看见某些人在未到衰老年龄时就突然衰老，这是十分令人遗憾和痛心的。不过现在多亏有了新的训练方法，保持良好的体形已成为一件可以企及的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容易办到的事情。在比您刮胡子所需要的还要少的时间内，“补尔活”健身器材将使您的身体成为其他男人妒忌不已和年轻女人们欣赏备至的对象，并能诱惑那些女人们。您每天只须投入五分钟就会把您那过瘦的小胳膊改造成肌肉发达的强壮的胳膊，把您干瘪的胸膛变成挺起的雄浑的胸膛，把您可怜的肚子变成结实的肚子，把您的垂肩改造成宽阔坚实的肩膀，把您火柴般的瘦腿变成两条既美观又结实

的“支柱”。现在让·泰克西埃（法朗士先生，体育高级顾问）告诉您该怎么做：

问：何谓“体形健美”？

答：对身体健康的人而言，健美训练属于体育范畴。也就是说，是指对肌肉进行定期和有效的锻炼。目标：使肌肉结实而柔软，让其保持神圣和美。

问：体形有缺陷表现在什么地方？

答：这要看年龄。如果您还是少年或您刚满二十岁，锻炼的目的就还得是长身体。如果您年纪大一些，那么最初的症兆一般是身体内部脂肪的积聚、乏力、没有精力，四十岁以后，身体就有松弛和日渐衰弱的趋向。

问：您想到的是身材吗？

答：不是。人人都可以通过每天进行一种锻炼使臀围减少几厘米。然而即使您成功了，您也会发现腰部周围的脂肪“带”。

问：能通过体育锻炼保持健美的体形吗？

答：绝对没问题，只要您继续锻炼一段时间，每周三四次，每次一小时。

问：就这些？没有其它更容易的方法吗？

答：当然有，有更容易更方便，并且快捷得多的方法。有一种特别富有成效的方法。

问：什么方法？

答：就是“补尔活”健身训练方法。它以经过实践检验的同度量变换技术为基础：比任何体育运动或

在健身房使用的任何训练方法都要快三倍见效。我认为这是健身领域的最先进的训练方法。

问：它要做多长时间？

答：它的入门训练大纲由十七个训练组成，每天只用七十秒钟，最先进的训练技术大约用五分钟。

问：多长时间能见效？

答：可以说从第一天开始。“补尔活”训练法配备了一个计算器，它向您自动显示您的力量的日增长量，一般以每周增长4%的速度。

问：我得等多长时间才能明显地看到这些成绩？

答：十天到三周。这有赖于您的勤勉程度和效率的高低。

问：勤勉、效率……是否要流很多汗？

答：不用。同度量变换技术的全部优点在于您只训练七秒钟，这样您就避免了过度训练肌肉，这和往往弊大于利的各种“耗力训练”不同。“补尔活”训练法与您的能力相适应，而且由于您将感到一天比一天精神焕发，您就会更加觉得这些训练容易。

一直微笑着读广告的拉扎尔叔叔对戈尔德曼说，这里讲的根本不是延长生命而不过是锻炼身体使其强壮。同样也在微笑地看拉扎尔叔叔读广告的戈尔德曼说，保持身体健康并使其强壮，这本身就是不容忽视的事情，而且这直接或间接地有助于延长生命，这就是其重要性所在。

拉扎尔叔叔又看了看让·泰克西埃即体育顾问法朗士

先生的照片，然后一边脱下眼镜一边问："这能把生命延长多少年?"接着他又补充说："肯定不会延长一千年。"他嘴角上挂着的腼腆的微笑使他脸上继续容光焕发了一会儿，然后就凝固、收缩了。立即排除了延长一千年生命这种可能性的戈尔德曼玩弄着"补尔活"健身器材接上话头："我听说过一些'减肥丸'"。当他注视拉扎尔叔叔的脸时，这张脸与他父亲的脸的截然不同一直都在使他深受震动，尽管拉扎尔叔叔的脸总是近乎执拗地使他联想起父亲的脸。他突然又强烈地想向叔叔再次打听在他和自己的父亲之间产生的、并阻止他们和解的怨恨究竟从何而来。但是他什么也没有问，因为他已经模模糊糊地知道了原因，而这原因在他脑海里又和父亲杀害了"黑夜"的原因奇怪地转弯抹角地牵在一起。戈尔德曼继续玩弄着健身器，拉扎尔叔叔则在翻阅报纸。戈尔德曼深为自己那位冷酷而难相处的父亲而悲伤，尽管他从未爱过父亲，认为父亲只有一丁点理由来为其摧毁性的诚实自豪。他对父亲只有极少美好的回忆，此时甚至很难再回想起来，再乐意去追忆，可能只有一个例外:有时闪现在他脑际的一个对童年时代的回忆。这是对一个阳光灿烂的、父亲把他带到海边的安息日的回忆。那天，天空异常地蓝，金色的太阳普照大地，透明的空气里洋溢着节日的欢乐。父亲和他很早就出了家门，他们走在静悄悄的大街上，数以千计的小鸟在九重葛、柏树和无花果树的枝头欢快地唱着歌。他父亲用粗大的手牵着他的手，带他穿过安息日深沉寂静中的天穹下那一望无际的白色沙滩，这沙滩使人产生了躺在上面、满地打滚和陶

醉一番的欲望：就这样一动不动地躺上好几个小时，任轻风拂面，任太阳抚摸、任时光流逝。戈尔德曼一边走，一边发现了大海的所有的美——蔚蓝、憩潮、无边无际。他和父亲来到海滩上，脱下衣服，铺好浴巾（斯蒂法娜从来不到海滨来）。然后他们坐在平静的、几乎没有浪涛声的海边。他父亲当时的脾气很好，用晒成古铜色的手指着与大海绝妙地融成一体的天际说，如果横穿大海的话，在海的那一边有一些美丽的国家，如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英国和荷兰。然后他们一步一步地稍稍走进了海里。他父亲穿着黑色的泳装，两腿显得分外白皙。当他走到齐腰深的水里时，他抓住儿子的手，紧紧握住，告诫他不要走开。父亲当时很紧张，戈尔德曼通过父亲对自己的身体和生命的担忧，预感到他在平静宽阔的大海面前所怀有的苦恼和极端的恐惧，大海具有的隐晦的力量随时会掀起滔天大浪和摧毁一切。父子俩儿在海里一动不动地站着，直到父亲说："够了，上岸擦擦身子吧。"他们转身回去上岸，戈尔德曼的父亲突然说："真遗憾你母亲没有和我们一起到海边来。"他们上了岸跑到仍未晒热的沙滩上。他们回到海滩上时碰到了穆瓦什·特齐梅、他妻子以及他们的两个年幼的孩子。戈尔德曼的父亲开始和穆瓦什讨论政治，而他妻子则闭上眼睛躺在沙子上，在太阳底下伸展她那庞大的身躯，全然不理会开始在很靠海水的沙滩上挖洞的孩子们。过了一会儿——确实是在这个安息日——卡曼斯卡娅穿一袭夏季白裙和"黑夜"一起出现在海滨，然后远离了他们的视线。穆瓦什·特齐梅大声嚷道："看看她，多么出色的喜剧演员

呀！”戈尔德曼的父亲说：“我不愿意看到这个婊子！”戈尔德曼像遭霹似地被“婊子”这个词猛烈地震撼了，他一直站在父亲身旁，却避而不看他，然后他们又和穆瓦什一道再次回到海里，在靠岸的水里呆了很久很久，互相泼着水。此时当戈尔德曼——他一直盯着拉扎尔叔叔看——想走开时，他父亲制止了。戈尔德曼重拾话题：“据说这些减肥丸会创造奇迹。”这时拉扎尔叔叔把报纸还给他并再次说，他日思夜想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身体毁灭和腐烂的可怕过程；他认为生命自身的本质和它的悲哀就体现在这过程中，因为很难接受以下事实：曾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的物质竟会解体和消失，会无可挽回地逝去，就像宇宙空间中迅速分解、然后永远消失在天际周围的无穷无尽的黑暗之中的星系那样。正玩弄着桌面上剩下的一块面包屑的拉扎尔突然问戈尔德曼他姐姐纳奥米死时多大年纪，戈尔德曼告诉他“二十五岁左右”。拉扎尔又问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但戈尔德曼已经再也想不起确切日期了，他答道：“她是在夏天的一次车祸中死去的。”拉扎尔显然还想问另一个问题，但他放弃了，于是两人重又在棋盘上摆棋子，你一步我一步地杀了两盘，直至拉扎尔叔叔拿着他的挂包站起来，迅速地向客厅里的斯蒂法娜告别，因为这天是星期五，他想按照惯例去探望母亲。由于戈尔德曼提议送他，叔侄俩儿便一起走了一段路，一直走到斯米埃尔和布拉莎家里。他们已经等了一会儿拉扎尔，于是很高兴地接待了他。

拉扎尔把书包搁在门厅后径直走进房间，哈娃大娘木乃伊般躺在鸭绒被里，拉扎尔在她身边小坐了一会儿，然

后一声不吭地出了房间进入厨房。在厨房里，布拉莎问候了他和耶胡迪·唐菲丝，并问他是否吃点什么。拉扎尔谢绝了邀请，说耶胡迪在等他，可是布拉莎已经在他面前摆了一碟切碎的鹅肝、一片嵌肉馅鲤鱼，一罐家制辣根菜、几片红皮白萝卜和新鲜的奶油蛋糕、一杯恭菜浓汤，然后她又给他端来一杯茶和一片她特意为玩“拉米”扑克牌游戏的这天晚上做的蛋糕，作为拉扎尔的餐后小吃。最近长了许多肚皮和腰带扣全部掉光了的斯米埃尔坐在拉扎尔对面，喝着少量的白兰地酒，被尼古丁熏黄的手指玩弄着一把金色的门匙。他向正在吃东西的拉扎尔谈起他的小汽车出租公司，和他的成立一个在国内运送小型旅游团的航空公司以及向一家纪念品和古玩连锁商店投资的计划。他住的这间布置豪华但毫无情趣的房子一尘不染，干净得发亮，厨房里的炉子上已经在热着一大锅犹太教安息日的午餐——荤杂烩。通常，伊拉娜和她的已经当上律师的丈夫及三个孩子常常在这个日子里回来团聚，于里和妻子女儿有时也回来，甚至斯米埃尔的父亲生前也回来，此外前来的还有些近亲、朋友及也住在这个城市里的同乡。但是阿哈隆和他的妻子一次也没有被邀请过，并非由于两兄弟争夺肉店的事令布拉莎怒火中烧，而是因为她对阿哈隆为讨债而狠揍了斯米埃尔一顿的事至今耿耿于怀，所以即使斯米埃尔请她原谅阿哈隆，她还是不准备这样做。每次，宾客们都围坐在客厅的大餐桌旁，布拉莎从一个贵重的大瓷盆里给大家盛佳肴。午餐十分丰盛，人们大饱口福。尽管布拉莎知道吃得过多于身体无益，但还是一个劲儿地劝吃劝

喝。客人们吃下了这样多的食物，简直连站起来离开桌子，慢慢挪回家去都很困难。而斯米埃尔患高血压，本该遵照医嘱停止抽烟和暴食并减肥的，他是布拉莎徒劳地试图限制其食量的唯一的人。他往往在最后喝干一瓶矿泉水后便倒在长沙发上呼呼大睡，这时，甚至布拉莎还没来得及收拾桌子，客人们也往往还没有走光。

拉扎尔和斯米埃尔撤进去喝茶的客厅已经布置停当，准备接待二十来个玩“拉米”扑克牌的朋友。他们常到这儿来，其中也包括戈尔德曼的父亲，他去世前一直是常客，此外一段时间里还有穆瓦什·特泽莱马耶。这些人赌得很小，只有斯米埃尔例外，他往往与众不同地倾向于下更大的赌注，有时约纳·科特钦斯基的那位萨拉也仿效他。除了戈尔德曼的父亲有时挑起一些无用和恼人的争论，从而造成紧张气氛以外，打牌一般都在穿插着欢笑和闲聊的愉快的氛围中进行。纸牌游戏在凌晨一两点结束，这时大家便算帐，付钱，伸着懒腰站起来离开牌桌，向主人告辞后心满意足地回家去。这时，大半个晚上都在招呼牌友们吃喝的布拉莎把剩下的糕点、饼干和水果从桌上撤走，倒清烟灰缸，接着去洗餐具，而且是像往常那样，尽管精疲力尽和时辰已晚，仍然心甘情愿地干活。与此同时，斯米埃尔把扑克牌一一收起，一盒盒装好放进大橱里。

拉扎尔叔叔还问起目前在美国的阿莫斯的近况。斯米埃尔告诉他他们两天前收到儿子的一封信，儿子在信上谈到他在被雇佣的公司所取得的成就和他准备买房的计划，但对于是否回以色列一事再也不置一词，事情已经很清楚，

他将和妻儿留在美国。这使斯米埃尔夫妇尤其是布拉莎非常难过。另外，自从几周前这对夫妇感觉到斯蒂法娜并不希望他们去看她和戈尔德曼时，就不再去她家了。不过布拉莎还是向拉扎尔打听斯蒂法娜和戈尔德曼的身体状况。与此同时戈尔德曼正沿着阿伦比街很慢很慢地往上走，街上几乎见不到一辆车、一个人，所有的商店都关了门；在这黄昏时分，整条街沉浸在犹太教安息日前夕的巨大宁静之中。于是，戈尔德曼在这种既温馨又伤感的昏暗中特别感觉到了礼拜五的魅力和他对这座看着他呱呱坠地和长大成人的城市的热爱，不过他只是在极少的以最纯洁的形式出现的圣宠时刻才会体验到这种热爱的心情。他慢慢溜达着，双手抄在背后，目光不时地被街上的橱窗吸引过去。当他走到罗兹查尔德大道时，他停下几分钟，随心所欲地观赏着鸟儿落满枝头的树木，和身着节日盛装、腋下夹着祈祷书急急忙忙走向犹太教堂的人们。他强迫自己离开这里往回走。他走到巴克莱斯银行时恍惚看见他姐姐纳奥米向他走来。他从那人的身材及走路的姿式认出是姐姐，他激动万分，看着她身背背囊从他面前经过，俨然是个美国游客。当她与他擦肩而过的时候，他朝她走的方向转过头去，长时间地注视着她直至她消失。然后他继续沿街往下走，这时夜幕已经降临在街上。姐姐出事是在七月份，七月十二日，不过她的死讯是三天以后才通知戈尔德曼一家的，因为她身上没有证件，很难辨明她的身份。通知到时戈尔德曼的父亲刚下班不到一小时，正光着脚心情恶劣地吃着斯蒂法娜给他端来的午饭。姐姐出事是在她从埃及的亚历山

大回来几年以后。对于亚历山大，戈尔德曼——他目前转入金乔治街——只能想象出它的清真寺、棕榈树以及融为一体的东方风格和殖民地风格的建筑，且一切都带着它特有的香料、香水和汗水的味道。他头也不回地从过去曾属于阿弗拉阿姆·谢奇泰的小店前面走过，接着又经过一家小咖啡馆，斯米埃尔和阿哈隆曾在它旁边大打出手，阿哈隆像一个狂怒的疯子似地扑向他哥哥——当时还不到中午，街上人头躜动——并极其粗野地揍他，致使甚至没有力图自卫的斯米埃尔的衬衫被撕破了，嘴巴鼻子鲜血直流。要三个人才把阿哈隆拉开并阻止了他喊叫“还我的钱来！小偷！寄生虫！你尽管等着，我不会亏待你的，我要教训你！”然后他拢腿就跑，留下满脸鲜血。斯米埃尔，他不知所措，因为他所蒙受的耻辱远甚于疼痛。

戈尔德曼转到拉希街，然后从那儿走进各种各样的小街窄巷，以散步者平静的脚步一一穿过去，享受着宁静和他所看到的一切。现在，他在家中突然出现的不自然的沉默中想起了纳奥米。这沉默也笼罩着许多进进出出的人们，他们做着手势，压低嗓门说话。戈尔德曼唯一的愿望是躺在床上，紧靠着墙，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他只得重新起来在厨房、客厅和房间之间走来走去，但只是有时在浴室里或厨房外面的阳台上找到一个临时庇护所。

25

他穿过迪藏戈夫广场，一直走到迪塔家里，他走了进去。为了庆祝犹太教安息日，迪塔已洗干净，穿好衣服，混身散发出整齐、清洁的气息。她把一张白桌布铺在桌子上，往上面放了两套餐具，一瓶白酒，给他们两人端上安息日晚餐，随着一年年过去，这已成了一种真正的传统。吃过晚饭，戈尔德曼浏览了一下报纸，迪塔高高兴兴地洗着碗。等她洗好了碗，他们便边看电视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戈尔德曼又感到——当他上楼将要按响门铃时，他散步的喜悦已荡然无存——他们之间只剩下许多外表上的习惯，比如安息日晚餐和其它一些令人厌烦的例行公事，从而几乎把他们的全部约会变成毫无意思的苦差事。他知道这个局面无法挽回，但又找不到足够的勇气来结束它，所以电视节目结束后，他又一次勉强在那里呆了好一会儿才与迪塔告别，她也没想挽留他。戈尔德曼回到自己家里，见到斯蒂法娜还坐在客厅里，耶胡迪·梅兹莱陪着她。她穿着一条特别旧的裙子，突然让他想起自己的母亲。他母亲又高又瘦，只懂意第绪语和波兰语，只穿丝绸和羊毛衣服。他在斯蒂法娜脸上见到了同样冷漠、不满，而且越来越傲慢的表情。斯蒂法娜现在已有他母亲去世时的岁数了，她实际上已一天一天地离群索居，竟然完全不理会戈尔德曼父

亲死后第7天和第30天的仪式或者安放墓碑的仪式，一点不想费心到他坟上默哀。她很少谈起他，使人难以相信他们曾经结过婚。这种既看不出一点愤怒也看不出一丝怨恨的举动在她身上是很自然的，就像她一直穿着旧丝绸和丝绒衣服一样，这些衣服似乎越来越适合她。同时，她还读起波兰书籍，与几乎所有到家里来的人讲起波兰话来了——她的波兰语字正腔圆，有贵族味儿。她也以同样的态度不理会玛蒂尔达·勒维阿唐发生的事故。后者穿过马路时被汽车撞了，伤得很重，住了几个星期医院，斯蒂法娜没去看过她一次。事实上，再也没有人能引起她的兴趣了，除了耶胡迪·梅兹莱；在某种程度上，还有纳奥米，也许最近还有她的兄弟雅内克。他穿着山羊皮的尖头鞋、花边衬衫，永远一副花花公子派头，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花露水和香水味，很得某种年纪的女人以及年纪轻轻的傻姑娘的欢心。善良而愚笨的雅内克一辈子都没读过一本书，却自以为是个真正的波兰人，竭力想被上流社会接纳，或者起码仿效上流社会的风度翩翩，优游自在。战前的那个夏天——他在战争中死去——他带她坐小船在河上兜风，当时他们在河边渡假；后来又带着那时才9岁的戈尔德曼到森林里散步（纳奥米没跟他们一道来）。晚上雅内克跟女人们跳舞，因为没有人跳舞比他更棒，玩扑克比他更精。后来，战争爆发了，他也就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当斯蒂法娜与耶胡迪·梅兹莱谈起他时动了感情，她赞美他，情深意切、万分惋惜，从而使他从遗忘的深渊中冉冉升起。耶胡迪·梅兹莱是她唯一要见、而且乐于接待的人。至于其

他人，诸如家族成员、本城的人、邻居、朋友，她都把他们拒之门外，或者对他们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慢慢地他们就不来了。只有特齐梅寡妇无动于衷，照样经常来；还有拉扎尔叔叔和穆瓦什·特泽莱马耶。后者总是看上去满头大汗、战战兢兢。由于他心存感激和自卑的感觉，所以不理会斯蒂法娜的冷淡和令人难堪的目中无人。他来的时候总记得带来一大瓶酒，一盒巧克力或一些鲜花，向她问候，他很清楚对方只会对他点点头或说两三句话，不过他不抱怨，甚至私下也毫无怨言。他继续毕恭毕敬地来探望她，最近心情还有点不安。终于有一天，他再也忍不住了，出门前拉住了戈尔德曼的手臂，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对他说他母亲看上去身体不好。戈尔德曼——他是斯蒂法娜继续用希伯来语与之交流的少数几个人之一——赞同地点点头，他其实并不吃惊，因为很久以来他就在斯蒂法娜的行动中看出了变化的迹象。不过，开始时他宁可不闻不问，然后作为与他无关的现实接受下来，拼命忍住被她母亲引起的愤怒和反感，尽量对她的荒谬言行无动于衷，用无论如何要离开这个家的想法来安慰自己。

开始时，拉扎尔叔叔也说什么也没注意到，或者只觉得她的古怪行为是性格和个人兴趣问题，可能有点怪异，使人不舒服。不过，当她开始涂口红，往脸上抹胭脂，言行越来越古怪时，他就与戈尔德曼谈到这个问题。他很有分寸地建议他找个什么人问问。戈尔德曼听着他说，一声不吭，他一点不想去咨询任何人，相反，他让她为所欲为，让她整天陷于精神混乱中，如果她真是这样的话。他最终也

习惯了，心里对她要多生气有多生气，要多讨厌有多讨厌。他竟然从中看到了她的真正个性的体现，并且想到她本来满可以老是这个样子，还会使他觉得她即使不是较好接近的话，也会较有人情味，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而已。当然，斯蒂法娜什么也没察觉，越来越关闭在自己的天地里，对四周表现出完全的冷漠。到了 8 月的那一天，她收到了曼弗雷德从伦敦寄来的一封信，这封信被搁在客厅碗橱上一个星期，她才把它打开；一读完，她又把它当作一件没用的东西扔在厨房的橱里。她在厨房里给戈尔德曼准备午餐，时间已经晚了。戈尔德曼正在走廊里打电话给伊斯拉埃尔，问他第二天是否愿意陪他去公墓他父亲的坟上。伊斯拉埃尔同意了，戈尔德曼告诉他自己不想一个人去，不过希望伊斯拉埃尔不要勉强。第二天，他们会面后一起到长途汽车站坐公共汽车去公墓。城里的天空一片灰蒙蒙，从早晨开始尘云越来越厚。当他们到达笼罩在烟雾和排出的肮脏的废气里的汽车站时，戈尔德曼没有朝去霍隆的车站走去，却在涌到通往基里亚——夏乌尔车站的人行道和马路上的满身大汗的人群中挤开一条路。跟在他身后的伊斯拉埃尔提醒他，被人群和令人窒息的酷热弄得烦躁不安的戈尔德曼对他说他不会搞错，他继续往前走去，排在队末。上了车坐下来后，伊斯拉埃尔又最后提醒他，认为他的父亲葬在霍隆公墓，不是在基里亚——夏乌尔公墓。戈尔德曼擦了擦脸上的汗，回答说他说得不错，不过，由于管理上的错误，他的父亲被当成另外一个戈尔德曼葬在霍隆；过了一个星期，又被从墓里挖出来，移到基里亚——夏乌尔

公墓，他本来就该葬在那里。这就是他要去基里亚——夏乌尔公墓的原因，是为了查看一下墓穴、墓碑等一切是否安排妥当。查看的过程很短。他们等了一会公共汽车，往回走的时候，天还未黑。落日的余辉透过厚厚的尘雾洒落在所有的地方，营造出奇怪的、不透明的、脏兮兮的微弱光线。太阳被这厚厚的尘雾遮住了，夏日的天空也被蒙上一层沙漠里的沙砾一般的带红色的灰栗色。暮霭缭绕，电线杆、树木、电视天线都隐没其中，稍远处的房屋变成了若隐若现的影子，飘浮在凝滞、潮湿、尘土飞扬的空气里，呼吸都不通畅。他们回到城里后，天才开始黑下来，黑得那么慢，几乎察觉不出来，似乎只是灰蒙蒙的光线颜色变浓了。从长途汽车站步行回来时，他们看见了雾蒙蒙的天空升起了一轮满月，就像一个暗淡无光的蜡制的圆盘。

戈尔德曼感谢伊斯拉埃尔的陪同，请他上楼喝一杯。但伊斯拉埃尔觉得自己混身粘呼呼，很肮脏，便与他道别了。他回到公寓洗澡、换衣服、弹钢琴。没过一会，他听到塞扎尔上楼梯的脚步声；而且，塞扎尔马上便走了进来，他感到很生气。由于炎热和上楼梯的缘故，塞扎尔气都喘不过来了，豆大的汗珠一滴滴往下淌。最近他也长胖了，烟抽得很凶。他摘下了身上沉甸甸的照相机，用同一条湿毛巾一边擦眼镜和他那张毫无表情、阴沉沉的脸孔，一边问伊斯拉埃尔有没有人打电话找他。伊斯拉埃尔回答："我没出去时接过4个电话。"塞扎尔从未像现在这样疲惫、消瘦和气恼。他说如果是坏消息就别告诉他，因为他死了，没力气听坏消息。伊斯拉埃尔说他没法判断消息是好还是坏。

接着，他便去厨房煮开水冲咖啡。塞扎尔不停地擦他的满脸汗水，跟在他后面，问道："谁打的电话？说呀！"伊斯拉埃尔说两次电话与工作有关，他记下了对方的名字和电话号码，他们要求尽早打电话过去。第三个电话是他母亲打来的，她只要求告诉塞扎尔她打过电话来，过些时候她会再打来。塞扎尔说："准是与沙尔娃有关，她要把我弄疯了。"至于最后一个电话是维基打来的，通知他她要外出一个星期，回来时会给他打招呼。因为自从她结婚后，就再也不想让塞扎尔给她打电话。塞扎尔靠在门上说："让他们全见鬼去吧！"瞧他脸上没有一点生气的样子，仿佛他没听见伊斯拉埃尔最后说的话。他站在那里，浑身无力，垂头丧气，点燃了一支烟，一动不动，陷入了完全的麻木不仁中。他把火柴扔到地上，说道："我有些麻烦。"停了一会又说："别担心，我要躲到意大利或美洲去。"接下来又是一阵沉默。塞扎尔对着盥洗盆俯下身，把水龙头打开又关上，他的香烟散发出一阵阵烟雾，烟灰掉到他的衬衫和裤子上，他也没留意。他继续垂头丧气地把玩着水龙头，斜看了伊斯拉埃尔一眼。伊斯拉埃尔始终默不作声，尽管他感到塞扎尔等着他问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他有麻烦。伊斯拉埃尔倒满了两杯咖啡，给了塞扎尔一杯，他们一声不响地喝完了咖啡——塞扎尔只喝了两三口便把杯子放回大理石桌上——塞扎尔拿着相机走进了"暗房"冲胶卷，伊斯拉埃尔洗杯子，坐到钢琴前面重新开始弹奏。过了一个小时，塞扎尔从"暗房"出来，满身大汗，筋疲力尽，他请伊斯拉埃尔去看照片。伊斯拉埃尔进了另一间房，看到

正在晾干的一个大纺织厂的照片，他称赞塞扎尔，塞扎尔对他的赞赏很高兴，说道："这些照片不错。"一点不掩饰自己看这些照片的得意劲儿。他告诉伊斯拉埃尔他想拍电影，伊斯拉埃尔对他说："那就干吧，你还等什么？"塞扎尔说事实上没有什么能阻止他去干，他一脸的踌躇满志。他重新欣赏自己拍的照片，补充道："我才不在乎为别人工作，这对我没影响。"他把背转过去对着照片，把臂肘支在桌子上，从口袋里又拿出一沓色情照片，是别人从德国带回来的。他一张张地看，双目闪闪发光，嘴里说着："你瞧这个。"然后又说："不错，不过我拍的较大。"当他全看完后，就笑着说："也许我也该拍点色情照片，使美观与实用相结合。"他用衣袖的背面擦擦脸上的汗，把色情照片放进其中一个抽屉里，又点了支烟，说道："她离婚了，这个婊子。"伊斯拉埃尔问是谁，塞扎尔从短暂的快乐中清醒过来，又是一脸的疲乏和严肃，他望着伊斯拉埃尔说："埃莉兹拉。"马上又补充："她今天才告诉我，这个婊子，一切都安排好了，你还有什么说的？他们都已与犹太法学博士约好了日期。"他边说边把烟扔到地上，用鞋子踩灭它。

尽管塞扎尔用恳求的目光看着他，伊斯拉埃尔始终一言不发。塞扎尔看上去一点力气都没了，他给自己倒了半杯威士忌，说她之所以离婚是因为他答应与她结婚，不过这个诺言是她硬逼出来的，他许诺时根本不认为有一天会兑现，尤其这么快兑现。只要她不离婚，总之现在不离，他宁可给她几百万。因为如果她离了，他就要在她和泰伊拉之间作出艰难的抉择，这正是他要避免的事情，因为他也

答应了泰伊拉要娶她。实际上，在他心目中，两个年青女人成为互为完美的补充。两人各有优点：泰伊拉喜欢呆在家里，行为得体，无暇可击的忠贞，使他有安全感——更不用说他认为自己很感激她——他同时爱着的埃莉兹拉却是唯一一直吸引他的人，因为她使他时时体验新的乐趣，他们之间在精神和性的方面那么和谐，只要他们结了婚，毫无疑问，尽管有困难，有纠纷，但他们的生活将会像永远过不完的节日。塞扎尔沉默了一会，伊斯拉埃尔问道："两个中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塞扎尔没想到会提这个问题，他又看着伊斯拉埃尔，这是一种受害者的无助的目光，但同时流露出失望和愤怒。他一边把玩着打火机，一边说他两个都喜欢，但如果非要喜欢一个，那就将是埃莉兹拉，然而又不该放弃泰伊拉。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最后停在朝街的阳台前面。伊斯拉埃尔用瘦长的手指卷着一张纸，说道："人们有时不得不作出舍弃。"塞扎尔朝外面看了一眼，说他很清楚，并且补充说："你说得对，非得舍弃一些东西。"不过，他还是被大大地激怒了，因为他一点也不能明白为什么要放弃，也不能接受这个观点，就像他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凡是关系到他的欲望，他的安逸舒适的时候，就会遇到绝望的、没有出路的情况，做不到的事情或者不能解决的矛盾，一定要选择或作出决定。塞扎尔把这一切想法看成是令人遗憾的、残酷的偏见，它们一般来说不是必需的，也不是有道理的。因为就他和他的感情方面来说，生活才刚开始，一定要听从他的意志，而且要心甘情愿地听从；因为他觉得生活是变幻无常的，没有定形的，无缘无

故的，生活中什么都是可能的，他可以把它像电影胶卷那样随意卷起或展开。他就根据这个信念企图去控制他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按他的意愿去塑造它，即使他知道这实际上不可能。他希望事情就是这样，认为自己除了满足个人的愿望之外没有其它义务，因此把任何其它的义务或约束看作为难或纯粹是挑衅。塞扎尔用责备的目光看着伊斯拉埃尔，说道："可是，怎么样离开她，跟她说再见，然后一走了之?"伊斯拉埃尔点点头。塞扎尔既愤怒又失望，神经质地摇晃着大腿，说："那她会自杀的。"他把刚点着的烟从窗口扔出去，又说一遍这对泰伊拉来说太残酷了。他欠了她那么多，因为他曾住在她家里，跟她像丈夫、妻子那样生活，那时她已因他而与家里闹翻了；她可能已错过了结婚的机会。他没有提起流产的事，尽管他记得很清楚。伊斯拉埃尔老用手指卷着同一张纸，只是开口说了以下几句话："她不会自杀的。不过，如果你这么想，那就离开埃莉兹拉，娶她吧!"他注视着塞扎尔愤怒的眼神。塞扎尔说："可是，我爱埃莉兹拉。"大家沉默了一会，塞扎尔喝他的威士忌，又开始在房里踱步，然后停在书桌前面，转身对着伊斯拉埃尔说："她，泰伊拉，有某种，某种说不出来的东西吸引我。"接着又说："这个人有人情味。"最后几句话他说得很庄重，还停了一会，仿佛它们使他脑海里动荡不安的思想得到延续。然后，他又开始在房里来回踱步，思维转向另一方面。过了一会儿，他才说："我跟她一起很拘束。"他一面把书桌的抽屉打开又关上，一面承认他不爱泰伊拉。他开始到她那里只是为了与她睡觉，等他去到第三、

四次时，她建议他晚上住在她那里，他同意了她的提议，因为时间太晚了，他不想惹麻烦。然后，过了两个星期，他又在那里过了一个晚上，最后就留在那里了。并不是因为他找不到女孩子，而是因为寂寞使他沮丧，——那个时候，他离开了家一人住在租来的套间里——因为冰箱里总有可以吃的东西，浴室里有肥皂和干净的毛巾，他的衣物都被洗净烫好放在柜子里。泰伊拉处处都照料周到，此外，她的工作占用了她许多晚上和夜里的时间，使他绝对自由。塞扎尔说完了这些话后，俯身对着工作台，沉默下来了。不过，两分钟后，他又说如果不是害怕埃莉兹拉当妻子不如当情人，尤其怕她不再对他忠贞不二的话，他是不管什么困难、障碍都要娶她的。停了片刻，他补充说他害怕吉德翁知道她还未结婚便与他有瓜葛，认为她是为了他才离婚，他便会一颗子弹打进塞扎尔的脑袋杀死他。塞扎尔一点不掩饰自己的害怕，声音都颤抖了。然后，他又不说话了。他还说："吉德翁是个好小伙子，不过他野心勃勃，缺乏幽默感。"接下来又说："总之，谁都会这样干，这是合乎人情的。"他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女孩子的照片，然后对着伊斯拉埃尔说："我没开玩笑，几天前他打了她。"这回他看也不看伊斯拉埃尔，又喝了一口威士忌才说："你知道，我没法容忍他，这是个卑鄙的家伙。"他看看外头，城市被一层尘雾笼罩——他看了很久——接着，他喃喃自语，好像说给自己听："而且，还有我儿子，我应等他好点再说。"他坐在伊斯拉埃尔对面的凳子上，说如果她已离了婚，或者起码不是为了他而离婚，一切就不同了。他精神好了一点，

又说他不想放弃埃莉兹拉，但他要说服她把离婚延期到冬天或来年春天。他紧紧盯着伊斯拉埃尔的脸，想找出赞同或理解的表示。但伊斯拉埃尔一直沉着脸，没有表情。塞扎尔又恼火又尴尬，手里一边把玩着威士忌杯，一边说："好吧，我要和她结婚，你走着瞧吧！"伊斯拉埃尔只说了句"好吧"。塞扎尔又回到靠近阳台门口的位子，说他觉得事情到目前为止还没发现什么不妥。他不明白埃莉兹拉为什么要离婚，不明白他自己一点不愿意结婚，从来不认为婚姻制度有任何价值，却只因为这两个婊子要结婚自己就得结婚。婚姻在他心目中是一种过时的制度，是另一个时代的残余。它已彻底失败了，它只成功地履行了一种职责，就是扼杀爱情，把丈夫和妻子推进自私自利和斤斤计较之中，把他们的生活变成地狱，就好比菲利浦和佐哈拉，他自己的父母，戈尔德曼的父母，或者还有分手前的阿维格多尔和吕阿玛的生活一样。此外，他还主张男人要多妻，而且认为应该一直保持下去，世界上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否认他的真正的本性，把他绑在一个女人身上，就算这女人是布里吉特·巴尔多本人也不行。

26

刮起一阵热辣辣的微风，从房间的门窗吹进来，吹起了塞扎尔的几绺头发。尽管他一直徒劳无功地涂抹荷尔蒙

洗剂和其它制品，但头上仍然只剩下稀稀疏疏的一点头发。他盯着对面的白墙，一言不发，然后关上窗户，说道："如果我知道我第一次为什么要离婚就好了，归根结蒂，那还不至于那么糟糕。"又说："都是由于那个下流胚吻了她。"确实，蒂尔扎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一个男人骗了他，这事把他毁了，他无法把它从记忆里抹去，也不能克服屈辱和嫉妒的感觉，尽管时间减轻了他在最初时刻感受到的痛苦。那时，他天天缠着她，逼她详详细细地，一次又一次地向他讲述这是怎样发生的，他们怎样遇见的，去过哪里。他不停地问她，问她为什么同意，有没有快感，他的阴茎是不是比他的大。同时，他在好几个星期里还想发现她的情人是谁，他想见他，也许想跟他谈几句。不过，他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因为蒂尔扎被他重重复复的问题激怒了，越来越不愿回答，坚决不向他透露那个男子的名字和可以认出他的某些细节。尽管这样，当她还是告诉他——塞扎尔认为是双重的侮辱——他们互相不认识，他是个医生时，塞扎尔仍不断地询问她，因为她的不忠使他受到刺激，受到震动，痛苦的回忆长时期折磨着他。当后来他与吕阿玛的决裂使他万分苦恼，不能自拔时，他又想起了这件事。他为了自己受损的名誉进行报复，与蒂尔扎大吵大闹、辱骂她、侮辱她，他们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分了手。不过，不管他怎么说，蒂尔扎的不忠并不是离婚的理由——顶多是个补充理由——实在是由于他自私，不想或是不肯放弃某些东西，或履行自己的义务；还有电影、杂志、埃尔温和贝什、空虚无聊的愿望以及那种要征服尽可能多的女人，不

停地显示自己的力量和男子气概的没完没了的需要也是离婚的原因。现在，就好像在任何发生危机和不幸的时刻那样，他感到了一种既现实又带感情色彩的冲动，突然说道："那次离婚是个大错误，我的行为像个孩子。"接着又说："我最终要回家去。"他说这些话时很诚恳，若不是他当时已确信事情已不可挽回的话，他是几乎马上就要按他所说的去做。不过，他仍然沉湎于这种想法中，他说："对于我来说，这是最好的，我跑够了。你想她会重新接受我吗？"伊斯拉埃尔说他想会的。这时，电话铃响了，塞扎尔突然紧张起来，请求伊斯拉埃尔去听，并且说如果是埃莉兹拉便说他该是出去拍照片了，要晚些回来，也许要到第二天才回。真的是埃莉兹拉用公用电话打来的。当伊斯拉埃尔向她转达了塞扎尔的话时，她只是说："好的，你告诉他我打过电话来便行了。"伊斯拉埃尔告诉她会告诉塞扎尔的，然后便挂了电话。他把她的话告诉了塞扎尔，塞扎尔依然闷闷不乐，极为后悔，现在后悔中又掺进了新的东西。他说："她很出色，我要娶她，让其它一切见鬼去吧！我不在乎。"他喝完了威士忌，说他肯定能说服她推迟离婚。他把空杯放在桌子上，拉住伊斯拉埃尔的衬衫，对他说："你瞧着吧，她不会这么快离婚，目前不过说说罢了。威士忌使塞扎尔心情好转，尤其是他刚刚向伊斯拉埃尔说的一番话使他受到鼓舞，心情舒畅起来。

外面，云开雾散，慢慢露出了夏天灿烂的太阳。塞扎尔点燃了另一支香烟，说他喜欢夏天，喜欢像巴西或墨西哥的某个穷人那样过一种自然的生活，优游自在，洗洗海

水浴，跳“桑巴”，找女人；这种生活没有奢望也没有忧虑。或者像那个美国女游客，她一点不想知道自己跟谁吃饭、上床，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事，什么样的男人的顺风车她都敢坐，陪他们一段路，既没什么很大的希望，也没有义务。塞扎尔说起这一切时语气挺惋惜，但也含有幸福的成分，似乎他的梦想正在实现，或者明天将要实现。他心不在焉地看着街对面的阳台，那边有个年青姑娘坐着写东西，他看了她好一会，然后突然转向伊斯拉埃尔，说道：“尽是废话，一切都会解决的。我们今晚去看电影还是去佐哈拉家？”伊斯拉埃尔说：“看看吧！”塞扎尔把那包香烟塞进衬衣口袋，手绢放进裤子口袋里，说道：“这个美国女人走了真可惜。”他拿了照相机说该回父母家了，因为沙尔娃死了，他这一辈子才见过她两回。伊斯拉埃尔陪他走到门口，待塞扎尔走到楼梯，他便在钢琴前坐了下来。但是房间里酷热难当，尤其是与塞扎尔谈话很累人，使他无法集中精神。因此他决定出去阳台，把双肘支在栏杆上，任由海上吹来的凉爽的穿堂风轻轻拂过。风吹散了无法忍受的炎热，他看着街上的行人和塞扎尔的大汽车。这是一辆“普利茅斯”，上面布满灰尘，还有一道道擦痕，它被丢在屋子前面。过了一小会儿，他以为看见埃拉走过来，心怦怦地跳，既高兴又愤怒，因为她已两星期没来看他了。从一开始，就是这么一种喜悦与愤怒的结合支配着他们的关系，使这种关系成了一连串的指责、拒绝、充满柔情和悔恨的和解。他们的争吵开始得快，结束得也快，吵的时候伊斯拉埃尔因为仇恨，那颗心既冷酷又痛苦，竭力尽可能残酷地去伤害她，尽

管他意识到自己对她不公正。他的残酷主要表现在拒绝、持久的沉默和固执。埃拉一再对他讲话、微笑、拥抱他，甚至怯怯地哀求他，力图使他平静下来，令他高兴，可是毫无用处，她的做法只是加深了他的敌意，使他更沉默。他看着女孩子从阳台下面走过，经过“普利茅斯”旁边。塞扎尔正想把他的车子从沿着人行道停靠的一排车子中开出来。伊斯拉埃尔不会开车，他现在看着车子开动，在街道右边一个急转弯消失不见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过去的延续
作者＝（以色列）雅可夫·沙伯塔依著　　麦梅娟　　谢咏译
页数＝２４０
ＳＳ号＝１０４９８３６９
出版日期＝１９９５年０３月第１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